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1-26-2013

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研究

King Yung, Anna T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soc_etd

Part of the [Sociolog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鄭琴淵 (2013)。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研究 (碩士論文, 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soc_etd.33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研究

鄭琴淵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零一三年

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研究

鄭琴淵

此論文為社會科學哲學碩士（社會學）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一三年

論文撮要

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研究

鄭琴淵

哲學碩士

1956 年，聯合國發表第一部研究世界人口老齡化的專著《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向全球發出人類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命運的預警。聯合國老齡化問題世界大會，先後於 1982 年和 2002 年召開，制定多項行動綱領和目標計劃，呼籲各國遵照和參與。

1981 年，香港步入老齡化社會。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調查報告，當時 65 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口佔香港總人口的 12.4%，預計到 2033 年，將會高達 26.8%。香港一向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安老政策，回歸之後，亦以「老有所養」作為治港方針之一。目前的趨向是政府取代了多種傳統家庭的養老功能，狹窄的稅基是否能承擔得起龐大的福利開支？香港如何完善香港現時退休保障制度？為人子女供養父母的責任仍應否存在？或以立法強制子女供養父母是否可行？如此種種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文以社會學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程序、技術進行研究，並與法社會學相關的基礎理論有機地結合，通過歸納分析逐步產生理論。設計出分為三個階段完善的特設框架：（一）文獻分析及初步歸納認為應有立法方向：在眾多文獻中提煉出主幹性的資料，包括國際社會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政策和方針，遠古中國的養老法律制度；探討「孝」具有「齊家治國」的奧妙；概述世界各國供養父母的立法情況；擷取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進行比較；採用受英國普通法直接影響的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為藍本，以香港特質建構一套初步的法例結構框架；（二）將此框架交於專業人士驗證；（三）此框架經過優化後成為較可行的步驟，進行個案試行及模擬調解。指出對抗制訴訟體制可能激化家庭矛盾，建議在進入訴訟程序之前必須設立「贍養調解前置機制」。

本文冀能收拋磚引玉之效，以喚起政府及早完善長者多支柱生活保障的長

遠策略，並就贍養父母議題展開公眾諮詢，引發各界進行討論，醞釀社會的共識，達到尋得真理的預期目標。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鄭琴淵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畢業論文核准頁

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研究

鄭琴淵

哲學碩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SIGNED

(主席)

羅榮健博士

SIGNED

(校外考試委員)

徐永德博士

SIGNED

(校內考試委員)

陳章明教授

導師：

陳章明教授

副導師：

李經文教授

代教務會核准：

SIGNED

施雅德教授

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26 NOV 2013

日期

目錄

表列.....	xi
圖列.....	xiii
鳴謝.....	xv
第一章 導論.....	1
1. 本文的研究背景.....	1
1.1.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1
1.2. 近代世界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及瞻養父母立法的導向	6
1.3. 香港研究立法瞻養父母的契機	7
1.4. 香港政府對瞻養父母的基本原則	10
1.5. 概述各界對香港瞻養父母立法的討論	12
1.5.1. 應否立法的討論	12
1.5.2. 養老責任誰屬的論點	15
2. 研究題目的緣起.....	20
3. 研究目的和意義.....	21
4. 研究範圍.....	23
5. 論文內容.....	25
6. 研究方法.....	26
第二章 國際社會人口老齡化工作目標與長者權益保障.....	28

1. 聯合國關注老齡化問題的歷史和背景.....	28
2.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及福利制度的改革.....	29
2.1. 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情況	32
2.2. 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情況	34
2.3. 20 世紀 70 年代前的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	37
2.3.1.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發展歷程	37
2.3.2. 20 世紀 70 年代前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特點	42
2.3.3. 20 世紀 70 年代前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發展的動因 ..	44
2.3.4.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功能	45
2.4. 20 世紀 70 年代後的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改革帶來的啟示	46
2.4.1. 改革的原因——福利國家的危機	46
2.4.2. 改革的概況	49
2.4.3. 改革的啟示	52
3. 近代各國對老年人權益保障及贍養父母的立法概況.....	54
3.1. 部份國家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概要	54
3.2. 近代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的特徵	57
4. 家庭養老的特點及東西方家庭養老的差別.....	61
4.1. 家庭養老的特點	61
4.2. 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的差別	65

5. 小結.....	71
第三章 中國歷史上養老功能演變與現代國家養老政策.....	73
1. 中國古代社會贍養的演變.....	73
1.1. 原始群習慣向氏族習慣的轉變	73
1.2. 母系氏族習慣向父系氏族習慣的轉變	77
1.3. 父系氏族習慣向奴隸制習慣的轉變	79
1.4. 夏朝奴隸國家的產生和贍養法律的起源	82
1.5. 中國贍養法律起源的特點	84
2. 中國歷代有關尊老養老贍養的法律與制度.....	87
2.1. 夏商周時期（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前 771 年）	87
2.2. 漢朝時期（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	93
2.3.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公元 220 年至 581 年）	96
2.4. 唐朝時期（公元 618 年至公元 907 年）	98
2.5. 宋朝時期（公元 960 至公元 1279 年）	105
2.6. 元朝時期（公元 1206 年至公元 1368 年）	110
2.7. 明朝的時期（公元 1368 年至公元 1644 年）	113
2.8. 清朝前期（公元 1644 年至公元 1840 年）	116
2.9. 清末和民國時期（公元 1840 年至公元 1911 年）	119
2.9.1. 清朝末期對傳統法制的改革與禮法之爭	119

2.9.2.	民國時期養老政策的發展	122
2.10.	新中國有關瞻養父母法律的發展	124
3.	儒家的孝道思想及其對中國瞻養立法的影響.....	127
3.1.	儒家孝道思想的內容	127
3.2.	儒家思想法律化及孝道對中國封建立法的影響	139
3.2.1.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遠因	139
3.2.2.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過程	142
3.2.3.	漢代法律儒家化與董仲舒學說	143
3.2.4.	漢代法律儒家化的主要內容	146
3.2.5.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儒家化的主要內容	150
3.2.6.	唐朝完成法律儒家化的過程	153
3.2.7.	唐朝法律儒家化的主要內容	155
3.2.8.	《唐律》起承前啟後的作用及對後世的影響	161
4.	中國瞻養歷史文化對近代處理瞻養糾紛的啟示：調解制度的興起與情理法.....	164
4.1.	中國古代調解制度的起源	164
4.2.	中國古代的主要調解形式	167
4.2.1.	情理為先的民間調解	167
4.2.2.	情理法兼備的官府調解	168

4.2.3.	調解為先的官批民調	169
4.3.	「無訟」思想對古代調解制度的影響	170
4.4.	「和諧」是古代調解制度的核心思想	171
5.	小結.....	172
第四章	香港養老政策的概況.....	174
1.	香港安老理念及政策進程.....	174
1.1.	60 年代至 70 年代——安老服務的萌芽和奠基.....	174
1.2.	80 年代至 90 年代——安老服務的拓展	175
1.3.	特區政府的安老理念及政策	176
2.	老年人口的特徵.....	177
3.	現時香港退休保障制度.....	180
3.1.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180
3.2.	社會保障	182
3.3.	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	193
4.	香港家庭養老的內涵和實踐.....	194
4.1.	香港家庭的變遷	194
4.1.1.	工業化對香港家庭模式的影響	195
4.1.2.	移民潮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	196
4.1.3.	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197

4.2.	子女供養父母現況	198
4.3.	老年人的角色和地位	201
5.	小結.....	202
第五章 研究方法.....		206
1.	研究框架.....	206
1.1.	文獻分析及初步歸納認為應有立法方向	207
1.2.	框架交由專業人士作評證	208
1.3.	個案試行分析	208
2.	概述研究方法及前期工作.....	209
2.1.	紮根理論的起源與基本思路	209
2.2.	研究設計模式	210
2.3.	蒐集資料	212
2.4.	理論觸角與閱讀文獻的關係	212
2.5.	文獻的運用和互動關係	213
2.6.	比較	214
2.7.	資料分析的具體步驟	215
2.7.1.	整理資料	215
2.7.2.	閱讀原始資料	219
2.7.3.	分析資料的技術	220

2.7.4.	描述	221
2.7.5.	核心範疇	222
2.7.6.	操作程序及方法	222
2.7.7.	條件矩陣	224
2.7.8.	編碼	228
2.8.	建構理論	243
第六章 創建框架及個案試行分析.....		245
1.	香港應透過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	245
1.1.	立法的背景	245
1.2.	立法的目的	246
1.3.	立法的意義	247
1.4.	建議法律框架	247
1.4.1.	簡稱	249
1.4.2.	釋義	250
1.4.3.	贍養父母審裁處的設立	250
1.4.4.	贍養令的申請	250
1.4.5.	應訴人連帶方	252
1.4.6.	贍養命令	252
1.4.7.	審裁處命令為贍養提供擔保的權力	254

1.4.8.	贍養命令的期限	254
1.4.9.	審裁處變更或撤銷贍養命令的權力	255
1.4.10.	禁止讓與贍養利益	256
1.4.11.	贍養命令的執行	256
1.4.12.	喪失能力的申請人	256
1.4.13.	任命贍養父母專員	257
1.4.14.	贍養父母審裁處的組成	258
1.4.15.	審裁處對申請的聆訊及裁決	261
1.4.16.	審裁處或專員所要求的資料	264
1.4.17.	藐視法院	265
1.4.18.	審裁處提請特別案件要求高等法院裁決的權力	266
1.4.19.	高等法院審議審裁處的訴訟程序	267
1.4.20.	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267
1.4.21.	訴訟費用	268
1.4.22.	行政長官修訂附表的權力	269
1.5.	本法令的立法歷程	269
2.	驗證結果.....	270
2.1.	成立「贍養父母審裁處」的可行性	271
2.2.	建議內容，程序及可達至調解結果的意見	271

2.2.1.	調解的提出	271
2.2.2.	調解的安排及過程	273
2.2.3.	調解可達至的結果	273
3.	如何補救法律的不足及未能解決的問題.....	273
3.1.	引入調解制度補救對抗制訴訟的弱點	273
3.2.	落實長者調解服務建議作為《贍養父母》本地立法的前期 工作	274
3.3.	通報及舉辦報機制	276
3.4.	個案試行分析	277
3.4.1.	模擬調解	277
3.4.2.	個案試行分析	280
第七章	結論.....	291
1.	現代養老制度的立法保障.....	294
2.	中國優良傳統的揚孝敬親.....	302
3.	總結.....	313
4.	論文不足之處.....	316
4.1	理論框架	316
4.2	研究方法	317
4.3	環境現實	317

參考文獻.....	319
-----------	-----

附註.....	331
---------	-----

附件一 聯合國老齡化問題的文獻撮要

附件二 概述部份國家和地區的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

附件三 概述部份國家和地區的家庭養老

附件四 香港贍養父母典型個案

表列

表 1	世界 60 歲或以上人口由 1950–2050 年的變化.....	3
表 2	世界 65 歲或以上老年人口由 1950–2050 年的變化.....	4
表 3	人口老齡化.....	5
表 4	1975-2050 年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及老齡人口贍養比.....	34
表 5	人口接近或超過 1 億的國家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絕對數.....	36
表 6	社會保險在部分西方國家的發展進程.....	39
表 7	歐洲國家社會政策部分專案的覆蓋率變化情況.....	43
表 8	福利國家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佔 GDP 的比例（1960–1980 年）.....	44
表 9	主要工業化國家退休人口與生產性勞動人口的比例變化趨勢.....	47
表 10	部份國家和地區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概要.....	54
表 11	比較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58
表 12	世界部分地區老年人口（60 歲以上）居住安排.....	67
表 13	20 世紀 80 年代部分國家老年人收入來源情況.....	69
表 14	清朝末期對傳統法制的改革與禮法之爭.....	120
表 15	自 2000 年 1 月起與家人同住長者獨立申請綜援的數字.....	183
表 16	1999–2009 年綜援個案的分類數目.....	186

表 17	自 2001–2002 年起長者領取綜援個案的分類數字及金額.....	188
表 18	自 1999–2000 年起，長者領取「普通高齡津貼」及「高額高齡津貼」 的個案數字及金.....	191
表 19	2009–2010 年度社會福利署的開支預算.....	193
表 20	不同年齡群人士對供養父母的意願.....	200
表 21	長者的理想和真實的角色和地位.....	202
表 22	各級編碼的作法及任務.....	222
表 23	條件矩陣一般性質.....	225
表 24	開放性編碼與情境說明.....	229
表 25	主軸編碼.....	235
表 26	選擇性編碼.....	241
表 27	調解服務進程模式.....	275
表 28	個案試行分析.....	281
表 29	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比較.....	300
表 30	新加坡、中國、香港保障長者權益立法比較.....	301
表 31	《中國歷代養老的法律與制度》概覽.....	303
表 32	傳統家庭和現代家庭的規範和功能比較.....	308
表 33	傳統孝道和現代孝道的對應特徵.....	312

圖列

圖 1	65 歲以上人士佔總人口的比例各國之間的比較.....	5
圖 2	1950–2050 年世界人口生育率與預期人口壽命.....	30
圖 3	世界人口金字塔.....	31
圖 4	60 歲以上人口比重全球分佈情況.....	33
圖 5	香港人口老化趨勢.....	178
圖 6	2007–2033 年總人口、長者人口及老年撫養比率的推算.....	179
圖 7	1961–2006 年的長者數目及比例.....	180
圖 8	1999 年 12 月–2009 年 12 月綜援個案的分類百分比.....	185
圖 9	1994–2008 年綜援個案的分類數目.....	185
圖 10	1994／1995 年度至 2003／2004 年度綜援開支對比整體政府經常開 支.....	188
圖 11	1998／1999 年度至 2008／2009 年度綜援開支對比整體經常政府開 支.....	189
圖 12	紮根理論基本思路.....	210
圖 13	建構主義的探究循環設計模式.....	211
圖 14	研究互動關係圖.....	214
圖 15	資料分析的組成部份：互動模式.....	219
圖 16	條件矩陣.....	225

圖 17	研究方法流程.....	244
圖 18	贍養令申請的流程.....	270

鳴謝

我懷着百感交集的心情感謝我的導師陳章明教授，2008年9月他以有教無類的理念取錄了我這個高齡學生，帶領我走進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迎來了我的第二生命，實現我終身學習的願望。三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涯，得到陳教授不遺餘力地指導，不捨不棄的提携，使我能夠在艱辛的研究道路上奮勇前進，達到預期的目標。感謝副導師李經文教授的時加指南，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使我擴闊了研究視野，豐富了論文的内容。

我必須感謝嶺南大學各位領導和教授，感謝社會及社會政策社會系主任蕭愛玲教授的鼓勵和關心，Professor Brian Bridges 傳授精粹的研究方法。

我要特別感謝林錫光律師和盧錦華太平紳士為論文擔任驗證，寫下精辟的意見和論定。亦感謝黎俊翹先生為我的論文稿件擔任校對工作。

我還要感謝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的各位同事劉穎娜、李詠妍、鍾雅雯、陳永聰、鄧珮頤及陳曉欣。他（她）誠懇熱衷的無私支持，令我畢生難忘。還有校務處、圖書館、資訊科技服務中心等各部門的協助和支援，使我能享用各項設施，促進我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和順利完成各項既定的學習進程。

在研讀過程中，也要感謝我三位子女對我殷切的關愛，從添置電腦、參考

書籍、到家務助理的安排，都盡顯「反饋」的真情，促使我建立學習信心、培養堅毅的精神，享受我第二生命中的校園生活。同時也感謝我外子的支持和關懷。

借此機會，感謝我的同窗、教友、同事、各界友好對我的鼓勵和關心。

最後，再次向我的導師、以及關心和支持我的老師、朋友和家人致以最衷心的謝意和敬意。

第一章 導論

1. 本文的研究背景

人類的祖先在歷史長河中發明了曆法，把常人生活在自然空間的時間，用日曆作為計算單位，每過一個週年就是增加一歲。這就是人口學、老年學常用的日曆年齡，也叫做年代年齡。(鄔滄萍，2006)按年代年齡劃分常人的社會群體，大概有兒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老年群體又分低齡老年人口(65歲至69歲或60歲至69歲)、中齡老年人口(70歲至79歲)和高齡老年人口(80歲或以上)。(熊必俊，2002)當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比重增加達到一定的程度或壽命延長時，就是進入老齡化進程的現象。根據聯合國1956年發表的《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的統計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或65歲以上人口總比例分別超過10%或7%，即屬人口老齡化型社會。因應各國國情的分別，老齡化程度有所差異，用高齡人口在老年人口中所佔比重來說明人口高齡化的程度。

1.1.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後，生產力提高，大大改善人類的生活質素。人類受惠於科學發明，醫療進步，加強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抵禦災害的能力，改進防疫措施，傳染病得以控制，發達國家的死亡率逐漸下降，相對地人類的壽命趨向增長。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推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生產者為了

加強生存的競爭力而追求高水平教育和技能，婦女爭取平等自由而紛紛投入生產市場，人類對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的改觀，醫學節育知識和避孕技術的提高，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都是促使育齡群擺脫生育累贅的原因，也是構成人口老齡化的要素。

19 世紀末，法國、瑞典、挪威等國家率先步入老齡化社會，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在 20 世紀紛紛宣告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到來，21 世紀將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朝向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依據聯合國的 2006 年世界人口預測，60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 2000 年的 9.9%，上升到 2025 年的 15%，2050 年是 21.8%（表 1）；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 2000 年的 6.9%，上升到 2025 年的 10.5%，2050 年的 16.2%（表 2）；年齡中位數將由 2000 年的 26.4 歲，上升到 2025 年的 31.9 歲，2050 年的 36.8 歲。（田雪原，2007）現時 65 歲以上老年人超過 18% 的國家，計有日本、瑞典、意大利，16% 以上的有奧地利、英國、瑞士、法國、西班牙、德國等，其次，加拿大、澳洲、美國及荷蘭等也超過 13%（表 3）。到了 2050 年，超過 20% 的有英國、美國、瑞典、新西蘭、加拿大、澳洲，超過 25% 的有荷蘭、法國、德國，至於日本、意大利、香港、希臘更超過 30%，其中尤以意大利達 36%，而香港次之，達 32%（圖 1）。佔世界總人口 21% 的中國於 1999 年踏入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65 歲或以上的人口將由 2010 年的 8.38%，到 2020 年的 11.83%、2030 年的 15.98%、2040 年的 20.98% 及 2050 年的 21.8%。

(蕭捷，2007)

表 1：世界 60 歲或以上人口由 1950–2050 年的變化

年份	人口（每千）	（%）
1950	204 974	8.1
1955	222 793	8.0
1960	243 541	8.0
1965	271 732	8.1
1970	308 017	8.3
1975	345 714	8.5
1980	378 145	8.5
1985	424 224	8.7
1990	482 150	9.1
1995	540 849	9.5
2000	608 690	9.9
2005	672 820	10.3
2010	764 906	11.1
2015	896 763	12.3
2020	1 037 187	13.5
2025	1 200 877	15.0
2030	1 337 074	16.6
2035	1 545 030	18.0
2040	1 687 748	19.1
2045	1 840 308	20.4
2050	2 005 746	21.8

資料來源：聯合國¹

表 2：世界 65 歲或以上老年人口由 1950–2050 年的變化

年份	人口（每千）	（%）
1950	130 847	5.2
1955	144 686	5.2
1960	159 287	5.3
1965	175 952	5.3
1970	200 323	5.4
1975	228 834	5.6
1980	260 752	5.9
1985	283 453	5.8
1990	321 861	6.1
1995	369 633	6.5
2000	420 952	6.9
2005	477 358	7.3
2010	528 517	7.7
2015	605 946	8.3
2020	719 416	9.4
2025	838 702	10.5
2030	976 920	11.7
2035	1 123 342	13.1
2040	1 259 127	14.3
2045	1 370 410	15.2
2050	1 492 055	16.2

資料來源：聯合國²

表 3：人口老齡化

國家	(%)	國家	(%)
・日本	19	・英國	16
・瑞典	18	・奧地利	16
・意大利	18	・荷蘭	14
・德國	17	・美國	13
・西班牙	17	・澳洲	13
・法國	16	・加拿大	13
・瑞士	16		

資料來源：《全球華人孝親敬老研討會論文集》³

圖 1：65 歲以上人士佔總人口的比例各國之間的比較

資料來源：The Retirement Village Industry in Australia: Evolution, Prospects, Challenges⁴

1.2. 近代世界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及瞻養父母立法的導向

面對世界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的嚴峻挑戰，國際組織制訂各項綱領和工作方針作為各國加強保障老年人權益的指標，包括通過法制化，使各項老年人保障制度有效地運作。2002 年第二次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在馬德里召開，發表的《政治宣言》共有 19 條，旨在政治上、宏觀上提出問題，其中以第 5 條為最集中表達對老年人保護的政治目標：

我們重申決心不遺餘力地促進民主，加強法治，促進性別平等，並增進和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發展權。我們決心消滅一切形式的歧視，包括年齡歧視。我們確認，隨着人們年齡的增長，他們應當享受充實、健康和有保障的生活，並應積極參加各自社會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我們決心增進對老年人尊嚴的認識，並消除對老年人的一切形式的忽視、虐待和暴力。

宣言強調透過加強法治、保護人權、發揚平等自由。消除對老年人的歧視，讓老年人享受充實、健康和有保障的生活。當老年人所享有的各項合法權益被法律確定下來後，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強制性來予以有效保護。老年人社會福利走向制度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而通過相應的法律來規範福利的供給

與需求，則是社會福利制度化的基本要求。由於各國的歷史背景、人民素質、社會發展、經濟狀況、政治因素、人口結構的特徵、老齡化程度的差異，各國實施的政策和法律的規定也就不同。目前保障老年人權益的立法模式主要可分兩種：一種是將保障老年人權益的條款分散或包含在其他相關法律中，多數從屬於社會福利政策或社會保障制度；另一種是專門為老年人立法保障模式。目前為保障老年人權益專門立法的國家並不多，而大多數來自經濟較發達的國家或亞洲國家。如美國、澳洲、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和中國等。〈附件二〉將會概述部份國家的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

1.3. 香港研究立法贍養父母的契機

縱觀以上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立法情況，西方國家強調點多數以個人為切入點，而家庭的功能卻較少被引入作為養老政策一部份。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西方社會是「先富後老」，故此在人口老化問題衍生之前已積聚到足夠財富以應付所帶來的需求（如退休保障、醫療服務）。與此同時，西方家庭經過多年的工業發展洗鍊，由農業社會的擴展式家庭轉變為適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核心家庭（兩夫婦及其未婚子女，父母並不包括在內）。而早在 20 世紀初在西方工業國家制訂養老福利政策時，都已沿用個人及其家庭（核心家庭）為依據的政策思維。養老或護老的政策便自然是傾向個人承擔或受助的模式，於是乎政府必需為不能自理的老人負責基本生計。然而這種福利養老模式的背後是要龐大的稅收予以維

持。

香港並不是「福利社會」，不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政府需要為市民「從搖籃到墳墓」負上責任。自從 1965 年第一部社會福利白皮書發表以來，政府的福利是協助性的，社會福利署不會在個人未盡全力前給予援助。香港回歸之後，仍以關懷長者是每個家庭的責任為基調作為施政方針之一。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在處理安老福利政策時，被人的感覺是「慢、散、薄、弱」；也有不少社會人士曾建議香港的福利政策應仿效西方發達國家。眾所皆知，優厚的社會福利背後必需要有龐大的財政支持。誠然，香港有過數十年的風光歲月，國民生產總值（GDP）由 1961 年的 2,347 港元上升至 1977 年的 207,194 港元，據統計，平均每年 GDP 的增長率為 15.7%。（香港統計處，2011）回歸之後，市民當家作主了，老百姓對政府的期望自然有改變，普選議席的增加，選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立法者的取向。1997 年，政府因財政充裕而增加長者服務，確實產生全民福利的傾向。唯好景不常，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0 年科網泡沫，1998 年，香港 GDP 出現負增長，由 1977 年的 11% 的年增長率下降到 2002 年的 -0.8%。（香港統計處，2011）繼之，2003 年非典型肺炎肆虐、伊拉克戰爭爆發，令香港經濟陷入谷底，財政赤字高企，政府不得不推行不受歡迎的開源節流措施，削福利、加稅、減薪等壓力之下，令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2006 年，香港經濟漸漸復甦，令 2008 年庫房充裕，要求政府增加福利之聲四起，政府採取謹慎理財的態度。財政司所言：「人

口老化亦為公共財政帶來沉重壓力，在收入方面，由於工作人口減少，入息稅的稅基更趨狹窄，同時，各類與長者有密切關係的開支，例如醫療、長期護理及社會保障，則隨着人口老化而大增。」語重深長、引發省思。2008 年下半年，發生的世界性金融海嘯，香港再度面臨財赤問題；市民面對失業、減薪、削福利、物價高企的壓力，申請社會綜合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個案自然增加；強積金供款者受投資失利、回報率低的摧殘；許多老年人依賴一生的積蓄收取銀行利息維生，受滙率波動、幣值不穩、外圍因素等影響，導至銀行存款利息微薄，逼使這群自食其力的老年人走向「食穀種（吃老本）」的困境。可見香港老年人賴以維生的三大經濟支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社會保障經濟支援和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將會面臨重大的沖擊。

西方發達國家也有過慘痛的經驗，20 世紀 70 年代石油危機引發世界性經濟危機，龐大的福利開支成為福利國家的沉重包袱，使許多西方國家陷入所謂的「福利困境」；隨之改革福利制度成為當時政府的重要工作。主要提出的問題是：社會福利究竟是誰的責任？公辦福利是否唯一的選擇？甚麼類型福利制度最能滿足社會需要？「福利多元主義」的理論開始抬頭，一方面強調福利服務由公共部門、公私營企業、家庭與社區共同負擔；一方面主張弱化政府的作用。到近幾年，過往強調「由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如北歐，英國都宣佈這種福利養老在低生育率及老齡化（包括老齡人口增加，人均壽命延長）情況下難以維持，歐

盟需要透過「跨代承擔」促進多代友好的政策來緩和養老開支。簡單地說是要返回昔日的「大家庭」互相照應的願景，務求在一般鄰里及家庭照顧上由社區自行料理。亞洲地區，以福利先驅國見稱的日本，2008 年 4 月推行徵收「長壽醫療保險」措施，試圖解決日後老人醫療開支超標問題，向 75 歲的老年人徵收保險費，定期從老年人的養老金戶口扣除有關金額，涉及的老人達 800 萬人。（符祝慧，2008）剛踏入 2010 年，法國、希臘、西班牙等地的政府擬延遲退休年齡而遭公民群起示威、罷工，表達擔心退休保障被削減。新加坡和中國先後於 1995 年和 1996 年通過立法強制子女供養父母獨立法案。2008 年 7 月印度國會通過強制子女贍養父母議案，初期將在首都德里實行。（Jayaram, 2008）看來，國際社會為建立和維持安老良策，以促進老齡化社會的祥和與安定，各項安老政策都在不斷嬗變演進、精耕細耘。西方國家的歷鍊和福利改革的動向，鄰近亞洲國家的贍養父母立法實踐，這些給香港帶來了甚麼啟示？一個社會變遷中的養老問題該怎麼辦？如何為日益龐大的弱勢社群（老人）謀求福祉？為下一代舒解壓力而籌謀獻策，正是孵化研究的目的和導向研究的目標。

1.4. 香港政府對贍養父母的基本原則

香港推行「家庭養老」的政策是有跡可尋的，早在 1965 年政府發表的第一部白皮書《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指出：「在香港由中國各地傳入的傳統價值及義務觀念，迄今只受到極有限度之破壞。所以進行社會福利服務

工作首先注意者為防止敗壞社會風氣之影響獲得支配社會之勢力，或任其加速破壞天賦或傳統之責任感。例如不應鼓勵家庭自然單位將其照顧老弱者道德上的責任，委諸公立或私立之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家庭保持完整成為健全之自然單位，以照顧年幼、殘廢或年老成員，而不至將遺棄」。(香港社會福利署，1965) 1993 年由當時港督委任的老人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中指出：「現行的老人服務政策，是鼓勵家庭成員在家庭環境內照顧老人，以及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香港社會福利署，1994) 1998 年，當時的社會福利署署長梁建邦認為「供養父母的責任應首先在子女身上，若子女沒有經濟能力，亦要証明能力水平，政府才會承擔」。(梁洵瑜，1998) 1998 年 12 月政府委派三人小組到新加坡考察立法強制供養父母有關的議題，(Hon，1998) 這說明香港政府已注意到新加坡養老政策的動向。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特首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強調關懷長者是每個家庭的責任。以「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作為治港方針之一。老有所養對社會的穩定起重大的成用，也是人類共同的願望。但誰來養？誰能養？怎麼養？政府該做些什麼？子女該做些什麼？社會人士如何理解養老問題？老年人本身可以做些什麼及享有哪些權利？縱觀香港社會經濟越是發達，家庭卻越是鬆散，照顧成員的能力越是薄弱，這又是何解？目前的趨向是政府取代了多種傳統家庭的養老功能，說成是人心所向，但為人子女供養父母的責任仍應否存在？或如何維持？又或以立法強制子女養老是否可行？傳統的孝道與家庭養老有何關係？對老者來說又是否可以接受？如此種種

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香港在英國統治達百年之久，法律制度是奉行普通法系，家庭觀念既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保持固有的儒家傳統「孝道」思想。在這種情況之下，建議立法強制子女贍養父母，如何探討社會人士的看法？如何研究立法的各項細節及其可行性？如何看道德與法律的關係？孝道與供養父母有何關係？香港現時家庭養老的情況如何？長者的角色和地位又是如何？

1.5. 概述各界對香港贍養父母立法的討論

1.5.1. 應否立法的討論

1998 年 6 月，臨時市政局議員周潔冰向行政長官、60 位候任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署、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提出書面建議，認為香港應規定有經濟能力的子女必須供養父母，並推動政府就立法一事展開諮詢。引發各界掀起一番熱烈討論，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簡何巧雲作出回應，指出社署仍在初步搜集資料的階段，將會派人到新加坡取經。（明報，1998）近年來，不但媒體經常發表關於香港應否立例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討論，該議題也成為學生的關注點。例如皇仁舊生會中學 2009 至 2012 年新高中戊班通識科網誌，以「政府應否立法規定子女供養父母」作為議題討論⁵，「應」方與「否」方可就（1）父母和與兒女、（2）傳統和現代家庭觀念、（3）道德責任義務、（4）家庭及工作環境、（5）感

情、(6) 社會、(7) 經濟、(8) 可行性等表達觀點角度。雙方皆有精辟意見，資料顯示，參與「應」方的討論較為踴躍。

前文已述，香港政府養老政策一向強調供養父母首要的責任是子女，政府只幫助那些子女沒有能力供養或無所依靠的長者。香港面對人口老化的壓力，養老意識日趨薄弱，立法強制子女贍養父母必定引發強烈的爭議。摘錄各界的意見如下：

(1) 1998 年，《蘋果日報》調查指出：在 229 名表示正在供養父母的被訪者中，有 68%贊成政府立例規定子女供養父母，只有 19%的被訪者反對，餘下 13%表示沒有意見；在 102 名當時尚未供養的被訪者中，同樣有 68%贊成立法規定供養父母；有 20%反對，餘下 12%表示沒有意見。(梁洵瑜，1998)

(2)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表示：反對立法規定子女供養父母，認為透過基本教育，如公民教育或倫理教育，讓人懂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是重要和有效。(明報，1998)

(3)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指出：要達致特首董建華的老人福利目標，不能徒能空言，而要「老有所養」，也愈來愈清楚不能寄

託於空泛的傳統孝道精神，也不可能長期依賴不斷擴大的老人福利承擔，立法規定子女供養年長父母，不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方向。（鍾劍華，1998）

(4)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學學院研究員陸緋雲認為：要解決和減輕社會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途徑之一乃要弘揚和彰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孝道」觀念，使中國人「父慈子孝」雙向的家庭養老模式，能夠繼續保持下去，使香港社會在吸納、傳播與融合西方文明的同時，也發揚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陸緋雲，1998）

(5) 《松柏之聲》指出：老人擔心立法會破壞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中國人有「家醜不外揚」的觀念，大多數長者難以接受與子女對簿公堂。（香焯，1999）

(6) 《文匯報》的社評認為：內地及新加坡等都以立法的方式，確立子女對父母及父母對子女的贍養義務。當子女不孝或父母不養子女時，父母或子女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討回自己的權益。這種中華傳統美德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加以保證的做法，向社會傳遞一個清晰的信息，即贍養父母或子女不僅僅是道德要求，更是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在香港社會家庭價值和倫理觀念淡薄的情況下，特區政府不妨借鑒內地和新加坡經驗，研究訂立相關法律。（文匯社評，2006）

(7) 胡志偉牧師指出：孝親是希伯萊民族與中華民族所重視的，聖經十誡內與人有關的第一條：「當孝敬父母」，而孝道一向是中國的文化精粹。聖經倫理與中國文化同樣尊重長幼有序的和諧關係。當子女孝順雙親，經濟上供養父母，正是信徒表達敬虔的生活。(胡志偉，2006)

綜觀各方面的意見，立法強制贍養父母具有正面的功能，如：紓緩政府開支；仿倣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提倡孝道，創建和諧家庭；把家庭養老制度化；令香港養老制度更趨完善；為保障長者權益增添一支柱；提升長者晚年生活的安全感等。當然也有負面的功能，如：訴訟引致成員之間感情破裂；打官司破壞跨代共融；長者難以接受與子女對簿公堂；產生不良的標籤作用；必須顧及長者的顏面問題等。

1.5.2. 養老責任誰屬的論點

香港應否立法強制子女贍養父母固然是極富爭議性的問題，養老責任誰屬也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該是家庭責任還是社會責任？不妨從政府早期的相關政策說起。1965年，政府發表的白皮書《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就創建社會安全及其他社會福利措施的目的指出：「此等福利服務之目的可能僅在協助個人在其需要幫助期間，維持最低限度之生活水準，或盡可能協助其恢復往日之自立能力。」，「任何社會若求經濟健全，則應盡量使每一市民能成為社

會資源之供應者而非消耗者。」《白皮書》就影響香港社會福利工作發展之社會因素道出：「在香港由中國各地傳入的傳統價值及義務觀念，迄今只受到極有限度之破壞。所以進行社會福利服務首要注意者為防止販壞社會風氣之影響獲得支配社會之勢力，或任其加速破壞天賦或傳統之責任感。例如不應鼓勵家庭自然單位將其照顧老弱道德上的責任，委諸公立或私立之社會福利機構。」又指：

「依照中國人傳統，凡因貧窘、過犯、疾病或天災等等而有所需求之社會福利措施，均屬個人問題，至少在理論上應由其家庭或在必要時由其家族負責。所以，基於社會與經濟方面之理由，香港應盡力支持與鞏固這種『家庭』責任感。」

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以「老有所養」作為治港之方針之一，養老責任屬於家庭的定調沒有改變，梁建邦在 1998 年任職社會福利署署長期間，回答記者詢問香港子女供養父母問題及長者生活費不足問題時稱：「供養父母的責任首先應在子女身上，若子女沒有經濟能力，亦要証明其能力水平，政府才會承擔。」按以上的說話來看，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有以下幾種含意：（1）從經濟原則出發；（2）社會福利的工作的大前題是防止販壞社會風氣及遏止消耗社會資源；（3）社會福利的資源只協助有需要的個人（意思是無依無靠的人士）；（4）香港養老的價值觀及義務觀念是源自中國各地；（5）養老是宣揚良好的社會風氣（筆者意味是孝道）；（6）養老是家庭成員必然要承擔的責任，是家庭成員履行道德上責任；（7）市民不應把養老的責任委諸公立或私立之社會福利機構；（8）若子女沒有能力供養父母，必須提出証明，包括資產申報及接受審查。如果根

據以上的思路下定論，養老的責任是家庭責任，家庭成員必須承擔的道德責任，屬於家事範疇，不應是社會責任。

1965 年的《白皮書》在社會因素中提到，香港社會並非渾然一體的社會，也不具備由演進而成，解決社會福利問題必須為大眾所接受之各種傳統與價值。指出：「世界各地亦均隨都市化與工業化而俱來之影響。遭受此種影響之普遍現象是：家庭成員間之聯繫及其他傳統之情誼以及彼此間之義務均趨鬆弛、冷淡；過去被重視之社會價值與倫理觀念漸遭漠視；罪惡成為商業化，以及缺乏任何可據以培養社會責任感之共同理想……。」看來，政府對香港家庭養老政策受社會因素問題影響早有遠見，可惜半個世紀來，香港面對急劇變遷的家庭結構的變化、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們壽命增長、出生率低等社會因素，政府沒有盡力支持與鞏固這種「家庭」責任感，也沒有致力培育這個親手催生的「家庭養老」政策，看來，現時香港養老屬家庭責任的政策只能是概念，政府沒有給予家庭成員實質的支援和配套，家庭養老實難以重拾昔日的光景，目前政府已取代多項傳統家庭養老的功能是不爭的事實。

家庭養老的意識日趨薄弱的原因，除了受上述各種因素所影響，筆者認為應重視以下兩點：

(1) 政府對家庭支援不足：目前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援及配套可以說極之不足，法例也含糊不清，舉例：如果子女有心供養家中老人願意與父母同住，但經濟能力不足，一般來講老人不可以單獨申請綜援，政府也沒有設立合理的給予老人的補貼制度。1999年前，與家人「同住不同吃」的長者，方可以單獨申請綜援，1999年後，規定與家人「不同住」的長者才可以單獨申請綜援。在這種「一刀切」制度之下，為了生活，子女不得不簽署「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分家紙」或「衰仔紙」。領取綜援的長者，如果收到子女私底下給予些津貼，必須向社署申報或適量扣除津貼金額，這種制度令到有心要盡孝而能力不足的子女感到沮喪。現時簽署「分家紙」的子女無需申報經濟能力或接受資產審查，即使家財豐厚，一張「分家紙」就可以把養父母的責任委諸社會或政府，政府也無從理會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私下協議。從目前實際情況來看，有人的確因經濟困難被逼做「衰仔」；有的是不顧道德責任而作「衰仔」，這種香港獨有的養老制度經常被人所非議。老人搬離家庭，沒有了完整的家，子女如何盡家庭養老之責？這豈不是家庭養老政策的大諷刺。

(2) 孝道隨世而轉，重塑迎合所需：筆者認為傳統的孝道特點是：泛孝主義的延展性、刻意塑造的角色性、不合時宜的他律性、欠缺道義的獨益性、情理為先的絕對性；而現代的孝道的特點應是：崇尚親情的局限性、自然本色的感情性、文明社會的自律性、符合法理的多樣性、適當輔助的替代性。欲縮小

跨代文化的差異應該重塑孝道的功能和作用，不應偏頗儒家文化的傳統思想，也不應站在源自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視角審視孝道，應該是按香港現實情況，透過立法把「善養」父母的家庭養老制度鞏固下來，讓養老的價值觀和義務觀念在家庭與社會間充分發揮其功效。

簡言之，筆者認為香港的養老問題，不單是「私人事務」或「家庭範疇」，而需要透過「公共討論」作為填補這些真空地帶。正如丁國輝教授言：「單靠傳統的價值觀念，不足以使家庭肩負起照顧老人的主要責任，社會有必要填補這些真空地帶」⁶。本文的討論期望達到以下目的：（1）有助於香港家事法體系的完善，構成對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的全面保障；（2）補充現時養老制度的不足，堵塞社會福利開支的法律漏洞；（3）為長者提供法律層次的贍養來源；（4）贍養父母的道德義務本是具有自發性，同時也具有不穩定性，當發覺道德義務產生不穩定時，需要考慮透過立法把它鞏固下來；（5）立法只是制定最低的道德標準，懲罰少數的違反者；（6）法律和道德雖然表現形式不一樣，但兩者具有發生重合的意義，立法必須符合道德標準基礎，道德往往依靠法律推行，兩者產生相互轉化作用。（7）本文強調透過調解處理家庭成員之間因贍養父母問題產生之糾紛，協助各方簽署具法律效力的和解協議書，但如有一方不履行義務時仍然要訴諸於法院，更何況調解制度是屬於各方自願性參加，如果一方採取不合作的態度，調解淪於徒勞無功、無牙老虎，無法達到調和的目的，因此必

須有凌駕性、強而有力的法律作後盾；(8) 透過立法達到宣傳教育的目的；(9)

養老責任應該是個人、家庭、社會、政府共同承擔的責任。

2. 研究題目的緣起

我生長在原屬英國殖民地砂拉越（Sarawak）的一個小鄉鎮詩巫（Sibu），位於婆羅洲島的北部，清末時期中國福建省福州籍人士黃乃裳帶領鄉親漂洋過海去到那裡墾荒建區，故有小福州之稱。上世紀 60 年代砂拉越脫離英國統治併入馬來西亞（Malaysia）版圖，成為馬來西亞東部的一個重要的州。砂拉越雖受英國統治達百多年之久，早期的華人社區的家庭保持固有的中國傳統思想。人們有濃厚的宗族觀念，數代同堂、多子多孫，被視為是家庭和睦興旺的象徵。在鎮裡每個人必須嚴格遵守祖制和家訓，「不孝」被視為是傷風敗德的行為。老人家在家中有崇高至上的地位。「養老」、「敬老」、「尊老」是與生俱來的天職，修身齊家是立世的根本。孩童三歲起，尤其是男孩，祖輩或兄長就會教他們背誦三字經、弟子規、千字文、百家姓，女孩以學習料理家務、女紅為主。兒媳輩必須懂得侍奉家中長輩，如朝晚給長輩倒茶、請安。踏上 21 世紀的今天，祖兒孫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況仍然很普遍；鄰舍關係良好，充分發揮互助的精神。鎮上雖然有官辦的老人院，只有極少數的無依無靠的老人入住。

20 世紀 70 年代初我負笈香港，初時看到老年人單獨浪蕩街頭、悶坐公園、

露宿天橋底，總會好奇地想：他（她）為甚麼不回家？他（她）的家人呢？80年代初我遷入灣仔居住，偶而到活道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做義工，有一次看到有項「關心老人工作小組敬老運動週」的宣傳單張，我感到很奇怪，關心老人應是發自內心的本性，是每個人應該做的天經地義之事，何必刻意加以工作小組的框架，而且還要大張旗鼓地「運動」起來呢？1983年秋天我加入灣仔區敬老大會的義工行列，開始對香港社會老人生活的認識，漸漸領悟到香港人口結構的特點。

我於 1985 年 開始擔任灣仔區議員，並擔任灣仔區議會社區建設委員會關心老人工作小組主席，由此，養老、敬老文化細胞在我體內擴張、澎湃，老人工作觸動了我的心。歲月不居，時節如流，27 年光景就此別過，留下了許多不同滋味的回憶。近年，長者投訴個案有增加的趨勢，老年人的工作也就愈來愈忙，個案多是因為老年人口快速增長此其一，老年人曉得善用社區資源此其二；忙是因為使命感、逼切性和個人的興趣。同樣地，由於老年人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導致不少個案難以解決，更何況有許多個案是涉及錯綜複雜血緣親情問題。雖有義憤填胸之懷，也只能徒嘆奈何。翻閱舊檔案，故事中的人物歷歷在目，在稍後的個案分析中再作分享。

3. 研究目的和意義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口結構急劇變化、高齡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到香港

的社會保障制度處於發展機遇和問題嚴峻的相互交叉點，處於十字路口的香港養老政策該走那一條路？養老的責任誰屬？怎麼樣的安老福利政策是香港政府所能承受？怎麼樣的養老制度會得到社會大眾認同？怎麼樣的制策可持續性發展？目前長者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靠三大支柱：（1）強制性公積金；（2）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保障；（3）個人積蓄、投資和年金（Annuity）。前文已提及（1）和（2）的不足之處，至於（3）蓋括範圍較廣，大部份長者靠銀行存款利息或投資而取得收入，銀行利息隨着經濟因素、金融狀況而波動，投資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雷曼事件的教訓就是個例子。⁷ 較保守的長者，寧可節衣縮食、粗茶淡飯、過着簡樸清貧的生活，不敢做任何投資，也不會向政府求助。當然，最幸福的一群是由子女供養的老人家。現時香港家庭結構改變，長者在家庭中地位式微，傳統的敬老護老的文化已逐漸褪色，家庭養老的功能日漸薄弱，引入子女贍養父母的立法討論，對香港來說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問題。贍養的意義是什麼？贍養的範圍包括哪些（物質贍養：衣、食、住、行、醫療、娛樂；精神贍養：侍奉、慰藉、尊重）？香港是中國人社會，受儒家思想、家庭倫理的濡染，但曾被英國統治達百年之久受西方文化的薰陶，中西文化迥異。費孝通先生說：「在西方社會，子女對父母沒有贍養的義務，而中國卻是子女負有供養父母義不容辭的責任。西方是一代一代的接力模式，中國是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反饋模式。」（費孝通，1998）藉着香港處於人口結構變化十年窗口的契機，研究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的可行性，有助重整家庭養老功能，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使命。本文提出的論點，與現時

的香港退休制度和社會福利保障起相輔相成作用，達到並駕齊驅的效果，為現時長者退休生活經濟來源的三大支柱之外穩固樁腳，由三足鼎立的格局走向四平八穩的情景。研究的目的，以家庭養老為出發點，社區輔之，強調長者的生活需要有個溫暖的家庭、長居久安的社區、貼近民情的政府。香港的家庭養老制度要向規範化和社區化的目標進發。那麼立法的程序又如何？法律的功能有哪些？法律有哪些弱點？法律不能夠解決的問題有哪些？香港是否具備成熟的條件立法強制子女贍養父母？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必須經過層層剖析、深化研究，方能達到預期目標。

4. 研究範圍

根據中國老年學專家鄔滄萍的說法：從老年人作為社會群體一部份的視角來劃分，認為老年人合法權益包括了兩部份內容：一是作為公民應該享有普遍權益，二是作為老年人應該享有特殊的權益。（鄔滄萍，1983）本文以老年人應有被贍養扶助的權利作為研究的範圍，大約有以下幾點：

1. 回顧香港安老服務的歷程，概述現行社會福利政策和退休保障制度而帶引出研究的目的；
2. 參考聯合國老齡化問題世界大會綱領和行動計劃作為背景資料，認識國

際動態和近年世界各國保障長者權益的立法及家庭養老的情況，選定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和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作為討論焦點；

3. 香港是華人社會，一向以「家庭養老」作為安老政策，被英國統治達百年之久，家庭觀念既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保持固有的儒家孝道傳統思想，研究中國古代歷代養老立法情況和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演進，孝道對中國社會及後世的影響，是本文研究範圍的重點之一；

4. 由於本論文的討論最終目標是應否立法，鑒於父母子女之間特別的親屬關係，道德義務法律化可能會破壞家庭的和諧，從而動搖家庭的穩定性，這是立法考慮中的焦點。因此如何引入調解制度也是本文研究範圍的重點之一。

5. 贍養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經濟贍養；二是日常生活的照料；三是情感支持。本文研究的核心範疇以法為本體，中心範疇是權利、義務；法律行為、法律關係，研究的設計之一是有具體條文的法律框架，把研究範圍鎖定在物質贍養，參考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條文說明申請人申請贍養令的前題是基於：「父母沒有能力足夠地供養自己是指他的整體或預期的收入和其他經濟來源不足夠支付他的基本物質需要，包括（但不限於）住所，食品，醫療開支和衣服。」日常生活的照料和情感支持，兩者涵蓋廣泛、含意繁多，難以用文字條文

固定下來，建議政府透過教育宣傳，建立長者友善社區，以提升對長者照顧和關愛。此外，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對精神瞻養方面作出立法，條文內容空洞，過於空泛，實踐證明難以操作。

5. 論文內容

第一章・導論。簡介研究的背景、擬訂題目的目的和意義、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及思路。

第二章・國際專題。以全球性的國際視野探討國際社會對老齡化問題的工作和發展。世界各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及對養老政策的影響；20 世紀 70 年代後西方國家出現福利危機而進行改革及帶來的啟示；近代世界部份國家和地區對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立法情況，家庭養老的形成和特徵，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的比較。

第三章・中國專題。研究中國歷代有關尊老及養老的史實；論述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孝道對社會的影響；儒家思想對後世的啟示。

第四章・香港養老政策概況。探討香港家庭結構的演變；論述香港安老及政策進程；探討現時的香港退休保障制度。

第五章・研究方法。本文研究方法採用社會學質的研究之紮根理論，分為三個階段完成特設框架：（1）文獻分析及初步歸納認為應有的立法方向；（2）建構法例雛型交由專業人士驗證；（3）個案試行分析及模擬調解。

第六章・創建框架及個案試行分析。建構法例雛型，闡釋引入調解制度補救對抗制訴訟的弱點，再交由專家驗證。經優化後進一步融入香港現實的典型個案予以分析，輔以模擬調解。

第七章・結論。從社會學角度循實踐過程去探討長者權益法律保障的核心要素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而勾劃出本文的理論主線，分為兩部份：（1）現代各國養老制度的立法保障；（2）中國優良傳統的揚孝敬親。

6. 研究方法

從本文的命題的字面來解讀看，有可能屬法律社會學/社會法學(Sociology of Law)的學科。由於本文研究的重點並不是書本上的法，而是以社會學從日常生活及平常人實踐的視角去理解和分析法律涵蓋的核心要素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意義，因而依循社會學的領域選擇研究方法。本文立基於社會學質的研究之紮根理論研究方法、程序、技術進行研究，並與法律社會學相關的基礎理論有機地結合，通過歸納分析逐步產生理論。

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搜集資料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2005）與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質的研究特別強調對研究者的個人背景進行反思。質的研究認為，研究者的個人生活和工作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個人的經歷和看法不僅影響到個人從事研究的方式，而且對研究本身來說是十分有價值的經驗性知識。本人從事區議會工作超過 26 年之久，主要的服務對象是長者，對長者的需要、社會的真實情境、香港政府的安老政策、世界性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老齡化問題對香港的影響等，都有充分的認識和興趣。

紮根理論是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結果。換言之，紮根理論是經由系統化的資料搜集與分析，而發掘、發展，並已暫時地驗證過的理論。因此，資料的搜集和分析，與理論的發展是彼此相關、彼此影響的。發展紮根理論的人不是先有一個理論然後去證實它；而是，他先有一個研究的領域，然後自此領域中萌生出概念和理論。（徐宗國，2005）

第二章 國際社會人口老齡化工作目標與長者權益保障

1. 聯合國關注老齡化問題的歷史和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人口突出特點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激增，戰後初期許多發達國家也出現短暫「嬰兒潮」。那時人們對人口問題的關注集中在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上，但一些發達國家的學者對人口老齡化已開始有所研究。1940年美國人口學家雷蒙·帕爾（Raymond Pearl）發表著作《人口老齡化》，最早提出並使用人口老齡化這一概念，但是作為生物學派人口學家的代表之一，把人口現象歸結為生物現象的理論決定了他不能揭示人口老齡化的真正含義。（黨俊武，2004）這篇論文為進一步研究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奠定了基本框架，對後來各國以及聯合國有關組織的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0 世紀 50 年代，隨著研究發達國家人口轉變的深入和歐洲生育率調查研究的開展，人們對人口老齡化的認識水準不斷提高，老齡問題開始受到聯合國的關注。聯合國人口司委託法國人口學家皮撒（Bourgeois Pichat）專門研究人口老齡化問題，並於 1956 年根據研究成果發佈了《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一書，該書提出 65 歲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的 7% 可稱為老年型社會，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和關於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重要理論；同時指出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還將繼續，在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已經開始，並在未來有加快的趨勢。這部著作是系統性研究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奠基性報告，標誌著人口老齡化

研究達到新的認識階段。此後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探討在國際範圍內不斷升溫。(黨俊武，2004)

1969 年第 24 屆聯合國大會上，馬爾他國代表提議在聯合國大會上增列「年長與老年人問題」這一專案，1973 年第 28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年長和老年人問題」的決議；1978 年第 33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 33/52 號決議，決定在 1982 年召開第一次世界老年人大會，專題討論老年人問題。1980 年第 35 屆聯大通過 35/129 號決議，決定將「世界老年人大會」更名為「世界老齡問題大會」；決議還決定成立世界老齡問題大會諮詢委員會和世界大會信託基金；同時要求各國成立老齡問題國家一級的機構，以便展開有關的活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先後於 1982 年和 2002 年召開，制定了多項指導性的綱領和工作目標，詳情將在〈附件一〉中敘述。

2.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及福利制度的改革

人口老齡化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的 10%，或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的 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人口老齡化現象始於 20 世紀的發達國家，並逐步蔓延到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目前全世界人口老齡化正在迅速發展，發展趨勢不可逆轉。造成人口老齡化的直接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生育率的下降，一個是壽命的延長。根據聯合國統計，從 1950 年開始，全球生育率出現急劇下降，而平均預期壽命則呈不斷上升趨勢。1950 ~ 1955 年生育率為 5.0，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5 個孩子，而到 2005 ~ 2010 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 2.7，並預計在 2045 ~ 2050 年下降到 2.1。另一方面平均預期壽命從 1950 ~ 1955 年的 46.6 歲上升到 2005 ~ 2010 年的 66.5 歲，並將在 2045 ~ 2050 年達到 75 歲（圖 2）。

圖 2：1950-2050 世界人口生育率與預期人口壽命

資料來源：聯合國⁸

受此影響，世界老年人口數量急劇增長，佔總人口比例不斷攀升。1950 年，全球 60 歲以上人口總數為 2.05 億，佔總人口比例為 8%，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為 5%。而到 2007 年，全球 60 歲以上人口總數已達 7.05 億，比 1950 年增長了 3.5 倍，佔總人口數比例 11%，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比例達到 8%。預計到 2050 年，全球 60 歲以上人口總數將超過 20 億，佔總人口數量比重高達 22%，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比例達到 17%，（UN DESA PD，2007b）屆時世界老年人的數量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年輕人的數量。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全球人口金子塔正由 1950 年的三角形結構逐步向圓柱體狀結構轉變（圖 3）。此外，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化。目前在 60 歲及以上的人口中，有 1/8 的人口為 80 歲及以上老年人，該年齡段人口以每年 3.9% 的速度增長，成為增長最快的人口。至 2050 年，預期將有 1/5 的老年人達到或超過 80 歲。（UN DESA PD，2007b）

圖 3：世界人口金字塔

資料來源：聯合國⁹

這種全球性的人口結構變化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具有重大影響。在經濟領域，人口老齡化將對經濟增長、儲蓄、投資、消費、勞動力市場、養恤金、稅務和代際間轉移產生影響。在社會領域，人口老齡化影響到家庭組成和生活安排、住房需求、遷徙趨勢、流行病以及保健服務需求。在政治領域，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影響投票格局和政治代表性等。

需要看到的是，雖然都面臨著不可逆轉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狀況，包括人口老齡化進程和發展速度、老年人數量和比例方面以及老年人的生活和發展狀態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2.1. 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情況

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進程早、程度深。老齡化社會最早出現於 20 世紀歐洲地區，尤以法國最為明顯。而目前人口老齡化程度較深的地區也主要是世界發達地區，包括日本、歐洲、北美及大洋洲地區。根據聯合國 2007 年統計，發達國家 60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平均比例已高達 20.7%，其中排名前十位的國家為日本、意大利、德國、瑞典、希臘，澳大利亞、保加利亞、比利時、拉脫維亞、葡萄牙（圖 4）。

圖 4：60 歲以上人口比重全球分佈情況

老齡人口瞻養比（65 歲以上人口/15 ~ 64 歲人口），即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表明每 100 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是從經濟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會後果的指標之一。半個世紀以來，伴隨著老齡人口比的不斷增長，發達國家老齡人口瞻養比也不斷攀升（表 4），給其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養老金制度）帶來了嚴峻挑戰和深遠影響。

表 4：1975-2050 年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佔

總人口比例及老齡人口瞻養比（%）

國家	老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老齡人口瞻養比			
	1975 年	2000 年	2025 年	2050 年	1975 年	2000 年	2025 年	2050 年
澳大利亞	8.7	11.9	17.4	22.3	14	18	28	38
比利時	13.9	16.4	22.0	25.0	22	25	36	43
加拿大	8.4	12.6	20.5	24.5	13	18	33	42
丹麥	13.4	14.7	19.7	21.1	21	22	32	35
芬蘭	10.6	14.6	22.3	22.6	16	22	37	38
法國	13.5	16.2	22.5	26.4	22	25	37	47
德國	14.8	15.9	21.8	29.2	23	23	34	52
意大利	12.0	17.7	25.6	35.7	19	26	41	69
新西蘭	8.7	11.3	15.9	20.4	14	17	25	33
挪威	13.7	15.0	19.5	21.6	22	23	31	36
西班牙	10.0	16.5	22.7	34.6	16	24	35	66
瑞典	15.1	16.7	21.6	23.2	24	26	36	39
英國	14.0	15.8	20.3	23.2	22	24	33	39
美國	10.5	12.4	18.3	21.2	16	19	29	35

資料來源：聯合國¹¹

2.2. 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情況

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進程較發達國家稍晚。截至 2009 年止，發展中國家老年人口只佔總人口的 11%，預期到 2050 年這個數字將上升到 22%，（UN DESA PD，2010）這意味著本世紀中葉，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進程可能進入與目前發達國家所處相同階段。但相對發達國家經歷的逐漸老齡化過程，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很快，適應人口老齡化影響的時間更少。例如，在法國，老年人口從 7% 上升到 14% 用了 115 年，而在中國僅用 27 年就達到了同樣

的人口增長率。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呈現一個隨著經濟和社會穩步增長而逐漸進展的過程，經過了幾十年以及幾代人，而在發展中國家，這個過程被壓縮為兩或三個十年。因此，發達國家在他們人口老齡化前已經變得富裕，而發展中國家在物質財富增長之前，其老齡化就發生了，（[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2003](#)）這種發展問題和人口老齡化問題帶來的雙重挑戰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

雖然目前發展中國家老年人口比重水準低於發達國家，但老年人口絕對數量卻遠遠超出發達國家（表 5）。2007 年，有約 4.5 億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約佔全世界老年人口（約 7.05 億）的 65%，預計至 2025 年，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老年人將達到 8.4 億，佔全世界老年人口的 72%。（[UN DESA PD，2007b](#)）

表 5：人口接近或超過 1 億的國家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絕對數（以百萬計）

2002 年		2025 年	
中國	134.2	中國	287.5
印度	81.2	印度	168.5
美國	46.9	美國	86.1
日本	31.0	日本	43.5
俄羅斯	26.2	印尼	35.0
印尼	17.1	巴西	33.4
巴西	14.1	俄羅斯	32.7
巴基斯坦	8.6	巴基斯坦	18.3
墨西哥	7.3	孟加拉國	17.7
孟加拉國	7.2	墨西哥	17.6
尼日利亞	5.7	尼日利亞	11.4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¹²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還在老年人口結構方面存在其他重要區別。目前，在發達國家，絕大多數老年人生活在城鎮地區，但在發展中國家，多數老年人生活在農村地區。對人口結構的預測表明，到 2025 年，發達國家 82% 的人口將生活在城鎮；而發展中國家生活在城鎮的人口不到其總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農村地區的老年人比率超過生活在城鎮老年人比率。（聯合國，2002）這也使得發展中國家養老金制度、養老服務產業等養老政策上與發達國家有所差異。

在發展中國家內部，老齡化的進展和速率是有所差異的。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預計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將佔總人口的 20% ~ 2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於繼續同愛滋病鬥爭，再加上經濟和社會困難，老年人數目將僅及上述比例的一半。（聯合國，2002）

2.3. 20 世紀 70 年代前的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

2.3.1.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發展歷程

福利制度又稱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化生產時代建立起來的，是現代化大生產系統中的配套制度。雖然它的歷史淵源比較長遠，其雛形在工業化之前早就存在，但是直到近現代大工業迅速發展的時期，社會保障制度才被建立和迅速發展。它既是經濟結構變革與發展的要求，也是家庭功能轉變和增進個人福利的需要。福利制度最先出現並發展於西方工業化國家，其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 19 世紀上半葉以前：社會救濟事業發展，社會保障制度萌芽。如 16 世紀以前英國教會和地方政府已經開始收容、救濟貧民，或作為一種宗教慈善行為，或作為一種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宜之計。1601 年《伊莉莎白濟貧法》是政府以立法形式開展社會救濟活動的開端。1669 年法國政府頒佈世界第一部《年金法典》，規定對不能從事工作的老年海員發給一定的養老金，儘管這一制度僅僅適用於海員，但卻是制度化老年社會保障的開端。

(2) 19 世紀 80 年代初到 20 世紀 30 年代：社會保險事業出現，西方各國相繼初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德國俾斯麥政府最早推出了一批具有現代性質的社會保險法案，於 1883、1884、1889 年分別通過了《疾病社會保險法案》、《工

傷事故保險法》及《老年和殘疾社會保險法》，於 1927 通過了《失業社會保險法》，從而構建了德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礎。（姜向群，2005）其他西方國家也相繼建立了本國社會保障制度（表 6）。與西歐相比，美國的社會保險制度起步較晚，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之後，美國政府才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於 1935 年通過《社會保障法》，建立了包括養老金制度、失業保險制度、救濟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聶明雋，1995）

表 6：社會保險在部分西方國家的發展進程

國家/年份	第一個險種	工傷保險	養老保險	疾病保險	失業保險
德國	1883	1884	1889	1883	1927
奧地利	1887	1887	1906	1888	1920
丹麥	1891	1898	1891	1892	1907
挪威	1895	1895	1936	1909	1906
芬蘭	1895	1895	1937	1963	1917
英國	1897	1897	1908	1911	1911
意大利	1898	1898	1919	1943	1919
法國	1898	1898	1910	1928	1906
荷蘭	1901	1901	1913	1913	1916
瑞典	1901	1901	1913	1891	1934
澳大利亞	1902	1902	1908	1944	1944
比利時	1903	1903	1924	1944	1920
加拿大	1908	1908	1927	1966	1940
瑞士	1911	1911	1946	1914	1924

資料來源：《現代社會保障》¹³

(3) 20 世紀 40 年代到 70 年代：福利國家出現，社會保障制度高速發展。

1941 年，英國成立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部際協調委員會，著手制定戰後社會保障計劃。經濟學家貝弗里奇（W. T. Beveridge）受英國戰時內閣部長、戰後重建委員會主席亞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委託，出任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部際協調委員會主席，負責對現行的國家社會保險方案及相關服務進行調查，並就戰後重建社會保障計劃進行構思設計，提出具體方案和建議。第二年，貝弗裡奇根據部際協調委員會的工作成果提交了題為《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的報告，即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該報告分析了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對以往提供的各種福利措施進行了反思，並系統勾畫了戰後社會保

障計劃的宏偉藍圖，確立了戰後英國福利體系重建的基本框架，標誌著福利國家思想開始由理論轉變成現實。

該報告從英國現實出發，指出貧困、疾病、愚昧、骯髒和懶惰是影響英國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五大障礙，並據此提出政府要統一管理社會保障工作、通過社會保障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建議。報告設計了「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整套社會福利制度，提出通過社會保險、國民救助和自願保險三個層次保障人們不同需要的重要觀點。其中社會保險用以滿足居民的基本需要，社會救濟用以滿足貧困需要，自願保險用以豐裕居民的需求。國家將為每個公民提供包括養老、疾病、殘疾、死亡、工傷、失業和家庭津貼等社會保險項目，此外還提供全方位的醫療和康復服務，並根據個人經濟狀況提供國民救助。報告指出，社會保障應遵循以下四個基本原則：一是普遍性原則，即社會保障應該滿足全體居民不同的社會保障需求；二是保障基本生活原則，即社會保障只能確保每一個公民基本的生活需求；三是統一原則，即社會保險的繳費標準、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須統一；四是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即享受社會保障必須以勞動和繳納保險費為條件。（貝弗里奇，2004）這些原則的提出和實施使社會保障理論更加豐富和趨於成熟。

1945 年英國舉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次大選，工黨在大選中提出承

諾，要使國民普遍享受到福利，使國家擔負起保障公民福利的職責，這一口號就是要將《貝弗里奇報告》從理想變為現實，因而深得人心，最終工黨以絕對多數在大選中勝出。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擔任首相後，即根據《貝弗里奇報告》進行了一系列社會保障立法：1945 年頒佈了《家庭補助法》，對有 15 歲以下的兒童、或是年滿 15 歲但未滿 18 歲正在接受教育的兒童的家庭給予補助；1946 年頒佈了《國民保險法》，實行強制性的全國保險制度。該法規定，凡受完中等教育（16 歲），已經就業，而又沒有達到領取養老金年齡（男 65 歲，女 60 歲）的公民，都必須參加國民保險，交納保險金，參加了保險的人在遭遇年老、失業、疾病、工傷等風險時有權享受社會保險津貼，其中凡交納國民保險費 3 年以上的英國公民，達到退休年齡（男 65 歲，女 60 歲）都可以申領國家基本養老金。同年還頒佈了《工業傷害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前者對工業勞動者實行工傷保險，後者則建立了全體國民免費醫療制度。《國民健康服務法》規定，所有民辦醫院和市政醫院都收歸國有，在英國居住滿 3 個月以上的人（包括外籍人士），不論男女老少均可享受免費的國民健康服務。其中老年人是該法案的主要受益者。1948 年頒佈的《國民救濟法》，作為上述法律的補充，對不能享受上述法律保護的人，或雖享受但仍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人提供補充救濟。該法規定凡沒有收入或收入太低而又沒有交納國民保險金者，可以領取國民救助金；老年人、患病者、殘疾人和處於其他需要救助情況的人，還可以向地方當局申請住宿和膳食等社會救濟服務。五部法律同時於 1948 年 7

月 5 日生效，過去的有關立法一概廢除，英國歷史上著名的《濟貧法》在經過了 300 多年後也告終止。上述五部法律共同構築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化和對公民社會保障權利的全面保障。1948 年英國首相艾德禮宣佈英國已成為福利國家。（林嘉，2002a）

《貝弗里奇報告》和英國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影響到了整個歐洲。瑞典、芬蘭、挪威、法國、意大利等國也紛紛仿效英國，全面建設國家福利制度，相繼宣佈建成福利國家。

2.3.2. 20 世紀 70 年代前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特點

(1) 福利制度保障範圍不斷拓寬，從部分社會成員逐步擴大到全民。全面性、國家性的福利制度意味著對所有或幾乎所有的公民，不論是否工作，不論城鄉差別，一律提供社會保障，以幫助個人克服年邁、疾病和失業等社會風險帶來的挑戰和困難。根據 Tomoka 的分析，西歐國家在戰後幾十年裡，各項社會政策的覆蓋率有了全面提高（表 7）。當中健康保險、疾病和養老金等方面的福利制度覆蓋面在 20 世紀 70 年代已超過了 90%。（周建明，2005）

表 7：歐洲國家社會政策部分專案的覆蓋率變化情況

項目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養老保險覆蓋率(參與人員佔勞動力總人口的比重，%)	66.83	76.85	90.54	92.69	95.9	88.8
工傷保險覆蓋率(參與人員佔勞動力總人口的比重，%)	52.92	60.77	71.54	78.15	85.13	97.4
疾病現金福利的覆蓋率(享受人口佔總勞動力人口的比重，%)	56.58	66.69	73.69	90.23	93.4	97.4
健康保險覆蓋率(參與人員佔勞動力總人口的比重，%)	56.58	66.69	73.69	90.23	93.4	98.5

注：資料為西歐國家平均值，具體指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芬蘭、法國、丹麥、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國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¹⁴

(2) 保障水準不斷提高，從維持最低生活水準向保持生活水準發展。如養老保險的發展進入 60 年代以後，享受保險的條件放寬，待遇水準有所提高，並引入了指數調整機制，使養老金隨物價或平均工資浮動。比如意大利曾規定，物價每增加 1%，養老金提高 1.1% 至 1.2%，這使得意大利企業職工的普通養老金計劃支出佔淨國民收入的比重從 1955 年的 30% 增加到 1980 年的 60%。(朱青、郭雪劍，2007)

(3) 隨著社會保障範圍的擴大和保障水準的提高，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社會保障開支也急劇增加，財政負擔日趨嚴重。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經合組織 OECD 統計，在 1960 ~ 1981 年間，美國、日本、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等西方國

家的社會福利支出（主要是養老金和醫療費）佔 GDP 的比重，增大了一倍左右（表 8）。

表 8：福利國家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佔 GDP 的比例（1960-1980）（%）

年份	瑞典	荷蘭	前西德	英國	加拿大	新西蘭	瑞士	美國	澳大利亞	日本
1960	10.8	11.7	18.1	10.2	9.1	18.4	4.9	7.3	7.4	4.1
1965	13.2	17.1	19.0	11.7	9.0	9.6	6.8	7.9	7.6	5.5
1970	16.7	22.5	19.5	13.2	11.8	9.2	8.5	10.4	7.4	5.7
1975	21.2	29.6	27.1	15.6	15.4	11.8	13.6	14.5	12.7	9.3
1980	25.9	28.3	25.7	16.4	15.0	15.2	14.5	15.0	12.8	11.9

資料來源：OECD¹⁵

2.3.3. 20 世紀 70 年代前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發展的動因

經濟因素：西方國家經濟逐步增長，特別是戰後至 70 年代中期，各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進入黃金時期。50 年代，德、美、日、法、英、意等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 8.6%、3.2%、7.9%、5%、2.8%和 5.5%。到 60 年代，仍以年均 4.7%、3.8%、11.2%、5.6%、2.9%和 5.6%的速度增長，這為社會保障制度的迅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聶明雋，1995）

思想因素：福利國家思想的發展和傳播，促使西方國家政府將發展社會保障事業作為本國重要的經濟政策。福利國家思想把國家看作是全社會增加福利的工具，要求國家通過立法和財政經濟措施，積極增進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

福利國家理論的中心思想是要達到三個目的：一、資本主義國家應當發展為福利國家；二、用強大的國家財政手段（政府預算）保證福利國家得以實現；三、為全體國民帶來最大的社會福利。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密爾（John S. Mill）最早提出了福利國家思想，最初這種思想旨在解決工業革命和自由放任給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困人口和失業等問題。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危機期間，以庇古（Arthur C. Pigou）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和以凱恩斯（John M. Keynes）為代表的國家干預理論盛行，為實行福利國家計劃奠定了基礎。（聶明雋，199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福利國家思想得到廣泛傳播，成為西方各國的官方理論，一些國家政府將發展社會保障事業作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使之成為國家干預收入再分配的手段。

政治因素：政府通過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社會再分配，保障基本人權，縮小貧富差距，以減少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19 世紀末，首先頒佈社會保險法的德國首相俾斯麥就曾有一句名言：「一個想獲得養老金的勞動者是再好統治不過的。」（姜向群，2005）

2.3.4.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功能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進步，人們對生命的品質更加關注。西方國家福利制度通過國家、政府和社會的行為，從經濟、醫療和服務等方面採取保障

措施，提高了人們的生命品質，有利於實現社會全面發展和進步。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充分體現了義務性和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的原則，通過轉移支付手段，保護了大多數人免於因年邁、失業、疾病等完全喪失收入，從而減少了絕對和相對貧困現象；通過收入再分配，降低了社會不平等程度，消除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2.4. 20 世紀 70 年代後的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改革帶來的啟示

2.4.1. 改革的原因——福利國家的危機

二戰後至 20 世紀 70 年代初，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空前發展是以它們高速增長的經濟為支柱的。在當時的條件下，西方國家福利開支的不斷增加，不僅沒有妨礙它們的經濟，而且通過刺激消費，對經濟發展還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社會福利開支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有所促進，形成一定程度的良性迴圈。西方國家的社會政策同它們的經濟政策是基本協調的。

然而，從 1973 年經濟危機發生以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受經濟危機影響西方經濟長時間處於滯脹狀態，經濟增長緩慢；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使退休人口與生產勞動性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以現收現付為基礎的西方養老金制度的負擔日益沉重（表 9）；同時經濟危機導致大量民眾失業，失業保險支出也隨之

增長。從 1971 年至 1977 年間，經合組織（OECD）國家公共開支平均每年上升 7.5%，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 2.4%，而在 1960 至 1970 年，這兩個數值分別是 7.2% 和 4.4%。（梁向陽，1990）社會保障支出日益龐大，而經濟發展減緩，致使各國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美國從 1975 年起，社會保障收入開始不敷支出，當年出現赤字 15 億美元；到 1982 年，當年支出高於收入達 122 億美元。英國從 60 年代後期到 1983 年，社會保險由 14 億英鎊的盈餘變為 115 億英鎊的赤字。1985 年意大利社會保障總局的赤字高達 38 億里拉。1987 年法國社會保險的赤字額為 23 億美元，1988 年增加到 55 億美元。（孫炳耀，1999）

表 9：主要工業化國家退休人口與生產性勞動人口的比例變化趨勢（%）

年份	美國	加拿大	法國	意大利	瑞士	英國
1950	20.1	20.4	26.4	21.2	22.5	24.2
1960	24.0	21.0	28.4	23.9	22.7	21.1
1970	24.0	19.9	31.3	28.1	25.0	29.0
1980	24.1	20.1	32.2	35.6	29.4	32.2
1990	25.4	23.0	28.7	35.3	30.2	32.1
2000	25.0	24.8	32.0	40.8	34.0	31.3
2010	25.7	27.7	32.4	45.0	41.6	31.9
2025	38.6	42.4	45.4	53.8	55.3	40.4

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¹⁶

為了籌措資金以彌補赤字，西方福利國家的政府不得不大規模地向國內外舉債。政府採取舉債辦法來彌補財政虧空，就必須要在金融市場上同私人資本搶奪資金，致使越來越大的一部分私人儲蓄被用來購買政府債券，而不是用來進行生產性的投資。同時巨大的社會福利開支，使得政府在很多其他事業上的

投入受到限制，比如科學研究和開發經費、資訊化基礎設施投入、國防支出等。

這都嚴重影響了國家經濟和其他各項能力的進一步發展。

為了應對不斷高漲的福利支出，政府必須提高或保持較高的稅收以維持財政收入。高福利和高稅收衍生出的問題是結構性的，一方面高福利已經培養出了勞動者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社會上「福利媽媽」和不願意工作的懶漢越來越多，高額的失業保障金減少了失業者再次尋找工作的熱情。另一方面高稅收又削弱了企業投資和個人努力工作的激勵機制。原本旨在保證社會公平的福利制度卻產生了「獎懶罰勤」的消極效果。福利國家「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上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王彩波、李豔霞，2003)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突破了民族國家的邊界，在全球範圍內加速流動。跨國公司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將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優勢與低工資、低稅收國家的成本費用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其生產過程分解到不同國家。這種開放的世界投資與生產市場，使得國家在與資本的對壘中越來越處於不利地位，政府在諸如利率控制和公共支出水準等關鍵經濟管理領域的控制力遭到削弱。西方福利國家政府不僅無法利用提高資本收益稅率的政策來維持福利國家制度所需要的費用，反而為了吸引高度流動的投資

進入本國，不得不面臨降低稅收和工資、減弱社會保障水準的壓力。

在經濟危機、人口老齡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多重影響下，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開始相互牽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惡性循環：滯緩的經濟限制了福利制度的維持和福利水準的提高；而維持現行福利制度的龐大公共開支，又制約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社會福利制度應當何去何從？西方福利國家面臨著巨大危機。

2.4.2. 改革的概況

社會福利制度是減少疾病、消除貧困、維持和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消除了社會不安定因素和促進有社會全面發展的社會體制，其產生和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體現和必然要求，因此是必須堅持、不可放棄的。但面對危機，面對社會政策和經濟環境的尖銳矛盾，西方福利國家又不得不採取行動。因此，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起，西方福利國家在堅持福利制度的前提下，對福利制度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和改革：

(1) 採取增收節支措施。增加社會保障收入。各國主要採取了擴大繳費基數、提高繳費率、延長繳費年限、開徵收益稅和增加稅收項目等增收措施。包括丹麥、芬蘭、法國、瑞典和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提高了繳費率。法國在 1997

年把社會保障繳費率從 2.4% 提高到 3.4%，另外繳費基數被延伸到包括僱主對職業養老金制度的繳費；強制職業養老金制度的繳費率也在提高，僱主和僱員平等分擔的最低繳費率從 1994 年的 10% 上升到 1995 年的 12%，1996 年的 13%，1997 年的 1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社會保障制度有繳費封頂線，但後來又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取消了這個封頂線，從而在實際上提高了繳費基數，如芬蘭、挪威、葡萄牙和瑞典等。（楊燕綏，2002）

縮減社會保障支出。在養老保障上，各國採取的節支措施主要包括提高法定退休年齡、限制提前退休、降低給付待遇（包括降低替代率、改變計算基數、調整指數化調節機制）等。如美國 1983 年通過法律規定在 21 世紀初將退休年齡提高到 67 歲；德國 1992 年《養老金改革法案》規定養老金調整基數將由過去的僱員毛工資改為純工資收入；從 2001 年開始限制提前退休，把享受養老金的最低工作時間提高到 35 年，把享受全額養老金的年齡提高到 65 歲，如果在 65 歲前退休，每提前一年退休將降低 3.6%。法國將可以享受養老金的繳費年限從 37.5 年提高到了 40 年，將養老金的基數計算標準從過去按收入最高的 10 年改為按退休前 25 年的平均收入計算；英國過去實行按工資和物價上漲率較高者調整年金的辦法，後改為只按物價指數進行調整。美國則改為只按物價和工資上漲率較低者調整，又如聯邦德國將養老金增長率由原來的 5.6% 降為 2.6%。（鄧大松，1992）西方國家這樣降低社會保障的待遇是有政治風險的，社會福利具

有不可逆性，減少福利常常引起重大的政治問題。1995 年 11 月 15 日，法國右翼朱佩政府向法國國會提交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方案，以減少作為 1999 年法國參加歐洲貨幣統一條件的財政赤字。方案中提到削減特別養老金制度的養老金支出，主要內容是將特別養老金制度中支付全額養老金的參加年限從 37.5 年提高到與一般養老金制度參加者一樣的 40 年，結果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以公共交通部門為中心的全國性罷工，這是法國自導致戴高樂下台的 1968 年學生運動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重的一次群眾性運動。（鄒根寶，2001）

（2）對現收現付的國家保險型福利制度進行結構性調整，發展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建的多支柱的社會保險機制，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推行社會保險私營化改革，鼓勵私營保險機構介入，社會保險基金市場化運營。（穆懷中，2002）如英國 1978 年通過社會保障改革方案，允許僱員自願退出「收入關聯」養老金計劃，加入由企業提供的職業年金計劃或由銀行、保險公司、共濟金或其它金融機構主辦的個人年金計劃。1985 年澳大利亞在社會救濟性的公共養老金計劃的基礎上引入強制性個人帳戶養老金計劃，個人帳戶積累的養老保險基金由私人養老基金管理公司負責投資。這項改革一方面減輕了政府的養老金負擔，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基金式的私營養老制度提高了國民儲蓄率。（朱青、郭雪劍，2007）

2.4.3. 改革的啟示

(1) 福利制度的保障水準要與本國經濟發展水準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社會保障必須以經濟為基礎，脫離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必然導致制度的危機。高福利的老年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發達國家一個難以擺脫的沉重負擔，減輕負擔的改革勢在必行，但是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不可逆性，降低保障水準容易引起民眾反感，且在民主制度下，社會保障的決策要經過民主過程，也是統治集團參政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社會保障的改革必然阻力重重。(姜向群，2005) 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正在起步階段，同時面臨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問題，但經濟資源卻是有限的。發展與保障相輔相承，不可偏廢，提高國民保障水準是國家發展根本目標，而發展又是保障水準持續提高的源泉，所以發展與社會保障水準應兼顧，應根據經濟發展程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準，避免盲目過度保障影響發展。

(2) 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自我保障與社會保障相結合，把自我保障融入社會保險機制，在自我儲蓄的基礎上發揮社會互助互濟的作用；發展部分積累制，將現收現付制與積累制相結合，取長補短。世界銀行通過總結世界範圍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經驗後提出，今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趨向是建立三大支柱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一是強制性公共管理的、以稅收為資金來源的現收現付的支柱。這一支柱能實行收入再分配，並能應付長時間的低投資收益、衰退、通貨膨脹和私營市場失誤的風險，有三種形式：它可以是提供以生活狀況調查為基礎的津貼，作為對各年齡段窮人給予資助的計劃之一部分；它也可以是強制儲蓄制度提供一個最低的年金保障；再一個選擇是為更大範圍的人口組別提供統一的年金，可以是普遍的或與就業關聯的。

第二是強制性私人管理的完全積累性支柱，發揮所在人口組別間平衡收入或儲蓄的功能。完全積累制會促進資本積累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它可以採用個人儲蓄帳戶或職業年金計劃，兩種強制性計劃都需要嚴格監控。

第三是自願性的儲蓄支柱，用於那些有資金也有較高水準保障需求的人。

（勞動部社會保險研究所，1994）

三大支柱各司其職、互相補充、協調發展，在不給政府造成過度財政壓力的情況下，為老年人提供多層次的經濟保障。

3. 近代各國對老年人權益保障及贍養父母的立法概況

3.1. 部份國家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概要

當老年人所享有的各項合法權益被確定下來後，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強制性來予以有效保護，老年人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走向法制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老年權益保障專門立法及與老年人相關立法情況表列如下（表 10）：

表 10：部份國家和地區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概要

老年人權益保障 專門立法	與老年人相關立法情況	贍養父母立法情況
美國 《老年人法》（1965） 《禁止歧視老年人法》（1975）	《社會保障法》（1935） 《房屋法》（1937） 《食品券法》（1964） 《醫療保險制度》（1965） 《低收入醫療救助制度》（1965） 《年齡歧視就業法》（1967） 《城市公共交通法》（1970） 《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1974） 《能源保護和生產法》（1976） 《房屋和社區發展法》（1978） 《退休平等法》（1984） 《公共預算調解法》（1987） 《殘疾人法》（1990） 《家庭和醫療病假法》（199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聯邦立法沒有統一規定子女必須供養父母。 ■ 有 30 個州立法規定子女贍養父母，要求子女在父母難以自我供養時，必須為其提供食品、衣物、住房和醫療照顧。 ■ 有 21 個州以民事訴訟，12 個州以刑事處罰，以保證子女履行供養父母的責任。 ■ 《聯邦家庭與醫療病假法》規定 50 人以上的企業必須給予需照顧病重家人的全職僱員長達 12 週的不帶薪假期，並享有各項原有福利。 ■ 休假後仍保持原有的或獲得等同原職位的職位、福利等狀況。 ■ 34 個州政府對贍養父母提供減稅或支付補貼等優惠。

澳洲 《家庭與社區護理服務法案》（1985） 《老年照顧法案》（1997）	《傷殘和老年年金法》（1908） 《老年人家庭法》（1954） 《家庭護理補貼法》（1956） 《家庭照顧津貼法》（1969） 《護理機構津貼法》（1969） 《老年人公寓法》（1972） 《國家健康保險法》（1973） 《護理機構援助法》（1974） 《養老金保證計劃》（1996）
德國 《護理保險法》（1992）	《德國民法典》 《疾病社會保險法》（1883） 《工傷事故保障法》（1884） 《老年人和殘疾社會保險法》（1889） 《養老金改革法》（1957） 《農民老年救濟法》（1957） 《改進企業養老金》法（1974） 《衛生改革法》（1989） 《養老金改革法》（1992）（1999） 《護理保險法》（1995） 《裡斯特改革方案》（2002）	■ 《德國民法典》關於家庭成員間扶養義務的規定，有能力的成年子女有瞻養父母的責任，這項義務可通過民事法庭和行政手段強制執行。
俄羅斯 《聯邦老戰士法》（1994）	《國家養老金法案》（1990） 《退休養老基金法》（1991） 《俄羅斯聯邦家庭法典》（1995） 《俄羅斯聯邦國家養老保險法》（2001） 《俄羅斯聯邦強制養老保險法》（2001） 《俄羅斯聯邦勞動保險法》（2001） 《俄羅斯聯邦稅法及關於稅收和保險繳納金規定的增補與修訂》（2001）	■ 《俄羅斯聯邦家庭法典》規定成年子女對父母的瞻養責任：有能力的成年子女必須為喪失能力而需要援助的父母提供照顧。 ■ 如若子女不能與父母達成支付瞻養費的一致意見，父母可以通過向法院訴訟取得瞻養費。 ■ 但是如果父母沒有履行父母職責的時，法庭可以免除子女的支付瞻養費的義務。

日本 《老年人福利法》 (1963) 《老年人保健法》 (1982) 《高齡人力僱傭安全法》 (1985) 《護理保險法》 (1997)	《民法》(明治 31)(1898) 《憲法》(1946) 《國民年金保險法》(1959) 《國民健康保險法》 《增加中高齡人力僱傭機會特別措施法》(197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民法》規定直系血親及兄弟姐妹有互相贍養的義務。明確了子女等親屬贍養老人的法定義務。 ■ 《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人保健法》和《殘疾人福利法》等也有強制家庭和親屬贍養老人的規定。
韓國 《老年人福利法》 (1981) 《老年人就業促進法》 (1992)	《民法典》 《生活保護法》(1961) 《國民福利年金法》(1988) 《醫療保險法》(1977) 《醫療幫助法》(1979) 《國民醫療保險法》(1998) 《國民健康保險法》(1999) 《國民基本生活保障法》(1999) 《基本養老金法》(2007) 《老年人護理保障法案》(200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韓國民法典》規定家庭成員間，包括直系親屬、配偶和其他共同居住的親屬有扶養義務。 ■ 老人無法自力維持生活時，子女和配偶等家庭成員有贍養老人的法律責任。 ■ 政府透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優惠稅制、優先權買住房等，以鼓勵直系親屬扶養者。
新加坡 《贍養父母法》 (1995)	《中央公積金法》(1955) 《醫療基金法案》(1992) 《婦女憲章》 《人民協會(社區)發展理事會規則》(1997) 《刑法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贍養父母法案》，要求成年子女承擔贍養 60 歲以上的年老父母的法律義務。 ■ 該法規定，凡拒絕贍養或資助貧困的年邁父母者，其父母可以向審裁處提出申請，如子女被證實違反「贍養令」，將被罰款 10,000 新加坡元或判處不多於一年的監禁。
印度 《老年人法案》 (2008)	《印度共和國憲法》 《僱員退休儲備基金和其他專款法》(1952) 《養老金支付條例》(1972) 《刑事程式法典》(1973) 《國家養老金計劃》(199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老年人法案》規定子女、親屬或繼承人有義務為長者提供經濟資助。子女遺棄老人將被處以 3 個月的監禁和 5000 盧比的罰款。

中國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婚姻法》（1950） 《個人所得稅法》（1980） 《憲法》（1982） 《繼承法》（1985） 《民法通則》（1986） 《收養法》（1991） 《勞動法》（1994） 《刑法》（1997） 《民事訴訟法》（200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老年人與家庭成員因贍養、扶養或者住房、財產發生糾紛，可以要求家庭成員所在組織或者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 調解前款糾紛時，對有過錯的家庭成員，應當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人民法院對老年人追索贍養費或者扶養費的申請，可以依法裁定先予執行。其他相關的法例，如《婚姻法》、《繼承法》等，也有規定子女必須贍養父母。 ■ 《刑法》以遺棄罪對子女不向父母盡贍養義務的行為進行懲罰。
--	---	--

3.2. 近代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的特徵

縱觀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情況，有一半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皆處於「儒學文化圈」內。其立法的內容，無論是專門保護老年人的權益或獨立的老年人立法，都體現了儒家「孝義」、「家庭養老」的文化傳統。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先後於 1995 年和 1996 年，採取立法手段強制子女供養父母，通過法院裁決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糾紛，其法律保障制度調整對象是代際關係，有別於其他國家，歐美國家立法保障老年人權益的基礎是建立於社會福利保障和公共政策層面，透過一系列的法規，規定政府部門、機構，少數針對子女（贍養人），向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及其他權益保障。

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的國際比較。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於老年人權利保護具有起步較早、保障範圍較寬、專案較全、標準較高、服務較為周到的特點。經幾十年的不斷制定、修改和實施，現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律制度，使得老年人生活狀況有了明顯改善，老年人權利得到比較全面的實現。（鄔滄萍，2006）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法制進程較晚、經濟發展滯後，對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尚處於起步或初步發展階段，目前立法不足，保障範圍較窄、專案較少、標準較低。此外，西方社會主要認為老年人保障是國家的職責，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更側重社會福利制度；而東方社會受儒家「孝道」文化影響，認為老年人權益保護既是國家責任又是家庭（子女）責任，故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屬於家庭養老和社會福利制度並重。以下選取世界上最先專門為贍養父母立法的國家，新加坡的《贍養父母法案》（簡稱《贍養法》）和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簡稱《老年法》）作個比較。

表 11：比較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比較項目	新加坡	中國
立法背景的比較	《贍養法》的直接出台動力在於1993 年左右新加坡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的加劇增加了政府的負擔，提高了社會的整體風險，而新加坡政府一向不提倡建立西方的完全福利社會，這就需要在社會保障制度後，為老年父母的贍養提供其他的法律途徑。另外，新加坡是除中國大陸、台灣地區後唯一	新中國建國後，雖然以《憲法》為核心的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法律已零星出現於各部份法當中，但各個法律的規定極為簡略、難以操作且遠不能形成一個健全的體系，特別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老齡化問題也非常嚴重且有著自己的特點，如老齡人口基數大、老齡化速度快

	<p>個華人佔絕大多數的國家，是一個典型的華人社會。雖然新加坡政府力倡多元文化社會，但儒家的「親親」、「尊尊」等孝道思想卻紮根在社會文化之中，子女贍養父母在新加坡被視為當然的道德義務。</p>	<p>等，這些都要求政府必須出台相應的法律面對老齡化給社會帶來的壓力。其次，中國作為儒家文化的淵源國，傳統的孝道觀念一直根深蒂固，對父母的孝被視為子女最基本的義務。這些都導致《老年法》的順利通過。</p>
立法內容的比較	<p>新加坡《贍養法》是以「贍養令」為核心構建起來的一部單行法，其目的在於解決老年人最基本的物質贍養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直接與贍養令有關的法律規範，包括贍養令的申請、贍養數額的確定、贍養費的保全、贍養令的變更、贍養令的強制執行等。其二，是保障贍養令執行的程式性規範，包括贍養審裁處的建立、贍養審裁處的許可權、贍養審裁處程式的性質及其與高等法院訴訟體制的銜接等。以「贍養令」為核心，志在解決老年人的「其下能養」，決定了《贍養法》的內容非常集中且立法技術化非常明顯。其三，引入調解制度以減低對抗制的民事訴訟給當事人帶來的傷害。</p>	<p>中國《老年法》的內容則比較寬泛。首先，其涉及老年人的「家庭贍養與扶養」，不僅列舉了物質贍養的各個方面，如對老年人生活上的供養義務、醫療費用、住房等，還列舉了老年人的婚姻自由與財產處分自由等，並對老年人的精神贍養也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其次，其規定了社會保障的相關內容，該法第三章對國家養老保險制度、養老金制度、老年人的社會救助、老年人醫療及老年人事業的研究等都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內容極為廣泛。再次，該法還對老年人的社會發展等也作了規定。總的來說，《老年法》規定的內容非常廣泛，也非常籠統，這是和其目的在制定一部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基本法的目標一致的。</p>
立法特點的比較	<p>《贍養法》的立法特點在於其把最低的道德義務法律化，並通過利用法律技術避免這種道德立法可能帶來的問題。《贍養法》的第二個特點就在於其特別設立了專門的「贍養父母審裁處」來保障贍養令的獲得。</p>	<p>《老年法》的立法技術是比較粗燥的，其雖然規定了老年人廣泛的權利，但這些法條的操作性是非常差的，在實踐中很難獨立成為訴訟的依據。另外，《老年法》並沒有考慮到家事訴訟的特別問題而建議採取設立特別的法庭進行審理。</p>

法律實施的比較	<p>由於新加坡《贍養法》的操作性較強，該法案生效後頭四年，贍養父母審裁處就收到 424 份申請，其中 328 份成功獲得贍養審裁處的贍養令。在申請者的構成中，大約 2/3 是華人，印度人至少佔 14%，馬來人至少佔 9%。在 1996 年，即《贍養法》生效的第一年，有 152 件申請，根據統計，在 20 世紀 90 年代，新加坡老年人口總數為 25 萬左右，這說明申請贍養令的數量還是有需要的。隨後 14 年的申請數字，1997 有 138；1998 年有 134 宗；1999 年有 127 宗；2000 年有 102 宗；2001 年有 120 宗；2002 年有 103 宗；2003 年有 88 宗；2004 年有 105 宗；2005 年有 99 宗；2006 年有 79 宗；2007 年有 109 宗；2008 年法例的修定有 127 宗；2009 年有 199 宗。</p>	<p>《老年法》於 1996 年出，法律適用不甚理想，法院在適用《老年法》的法律條文時，基本都不是獨立適用該法律，而是把其作為原則性規定，結合其他法律而適用，這也說明，《老年法》中獨立的請求權基礎不多，無法獨立給老年人以法律保護，這是《老年法》操作性差在司法實施中的集中體現。此外，司法部門並沒有就《老年法》作單獨歸類，難以取得確實數據作進一步分析。2009 年 6 月 7 日，從「北大法律資訊網」資料庫中查得 113 次條文適用中，只有 5 個是獨立請求。</p>
法例修定的比較	<p>2010 年 11 月 23 日國會通過《贍養父母法案》修定案，賦於贍養父母專員絕對的權力，要求當事人雙方接受調解安排，專員在合法情況之下，運用權力協助長者尋找失去聯絡的子女（如透過中央公積金戶口資料）。</p>	<p>中國修定法例起步較慢，有關部門正着手研究就《老年法》作出修改，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已收集許多資料和意見。</p>
調解制度的比較	<p>根據《贍養法》的規定：審裁處在處理贍養令申請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由調解員進行調和；贍養父母專員有絕對權力，要求當事人雙方接受調解安排。</p>	<p>根據《老年法》的第四十五條規定：「老年人與家成員因贍養、扶養或者住房、財產發生糾紛，可以要求家庭成員所在組織或者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調解前款糾紛時，對有過錯的家庭成員，應當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p>

立法意義較相似	從立法意義上來說，兩部法律出台的意義是比較相似的。首先，這兩部法律的出台，都將對老年父母的贍養納入法律調整的範圍，有利於借助法律的強制性來維護老年人的基本權益。通過法律調控，有助於明確老年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其權益範圍以及權利的強制執行方法，這些都是道德約束所不具備的。其次，兩部法律的出台，都有助於家事法律體系的完善。在新加坡，《贍養法》與《婦女憲章》一樣，構成對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的全面保護。在中國《老年法》作為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基本法，成為地方性立法的根據，其出台，促成了中國老年人保障法律的體系化。
---------	--

透過不同的範疇比較《贍養法》和《老年法》，再以本文研究的目的及認為更適用香港的角度評其優劣，明顯地是前者優於後者。故選取新加坡模式優點為範本，撰寫建議框架稿。

4. 家庭養老的特點及東西方家庭養老的差別

4.1. 家庭養老的特點

家庭是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的基本組織單位，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對全體家庭成員提供照顧和支援。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把「家」看作「養生送死」的所在，（穆光宗，2002）概括出家庭在代際間的兩項重要制度：家庭生育和家庭養老。其中，家庭養老即家庭成員對老年人的照顧和支持，最主要的形式是成年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它與自我養老、社會養老共同構成養老制度，三者的結合和互相補充的程度，因不同社會中經濟、政治和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在人類歷史上，家庭養老被公認為是最普遍、最悠久的養老制度，從農業社會至今，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其存在超越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的差異。根據，1982 年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指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日益發展以及勞動流動性增大的趨勢表明，關於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作用的傳統觀念在發生重大變化。就世界範圍來看，家庭所負擔的為老年人提供的傳統的照顧和滿足老年人需要的全面責任正在削弱」。(聯合國，1982) 保障老年人責任已由或正由家庭承擔向家庭與國家共同承擔轉變。儘管如此，家庭在養老制度中的重要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1982 年第一屆老齡化問題世界大會就曾提請國際社會關注家庭在照顧老年人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世界衛生組織 2000 年「人人健康」的目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庭和其他非正式照顧去完成。(穆光宗，2002)

家庭養老的方式和內容。家庭養老的方式，主要是指養老居住安排，如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地點的選擇)，分居養老和合居養老(與子女居住上的選擇)等。無論方式如何，只要養老支援力來源主要是家庭成員，那麼就屬於家庭養老。家庭養老不同於居家養老，也不同於合居養老。雖然在傳統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結構下，家庭養老是以合居養老為主要方式的，但伴隨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等進程，家庭養老的方式也呈現出新的變化。選擇合居養老，可能是由於老年人願意與子女生活，獲得更好的生活照料，保持情感聯繫；也可能是由

於住房資源緊張，子女成年後難以購置新居等原因。選擇分居養老，可能是父母或子女崇尚獨立，避免生活方式差異而產生代際矛盾；也可能是由於城市化帶來人口遷移，子女隨工作遷居等原因。子女與老年父母合居與否與家庭結構有著密切聯繫。核心家庭是指一對夫妻和其未婚的子女所構成的生活單位，又稱「小家庭」。在這種模式中，子女成年或成婚後則會離開父母，當父母進入老年階段後就形成分居養老。聯合家庭，就是兒女成婚後繼續和父母在一個單位裡生活，兩代或多代重疊的核心家庭，稱作「大家庭」。(費孝通，1982) 大家庭產生合居養老。

一般來說，家庭養老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經濟贍養，即子女為老年父母提供經濟的保障；二是日常生活的照料，即老年人在家庭裡得到兒孫輩提供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服務；三是情感支持，即老人在家庭裡精神上有依靠，感情上有交流，可得到心理慰藉。

家庭養老的方式和內容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受到一系列宏觀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因素，例如人口老齡化、移民和家庭結構等，都限制了家庭贍養內在的可能性。經濟發展水準、福利政策和財政與政治維護水準，也影響了家庭和政府重新分配資源的內在可能性。文化準則和道德觀限定了親屬關係過程，從而決定了互惠援助模式。隨著這些因素的變化，家庭贍養的連

續性和變化也要受到影響。(劉夢、付愷斐、楊衡平，1997)

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世界家庭養老的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

(1)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影響，傳統大家庭模式逐步解體，家庭規模逐步縮小，家庭結構核心化，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選擇與子女分開居住。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這一過程，而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

(2) 婦女包括女兒、兒媳等，是老年人的主要照顧提供者。但隨著婦女教育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婦女參與就業（甚至在婚後和生育後），在平衡就業與老人照顧中，婦女面臨著雙重壓力，同時由於就業對時間和精力上的轉移，婦女對老人的照料也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Liu & Kendig，2000)

(3) 面對分居養老的趨勢以及家庭中提供照顧的人力資源減少的情況，家庭養老需要得到社會服務的支援。西方發達國家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陸續出台政策，發展社區照顧以支持居家養老，這種以社區為依托的居家養老模式獲得成功，並被不少發展中國家所借鑒，逐漸成為全球接受的養老制度發展趨勢。(Asian-Pacific Center，2001)

雖然家庭養老在養老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承認，但由於人口老齡化程度、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情況上的差異，東西方國家的家庭養老制度也存在不少差異，因此以下將對東西方家庭養老制度作出比較。

4.2. 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的差別

無論是在東西方社會，家庭都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要發揮著重要的支援作用，與國家老年福利制度配合，共同構成老年人保障制度；兩種社會都存在宣導子女孝順父母、贍養父母的道德禮儀或宗教信仰等養老文化。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影響，東西方社會都經歷了家庭養老功能的削弱，家庭結構逐步核心化，從合居養老向分居養老轉變，婦女傳統照顧者角色遭遇挑戰等。但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也存在如下不同：

(1) 家庭養老文化不同。養老本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梁治平認為：「不同人群對待和處理相同問題的方式卻經常迥異其趣。這些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思考和行為的方式構成了文化核心」。(梁治平，2002)以中國為例，養老文化是以「孝文化」為核心；美國是以「公民權利」為核心。費孝通認為東西方文化在親子關係上存在差別，父母對子女有撫育的義務，這是雙方相同的，所不同的就在子女對父母有贍養的義務。概括來說，西方的家庭代際關係屬於

「接力式」，上一代對下一代有撫育義務，而下一代對上一代沒有贍養義務，呈 $F1 \rightarrow F2 \rightarrow F3 \rightarrow F4$ （「F」代表「世代」，「 $\rightarrow$ 」代表「撫育」，「 $\leftarrow$ 」代表「贍養」）；而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代際關係為「回饋式」，上一代對下一代有撫育義務，而下一代對上一代則有贍養義務，呈 $F1 \leftarrow F2 \leftarrow F3 \leftarrow F4$ 。但上面這樣的分析未免過於簡單化，因為親子關係的內容是豐富和生動的，既有物質的一面，還有精神的一面。上面所說的東西方社會不同代際模式主要是從法律上的贍養義務而言，而且又偏重於親子的居住和經濟供養的範圍。但現實中，西方子女對父母在感情上和在經濟的資助上還是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費孝通，1983）只是這種聯繫被社會更多地認為是情感的力量，而非規則的力量。上述東西方文化在親子關係上的差異，對養老制度有著深遠的影響。比如西方社會認為養老更多的是國家責任而非子女責任，重視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而東方社會則認為贍養老人是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養兒防老」是一種典型養老觀念，儘管近年來受西方國家影響，這種觀念出現淡化，社會養老逐漸得到重視，但家庭養老目前仍是東方社會最基本的養老制度。

（2） 養老居住方式不同。在西方國家，大部分老年人與子女分開居住，子女通過信件、電話、互訪等方式與父母保持聯繫並提供照料；以美國為例，據統計，1950 各州 65 歲以上老年人與子女合居平均比例為 34.1%，到了 2000 年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 14.5%；（Ruggles，2007）而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在亞洲

地區，大量的老年人與成年子女共同居住並受到照顧（表 12），儘管這種合居贍養的比例正在逐漸降低。思想因素是導致這一差異的重要原因，西方國家在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下，不管是年輕子女還是老年父母都崇尚獨立自由，願意分開居住。而亞洲不少地區歷史以來就存在大家庭合居的傳統，老人更願意與子女和孫子女共同居住，從而與親人保持情感上的緊密聯繫。此外，西方國家大多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區養老服務體系支援與子女分開居住的老人養老，老年人在獨立生活能力衰退時也能獲得充分照顧；而東方社會目前除日本、韓國等經濟較發達國家外，大多國家尚未建立社區養老服務體系，難以支援分居養老方式。

表 12：世界部分地區老年人口（60 歲以上）居住安排（%）

地區	居住安排			
	一人獨居	夫婦獨居	與子女或孫子女居住	與其他親屬或非親屬居住
亞洲	7	16	74	4
東亞	9	20	70	1
東南亞	6	13	73	9
南中亞	4	9	83	--
歐洲	8	9	74	8
非洲	26	43	26	4
非洲南部	19	39	38	4
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	9	16	62	14
北美	26	47	19	8

資料來源：聯合國¹⁷

(3) 家庭贍養的主要功能不同。在西方國家，較為完善的養老金制度為老

年人提供了較為充足的經濟支持，同時崇尚獨立的思想也使部分老人不願接受子女的經濟援助，因而家庭養老的功能側重對老人日常生活的輔助以及情感上慰藉。而亞洲地區，除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外，大部分地區屬於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發展水準的限制，政府為老年人提供的經濟支持極為有限，尚不足以維持老年人體面的晚年生活，因而經濟供養仍是家庭養老的主要功能。這與世界銀行關於老年人收入狀況的調查分析相一致，據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在世界低收入地區，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費來源是自己工作和家庭幫助，正規養老制度（退休金或福利）只起很小作用；在中等收入地區，工作和家庭仍是重要來源，但是退休金和福利佔主要部分；在高等收入地區，退休金和福利幾乎是最常見的生活費來源（表 13）。（勞動部社會保險研究所，1994）所以東方家庭養老所面臨的壓力遠比西方大，因為東方家庭承擔了更多的養老功能。

表 13：20 世紀 80 年代部分國家老年人收入來源情況（%）

部分西方高收入國家	65 歲以上老年人收入來源百分比		
	工作	家庭	年金/福利
澳大利亞	9	--	93
加拿大	19	--	97
瑞典	0	--	100
法國	4	--	96
德國	2	--	98
荷蘭	5	--	100
英國	13	--	100
美國	20	--	94
部分東方國家	60 歲以上老年人收入來源百分比		
	工作	家庭	年金/福利
新加坡	18	85	16
韓國	24	64	6
中國	45	34	13
印尼	46	63	10
馬來西亞	34	83	14
菲律賓	63	45	13

註：某些國家的收入來源各項之和大於 100，是因為工作與年金/福利之間有交叉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¹⁸

(4) 主要贍養提供者不同。在西方國家，多數情況下，女兒及其他女性親戚都是老年人最常見的家務幫助者，平時的生活護理和患病時護理大多由配偶和女兒提供，此外，女兒也是老年母親主要的感情支持者。而老年人的財產維護主要依靠同住或住在附近的男性親戚幫助。而在東亞國家，兒子是年邁父母經濟援助的主要提供者，而兒媳則有義務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的照顧和感情上的支援。傳統社會中，女兒對父母沒有經濟贍養的義務，主要承擔生活照料和感情支持的責任，但隨著男女平等觀念普及，在越來越多的國家中，成年女性

在法律和習俗上都對父母負有經濟贍養義務。東南亞國家大多實現「共同責任制」，合居與分居的子女都對父母盡經濟供養責任，同時由於老人偏好與女兒合居，女兒在對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上承擔的更多。

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與發展進程的相似、文化的差異與共通，產生了西方國家與亞洲國家在養老制度上的共性與個性。這種共性與個性的並存，使得亞洲國家在發展本國養老制度時，應當結合本國國情，同時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一些西方國家在發展國家老年福利制度時，曾一度忽略了家庭在養老中的重要作用，過於依賴以機構養老取代家庭養老，不僅有損於老年人的保障水準的改善，還加劇了本國的財政困境。1982年，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制定了聯合國指導老齡工作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維也納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強調各國政府在老齡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時，應當注意支持對老年人的家庭照顧和社區照顧，提出：「不同形式和結構的家庭是連接各代人的一種社會基本構成單位，應當根據每一個國家的傳統和風俗予以延續、加強和保護」。由於工業化、城市化和西方化，亞洲各國目前正面臨著家庭養老功能的削弱。在此情況下，一方面亞洲各國應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及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彌補家庭養老的弱化；另一方面也應當吸取西方發達國家的前車之鑒，在加強社會養老的同時，結合本國優良的敬老孝老傳統，不忽視家庭養老的作用。

5. 小結

從國際社會人口老齡化趨勢來看，人口老齡化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既是機遇也可能是挑戰，從香港目前的經濟條件和文化背景等表徵來看，可能是挑戰大於機遇。現時國際社會關注老齡化的定調，認為對老人來看，維持收入方面的問題比其他任何保障都更為重要。老年人有穩定的經濟收入而達到養老目的，不僅會維持生活質素、良好身心健康狀況，還影響到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地位。因此，如何處理「老有所養」的問題，應是香港未來重大的挑戰。

從現代西方老年學文獻來看，按支持主體和發揮功能的不同，把養老方式分為兩種：（1）非正式支持，或稱為非正式制度安排，是以「家庭養老」為核心的內容，其次是親屬、朋友、鄰舍和義工提供協助；（2）正式支持，又稱為正式制度安排，指來自政府行為中的社區和機構支持行為，所以是制度化、社會化的支援模式。從人類發展史來說，家庭是養老的根本，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才出現社區照顧等制度，由非家庭成員（或沒有血緣關係）的政府或組織來提供協助。簡而言之，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是由家庭養老保障向社會養老保障過渡，但兩者並不能相互替代。如要達到適當配合，資源得以合理調配，政府必須介入，透過立法建立強制性的養老保障制度。東西方國家和地區因應各自國情、歷史因素、文化背景、人文質素，透過不同方式就保障長者權益立法。立法有多方面的作用，設定最低標準；懲罰小撮不守法的人士；既可建立良好的養老護老風氣，也可施行國民教育。無論中西方國家，自古以來都有養老的

制度。中國養老制度起源於四千多年的夏朝，源遠流長，制度精密，獨樹一幟，以孝文化為思想中心的養老立法制度，對後世及東南亞鄰近國家和地區有深遠的影響，作為中國一員的香港，若能從回顧原義時作出反思，從今義加以回應並借各國經驗為鑒，有助於研究香港未來養老制度的發展。

第三章 中國歷史上養老功能演變與現代國家養老政策

為了解中國有關養老法律與政策的歷史變遷，我們首先必須知曉中國古代社會的演變和法律的起源，進而掌握中國歷史上養老功能的演變與現代國家養老政策。本章沿着神話傳說的脈絡，尋找中華民族祖先的印記，追憶原始群、血緣家族、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等原始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踏上三千六百多年的中國法制發展史的道路，歷經奴隸制時期、封建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認識不同時期的每一個朝代，涵蓋不同統治者的思想指導、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而產生不同類型的法制；描述有關養老政策和司法制度及對後世產生的影響。

1. 中國古代社會贍養的演變

1.1. 原始群習慣向氏族習慣的轉變

「盤古開天闢地、女媧抁土造人」，三皇五帝的英雄史蹟和偉大創作，先民以壯烈的神話渲染着中華民族祖先的發源；南北朝時期啟蒙詩《千字文》，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為開端，描述天昏地暗，宇宙處於渾渾沌沌、荒遐蕪穢的狀態，這些神秘的傳說伴隨着文明古國源遠流長的歷史而流傳於民間。文學家、藝術家以豐富的想像力、細膩的筆劃、絢麗的色彩繪描史前傳說，以滿足喜愛追源尋根的世人能夠撫摸疑幻疑真的遠古時代，也為遼古的人類先前史

增添精彩。

根據歷史學家的記載，科學家的考古，人類學學者的研究，說明我們的祖先早在 170 萬年前，開始在富饒遼濶的黃河流域勞動、生息、繁衍、奮鬥，逐漸為東方文明古國孵化出最原始的國家細胞——原始社會。原始社會處於蠻荒狀況，所謂：「上古穴居而野處。」《呂氏春秋·恃君覽》曾經這樣描述：「無衣服履帶宮室畜類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可見當時人們過著群居群婚的生活，彼此的親屬關係模糊，孩童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沒有人倫綱常禮儀規範；社會沒有階級或等級，實行集體勞動，共同生產，所有生產資料屬同穴共居的人們共同擁有；居所沒有戰車或城廓的設備，也沒有國家和君主，運用最原始的習慣來管理同居者的日常事務。

美國社會學家摩爾根（Lewis H. Morgan）是第一個具有專門知識而嘗試給史前史建立一個確定系統的學者，他提出三個主要的時代：蒙昧時代是以獲取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人工產品主要是用作獲取天然產物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畜牧和農耕的時期，是學會靠人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生產的方法的時期；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中華民族以先人創舉的傳說來描繪這幅人類生活史演變的圖景：

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帶領先民改變最原始的穴居生活，開始懂得防範猛獸蟲蛇的侵害；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用火照明、取暖驅趕猛獸，最重要的一項是用火煮食，結束了人類茹毛飲血的時代，增加了新的食物種類，減少受氣候和地域的限制；伏羲教民結網、漁獵畜牧，製造八卦而觀天象，帶領先民由採集、漁獵踏入農耕的初階；神農氏是處於人類文明的初創時代，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醫學家，他發明了中國最早的農具——耒耜，促使原始社會末期農業部落和遊牧部落從狩獵、採集者中分離，進入人類史上第一次社會分工。以上所述雖然世人予以神話化、形象化，但這是標誌着人類的祖先是智慧、毅力和勇敢為人民謀福祉的英雄，代表人類生活方式的一項發明、或一個時代。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歷史文物的佐證，這確實是中華民族發展史的進程，同時，與摩爾根的說法是相吻合的，說明人類的祖先在長期歷史環境的變遷，受自然、社會、文化的制約和影響，才能譜出如此璀璨的史卷。

經過數十萬年的進化、演變，由遠古的原始群習慣步入氏族公社階段。氏族公社是原始社會的最高組織，是古代的部落，《孝經》有云：「古之所謂氏者，即國也。」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人類共同體，是「氏族」徽號區別的起源，是人類進入「知母」、「知父」的階段，「家」的形成。孕育着人類最原始的大同世界，產生最純樸的及具有人類感情的倫理思想。氏族社會受生產力發展和自身家庭生活制度的影響，從萌芽到瓦解，在漫長的萬年歷程中起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標誌人類走向文明社會之前，在自然規律變化中所經歷的搏鬥、掙扎和抉擇。

恩格斯說：「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上的決定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着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勞動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恩格斯，1995) 大概在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人類開始懂得用火和石器作為生存的武器，提升狩獵和加強征服大自然的能力。年輕力壯的小群體為了開拓生活資源而從原群體分裂出去，長途跋涉到物產豐富的地域覓食。這種分裂的結果逐漸分清族內的輩份，減低不同輩之間近親性關係，從實際中，體會到家族內近親通婚對人類體質的弊端，因而產生了人類最早近親禁婚。逐漸排除父母與子女亂倫、兄弟姐妹之間通婚，產生集體之間的伙婚，也就是一個群體的兄弟和另一個群體的姐妹互為夫妻。摩爾根 (Lewis H. Morgan) 稱這種婚姻形式為「普那路亞 (Punalua)」¹⁹。弓、弦、箭等狩獵工具的進步，人們開始發展大規模的圍獵活動，不單要健壯的體魄，更需要團體的協作，為氏族間創造了聯姻的條件，族外婚也因此提升。摩爾根說：「沒有血緣親屬關係的氏族之間的婚姻，生育出在體質上和智力上都更強健的人種；兩個正在進步的部落混在一起了，新生

代的顱骨和腦髓便自然地擴大到綜合了兩個部落才能的程度。」人類本能地、自發地由血婚制家庭過渡到伙婚制家庭，自然選擇規律起了重大作用。「留在各族血緣集團內的只有各代女兒的子孫，這樣就逐漸組成一個確定的、彼此不能結婚的女系血緣集團。由於其他共同的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日益建立鞏固起來，最終便形成有別於其他集團的氏族、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的母系氏族。」（左秀榮，1992）

1.2. 母系氏族習慣向父系氏族習慣的轉變

相傳距今約三、四萬年前，母系氏族習慣社會開始產生。傳說燧人氏是舊石器時代河套附近的一個母系氏族。母系社會雖然較原始社會更趨社會化，但仍以採集和漁獵標誌的生產力極低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產生複雜的社會制度，不存在其真正意義的法律與國家，但並不意味着沒有調整日常生活關係的準則。人們依靠社會輿論維繫的原始習俗和慣例，協調社會關係，處理內部糾紛，施行人們共同勞動、平均分配以及共同消費的準則。恩格斯說：「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恩格斯，1995）大約在六七千年前是各原始部落向母系社會推進的鼎峰時期，人類史上稱謂仰韶文化時期。²⁰《禮記·禮運》（大同篇）對這一時期作的社會狀況作這樣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說法略嫌美化當時社會的情況，摻染了儒家思想的天下為公和大同世界，但說出當時社會的財產公有、平等觀念、博愛和諧和福利互助精神的風氣和習慣，不失為原始正義社會的特徵。在母系社會裡，女性採集野菜植物，燒烤獵物，分配食物、哺育兒童，以母性的天職與孩子建立感情。由於婦女的工作較為接近群眾，受到人們的敬愛，成為氏族的領導者。人們只知母親而不知父親，團結在母親周圍，為共同的生活而努力。因此《商書·開塞》對當時的社會作了以下的記載：「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隨着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母系氏族社會開始向父系氏族社會轉化，大概距今五六千年前，歷史上傳說的神農時代大體相當於這一時期，《白虎通》說：「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大概處於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興起的初期，生產工具日益精良，犁耕農業取代鋤耕農業，犁的使用不但提高生產效率，更擴大了耕地面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原始農業、捕魚業、飼養、畜牧、手工業相繼出現，男性較女性具有更強的勞動體力，各生產技術亦需要強壯的體魄能夠勝任，男子漸漸成為生產中心力量，家人的生活來源依靠男人，婦女的職能轉向家務瑣事和照顧幼童。男性逐漸取代女性的領導地位，不是偶然的，而眾多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其中最顯著的是財產關係的改變。男子從

事畜牧業獲得畜群，戰爭奪掠得財物、奴隸（當中包括婦女），都屬於私人財產，因私人財產的累積而衍生繼承制度，父系繼承制度應運而生。學者認為：「財產觀念在人類心靈中的成長過程，包括財產的創始、財產的享有，特別是包括對財產繼承權的法定。」（Morgan，1977）「當財產開始大量產生和想把財產傳給子女的願望使世系由女性改變為男性下傳時，父權的真正基礎才第一次確立起來。」（Morgan，1977）

原始社會的任何發展，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父權制代替母權制，正說明了這個道理。大約從五千年前，歷史上傳說的五帝時期，是黃河、長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後從母系公社進入父系公社的時期。專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取代對偶家庭，步入「知父」的父系氏族社會，人們開始有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的意識。從此，男子處於領導的地位，婦女從屬於男子，必須忠貞於丈夫，其主要的目的就是生育身份正確的親生骨肉，只有親生子女才有繼承人的資格承繼他們父親的財產。子孫在父親氏族裡成長，父系大家族取代了母系大家庭，社會踏入以父權為領導地位的父亲社會。

1.3. 父系氏族習慣向奴隸制習慣的轉變

距今約四千三百年前，處於後世所謂的龍山文化時期，²¹ 即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的興盛時期，促使這個時期的農業和畜牧業較仰韶文化時期有了更迅速的

發展，原始文化有長足的進步，生產工具種類和數量的增長，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農業和手工業有初步的分工，為社會提供了較充足的剩餘產品，開始出現和有財產的儲蓄而導致貧富不均，產生了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階級分化的現象。從社會形態來看，當時的父權制社會，新的社會習慣逐漸形成，開始跨入階級社會門檻。其主要的轉變可概括為以下三個內容：

(1) 顯示部落聯盟酋長的權威。原始社會的末期，私有制的發展，各部落為了爭奪土地、財產和奴隸，不斷發生戰爭，戰事頻繁，自然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總指揮，也需要人們的服從和犧牲，部落聯盟酋長的地位自然顯赫。《尚書·舜典》：有「（虞舜）流共工於幽州，放獯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國語·魯語》也有「禹朝諸侯於會稽山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的記述。這意味着部落聯盟酋長有至高無上的威力，他的決定是凌駕於聯盟部落會議之上，遇有重大的問題時，他擁有臨時處事的大權，無須通過部落聯盟會議，即使召開會議，也是任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再是馬克斯所說的「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奴隸制確立以後，這類習慣就被改造為維護君王專制的奴隸制法律。

(2) 改變財產平均分配的習慣。在母系氏族公社裡，人們建立上古原始社會的道德風貌，氏族集團的成員純樸而不虛偽，只有為公不計私利，遵守共同

勞動以及平均分配的共同準則。到了父系氏族時期，社會進入大分工階段，隨着銅器、青銅器和鐵路的應用，農耕、畜牧、手工製造業的產品和種類越來越多，人口的增長跟不上生產力增長的速度而產生剩餘物品，狩獵再也不是人們生活主要的來源，氏族首領和部落聯盟酋長規定個人所獲的獵物為自己私有財產，不歸集體平均分配，由於產品的剩餘，首領或酋長可以取得超出常人的更多份額，此外，首領利用職務侵吞公有財產，任意處理掠獲的財物成為普遍的現象。《管子·揆度》：「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這些有關堯舜把掠獲的粟與財物轉賣的記述，足以反映當時的情況。

(3) 建立有關處罰的習慣。「原始社會的舜禹統治的時期，特別是大禹統治的時代，氏族公社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不單部落聯盟制、軍事民主制發展到高峰，有關處罰的習慣也發展到頂點。」（曾憲義，2009a）《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意味着唐堯傳位給虞舜時，要求虞舜的首要的工作就是慎重地完善五典，務使五典能使民遵行，因此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的訓示。《竹書紀年》說：「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新語·道基》說：「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栓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據《尚書·大禹謨》所載：「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於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

用現代的話講，舜帝在讚揚皋陶的功績時指出：「皋陶！這些臣民之所以不敢冒犯我的政務，全因為您作為司法長官明曉五刑，並用其輔助五教，符合我的治理之道。」

可見父權制社會的習慣，已經非常豐富，其促進了等級社會的萌芽和發展，成為奴隸習慣法和法律的淵源。這些習慣雖然沒有脫離原始習慣的範疇，更不可能成為國家形態的法，但是卻預示著奴隸制習慣法統治的時代即將到來。夏朝作為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集中體現了維護奴隸主階級統治的習慣法。但是夏朝是奴隸制國家的初建，沒有立即制訂較完善的法律制度，只是將有利於奴隸主統治的氏族習慣賦予新的性質，上升為國家形態的習慣法。

1.4. 夏朝奴隸國家的產生和贍養法律的起源

原始社會基於歷史條件所限，不可能產生具有階級專制性質的國家，也不能產生體驗國家權力和代表統治者意志的法律。因而原始社會並無國家和法律可言。儘管中華民族從黃帝至夏禹年代，約 500 年間逐步產生了許多規則、典章、刑罰和制度，但這些都處於初步的、不完全的，只能夠說是中國法律制度的萌芽或雛形。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過渡的演進，當生產力發生到一定的程度，隨着私有制和階級觀念逐漸形成，才能具備產生國家和法律的條件。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恩格斯指出：「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

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

歷史學家認為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制定了相對完全的法律制度，依靠國家權力予以保護和實施。「它的建立標誌着中國歷史正式進入文明時代。」（朱紹侯等，2004）

夏朝具備國家的各種特徵，主要表現如下：

(1) 《史記·夏本紀》記載：「而后舉益，任之政。」「於是啟逐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竹書紀年·夏紀》又說：「益干啟位，啟殺之。」說明啟是公開破壞「禪讓制」，殺掉禹推舉的益自立為王，從此，「禪讓制」被「世襲制」所取代，公天下變為私天下，標誌着國家的形成和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制社會。

(2) 《史記·夏本紀》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說明夏朝已開征賦稅為國家增加收益，要求部落進貢的制度，《孟子·滕文公上》有「五十而貢」之說，對「貢」作此解說：「貢」是夏代王室對其所屬部落或平民根據若干年土地收穫的平均數按一定比例徵收的農產物。夏書有關石和鈞的記載，說明夏朝已為貢賦稅收訂立制度，包括具備征收賦稅用的石和鈞等衡量器具，以量度及保持皇廷的經常性收入和支出，說明夏朝已為貢賦稅收訂立制度。

其實際的情形可能是，奴隸耕種的田地約為 50 畝，向夏王和奴隸主交納的田賦為「十稅一」。(呂克勤，2007)

(3) 設立奴隸制國家機構和建立軍隊，其下設「六卿」，是夏王的左右大臣，既理政事，也掌軍事，職能既廣，權力也大。《史記·夏本紀》有「乃召六卿申之」及《尚書·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的記載。《甘誓》是夏啟征討有虞氏前為整飭軍旅、動員將士而發佈的命令。這說明了軍隊是聽命於國王而不再是屬於全體氏族共同組織的武裝力量。

(4) 夏朝制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奴隸制法典——《禹刑》，《左傳·昭公六年》所謂「夏有亂政，而制禹刑」。為了鞏固政權，隨着刑律的產生，夏朝設置了監獄——圜土。這些都是顯示夏朝已完全具備了國家的條件。

1.5. 中國贍養法律起源的特點

芸芸文獻中，學者就中國法起源的特點有各種不同的論述，主要可歸納為數點：禮法結合、貴族宗法統治、維護專制王權、刑起於兵、民刑不分、具有早熟性。本文就對中國歷代親屬法律制度有深遠影響的禮法結合及貴族宗法統治作個簡述。

(1) 禮法結合。由於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如經濟、民族、文化、政治等原因，建立了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以重禮儀又重法治為歷史傳統，即所謂「禮法結合」。夏朝的法律在形成中，不僅改造和吸收了父權制時代的某些習慣，也改造和吸收了原始社會沿用已久的「禮」的傳統。實現了中國奴隸制最初的禮法結合。（曾憲義，2009a）將奴隸主階級的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結合使用，是其他國家與法律較為少見的例子。「禮」起源於原始氏族社會的祭紀鬼神祖先求賜福保佑的社會活動。據《說文解字》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豐，從豆象形，行禮之器也。」祭祀的器皿被視為神聖之物，誰能執神器主持祭禮，表明他的身份等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古代祭禮是向「天廷」禱告，聽取上帝的命令，從而決定家國大事。帝王以祭祀的器皿作為通天工具。因此祭祀用的器皿成為國家政權的象徵。祭祀不單是皇家的盛事，也是各部落的重大事務，在蒙昧落後的原始社會，每逢重要的節日，氏族的首領就會帶領全體成員舉行「祭鬼神」、「稟祖先」的祭祀儀式，「禮」成為全體成員生活模式中心思想。祭祀儀式成為禮儀，氏族首領要求所有的成員必須遵從禮儀，也成為生活中的習慣，逐漸提升為每個人自願自覺遵守的行為規範。統治者對這種行為規範賦予以階級屬性的法律效力，順理成章地成為禮法結合奴隸制社會的法律制度。「夏王朝將禮法結合，憑借禮的精神統治力量強化法的鎮壓職能，依靠法的強制力推行禮的規範。從而為統治階級構築了嚴密的統治羅網，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郭成

偉，2007)《論語·為政》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可見，夏、商、周三代的「禮」，有繼承關係，但也經過修訂，去掉不適合的，增加新的內容。禮法結合對中國後來的法制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等級制特徵的「禮」，成為一種政治法律制度，如被稱為封建制度法律典範的《唐律》以禮作為立法根據，有親屬相隱、八議入律、官當請減、存留養親都構成中國傳統法律所獨具的特色。

(2) 貴族宗法統治。法制史學者對中國奴隸制法律制度作以下描述：

「中國奴隸制法律制度形成於封閉的原始農業的經濟環境當中，封閉的原始農業，以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以家族作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趙昆坡，2002)「原始社會的血緣關係紐帶並未因原始氏族制度的瓦解而削弱，而是轉化為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家族與宗族制度，父權制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組織特徵。」(張晉藩，2003)夏朝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把中國帶入了另一個歷史階段——奴隸制社會。從表面上看，夏朝具備了國家的特徵，有部落、土地、軍隊、百官、法律和百姓，但統治階級的內部仍採用氏族父系傳統統治的方法來組織管治架構。啟登王位之後，一方面把原有的部落按照地域作好部署，另一方面為了顯示自己的統治地位，鞏固氏族的勢力、籠絡親信，按其訂立的新宗法制，把夏族的宗族（姒氏族）與其有同盟友好關係的氏族全部保留下來，繼之任命百官、擴充軍隊。啟自己本身

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貴族是各氏族的家長。這樣的制度很明顯的是按血緣關係的親疏來確定氏族的社會地位，援引父權制的傳統統治方式來管治國家。夏朝的法律起源是延續原有宗法關係的氏族習慣，也順應產生了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習慣法；夏朝的習慣法既是維護奴隸制國家制度與貴族宗法制的統一，同時肩負了國家與貴族組成的治國共同體的職能。法學家稱為：「實行家國相同，親貴合一的夏王朝。正是這個原因，使中國法律在形成時必然帶有氏族社會的濃厚影響，以及種族奴隸制、宗法制的鮮明特點。」（郭成偉，2007）這個制度始於奴隸制度的夏朝，但得到後世所沿用被儒家學派吸納為倫理道德的核心價值，由漢朝開始在儒家思想法律化過程中高居頭角，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些對歷代封建制度，尤其是法律倫理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父權與君權一脈相承、互為表裏，嚴密的以孝為中心的宗法倫理想得以使封建專制統治長治久安」，（洪煜，1997）孝道穩定了家庭生活秩序，也穩固了封建專制統治秩序。

2. 中國歷代有關尊老養老贍養的法律與制度

2.1. 夏商周時期（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前 771 年）

受孝道的影響，事親孝親、尊老養老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尊老尚齒，一般認為形成於堯舜，發展于夏商，到了周代，已經形成行為規範和社會準則。（蘇保忠等，2008）據《禮記·王制》記載，「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夏後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這說明先秦時期的養老，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有虞氏」部落。（劉松林，2000）先秦的養老制度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 用禮節侍奉老人。《禮記著華錄·王制》的引述：根據清人吳曾祺評註的《禮記》，「燕禮」乃「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饗禮」乃「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食禮」乃「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周人修而兼用」乃「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用款待賓客的禮儀來對待老人，足以表明夏商周三代尊老尚齒的程度。另據《禮記·祭義》記載：「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後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由此可見，虞夏商周四代的敬老養老價值標準經歷了「德」、「爵」、「富」、「親」等四次改變。然而，卻貫穿著一條不變的主線，四代所貴不同，而所尚則同，此即「尚齒」（尊老敬老），反映了「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即對老年人的尊敬和愛戴早已成為長期存在的觀念。

（2） 國家舉行尊老敬老的禮儀活動。記載西周提倡敬老尊賢，社會敬老風氣盛行，最為突出的是每年臘月舉行的養老大典——「鄉飲酒禮」。鄉飲酒是一

種國家舉行的鄉黨集會的飲宴，舉辦的宗旨是合族歡宴，促進和睦，加強尊老的教育。根據《禮記·鄉飲酒禮》的記載，該儀式非常隆重，從邀請主賓，到行飲酒之禮結束，謙讓的禮節十分繁瑣，主與賓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以及酒席的設置和器皿的擺放都有嚴格的規定。儀式開始時，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之後「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然後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上座，以其發言為訓，以其行為示範。五十歲以下的站在一旁聽候差遣。《儀禮·鄉飲酒禮》記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顯示鄉飲酒禮，既有教民「尊長」之意，亦含有訓民「養老」之意義。「豆」是食具的數目，「三豆」的意思指三個菜或三碟菜。按十年為一分齡，而遞增各階齡長者應享用的食物。席間的樂章編排非常講究壯觀，以不同的歌曲，樂器伴隨每一項禮儀的進行，一絲不苟地貫穿全場，一直到酒禮圓滿結束。²² 鄉飲酒禮完畢，讓年長者先行離席，主禮者才離場，以示尊敬。《論語·鄉黨》記載孔子的說話：「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3) 養老與教育相結合。在先秦時期，就開始就有供養老年人的美德。根據《禮記·王制》記載：「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後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校，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看來，國老、庶老身分等級是有別，

養老的方式也有區別。根據孔穎達疏《禮也·王制》的解說：「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者也。」指告老退職前具有卿、大夫、士的高級職位；《魏書·高祖紀下》解說：「庶老指士之告老退休者與庶人之老者。」《新唐書·禮樂結九》則有這樣的說法：「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庠」、「序」、「學」、「校」都是當時的學堂，因而先秦的養老制度具有與教育相結合的意義。

(4) 設立專門的養老官員及推行養老令。先秦諸國中西周有較週全的養老政策。設有專門照顧孤寡老弱群體的官員，據《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養老」即是尊重年高德劭之人和善待鰥寡老人之意，說明「養老」是地官大司徒的主要職責之一，所謂：「天民之窮而告者，皆有常餼。」即生活有困難的社群，經常有糧食接濟。《禮記·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即不同的年齡的老人由鄉、國、學等不同的機構負責供養。能夠在鄉、國、學養老的只局限於士大夫以上的賢能才可享有，人數不多而不普及。因此，《禮記·王制》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宋朝經學家陳澧作以下註釋：「者眾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國家為了體恤有需要養老的家庭而實施免除徭役的政策，推行「引戶核年」（按戶核實年齡），對家庭提供優惠，對八十、九十

的長者，免一人或一家人服役，目的是讓更多的老人能得到家人供養和照顧。

依據引年規定，對長者實施寬免政策：「五十不從征，六十不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奇）喪之事費及也。」意思是說，五十歲以上不須參與政務，六十歲不履行兵役，七十歲不迎送賓客，八十歲不參加喪事。

（5） 退休制度及賜仗的意義。根據《禮記·曲禮》的說法：「大夫七十而致事。」告老還鄉。意思是在先秦時代，官員七十歲之後要還政於君，稱為「致仕」或「致事」，相當於今天的退休制度。《尚書大傳·略說》也有同樣的記載：「大夫七十而致事，老於鄉里。」但如果繼續留任，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几杖」制度是對到了致仕年齡而繼續從政的高齡官員的特殊照顧措施。「几」，就是古人席地而坐時所倚靠的器具；「杖」，就是老人站立時所撐的手杖。這就是說，高齡官員外出執行公務，還有奴婢照顧，並將乘坐安穩的小車。《周禮·秋官·伊耆氏》說：「共（供）王之齒杖。」據唐朝經學家孔穎達疏說：「既共王之齒杖，明皆據王賜老者之杖而言，若不得王賜者，自拄之也。」《禮記·王制》記載：「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可見七十歲以上老人之杖由國家賞賜，七十歲以下五十歲以上者「自拄之也」。《殷墟文字類編》有「象老者依杖之形」，認為老者的特徵之一是拄杖。

(6) 老年人刑事赦免制度。西周時期，根據「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刑罰世輕世重」以及「尊尊」、「親親」的法律思想，在刑罰方面就對老年人犯罪設立的特殊的赦免政策，這成為中國老年人刑事犯罪赦免制度的起源。《周禮·秋官司寇》說：「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禮記·曲禮上》說「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7) 不孝罪開始入律。不孝罪的起源並沒有很確實的考證，一般認為可追溯至夏朝。《孝經·五刑》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即夏朝刑法認為，三千罪名中，以不孝罪為最大。根據章太炎《孝經本夏法說》考證，此條應是夏朝刑法的規定。在商朝，不孝亦為重罪，有《呂氏春秋·孝行》說：「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之說。《尚書·康誥》有：「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應「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之說。即認為大惡大奸的人，也是不孝順不友愛的人，應儘快採用文王制定的刑罰，懲罰這些犯罪並不予赦免。另根據《周禮·地官司徒》所載：「大司徒」職責之一，「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2.2. 漢朝時期（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

漢朝強調「以孝治天下」，實行了一系列養老敬老的措施，為後世所仿效。

(1) 養老敬老制度。《漢書·文帝紀》說：漢文帝以頒發詔書推行養老制度，據「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衍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察胃米者，長吏閱視，垂若尉致。不滿九十，音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該條法令詳細規定了受賜老年人的年齡、賜物數額，還規定了法令執行人，以及違法的法律責任等。至武帝，該項政策被正式命名為「受粥法」，規定年齡九十以上者都有生活保障，並且惠及子孫，《漢書·武帝紀》作這樣的記載：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期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粥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2) 王杖制度的設立。王杖制度起源於西周，漢朝予以制度化、法律化，成為漢代養老、敬老的顯著特色。漢朝政府規定給予七十歲的長者授王杖。《後漢書·禮儀誌》說：「仲秋八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王杖。」

「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

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這裡所指的「案戶比民」，是漢制的人口登記。八月賜杖既可掌握確實的老年人數，也是最好的時令，因此有「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意義。政府通過「立令」授王杖予老年人，而賦予其特權，可享受相當於六百石官吏的待遇，無論是政治、經濟都有了全面保障，並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王杖，又名鳩杖，因杖頂端以鳩鳥裝飾而得名。以鳩鳥為飾的原因，根據《太平御覽》，引《風俗通》認為：「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于京、索，循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後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雞杖以賜老者」。《王杖詔令冊》作這樣的敘述：「高皇帝以來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憐耆老。高年賜王杖，上有雞，使百姓望見之，比於節；吏民有敢罵毆詈辱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節第、行馳道中；列肆賈市毋租，比山東復。」意思是說，宣帝本始二年，仿效高祖的仁政，出於對老年人的愛憐同情，實行王杖制度，杖為鳩首，象徵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享有許多特權；吏民如果辱罵持杖人，將以大逆不道論處。持杖者可自由出入官府、節第、行馳道中；經商毋須繳稅，像當年追隨高祖打天下又居於關中的山東吏民那樣終身免除賦役。

(3) 完善退休制度。致仕即是退休，西周時代已有規定。漢代的官吏退休年齡一般是規定七十歲，《白虎通·致仕》作出解釋：「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跨之屬是以退之。」意思是說男子到了七十歲，耳目不聰，手腳不靈活，應該退休。根據《漢書》卷七十二《書賢傳》記述，漢代前期，官員退休後，朝廷往

往給予一次性的豐厚的賞賜，以示敬老尊賢。如漢宣帝時，丞相書賢七十余，為相五歲，退休時，皇帝特賜黃金百斤，宅地一區。對於德高望重的重臣，退休後擔任問角色，可以按時朝見皇帝，皇帝有重大事情還向他們諮詢，還請他們參加朝會。

(4) 對老年人的刑事赦免。漢代繼續實施對老年人的「恤刑」政策。漢景帝后元三年曾發佈詔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鞠系者，頌繫之。」所謂「鞠系」，即監禁；所謂「頌繫」，即免戴刑具。此令就是對老、幼、孕婦、書生、侏儒等幼弱者，在被監禁期間給予免戴刑具的優待。

《漢書·惠帝紀》記載：漢惠帝即位時就下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後漢書·光武紀》：東漢光武帝下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系。」即指老幼及婦女，除大逆不道、詔書明確規定逮捕之外，都不能拘禁之。據《漢書》卷二十三《刑法誌》載，推行「矜老」制度，漢宣帝曾說：「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認為年長者犯罪對危害社會程度比壯年犯罪者為少，相應地處刑也應減輕。

(5) 對不孝罪的處罰。漢朝不孝罪的處罰則開始見於法典之中。根據《二年律令·賊律》：「子賊殺傷父母，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其梟首市」；「子

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段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

子女殺傷父母屬大逆不道之罪，一律判處梟道的刑罰。對一般殺人及殺人未遂，

《二年律令·賊律》的規定是：「謀賊殺、傷人，未殺，黥為城旦舂」；「殺人，及與謀者，皆棄市。未殺，黥為城旦舂」。「大父」意為祖父，「大母」為祖母，「段大母」即為繼祖母或庶祖母。從該律令中可知子女毆殺父母或祖父母未遂就要判處遊市，甚至毆傷長輩也要鄰處棄市。可見子女侵犯父母等長輩，比之普通之人，量刑要加重，而血緣關係越近，鄰刑越重。為了推行孝道鼓勵同居共財，不與祖父母、父母分居折產，加強宣揚供養父母的良好社會風尚。

(6) 親親得相首匿。呂后《二年律令》的《告律》，已有不准許子告父母，奴告主的規定，這是「親親得相首匿」的雛形。到了宣帝，發展為直系三代（父母、子女、祖孫）血親和夫妻之間，除了犯十惡之罪，都可以互相包庇隱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祖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若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據《論語·子路》記述，最早提出這思想是孔子，他主張父子之間如有犯罪行為，應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樣，才體現了父慈子孝之道。

2.3.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公元 220 年至 581 年）

魏晉南北朝時期，儘管朝代更替頻繁，而在尊老養老方面，卻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 設立了官方的養老機構。齊武帝（公元 483 年至 493 年）在位時，他信奉佛教，設立「六疾館」，成為中國歷史上已知最早的官方慈善機構。據《南齊書·文惠太子傳》述：「太子與竟陵王子良具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公元 521 年，梁武帝在建康（今南京）設立孤獨園，以恤孤幼，相當於現代的養老院、孤兒院，以收養窮困百姓。《梁書·武帝下》記載：梁武帝頒佈詔令：「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設置「孤獨園」，目的是讓「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公立的養老機構的設立，表明了國家對尊老養老的進一步重視，並且以後歷代都依此設立了類似的機構，對後世有著積極的影響。

(2) 重罪十條的確定。不孝罪的起源於先秦時期，但把「不孝」列入重罪，則在南北朝期間。根據《隋書·刑法誌》記載，約公元 564 年，北齊武成帝命大臣高睿等頒行《北齊律》，該律首創「重罪十條」，並將「不孝罪」位列第八，即「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條重罪之中，有四項屬於家庭罪案。惡逆，指毆打及謀殺祖父母等直系，尊長的行為；不孝，指咀咒、謾罵祖父母、父母；供養有關；在父母喪期內嫁娶等；內亂，指家族內部的亂倫奸淫行為。

(3) 留養制度的起源。「絕後」是中國古代家庭最悲慘的下場。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講究孝道的傳統中國社會把傳宗接代，繼承香火看作個人的責任和人生的頭等要事。為了確保家庭不致於「斷子絕孫」，只要不是犯上惡不赦的大罪，司法制度中有留養制度的規定。留養制度起源於北魏，《北魏律》稱：「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 70 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列。」獨子犯死罪，罪犯如有超過 70 歲以上的祖父母、父母，可以上請皇帝裁決。獨子被判流刑則可服侍祖父母、父母至去世再往服刑地點。

2.4. 唐朝時期（公元 618 年至公元 907 年）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尊老養老體現了豐富國家社會養老與強化家庭養老責任的二元化特徵，主要制度有：

(1) 宴會制度：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設立的宴會制度，直接體現了皇權對父權的重視。開元二十四年，唐玄宗《全唐文·千秋節賜父老宴飲敕》載：「今茲節日，谷稼有成，頃年以來，不及今歲。百姓既足，朕實多歡，故於此時，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並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少物，宴訖領取。」在豐收之時，皇帝以美酒佳餚款待長者，並賜禮物，宴會完畢之後贈送，顯見朝野同樂，上下一心，喜慶祥和。

(2) 設「養病坊」：專門收養窮苦老幼。唐代病坊一直設置於寺院，先是完全由僧人管理。《唐會要·病坊》記述：「悲田養病，從長安而來，置使專知。國家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至於安庇，各有司存。」由於影響擴大，政府才參與監督的。(張志雲，2005) 唐代的養病坊起初的直接目的不是養老，而是收留流離京城的乞丐。《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載：「禁京城乞丐，悉令病坊收管，官置本錢收利給之」，但其後發展到贍養老人及其他鰥寡無助之人的目的，並為後世「福田院」、「養濟院」的建立提供了經驗。

(3) 對老年人的刑責減免：從唐朝開始，對老年人的刑事赦免制度已正式確立在刑法典之中。例如《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雖有死罪，不加刑。」把老年人的寬刑政策由詔令變為正式的法典，有助於該制度的貫徹執行。

(4) 設立王杖制度：繼漢之後，唐朝也有設立王杖制度的規定。據《新唐書·玄宗本紀》記載，唐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宴京師侍老於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5) 官吏致仕制度：唐代的官員退休年齡定在 70 歲，根據《通典·職官

十五·致仕官》記載：「諸職事官，年七十以上，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奉聞。」朝廷撥給退休官員的糧饗，五品以上的官可受半祿；其他的官員獲撥劃永業田作為養老。如果七十以上官員仍不主動申請退休，將受人議論和譏笑。唐代為了宣揚惜賢敬老的良好社會風尚，往往給予一些退休官員特殊的禮遇，例如給予加官一級，或授予一個較高的官銜。

(6) 留養制度：留養制度最早見《北魏律》。為維護宗法制度，確保家族能傳宗接代繁衍子孫。唐朝也有留養制度《唐律》規定：「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期親丁者，上請。」

(7) 「十惡」之「不孝」的法典化：《唐律疏議》是中國封建社會立法技術非常高的一部刑法典，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立法水準。《唐律疏議》以「禮」為基本原則，集中體現封建禮制的法律化。《唐律疏議·名例律》中，把「不孝」位列第七。另外，「十惡」中的「惡逆」及「不睦」也涉及對不孝的處罰。²³《唐律疏議》中確立的「十惡」之「不孝」，不僅把不孝罪法典化，也是歷代刑法典的兼範，具有深遠的影響。²⁴ 具體說來，《唐律疏議·名例律》中的「不孝」，以及其他法律篇章中的刑罰規定，可參考《唐律疏議·斗訟》和《唐律疏議·戶婚》。

《唐律疏議·斗訟》對向官府告發或咀咒謾罵至親尊長有較嚴厲的懲罰；未盡贍養義務者必須負刑事責任。

告言、詛誑祖父母父母：即指向官府告發祖父母、父母的不法之事，或因對其不滿而咀咒、謾罵他們。對狀告期親尊長，《唐律》規定：「諸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意思是說，根據該法律條文，一是告發期親尊長、外祖父母、丈夫及丈夫之祖父母，即使罪行確鑿，仍然處徒刑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就是說，如果所告事情嚴重，則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告之者猶坐」，即是，犯罪者雖然有罪，但告發者身份不合，所告屬實，仍應受到相應處罰；「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可解釋為，如果存在誣告重罪，則要加處所誣罪三等處罰；「告大功尊長，各減少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這是說明隨着服制遞減，對於告其他大功、尊長減罪一等；告小功、緦麻等親屬減罪二等，三是對誣告期親尊長，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處罰為輕，各加所誣罪一等。如果不屬於親屬得兼容隱範圍，被告者則按常人律論。「若告謀反、逆、叛者，各不坐」，為着鼓勵告發謀反、大逆、叛變等嚴重危害皇室及國家的行為，對此不處罰。《唐律》對「諸詛祖父母、父母者，絞；毆者，斬；過失殺者，流三千里；傷者，徒三年。」對子孫妻妾詛誑丈夫之祖父母、父母，隨著服制降低，處罰也明顯減輕：「諸妻妾詛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須舅姑告乃坐。毆

者，絞；傷者，皆斬；過失殺者徒三年，傷者徒二年半。」另外，妻妾在丈夫去世之後毆打責罵故夫的祖父母、父母，其雖離開了原有家庭並且很可能已經另組家庭，但仍要受到處罰：「諸妻妾毆、詈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各減毆、詈舅姑二等；折傷者，加役流；死者，斬；過失殺傷者，依凡論。」子孫詛詈祖父母、父母，其刑罰僅次於毆殺祖父母、父母處斬極刑。這樣的立法，根本上乃在於維護尊長親屬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使之凜然不可侵犯。（孫家紅、龔汝富，2007）

「供養有關」的法律規定：「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根據《唐律》規定，子孫不應違背父母合適的教育訓導，以及有能力盡贍養義務而不盡義務，要處徒刑二年；但如果教令違法或家庭貧寒、無力供給，則需祖父母、父母控告才受罰。《唐律》又作以下補充：「議曰：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須奉以周旋，子孫不得違犯；『及供養有關者』，禮云『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類，家道堪供，而故有關者：各徒二年。故註云『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若教令違法，行即有愆；家實貧窶，無由取給：如此之類，不合有罪。皆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為了維護家長的地位，不單只注重禮教，還用立法手段，以確定這種以經濟為基礎的孝養。

按《唐律疏議·戶婚》的規定，祖父母、父母尚在，子孫分戶佔財產；為

父母守喪期間嫁人娶妻、作樂消遣、不依禮穿着孝服；沒有適時為去世的至親長輩與殯；詐稱健在的祖父母、父母死亡，該等行為全屬違法。

(i) 對「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唐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別籍、異財不相須，下條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孫不坐。」也就是說，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另立戶籍或分拆家產，處徒刑三年；祖父母、父母同意子孫另立戶籍或不法過繼他人，祖父母、父母處徒刑兩年，子孫不處罰。

(ii) 「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即指在為父母守喪時，嫁人娶妻，作樂消遣或在服喪期內，去喪服而穿吉服。根據《禮記·喪服》的規定，父母喪是斬衰三年重服。²⁵ 對於匿喪、作樂、釋服從吉，法律規定：「諸聞父母若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流三千里；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聞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徒一年；喪制未終，釋服從吉，杖一百。大功以下尊長，各遞減二等。卑幼，各減一等。」根據以上法律條文，匿喪不舉，要處三千里流刑；在喪期內去喪從吉，或者忘喪作樂，要處三年流刑；參加娛樂者（指百戲、雜樂、歌舞、傀儡等）處徒刑一年；聽禮樂、赴吉宴者，出仗刑一百。同時，對期親、大功及卑幼進行適當的減刑。「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

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就是說，在服喪期間，子孫不能談婚論嫁、夫妻不能同居生子。這種禁止嫁娶的義務還可能延伸到其他領域，例如當父母被囚禁時法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減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論。」即只有父母在父母的命令下進行，這種罪責才不予追究。甚至，在父母喪期幫別人主持婚禮也是不允許的，《唐律》規定：「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這種為了滿足禮法之需要，刻意強調感情道德因素，並予以法律化，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在中國古代社會，禮法交融，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這樣的規定恰恰是合理的。」

（孫家紅、龔汝富，2007）

(iii) 「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即指祖父母父母死而不舉行喪事，或另選擇他日，以及祖父母父母健在而假稱其死。法律明文規定：「若詐稱祖父母、父母及夫死以求假及有所避者，徒三年；伯叔父母、姑、兄姊，徒一年；餘親，減一等。若先死，詐稱始死及患者，各減三等。」根據《唐律疏議·詐偽》解釋：「父母之喪，解官居服。而有心貪榮任，詐言餘喪不解者，徒二年半。為其已經發喪，故輕于『聞喪不舉』之罪。若祖父母、父母及夫見存，或稱死求假，及有所避而詐妄稱死者，各徒三年。伯叔父母、姑、兄姊，徒一年。『餘親，減一等』，謂緦麻以上，從徒一年上減一等，杖一百。若先死，詐稱始死及妄說疾病，以求

假及有所避者，『各減三等』，謂詐稱祖父母、父母及夫始死及患，徒三年上減三等，合徒一年半；伯叔父母、姑、兄姊，徒一年上減三等，杖八十；餘親，杖一百上減三等，合杖七十。」簡單地說，如父母存而因求假或有所避而詐稱死，則處徒刑三年；詐稱伯叔父母、姑、兄姊死，處徒刑一年；緦麻以上親，從徒刑一年上減一等，處杖刑一百；若先死而詐稱始死或疾病者，如詐稱的對象是祖父母、父母，從徒刑三年上減三等，處徒刑一年半，如詐稱的對象是伯叔父母、姑、兄姊，從徒刑一年上減三等，處杖刑八十；其他親屬，從杖刑一百上減三等，處杖刑七十。

2.5. 宋朝時期（公元 960 至公元 1279 年）

宋朝開國，政治上承襲漢代以來的「以孝治天下」的立國原則，並延續了唐代的法律制度，把儒家孝悌倫理沿用於朝廷施政實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物質賞賜。宋朝統治者在位時常常以詔令的形式對高齡老年人以物質賞賜，主要有粟米、布帛等，有時候也會有酒肉和錢，並附帶免除徭役等。據《宋史·太宗紀》述：宋高宗時代，曾「賜京畿高年帛」、「賜高年白金器皿」。《宋史·真宗紀》也有關於宋真宗賞賜長者茶、絹，還免課役的記載：「父年老八十者賜茶帛，除其課役。」《續資治通鑒長編》也有這類記載，如高宗「召京城耆耄百

歲以上者凡百許人至長春殿，上親加撫慰，……各賜束帛遣之。」宋仁宗「民年八十以上，每遇長寧、於元節，許赴州縣燕設。其父母年八十者，與免一丁，着為式」、宋哲宗「耆老年八十以上者，人給酒食、茶絹，常加存恤。」這些都是最高統治者向長者賜物政策的實例。

(2) 賜於官爵。兩宋時期，歷代皇帝用賜於官爵的方式表示向有特殊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長者，賜給爵位或封號，以示對長者的尊敬。這些實例可參見各文獻記載。如《宋史》：太宗「乙未，賜諸州高年爵公士」、真宗「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岩爵一級」、仁宗「諸州上男子百歲以上者凡十一人，……並補本州島助教」、徽宗「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神宗「台州民延贊等九人，年各百歲以上，並授本州助教。」《續資治通鑑長篇》也有相關的記載；〈卷二九〉：「丙申，賜諸通高年百二十九人爵為公士」；〈卷七二〉：「赤縣父老……九十者授攝官，賜粟帛終身，八十賜爵一級。」〈卷一三二〉：「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宋會要輯稿·崇儒·太學》也有記載：「太學內舍、上舍生父母年七十以上，外舍生父母年八十以上，並與初品官，婦人封號。」從以上資料所得，宋代高齡人士受賜爵的官銜很籠統，除「助教」之外，其他如「士」、「公士」、「初品官」、「授官封」和「授攝官」都沒有具體的職銜，可見這些高年官職不注重實際的職務，只是身份象徵。

(3) 養老機構。宋朝是中國古代慈善事業的大發展時期。兩宋依照前例，

先後設立了福田院、居養院、養濟院等救助機構，收容貧病無依、不能自存的老人。據《宋史·食貨誌》記載，北宋初年在京城開封設置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疾孤窮丐者」，可見當時養老是各項慈善工作的目標之一。福田院，在唐代稱之為悲田養病坊，原是佛寺開辦的民辦救濟機構發展而來的。另外，北宋在地方設置廣惠倉，主要的職能是在冬季救濟老幼貧民。《續資治通鑑長編》述說，在宋哲宗時期一道敕令記載：「鰥寡孤獨貧乏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縣令、佐驗實，官為居養之；疾病者仍給醫藥。監司所至，檢察閱視。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無戶絕以官屋居之，及以戶絕財產給其費，不限月分，依乞丐法給米豆，闕若不足者以常平息錢充，已居養而能自存者罷」，南宋時期，統治者也很重視老疾貧民的收養工作，在全國範圍建立了相關的救助機構，如養濟院、居養院、廣惠坊、利濟院、安老院等。

(4) 老年人的刑事赦免。兩宋繼承前朝法制，繼續實行對老年人的刑事赦免政策。根據《宋刑統·老幼疾及婦人犯罪》條的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諸犯罪時雖未老，而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另外該條項下還有兩條准用規定：其一，「諸准格、敕應決杖人，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並斟酌量決罰。如不堪者，覆奏，不堪流、徒者，亦准此。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篤疾，並放，不

須覆奏」。其二，「八十以上及篤疾人，有犯十惡死罪、造偽、劫盜、妖詐等至死者，請矜其老疾，移隸僻遠小郡，仍給遞驢發遣。其犯反、逆及殺人，奏聽處分。」這些量刑從寬或免刑的規定，從側面體現了對老年人的尊重和保護。

(5) 家庭養老的保障政策。家庭養老仍是兩宋養老的主要方式，其主要是通過制度保障以及刑罰制裁兩部分加以保障的。

(i) 制度保障。制度保障主要體現在共居制度、侍丁制度、官員侍老制度和留養制度上。共居制度要求子女與父母、祖父母同居，否則將受到刑罰制裁。例如《宋刑統·父母在及居喪別籍異財》條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孫不坐。」這就是說明：如果祖父母、父母健在，子孫要無條件地與其同居共處，以便於侍養，否則就會受刑罰。兩宋實行「侍丁制度」，這是一種保障高齡老人得到較好贍養而免除其子孫賦役的政策，獲免的子孫即為侍丁。侍丁家中需有八十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如前述宋真宗「父老年八十者賜茶帛，除其課役」、宋仁宗「其父母年八十者，與免一丁，著為式」等，即為實例。宋代對官員侍老有專門的規定。《宋刑統·匿哀·冒哀求仕》：「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委親之官；即妄增年狀，以求入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這說明，宋代官員家裡如果有「老疾無侍」之人，該官員就需要盡侍養之道，否則會被彈

劾定罪、處以刑罰。權留養親即留養制度，是一種對於家有老疾的服刑物件採取的緩刑侍老的政策。《宋刑統·犯流徒罪》條規定：「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周親成丁者上請。犯流罪者，權留養親，不在赦例，課調依舊。若家有進丁及親終周年者，則從流計程，會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應侍，合居作者，亦聽親終周年，然後居作。」留養制度源於《北魏律》，乃保障家族不致於絕後，是體驗「以禮入法」的精神，是一項養老制度，並非對犯人的赦免。

(ii) 不孝罪的刑法制裁。宋朝刑法典《宋刑統》沿襲《唐律》，把「不孝」列入「十惡」，其具體內容包括：「調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關；居父母喪，自身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其內容與《唐律疏議》分毫不差。《宋刑統》對「告言、詛詈父母、父母」、「別籍、異財」、「匿不舉哀、作樂、釋服」都以不孝罪嚴刑處罰。不孝罪的量刑方面分別為：「諸詛祖父母、父母者絞，毆者斬」；「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諸聞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者，徒三年」，「聞周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徒一年。喪制未終，釋服從吉，杖一百」，「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

被囚禁而作樂者，徒一年半」。

2.6. 元朝時期（公元 1206 年至公元 1368 年）

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的封建王朝，出於維護和鞏固其政權的需要，一改其「貴壯健，賤老弱」的風俗，逐漸接受了漢族尊老敬老的思想傳統，儘管當中內容仍是蒙漢有別，但總算是建立尊老養老的法律與制度，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物質救助。元朝在建國之初就確立了對老年人的國家救助制度。《元史·食貨誌》有許多相關資料，元世祖中統元年曾下詔「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無告者也，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至元元年下詔「病者給藥，貧者給糧」，至元八年命令「令各路設濟眾院以居處之，於糧之外，復給以薪」，至元二十年令「給京師南城孤老衣糧房舍」；元成宗元貞二年曾下詔「各處孤老，凡遇寬恩，人給布帛各一」，大德三年下詔「遇天壽節，人給中統鈔二貫，永為定例」，大德六年下詔「給死者棺木錢」。這說明元朝對老年人提供的物質救助包括糧食、藥品、住所、錢幣、布帛、喪葬費等等。

(2) 高年老人的榮譽旌表。賜老年人以官爵，前朝已有定制，元朝也採取了相應的做法，《元史》卷 40（順帝四）記載：元惠宗至正元年曾下詔「民年八

十以上，蒙古人賜贈帛二表裡，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但是和前代相比，元朝不僅將政治榮譽降低到了單純的精神獎勵，還有了民族差別，對老年人的榮譽表彰針對的僅僅是蒙古族以內的老人。

(3) 老年人刑事赦免制度。元朝借鑒前朝，繼續對老年人犯罪實施刑罰赦免制度。根據《元史·刑法志》記載，「諸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者，贖」，這說明元朝老年人聽贖的標準是年滿七十歲。另外，老年人如果犯罪時未達赦免年齡，但案發後已達老年，則按老年標準處罰，即可聽贖，此種立法技術不僅體現了對老年人的保護，也體現了處罰從輕的思想。見《元史·刑法志》：「諸幼小為盜，事發長大，以幼小論。未老疾為盜，事發老疾，以老疾論。其所當罪，聽贖，仍免刺配，諸犯罪亦如之。」

(4) 設立官方養老機構。元朝借鑒前朝做法，設置養老機構，《元史·食貨誌》記載，元世祖於至元八年在各路設立「濟眾院」、於至元十九年在各路設立「養濟院」，以對失去生存能力而又無人收養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給予救助。元朝的養老機構制度的特別之處是在刑法中對國家的養老責任進行了規定。根據《元史·刑法志》記載，「諸父母在，分財異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職，及同宗有服之親，鰥寡孤獨，老弱殘疾，不能自存，寄食養濟院，不行收養者，重議其罪。親疾亦貧不能給者，許養濟院收錄」、「諸鰥寡孤獨，老弱殘疾，窮而無

告者，於養濟院收養。應收養而不收養，不應收養而收養者，罪其守宰，按治官常糾察之……諸年穀不熟，人民轉徙，所至既經賑濟，復聚黨持杖，剽劫財物，毆傷平民者，除孤老殘疾不能自贍，任便居住，有司依前存養」，這樣就把家庭贍養責任、國家贍養責任聯結起來，有助於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終。

(5) 致仕官員的養老政策。元朝仍將七十歲定為官員的致仕標準，致仕官員將享受加官進秩、食俸祿、蔭敘子孫等三項優惠政策。《元史·選舉誌》解說：加官進秩是指「內外官員年至七十者，三品以下，于應授品級，加散官一等，令致仕」，後來皇慶二年又規定，「三品以下官員，職事、散官俱升一等，令致仕」。《元典章·職制》述：食俸祿是指「子幼家貧者，給半俸終其身」，以保障退休官員的基本生活。蔭敘子孫是指退休官員可以蔭自己的兒孫為官，而不用參加科舉考試。因當時的高級官員都是蒙古人，因此該制度惠及漢人的機會並不多。

(6) 傷害尊長的刑法和處罰。元朝雖然不像前朝那樣，把「不孝」列入「十惡」，但對傷害祖父母、父母或尊長者的罪行，是處以極刑。元朝對虐待老年、殺傷老人者同樣處以嚴厲的刑罰。根據《元史·刑法志》的記載：「諸子孫弑其祖父母、父母者，凌遲處死，因瘋狂者處死。諸醉後毆其父母，父母無他子，告乞免死養老者，杖一百七，居役百日。諸子弑其繼母者，與嫡母同」；「諸子

弑其父母，雖瘐死獄中，仍支解其屍以徇。諸毆傷祖父母、父母者，處死。諸謀殺已改嫁祖母者，仍以惡逆論。諸挾仇毆死義父，及殺傷幸獲生免者，皆處死。諸圖財殺傷義母者，處死」；「諸婦毆舅姑者，處死。諸因奸毆死其夫及其舅姑者，凌遲處死」；「諸挾仇毆死其伯叔母者，處死。諸因爭兄弟同謀毆死諸父者，皆處死。諸挾仇故殺其從父，偶獲生免者，罪與已死同」；「諸婿因醉殺其婦翁，偶獲生免者，罪與已死同」。這說明元朝對虐待、殺傷尊長等「惡逆」行為，處罰極為嚴重。

2.7. 明朝的時期（公元 1368 年至公元 1644 年）

明朝的統治者通過借鑒歷史經驗和社會統治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養老政策，主要內容有選用老年人為官、賜物、存問高年、刑事赦免等，具體政策如下：

(1) 物質賞賜、賦稅減免。賜物是明朝政府養老的一項重要措施。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明太祖洪武十九年發佈詔令，「若貧無產業年八十以上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歲加賜帛一匹、絮一斤。其有田產能贍者，只給酒肉絮帛」；明成祖永樂十九年發佈詔令，「民年八十以上，有司給絹二匹、布二匹、酒一斗、肉十斤」。這些即為對老年人進行物質賞賜的實例。在明朝，對老年人進行賦稅減免已經形成慣例，例如，明太祖在洪武六年就規

定：「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子侍養，免其差役。」

(2) 鞏固老年人社會地位。明朝對老年人的社會地位十分重視，並制定了多種措施加以保障，主要有：選用老年人為官，如洪武十九年曾諭禮部，「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征至京師。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優禮高年大臣，即對以至致仕年限而繼續留用的高年大臣，給予特殊照顧，《明史》可見一二，如「以老特乘小車出入」、「免其常朝」、「除夕賜禦制詩，及以告病，則遣臣賜藥餌」等。《明太祖實錄》及《明英宗實錄》都有提及，選用老人作里老，即讓其掌管司法教化，具體內容有：處理民間糾紛，「若戶婚、田宅、鬥毆者，則會里胥決之」；監督生產，「許裡老依教民榜例懲治」；勸導民俗，教導鄉民應「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監督地方官吏，可「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面奏，以憑保全」；²⁶ 另外統治者還通過召見老人以實現社會教化和對老年人的安撫，例如《罪惟錄·鄉飲讀法養老禮》就有「太祖重耆老，令五十歲以上者，歲朝京師，訪問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的記載。

(3) 設立養老機構。《明太祖實錄》有關的說述，如明太祖早在洪武元年就發佈詔令，明確宣佈：「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至洪武元年，發佈詔令，命「天下郡縣立孤老院」，不久改名為「養濟院」。明朝官方養老制

度被置於刑法的保障下，《大明律·戶律》規定：「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這一規定明確了地方官員收養孤老的責任，有助於該制度的實行。

(4) 老年人刑事赦免制度。明朝亦實行對老年人的寬刑制度，《大明會典·老小廢疾收贖》條款中規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凡老幼及廢疾犯罪律得收贖者，若例該枷號，一體放免，照常發落」。《大明會典·犯罪時未老疾》條款中規定：「凡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另外，《大明會典·共犯罪分首從》條款規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若尊長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歸罪於共犯罪以次尊長。」這些都體現了對老年人的寬刑、恤刑的思想。

(5) 致仕官員的養老政策。致仕官員按照其品級可以享受相應的物質待遇，《明史·禮誌》曾說，明世宗時曾詔「文職致仕一品未受恩典者，有司月給食米二石，歲拔人夫二名應用。二品以上年及八十者，備彩幣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實奏來，遣使存問」，即為實例。對於生活有困難的退休官員，政府還給予特殊補貼，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令在京文職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者，「廉貧不能自存、眾所共知者，有司每歲給予食米四石」。(王興亞，1994)

(6) 家庭贍養的刑法保障。明朝繼承了前朝有關「十惡」之「不孝」的規定。根據《大明會典·律例》的規定，凡是「咒罵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缺，居父母喪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間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均為不孝的行為。另外，《大明律·棄親之罪》規定：「凡祖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篤疾別無以次丁棄親之任，及妄稱祖父母老疾求歸入侍者，杖八十。」這明確了對老年人的養老責任。

2.8. 清朝前期（公元 1644 年至公元 1840 年）

清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其在尊老養老方面的措施大多數是參照前朝的規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物質賞賜、賦稅減免。物質補助是歷代統治者實行尊老敬老的仁政的必要措施，《清世稿·世祖本紀一》敘述，清世祖順治元年就曾發佈詔書，令對「八十以上者，給與絹醕米肉」，每逢朝廷慶典，清政府也會對老人有所賞賜。對於賦稅減免，順治元年規定，「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徭役」；《大清會典》稱，康熙二十七年，為使家庭能充分照顧老人生活，清政府又下詔「軍民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派差役」。物質獎勵和賦稅減免均為政府命令性質的法律措施，其實施情況以及執行的連續性是難以保證的。

(2) 千叟宴。千叟宴始於康熙，盛於乾隆時期，是清宮中的規模最大，與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表示對老人的關懷與尊敬，以體現統治者尊老敬老的仁政作風。《養吉齋叢錄》記載：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是清聖祖玄燁帝六十歲生日，萬壽節那天，「上朝慈寧宮，御太和殿受賀，頒詔覃恩，錫高年，舉隱逸，旌孝義，蠲逋負，鰥寡孤獨無告者，官為養之，罪非殊死，咸赦除焉。壬寅，召直省官員士庶年六十五以上者，賜宴於申易春園，皇子視食，宗室子執爵授飲。扶掖八十以上老人至前，親視飲酒」。這場漢宴規模極為龐大，與宴者「九十歲以上 33 人；八十歲以上 538 人；七十歲以上 1823 人；六十五歲以上者 1864 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康熙在乾清宮請年紀在 65 歲以上的老人共 1020 人，並即興賦詩，故名《千叟宴詩》。另外乾隆五十年、嘉慶元年都舉行了千叟宴，以體現對老年人的尊重。見《清史稿·高宗本紀五》：「舉千叟宴禮，宴親王以下三千人於乾清宮，賞賚有差。」《清史稿·仁宗本紀》：「寧壽宮舉行千叟宴，太上皇帝蒞焉。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座，賜卮酒如故事。」

(3) 設立養老機構。清代承啟前朝傳統，設立了養濟院和普濟堂等社會福利機構，對鰥寡孤獨者進行救濟。清代養濟院始立於順治五年，據《清世祖實錄》說：「各處設養濟院，收養鰥寡孤獨及殘疾無告之人」。後得皇帝支持發展為官辦，養濟院的設置漸趨普及，遍佈全國。養濟院收留的對象，只限本地戶

籍，普濟堂則沒有此限。因此可以說普濟堂的設立是為了彌補養濟院的不足。

(4) 老年人寬刑政策。清朝仍保留了前朝有關老年人犯罪的寬刑政策。

《大清律例·名例律》規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其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償受贓者償之。」並且在「犯罪時未老疾」條保有規定：「凡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這些規定既體現了立法技術的先進，也體現了寬恕老幼的仁愛的思想。

(5) 致仕官員的優待。清朝政府關注致仕官員的待遇問題，起于順治年

間，《大清會典事例》稱，「八旗武職六十以上乞休解任者，查其所曆俸次，及原效力處、年份，題請賞給半俸；其年未至六十告病解任者不准。內務府佐領及公府屬佐領並子弟襲職官員不准給」。即規定六十以上正常致仕八旗武官發給原俸祿之半。可參考《古今圖書集成·銓衡集·休致部匯考二》的資料，如順治十六年規定，「凡滿洲、蒙古、汗軍大小各官致仕」，「致仕之官有世襲者照品給俸」；順治十八年又規定，「無世職之官，年至六十致仕者，仍給半俸，未及六十歲，因疾辭仕者，不准給」。致仕領半俸始成定例。

(6) 家庭贍養的刑法保障。清朝早期延續前朝有關「十惡」的規定，把「不孝」列為「十惡」之一。《大清律例·名例律》規定的不孝與前朝沒有差別，即「譴告言、咒罵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稱祖父母父母死」。

2.9. 清末和民國時期（公元 1840 年至公元 1911 年）

2.9.1. 清朝末期對傳統法制的改革與禮法之爭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古老的中華帝國開始喪失獨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此過程中，傳統的父權社會也開始解體，以父權制度為依託的古代養老體制開始瓦解，封建國家與社會的養老思想開始轉變，各種法律制度也開始崩潰，集中體現就是 1905 年開始制定，並於 1911 年 1 月 25 日正式公佈的《大清新刑律》。（曾憲義，2009a）《大清新刑律》本預訂在宣統五年正式實施，但公佈後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故《大清新刑律》並未正式施行，但因修訂《大清新刑律》過程中，發生了一場中國法制史上的「禮法之爭」。禮法之爭約發生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至清宣統元年（1909 年）以張之洞、勞乃宣為首的「禮教派」與以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為代表的「法理派」，圍繞《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等新法典的修訂及制訂而產生的

理論爭議。《大清新刑律》對封建刑法制度作了大量刪減，尤其是刪去了以家天下和宗法制為根據的「十惡」制度，標誌著唐朝正式確立的、在中國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十惡」制度被正式廢除，封建社會有關「不孝」的刑事處罰及封建統治的宗法思想開始動搖。這部新刑律，對於根深蒂固的倫常掛念，大大地予以一次打擊。（王伯琦，2005）引起「禮教派」群起反對，指責「法理派」大量採納資產階級刑法體制和原則，有「蔑棄禮教」、「不合吾國之禮俗」之嫌。「禮法之爭」，其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如何對待西方近代法律精神與中國傳統法律原則。（朱勇，2006）主要有以下數點（表 14）：

表 14：清朝末期對傳統法制的改革與禮法之爭

爭議點的規條 名稱及內容	禮教派的理據	法理派的論點
1. 干名犯義。「干名犯義」是傳統法律中的一個重要罪名，專指子孫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為。按照儒家的理論，親屬之間理應相互包庇、隱瞞犯罪。親屬相告言：「虧教傷情，莫此為大。」明清律中，子孫控告祖父母謂之「干名犯義」，亦屬十惡之條。	認為「中國素重綱常，故於干名犯義之條，立法特為嚴重」，（《大清法規大全·法律部》，不詳）由此足見「干名犯義」條款大於禮教之事，是傳統倫理的根本所在，因而絕不能在新刑律中沒有反應。	從西方國家通行的法理出發，提出「干名犯義」屬告訴之事，應於編纂判決錄時，於誣告罪中詳敘辦法，不必另立專條。（沈家本，不詳）
2. 存留養親（留養制度）。「存留養親」多適用於獨子鬥毆殺人之案。考慮到	「存留養親」是宣揚「仁政」、鼓勵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隨便就排除在新律之外。	認為：「古無罪人留養之法」，而且嘉慶六年上諭中也明白表示過：「是承祀、留養，非

其父母年老無人奉養，又無其他男丁繼承宗嗣，經有關部門代為申請，得到皇帝特許以後，可免其死罪，施以一定處罰以後，令其回家「孝養其親」。		以施仁，實以藏奸，轉以誘人犯法」。因此，「存留養親」不編入新刑律草案，「似尚無悖於禮教」。（沈家本，不詳）
3. 「無夫奸」及「親屬相奸」。依照傳統禮教，這都是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舊律定罪極重。	依照傳統倫理，「奸非」是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故傳統刑律有嚴厲的處罰條款。「親屬相奸」更是「大犯禮教之事，故舊律定罪極重」。認為在新律中也應有特別的規定。	認為，「無夫婦女犯奸，歐洲法律並無治罪之文」。此事有關風化，當認為「無夫婦女犯奸，歐洲法律並無治罪之文，事有關風化，當於教育上別籌辦法，不必編入刑律之中。至於親屬相奸，「此等行同禽獸，固大乖禮教，然究為個人之過惡，未害及社會，舊律重至立決，未免過嚴」。因此，對此等行為，依「和奸有夫之婦」條款處以三等有期徒刑即可，「毋庸另立專條」。（沈家本，不詳）
4. 「子孫違反教令」問題。傳統法律中一條針對子孫卑幼「不聽教令」，彈性很大的條款。只要子孫違背了尊長的意志、命令，即可構成此罪名。	清律之中，除規定子孫違反教令處以杖刑之外，還賦予尊長「送懲權」。認為這樣「子孫治罪之權，全在祖父母、父母，實為教孝之盛軌。」	認為「違反教令出乎家庭，此全是教育上事，應別設感化院之類，以宏教育之方。此無關於刑事，不必規定於刑律中也。」（沈家本，不詳）
5. 當子孫卑幼被尊長時，能否對尊長行使正當防衛權問題。	認為，按照中國傳統的倫理，「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子孫對父母祖父的教訓、懲治，最多像舜帝那樣「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只有接受的道理，而絕無「正當防衛」之說。	認為：「國家刑法，是君主對於全國人民的一種限制。父殺其子，君主治以不慈之罪；子殺其父，則治以不孝之罪」，惟有如此「方為平允」。（沈家本，不詳）

禮教派的觀點，不單止代表社會上層貴族高官，封建士大夫的保守派思想和態度，實際上是代表朝廷的立場，清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清朝政府針

對修律過程中的爭議，正式發佈上諭，明確表示：「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禮教。中外各國禮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異。……良以三綱五常，闡自唐、虞，聖帝明王兢兢保守，實為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今寰海大通，國際每多交涉，固不宜默守故常，致失通變宜民之意，但祇可采彼所長，益我所短。凡我舊律義關倫常諸條，不可率行變革，庶以維天理民彝於不敝。該大臣務本此意，以為修改宗旨，是為至要。」（《大清法規大全·法律部》，不詳）在清廷偏袒禮教派意見之一，法理派只好妥協讓步，在新刑律後加上五條《附則》，稱為《暫行章程》。包括規定無夫婦女犯通奸罪的刑罰；子孫卑幼不得對尊長使正當的防衛權；加重卑幼對尊長、妻對丈夫殺傷害罪的刑罰，相反地，減輕尊長對幼卑、丈夫對妻子殺傷害的處罰等。凡是符合傳統禮教、家族主義的儒家思想、「三綱五常」的倫常道德等規範，儘量予以保留。從修訂刑舉的過程中，可見封建制度的保守迂腐、當權者的利欲熏心，也顯示儒家倫理思想對中華法系影響的深遠。雖然「禮法之爭」的結局是法理派的退讓和妥協，但隨著清王朝的覆滅，傳統以父權為基礎的尊老養老思想及其制度開始解體，呼喚著新的養老體制的誕生。

2.9.2. 民國時期養老政策的發展

及至民國，傳統的孝道思想受到挑戰，取而代之的是近代平等、自由、獨立的家庭倫理觀念。隨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家庭的物質基礎受到侵

蝕，這些原因導致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社會福利思想的引進；加上時局多變、政治不穩定、社會動蕩不安，國家沒有能力承擔養老責任，於是外國宗教機構、民族工商業企業家、社會賢達等籌辦的社會慈善事業快速出現。養老事業由教會、民間團體、慈善機構、商界等非政府組織舉辦，也就是中國近代養老服務產業的萌芽。

近代養老的意義和傳統社會贍養年長者的意義有很大的區別。傳統社會的贍養是封建家長權的體現，並不是因為老年人的需要或處於弱勢環境，恰是因為老年人是封建家庭的權威，處於強者及領導的地位；現代社會的贍養是國家作為民生的政策，是體驗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的精神，不但是個人、家庭應有的義務，也是社會必須關懷、國家應盡的責任，最主要的是老年人應有的權利。根據資料顯示，（陳叔紅，2007）1930年國民政府內政部調查江蘇等18個省的救濟院和舊有慈善團體時統計的資料，總計566個縣市共有1621個舊有慈善團體，佔所有社會救濟機構的78%；又據國民黨中央社會部1946年年底的統計，全國29個省市總共有救濟機構3045個，其中私立的有1011個，約佔33%；1948年的《中國年鑒》披露，當時全國有4172個救濟機構，其中私立機構1969個，佔47%。但由於國力的限制和長期動蕩不安的國情，這些服務機構的供養老人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為當時的服務對象不單是老人而是無依無靠的眾人，服務內容是屬於一般生活的救濟和照料。在眾多民間慈善機構當中，極少專門為

老人服務的團體，相對來講，有不少是屬於扶幼、慈幼的組織。民國時期，影響較大的民間慈善救濟團體有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幼協會、戰時兒童保育協會、香山慈幼院、華洋義賑會等。（黃劍波，2005）

2.10. 新中國有關瞻養父母法律的發展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的法制建設經歷了曲折的發展，直到確立改革開放的國策之後，才逐漸走向正軌。以 1982 年的第四部《憲法》為標誌，有關老年人瞻養與權益保障的法律開始逐漸形成一個體系。但是，《憲法》並非最先規定了子女對父母的瞻養扶助義務，1950 年《婚姻法》開創了新中國子女瞻養扶助父母義務的先河，該法第十三條規定：「父母對於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於父母有瞻養扶助的義務；雙方均不得虐待或遺棄。」並且，1980 年制定的取代該法的新的《婚姻法》保留了該條的規定，並有所擴充。

1982 年《憲法》第 45 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第 49 條第三款規定：「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瞻養扶助父母的義務。」同條第四款規定：「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

《憲法》規定老年人對國家和社會的物質幫助權，是老年人享有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權利。《憲法》要求的子女對老年人的瞻養扶助的義務，以及禁止虐待老年

人的規定，成為中國公民處理家庭關係的一項基本原則。（周葉中，2005）《憲法》中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及其贍養的規定，為部門法的立法提供了憲法依據，有助於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形成一個逐漸充實的法律體系。

1986 年《民法通則》第 104 條第一款規定：「婚姻、家庭、老人、母親和兒童受法律保護。」這是民法基本法最先對老年人保護的原則性規定，但是該條極為概括，只能作為一條基本原則加以適用，難以操作。1980 年制定、2001 年修正的《婚姻法》第 2 條第二款規定：「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全法權益。」這首次確定了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是婚姻家庭關係的一項基本原則。第 21 條第一款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同條第三款規定：「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會給贍養費的權利。」該兩款豐富了 1950 年《婚姻法》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扶助義務。贍養是指子女對父母的供養，即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扶助，是指子女對父母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關心、幫助和照料。（馬憶南，2002）該兩款儘管仍沒有明確界定「贍養扶助」的內容，但明確賦予父母要求贍養費的訴權，促進了司法實踐的發展。

1979 年制定、1997 年修訂的《刑法》第 260 條第一款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 2 年以下有期待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條第二款規定：「犯

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 2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61 條第一款規定：「對於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情節惡劣的，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這兩條分別稱為虐待罪和遺棄罪，構成了對老年人權益的刑法保障。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經常以打罵、凍餓、緊閉、強迫過度勞動、有病不給治療、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從肉體上、精神上進行摧殘、折磨，情節惡劣的行為。（劉憲權，2005）遺棄罪，是指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人，對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員，拒絕履行扶養義務，情節惡劣的行為。（同上）由於刑法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刑法設定的虐待罪和遺棄罪，為子女贍養扶助父母義務的履行，提供了震懾手段，有助於監督該義務的履行。

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法律，不僅僅體現在子女的贍養扶助的義務上，其他部門法中也開始散落著相關規定。例如，1980 年制定、經過多次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第 5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批准可以減徵個人所得稅：一、殘疾、孤老人員和烈屬的所得；二、因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損失的；三、其他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准減稅的。」1994 年制定的《勞動法》第 70 條規定：「國家發展社會保險事業，建立社會保險制度，設立社會保險基金，使用權勞動者在年老、患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獲得說明和補償。」第 73 條規

定：「勞動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一）退休；（二）患病、負傷；（三）因工傷殘或者患職業病；（四）失業；（五）生育。」這表現新中國開始從經濟法和社會法的角度開始對老年人的權益加以特別保護。

雖然以《憲法》為核心的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法律已零星出現於各個部分法當中，但各個法律的規定極為簡略、難以操作，且遠不能形成一個健全的體系，這些零星的法律規定，已不能滿足保護老年人權益的社會需要，特別是中國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問題已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在這個背景下，需要一部專門的法律規定老年人的贍養扶助的問題，因應社會的需求，《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於 1986 年 8 月 29 日宣告面世。

3. 儒家的孝道思想及其對中國贍養立法的影響

3.1. 儒家孝道思想的內容

中國傳統孝道是中華民族倫理思想的核心，古代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兩千多年來「孝」成為對封建制度之下維繫家庭和社會運作的主要元素，至今仍滲透在現實的生活中，不但對華人社會人們思想的行為起教化作用，還傳播至週邊國家蔚成東方社會養老文化的主體和特徵。有關孝的起源，學者意見不一，頗有爭議，如曹方林認為：孝應起源於「民知母不知父的時代」；（曹方林，2000）康學偉認為：孝的觀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時代的產物」；（康學偉，2000）陳蘇

鎮認為，孝的觀念不會早於殷周之際。（陳蘇鎮，1983）孝字最早見於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由上面一個「老」字和下面一個「子」字組成。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會長李寶庫描述：「形象地描繪出上面的老人呵護着下面的子女，下面的子女承奉着上面的老人，父慈子孝，十分和諧。」（李寶庫，2005）根據《說文解字》東漢許慎講法：「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許慎認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所從之「匕」字，而加上「子」字結合而成的會意字。「從老、從子」，表示老人和子女具有血緣、親親關係；「子，承老也」，說明子女對老人的繼承，並且承擔奉養老人的責任。從漢字的構字原則看，「孝」體現了父（老、考）子相承、善事父母的意思。這說明「孝」被看著是子女對父母的一種善行與美德。在西周及其以前，對「孝」的認識也僅以「恭敬、奉養父母」，以及「祭祀先祖」為限的。可參考《詩經·大雅·文王之什》：「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詩經·小雅·楚茨》：「以為酒食，以享以祀。」《詩經·周頌·臣工之什》說：「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尚書·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史記·周本紀》記述：「周室衰微，諸侯強併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說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傳統的社會制度已趨向瓦解。傳統的禮樂文化遭到破壞，奴隸制孝道也因而失去生存的土壤。正式在這種「禮崩樂壞」的背景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開始對傳統孝道進行繼承和改造，並加以

拓展和深化。《爾雅·釋訓》認為「善父母為孝」。《論語·學而》和《論語·為政》對孝的內涵作了許多註釋。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內涵非常豐富，包括「愛人」、「理智」、「孝悌」、「忠義」等內容。但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孝」乃「仁之本」，在其「仁」字道德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儒家的孝道用外在的「禮」建立起來的，《左傳》說：「孝、禮之始也。」孔子所謂的「無違」，即以不違背禮節為「孝」。然何謂「無違」，儒家認為，「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即當父母健在時候，應該按禮節侍奉；父母去世，應該按禮節安葬，按禮節祭奠他們。《孝經·開宗明義章》引述孔子的說話：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孔子把孝歸納為三方面，首先從事奉自己的父母開始，其次是事奉自己的君主，最後是修身立世實行自己的志向。

(1) 孝「始於事親」，內容包括多個層次。《孝經·紀孝行章》說：「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禮記·祭義》說：「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子女對父母的奉養包括物質上的「養」和精神上的「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物質上贍養和悉心照料父母，另一方面要從精神上體貼、關心、愉悅父母；又說：「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可見，對父母的「孝」

分為「養」、「敬」、「安」、「終身孝」四個涵義，彼此融滙貫通缺一不可。即首先要瞻養父母，其次要尊敬父母，再次安定父母，最後要終身為孝。

「養親」，被認為是最低層次的、出於本能的「孝」。《論語·為政》記載：孔子以「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來表達養親的必然性，因此儒家認為孝養不只限於子女因報恩而例行公事，應該有較高的標準，就是「善養」。至於要達到「善養」，則有「五道」的要求，即「養體」、「養目」、「養耳」、「養口」、「養志」。《呂氏春秋·孝行》有詳細的解說：「養有五道：修宮室，安床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飡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飡煎調，養口之道也。飡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以上所述的五道，恐怕只能是皇家貴胄，豪門望族才能做到，一般老百姓，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逮。儒家經典對曾子行孝有許多記錄，例如《孟子·離婁上》的記載，曾子養其父母時，每頓必有酒肉，吃完之後還問夠不夠時，總要聽到「有剩餘」才於心。從健康角度來講，用這樣方式供養父母，應該不算是「善養」，較為合理的應該是如《新語》所記：「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

「敬親」，就是孔子所謂「孝」的本質，才是人之「孝」與犬馬之「養」

的根本區別。「敬親」要求子女的孝行不僅停留在行動上，更要求子女從內心發出對父母的尊敬之情，保證父母能夠經常和顏悅色。因此孟子說：「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禮記》說：「孝子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又說：「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而敬之。」意思就是，子女奉養父母，應該讓他們心情愉快，保持歡樂，不違背他們的志趣，應該要順從他們的心意，那才算是孝順。《中庸》對孝順父母的行為作這樣的描述：「夫孝者，善述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以孝行見稱的儒家弟子曾參在這方面又立了榜樣，據《呂氏春秋·孝行賢》的記載，他說：「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曾之父曾皙嗜羊棗（一種果實），而曾子不忍心食羊棗，怕奪父之好，這種說法略帶牽強附會，卻表達孝子對父母的順從和尊敬。儒家認為尊敬父母，還體現在應正視父母所犯的錯誤，但應該委婉勸諫，這樣才不至於陷父母于不義。若勸諫不成，仍應恭敬孝順，而不能對父母有所怨恨。《呂氏春秋·應同》認為：「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論語·里仁》：「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這種說法，看起來很矛盾，但說出情禮相扶，以禮制情，子女應體諒父母的無知，容忍父母的固執，包容父母的過失，克制個人的情緒。不可因父母的缺點，而對他們產生惡感、不孝、不敬、不服、不順；亦說明儒家的孝道並不主張子女對父母的盲從，必須具有更高深的內涵和情操，才能表達孝的真正意義。儒家還有許多有關諫諍的道理：如《孟子·告子下》「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

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荀子·子道》：「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

「安親」，就是說子女在父母在世時立身行事，不處危險之所，不為不義之行，更不能惹事生非、作奸犯科，以免父母為自己擔驚受怕，心境得不到安寧。除了物質奉養父母之外，做子女的必須經常陪伴父母身旁，時加問候、關心、愛護，尤其是對年老患病的父母更應加以關懷體貼。《孝經·紀行孝章第十》記載孔子的說話：「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就是說要令到雙親安心無憂，身居高官厚祿者要謙虛而不敢驕傲自大，地位低下之時也不敢悖亂違法為非作歹，不與人爭鬥計較，這樣就不會招惹禍端導至身亡，也不會因悖亂違法而受到刑罰制裁使到父母受牽連。一個人如果不免除這些惡習劣行，令父母不得安樂，就算每天用佳饌美食，大魚大肉供養父母，仍然不能算是孝順。年老的父母，希望子女守在身旁，才會感到有安全感，因而《論語·里仁》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禮記·曲禮上》也有「凡為人子者，出必告，返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之說。說明為人子女者，一旦出了門，應該告訴父母去了何處，做了那些該做的事業，不要令父母掛念擔心。以行孝見稱的曾參又立了一個典範，據《孔子家語》記述：「齊

欲聘曾子為卿，曾子說：『吾父老。食人之祿，則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這種說法有刻意表揚曾子之嫌，其實古代為官是可以携眷，更何況齊欲聘曾子為卿，必定是高官厚祿，何愁沒有官邸、家丁、奴僕呢！為官者往往是在居父母喪期，間辭官回家守孝三年，就是所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的行孝，因此「遊必有方」的說法，作為「安親」之道，應該是比較合乎情理。

「終身孝」，行孝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繼承父母的遺志，教化下一代，使之發揚光大；傳宗接代，繁衍子孫；父母在世應盡孝，死後要按禮節安葬、定時拜祭。儒家認為承傳父母遺志，使之發揚光大是一種終身孝的行為，就如《論語·祭義》說：「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論語·學而》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就是說，觀察一個人是否孝順，當其父在世時，看他的遠大志向；其父去世後，要看他的行為如何；如果三年內不改變他父親遺留的優良品德，就稱得上孝。《論語·子張》記載曾子的說話：「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改，是難能也。」曾子認為，像孟莊子一樣孝順父母別人還有做得到的地方，只是不改變父親的的臣子和父親的政令，別人難以做到。儒家認為男女必須按禮儀而舉行婚配，生兒育女為宗族續香火謂之大孝。因此，孟子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東漢經學家趙歧在《孟子章句》作這樣的註釋：「於禮有不孝者三，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

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古代舜帝有個娶妻不告父母的例子，可參考《孟子·萬章上》的記載：「父瞽叟頑、母嚳、弟象傲。」舜的身世並不好，年屆三十尚不為他娶妻，堯帝覺得他仁道孝順，把兩個女兒許配給他，「舜不告而娶」。孟子的學生萬章問：「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說：「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問老師孟子，娶妻應該要父母作主、媒妁之言，舜未徵得父母同意即娶妻，何解？孟子告訴他，男婚女嫁是人生倫常關係的大事，如果問了，父母一定會不同意，即破壞這段婚姻大事，也就會怨恨父母，因此就不問而娶之。可見舜是從情理之間作了選擇。

中國歷來重視拜祭祖先的習俗，唐代詩人杜牧所寫《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正是描寫賢孫孝子到祖先墳前拜祭時惆悵、悲傷的心情。儒家認為慎重處理祖先的喪事，對過世已久的先人不悼念追思，這樣的品格自然會導致社會風氣更趨淳厚。這就是《論語·學而》所謂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子認為行孝是不違禮的意義，他說，父母活着時，按規定的禮節侍俸他們；父母死了，按規定的禮節埋葬他們，祭祀他們。這就是儒家經書《語論·為政》所記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因此行孝是有始有終，必須惜身自愛，不辱父母名聲；繼承父志，光宗耀祖；繁衍

子孫，建功立業。如《孝經》所說：「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終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2) 孝「中於事君」，即用孝心侍奉君主、忠於君主，這是儒家把孝的內涵在政治領域的擴展和延伸。通過闡述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與庶人之孝，儒家把整個社會都置於「孝」的倫理當中。行孝不分尊卑貴賤，只不過是不同的人行為側重點不同。《孝經》各章有記載：

天子之孝在於「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就是說竭盡愛敬侍奉父母，施展教化於萬民百姓之中，因此他在普天之下就成為四海效法的榜樣，這就是天子應盡的孝道。

諸侯之孝在於「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諸侯是天子分封的地域內為國君，只要不出現傾覆王朝的危險，謹慎處理財源分配和開支，自然能夠長久地保持尊貴的職位和充裕的財富，就是說諸侯忠於君，首先要使富貴不離開自身，然後才能夠保住他的社稷，跟天下百姓和悅地相處；卿大夫之孝在於「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卿大夫是朝廷高級官員，天子身邊政令的實施者，不符合先王所制訂的禮法衣服，不敢隨意穿着；不符合先王所制訂的禮法言辭，不敢隨意

說出口；不是先王所遵循的道德規範，不敢任意推行；所以《詩經》說：「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意思是卿大夫不論早晚，都要專心專意事奉天子，不可有住何懈怠；

士之孝在於「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士是古時的官名，其位次於卿大夫，意思是說為官的，以事奉父母的孝心，轉而事奉天子，就是忠誠，以事奉父母的孝心事奉師長，就是順從。以忠誠和順從的心事奉君王的師長，就能永遠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俸祿；

庶人之孝在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老百姓要順應天道，善用天道地利的自然變化，精心預算及節約開支，不作不必要的浪費，務求做到供養父母和自己。

這種以孝見忠誠，統治教化子民之大道，是由上至下的施行教化，要求由下至上的順從忠孝，就是由君主到百姓都能做到各盡其職，各盡所能，各得其所，以「孝」為核心，以「孝」為人們道德規範的根本，建立了一個嚴密的封建等級制度。另外通過孝道，使當官的能忠於職守、忠於君主，可使民安守本份，進而擴展為維護封建社會政治、社會穩定服務，以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大學》有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未之有也！」就是說：上自國家君王，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養品性為根本。若這個根本被擾亂了，家庭、家族、國家、天下難以治理得好。《論語·學而》記載孔子的說話：「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說：懂得「孝順父母、敬愛兄弟的人，很少喜歡冒犯上級，從來沒有不喜歡冒犯上級的會喜歡叛亂。君子致力從根本做起，根本樹立了，大道自然產生。

(3) 孝「終於立身」，從「立身」的角度說，孝不僅是一個人對父母、對祖先、對社會的一種道德責任和道德義務，更是一種自我道德完善，以及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孝的實質上是要求一個人終生維持道德，報效社會，報效國家。」(朱嵐，2008)《大學》開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學的宗旨在於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棄舊圖新，務求達到最完善的境界。又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者；慈者，所以使眾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以，有修養的人在家裡就受了治理國家方面的教育：對父母的孝順可以用於事奉君

主，對兄長的恭敬可以用於侍奉官長，對子女的慈愛可以用於統治民眾。之所以說平定天下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是因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會孝順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長輩，老百姓就會尊重自己的兄長；在上位的人體恤救濟孤兒，老百姓也會同樣跟着去做。所以，品德高尚的總是實行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也正因为此，儒家認為名立於世，也只能通過「事親」與「忠君」、「悌兄」與「順長」、「理家」與「治官」來實現。《孝經·廣揚名章》有引錄孔子的訓示：「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以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以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以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在儒家看來，孝不僅是外在的「禮」，更是內在的「仁」，外在的「禮」最終還是為了內在的「仁」，實現其理想上的親善、友愛。

根據儒家的孝道學說，如果要盡孝，對內要服從家長的權威、對外要服從君主的權威，並且認為這種服從是人之本性，《孟子·盡心上》解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這對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建立無疑提供了思想上的正當性。孝不僅為子女對父母的一種尊敬之情，更是每個人為人處世都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是做人的根本。通過儒家學派對孝道的擴展，其不僅用來協調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以鞏固家庭內部的團結，還延伸到社會經濟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用來協調

整個社會中老年人與年輕人、君主與臣民、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關係，用來維繫和強化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隨著儒家學說的普遍推廣，以及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所宣揚的孝道逐漸滲透到封建的社會的各個領域被歷朝歷代所沿用，對傳統中國的家庭、社會與立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2. 儒家思想法律化及孝道對中國封建立法的影響

3.2.1.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遠因

儒家學派的始祖孔子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無道」的「衰世」，因此他立志要改革社會。他認為當時的政治環境雖然是「禮崩樂壞」，「天下無道久矣」，「世道衰微」，但仍主張「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在西周的「禮治」和「明德慎罰」的思想基礎上，施仁政、善「德治」、重「禮治」、強調「為政以德」的法律觀點。西周時代的禮，既是倫理道德的行為規範又是典章制度，兩者兼容互濟。《左傳》隱公十一年說：禮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的工具，可見「禮」是一種國家制度而具有「法」的力量。西周立法指導思想之一，禮作為嚴禁罪惡於未然，刑是對罪犯的制裁和懲治。可見禮是教化作用，「守禮」是「守法」的基本要求，禮和刑，互為表裏，故有「出禮而入刑」的說法。孔子認為周禮是當時最完美的禮制，他主張對「民」「齊之以禮」。就「為政以德」而言，他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通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

格。」孔子認為用政令來領導人民，用刑罰來管治百姓，只是令他們暫時避免罪過，不會有羞耻之心，而用「德化」和「禮治」的辦法善待百姓，不但令他們懂得羞耻，還會有自我提高品格之心。這樣人心就會歸服，統治者就會被擁護，像北斗星那樣被群星所拱托。

儒學創立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政治形勢動蕩不安，傳統的禮制遭到嚴重的破壞。刑罰遠比教化易於操作，「法」的立竿見影遠勝於「禮」的潛移默化而更為能整頓社會秩序，儒家思想生不逢時，沒有得到統治者的垂青。孔子為官的時間並不長，他透過周遊列國，授徒講經，宣傳他的學說和政治立場。離他去世約相隔 360 年後的西漢時期（約在公元前 140 年），他的學說開始發揚光大，儒家思想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逐漸開始獲得正統官方的承認，成為統治者和社會的主流思想，跨越千年的發展、嬗變，成為中國以倫理道德作為立法指導思想的文化特色，並傳播至鄰近的東南亞各國。儒家思想得以法律化，與其本身的核心價值和理念有莫大的關係。

孔子以「貴仁」見稱。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倫理學說的根本。他提出「孝」為「仁」本的思想。「仁，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孝」不僅是外在的「禮」，更是內在的「仁」，必須透過禮體驗倫理思想的親善、友愛。換句話說，「仁」的內涵是「孝」，「禮」是實現「孝」的行為和手段，「孝」是

靠外在的「禮」，建立起來。所謂「孝，禮之始也。」孔子所謂的「無違」，即以不違背禮節為「孝」。儒家的「孝」不僅是個人對父母的順從，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孔子繼承了殷周宗法制度中的「孝悌」思想，他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與於仁。」要求弟子做到「入則孝、出則悌」的道德要求。他認為一個以能孝順父母、恭敬兄長，一定不會「犯上作亂」，社會的風尚就會良好，國家局勢得以穩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之說。

儒家思想得以法律化，也曾經過「適者生存」的社會選擇。「諸子百家」之中，戰國時期多個國家和秦國採納法家思想作為治國策略，最具代表性是韓非子提倡的「以法為本」、「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秦朝視儒學為邪說異端，儒家學派還遭受「焚書坑儒」的厄運。黃老學說曾被漢高祖所推崇，「無為而治」是漢朝開國初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法律思想都有重大的影響，因而產生儒、法之爭，儒家未見佔上風。秦兼併群雄而統一天下，採納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刑去刑」、「以殺去殺」的立法指導思想，實行「重典重刑」、「輕罪重罰」的政策。所謂「水能載舟、水能覆舟」。嚴治重刑只能是激化階級矛盾，逼使百姓與朝廷對立。法家的政治主張沒有令到百姓信服，也沒有法寶可維護統治階級的特權，導致上下不相維，自然難以立足天下。對比之下，孔子是主張「仁政」，反對「暴政」提倡「寬猛

相濟」、「取信於民」。推行「德主刑輔」、「禮法結合」的政策，既維護統治階級的特權和封建禮教的地位，又能令百姓修身克己、忠於朝廷，這種軟硬兼施、剛柔並濟的法律制度，當然更迎合統治者的喜好。

3.2.2.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過程

儒家思想對中國封建法律的影響，主要是體驗在封建時期儒家思想法律化、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儒法合流的進程。儒家思想法律化是指立法者把儒家思想的人倫道德融入封建法律各個範疇，使封建法律具有倫理性質，令儒家思想成為民事、刑事、司法制度、量刑定罪、訴訟制度、註法、釋法等各個部門的基本原則。其中尤以孝道的理念，全面融入家庭立法規範，把統治者的意志強加在老百姓的家庭生活的每個細節中，「像血液一樣存在中國傳統社會的肌體之中。」（曾憲義，2009a）令儒家倫理思想和價值觀廣泛地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對整個中國社會發揮深遠的影響。與期說儒家思想法律化，倒不如說封建法律被儒家化。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歷程大概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皆銳意創新，建制立律，也相沿因襲，互有損益、互補不足。其一，漢代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律滲透，表現為「禮入於刑」，創「禮律融合」的先河。如「親親得相首匿」、「貴族官員有罪先請」，成為漢律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原則；把儒家經典納入司法訴訟制

度，作為「決獄」、「註律」的依據；「三綱五常」、「封建禮教」的倫常規範成為立法的具體內容，可見漢朝為中國封建法律儒家化歷程奠下豐厚的基礎。其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大量吸納儒家思想，加快法律儒家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以禮入律」，不僅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又突出禮教作用，促使禮律進一步融合，開拓「禮律並重」的儒家禮儀制度與法律適用相結合的新里程，主要反映在《曹魏律》、《晉律》、《北魏律》和《北齊律》四部法典中。如「八議」、「官當」、「五服治罪制」、「重罪十條」、「留養制度」都出現在這個時期。其三，唐朝是法律儒家化的定型臻善時期，《唐律》就是封建法典的代表作，是「一准乎禮」的楷模，是「禮法合一」的結晶品，是最能顯示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一體化、儒法合流的中華法系特色。《唐律》一直被後世所推崇而沿用，成為中國封建法律根深蒂固、歷久不衰的典範，足見唐朝立法技術已達到超群絕倫的水平。

3.2.3. 漢代法律儒家化與董仲舒學說

西漢成立初期，奉行黃老思想的特點「無為而治」作為立法指導思想，實行「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社會政治經濟經 70 多年的調整與發展，出現國庫充裕、糧食盈倉、民生富足的「文景之治」盛世。到了漢武帝時期，高祖稱帝時分封的諸侯王的勢力逐漸擴大，與中央政府的磨擦日漸尖銳，單靠「道莫大於無為」的治國理念，不足以震懾藩王的野心。武帝為了鞏固封建專制君主的地位，加強中央集權的力度而積極招賢納諫，董仲舒的「三封策」。其中包

括「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用德教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罪，就是「德主刑輔」、「禮法結合」的治國策略。這種既可以強化統治力度，也可以操控人們思想的專制統治，正是武帝加強封建大統一的需要。董仲舒的政治主張及其學說體系，就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歷史條件之下奠基而茁壯；他成為漢代跨過「與民生息」、「無為而治」階梯的第一功臣；漢代以來封建思想的確立者；同時，他利用佔據政治舞台的優勢，精煉出架在老百姓肩上經法律活化的禮教枷鎖——「三綱五常」。

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新理論，他的世界觀和哲學體系是沿着神學唯心主義而展現。他倡議施行仁義德政便可，「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天下，天下和洽，萬物皆安仁樂誼，各德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用感化的辦法征服「背上之心」，而「不肖者有罰」、「刑罰而威其惡」。這恰恰是周公的「明德慎罰」，孔子的「寬猛相濟」，荀子的「隆禮重法」，三者相結合的「德主刑輔」、「禮法結合」的大儒之治。但他別具用心地把陰陽五行的理論注入儒家思想，指出「天道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他倡導「君權天授」說，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王者法天意」、「天人相通」的神化說。他認為萬物皆由天主宰，天子受命於天，臣民必須服從天子的統治，就是順天意，否則會遭「天罰」，同樣地，天子無道，就會遭「天討」，簡而言之，臣民不得逆天意而反上，應多求上天賜福；天子應

懾「天威」多「行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確是上下相維，縱橫天下的治國良策。董仲舒不但用神學唯心主義麻痺人們的思想，還利用人類本性的倫常道德，憑借上層建築的法律工具束縛人們的行為和意志。提出「三綱五常」的理論，透過立法、司法、釋法等程序鎮壓被統治者，促使其理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先秦儒家有五倫之說，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屬於人倫關係，雖有尊卑等級之別；但有上者、尊者和下者、卑者之間的良好關係，《禮記·禮運》對宗法制社會組織的說法是，父慈子孝、君禮臣忠、夫義婦聽、兄友弟恭、長惠幼順」。董仲舒引用陰陽五行學說，把「三綱」建立在「陽尊陰卑」的基礎上，確立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只有下者、卑者向尊者、上者順從和負責任，尊者、上者對卑者、下者毫無道德責任。五常，仁、義、禮、智、信的含義，本是儒家的社會文化教育，如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秦時期的儒學家有豐富的立論。董仲舒認為這五個基本道德規範與天道的五行應該互相配合，他以義配金、以仁配木、以禮配水、以智配火、以信配土，他強調這五者彼此有內在的聯系，並處於屬於三綱的地位。

3.2.4. 漢代法律儒家化的主要內容

儒家思想對漢代的立法影響，涉及的範圍廣泛，主要包括刑法原則的定罪量刑；家庭立法的孝道及孝廉舉賢的制度。

(1) 法律倫理化的「親親得相首匿」。指一定範圍之內，父母子女、夫妻、祖父母孫子女之間，互相隱瞞親屬犯罪的事實，得以免受法律的制裁，這是依據孔子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道理演變而來的，可見儒家所倡議的「仁孝」倫理道德觀念具有法律的效力。漢代這種相匿的規定不適用於危害封建地主專政階級權貴顯要的案件。

(2) 體驗禮入於刑的「貴族官員有罪先請」。這項原則是在西周「刑不上大夫」和儒家思想，「禮治」的基礎上引伸所得。「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源自《禮記·曲禮上》。立法的精神是大夫不會因懂得刑罰而加重罪責，庶人不會因不懂禮而減輕刑罰。無論是懂刑或不識禮都不會影響量刑，而是視乎犯罪者的身份定罪。兩漢時期，凡公侯及其嗣子、受俸祿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犯法，一般官員無權受理，必須上報司法機關的最高負責人廷尉，奏請皇帝親斷。這種依法享有「先請」的制度，經上請後的罪犯，都會被減刑或免刑，由此可見漢代的律法，通過「禮入於刑」的手段，以維護貴族官僚等級的特權。這項原則被三國的曹魏吸納和發展為「八議」制度，並予以具體化。

(3) 以《春秋》決獄作為立法的補充。漢代在審案時，如果遇到沒有明文規定時，則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儒家經典中，以《春秋》為主，故有《春秋》決獄之稱。《春秋》原是孔子編修的魯國編年史，不單是記載史實，還透過遣詞用字的方法，宣傳禮義，筆伐敗壞份子。謂之「微言大義」。《春秋》決獄制度延續了六七百年，到隋唐因法制的完善而終止，《春秋》決獄的意義大致可分以下數點：

(i) 論心定罪。是斷獄的基本精神，根據事實犯罪的動機和目的而定罪量刑。這是董仲舒提出的一項審判理論，他在《春秋繁露·精華》篇中指出：「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特重，本直者論輕。」《鹽鐵論·刑德》篇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故其治獄，時有出於律之外者。」《春秋》斷獄的基本原則是儒家經典為依據，但由於儒家經典內容浩瀚、文章深奧，容易被人曲解而穿鑿附會；司法官員的主觀臆斷，缺乏中肯性和客觀性，難免在判案時出現偏差；在運作過程中容易產生流弊，為罪刑的擅斷創造條件。

(ii) 罪止其身。根據《春秋公羊傳》昭公二十年：「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的觀點，法律應只懲罰犯罪者本人，不應牽累無辜的親屬，可見《春秋》斷獄也有合理性的一面。

(iii) 以功覆過。此意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漢代春秋《決獄》經常以此為據，替曾為國立功的罪犯辯護解脫，得以免受刑罰一種特權。這種以功蓋過的理論沿續到三國時期而被納入《曹魏律》的「八議」之一的「議功」，即功勳卓著者犯罪在適用刑罰時的優待原則。

(iv)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出自《春秋·庄公三十二年》，是根據儒家尊尊親親引伸出來，是指君臣、父子之間的關係，必須各守己份，不應犯上。「君親無將，幾而誅焉」。這句說話經漢代統治者和律法專家的演繹具有以下含義。根據儒家尊尊親親的理論，尊尊是指臣忠君的行為，親親是指家庭內父慈子孝的意義，在漢朝遵從尊尊高於親親的原則之下，推崇親親，是為了顯揚尊尊；任何侵犯皇權、皇帝尊嚴及危害皇帝安全的行為，就算是皇帝的尊長所為，也要依法論處；這種犯「上」不單指行為，只要有這種思想就被為犯法；尊尊親親的制度並存不並列，也有不共存的時候，當處於忠孝兩難的局面時，必須捨「孝」而盡「忠」。犯上是罪大極惡的行為，南北朝《北齊律》首創的「重罪十條」及唐朝的《唐律》「十惡」都有具體的規範。

(4) 引經註律。即以儒家的觀點解釋現有的法律，當儒家思想未能及時被納入法典時則另闢蹊徑，巧妙地運用引經註律，而達到禮入於刑的目的，這樣一來，法律條文就能符合儒家經義。

(5) 執行三綱五常的家庭立法。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與維護父權家長制有密切的關係，所謂「三綱居其二，五常在其中」，封建統治者把「齊家」看作是「治國」的前提。漢朝為了整肅封建宗法家教制度，強化倫理道德的政治需要，律法中有「不孝」罪的規定。據《二年律令·賊律》的記載：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毆打父母皆處死刑；毆死父母要梟首；弑父母以大逆論，處腰斬。嚴法勵治，不究情理，可見統治者心狠手辣，殘酷無道。為了鼓勵行孝，漢代也有較理性的舉措，提倡子女與祖父母、父母同居共財，履行供養父母的責任。這項政策唐朝予於規範化。

統治者為了加強丈夫為家庭中處於統治的地位，以「夫為妻綱」的理論，制造許多封建禮教的規條約束婦女，其中包括休妻制度。原屬中國古代「禮制習俗」的「七出」也被漢代作為家庭立法的婚姻制度。據漢朝《大戴禮記》所說的「七出」，包括：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口多言、竊盜。當妻子的行為被認為是符合任何一種條件，丈夫即可單方面提出離婚。為了保障婦女不會任意受丈夫欺凌而休棄，以「三不去」作為補充，但「七出」的範圍廣泛，內容多屬於主觀性、任意性的，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雖有「三不去」，即《大戴禮記》所載的：「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也難擋「七出」的威力。相反地，「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可見當時的婦女完全是處於被動的地位，要貼貼服服地服從丈夫。難怪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

「婦·服也」。

(6) 利用行政手法推動的孝廉舉賢、孝悌力田。漢武帝時期「孝廉」、「秀才」被列入選拔賢能的科目。所謂「孝廉」，漢代的統治者認為在家孝順父母，又能廉潔自愛的人，擔任朝廷命官，一定會忠君守法。《漢書·武帝紀》有此記錄：「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漢代重視專業人才，招攬賢能的條件之一，是「明經、明法、文學者可入仕」。明經即諳練儒家經典之意。「孝悌力田」是漢代具前瞻性的制度，統治者提倡孝道和促進農業發展，透過行政手法，給予有良好品德行孝恭兄或致力農耕工作的人士一種獎勵制度。

3.2.5.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儒家化的主要內容

三國兩晉南北朝雖然是政權更迭頻繁、政局動蕩的時期，但立法活動積極、律學思想活躍，使到法律制度迅速進步。由於各國的立法工作絕大多數是由儒家學者草擬條文，因而為禮之全面入律創造了特定的條件。據記載，參與當時制定法律的大儒，有《曹魏律》的陳群、劉劭等；《晉律》的鄭冲、羊祜、杜預等；《北魏律》的崔宏、崔浩父子及高允等，被認為該時期立法水平較高的《北齊律》也是由數十位擅長律學的名儒合力制定。該時期儒家思想法律化主要體驗在儒家思想核心內容的「禮」，開始全面入律；確立封建法律倫理化的基本原則。

（一） 「八議」是權貴階級享有的特權。這是一種為封建社會的皇親國戚地主官僚締造的特權，一項凌駕於神聖法律之上的制度。源於《周禮》的「八辟」，據《周禮·秋官·小司寇》所載：「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詢）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與「八辟勵邦之法」。八辟指對皇親國戚官僚貴族等八種通過特殊審判程序使其減免刑罰。兩漢以此為範制定「貴族官員有罪先請」的原則，但體制尚未成熟。曹魏時期吸收前代經驗加以具體化而列入《曹魏律》。「八議」的意思是對八種權貴人物，指親、故、賢、能、功、貴、勸、賓。當他們犯罪時給予特殊照顧。所謂「大者必議，小者必赦」。該項法例被兩晉南北朝歷代封建王朝收錄入典，歷經隋唐到明清，持續一千六百年而相沿不改。

（二） 權貴官僚贖刑制度「官當」。是另一種維護封建制度貴族官僚特權的贖刑法律制度。權貴階級一旦犯了罪，法律允許用官品和爵位抵當徒刑，避免受法律的制裁。所謂「免官比三歲刑」。《北魏律》是首部納入此例的法典。據《魏書·刑罰誌》載：「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凡「五等到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等。」這說明，凡屬五等列爵或五品以上的官員，皆可以一官階抵二年徒刑；罷官者三年後可以復職，復職後的職級比原先的官階降一級。這項封建社會用以維護特殊階級的愚民政策，一直沿用到隋唐宋，到了明清朝代，以罰俸、革職等制度而取代。

（三） 按身份等級量刑的「五服治罪制」。《晉律》確立「五服治罪制」。

該制度為儒家倫理綱常添磚加瓦，也是封建社會家長制主義憑借法律的威力向卑微成員施罰的手段。「五服」是封建制度下形成的一種喪服制度，據《禮記·喪服》篇的規定：親屬之間服喪，是依據血緣關係的遠近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等級，五服治罪制在刑事立法上，當有親屬關係的人相犯，考慮雙方親疏和輩份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如卑幼殺傷尊長，關係愈親則刑罰愈重，相反地，如尊長殺傷卑幼，關係愈親則刑罰愈輕。在民事家庭立法上，依服制決定贍養祖輩的義務及子嗣繼承祖業的權利。「准五服以制罪」的特點是因「尊卑有別」而「同罪異罰」，赤裸裸地暴露封建社會宗法制度的專橫無理。該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末，明清法典附以《五服圖》，以便司法機關量刑時參考。

（四） 維護君權父權夫權「重罪十條」。戰國以來，對於直接危害國家利

益，嚴重侵犯皇帝尊嚴及人身安全，違反倫理綱常行為的罪狀，都予以規範及懲治，但條文鬆散和含糊。《北齊律》集歷代的經驗，概括為「重罪十條」，置於律首並規定犯此「十罪」者不得享有「八議」、「官當」、「留養」等權利。「重罪十條」中之反逆、大逆、叛、降四項罪名，都是顛覆國家、謀權奪位及有損國家利益的罪行，從政治角度來講，封建社會統治者視這些是謀反叛逆大罪，而罪大當誅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敬、不孝、不義、內亂，屬於違反尊卑關係和倫常行為而入刑，從立法思維的邏輯來講是極其牽強附會。但自漢朝武帝時期開始，儒家引

「三綱」充實「禮」的內容，視「禮」為社會倫理的最高規範，按「三綱」為準則，賦予「忠」、「孝」、「貞」以確定政治的意義，無論是侵犯君權、父權或夫權皆屬罪及十大。「重罪十條」的訂立，目的是加強打擊損害君權、父權和夫權的行為，進一步體驗禮法結合，以法律作為推動禮的工具。「重罪十條」是中國古代法律史上一項重要的決定，隋唐都在該基礎上加以修改和發展，把它定為常赦所不原的「十惡」大罪，並被宋、明、清歷代所沿襲。

（五）「留養制度」體驗孝悌精神。《北魏律》訂立「留養制度」。除犯十惡不赦罪犯，凡犯死、軍、流、徒罪之人，如有親老丁單或孀婦獨子等情況，在一定條件之下，該犯人應侍俸其親，死罪可上請，流刑可免遣，有期徒刑可獲緩刑，讓犯人留守家中照顧其親屬老人，待家中老人去世後再按實際情況執行。這項制度充分反映中國古代法律因家族化、倫理化而不惜採用屈法而伸禮的手段。留養制度一直被後世所承襲，也是清末時期引發「禮法之爭」的焦點討論條文。

3.2.6. 唐朝完成法律儒家化的過程

從西漢武帝開始，奉儒學為立法指導思想，開展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歷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諸國積極繼承漢儒的衣鉢，加強法律儒家化的步伐，歷經八百多年，封建法律發展軌跡寸步不離地緊貼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到了唐朝而終結。換句話說，唐朝基本上完善了中國法制史上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歷程。

誠然，唐朝能完備法律儒家化的任務，與當時的政治氣候、經濟發展、社會風氣、文化水平都有莫大的關係，但最大的動力仍是來自立法指導思想。

唐朝汲取隋煬帝無道、苛政濫刑、導致迅速覆滅的歷史教訓，統治者極之重視立法活動，將整頓法制視為政本，為了減低社會矛盾的政策和思想，充分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高祖李淵曾感嘆說：「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太宗推崇以民為本的理念，引用古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為警誡。唐代引用儒家思想作為立法指導思想是處於主動的地位，是有別漢代的。漢代在建國初期，基本上已完成了主要的立法工作，如漢代的重要法典《九章律》是在漢高祖時期制定，後經文景帝等歷朝的修法和補充。到漢武帝時期，雖然確立儒家學說為官方的指導思想，但在立法方面只頒佈一些單行的法令，在龐大複雜的司法體系中是起不了重大的作用。因此透過引經決獄、以經註律、行政手段把儒家思想滲透入司法制度的各系統中，局限於禮法並用，以禮作為推動法律的工具的層面，難以達到儒法融合的程度。唐朝的主要法典《唐律疏律》，以綱常名教作為條文內容的元素，視倫理道德為立法的靈魂。《唐律疏律》以德輔刑主、禮法合一，簡約易明、除煩去弊，審慎嚴緊、保持穩定，志為公道、寬仁慎刑為見稱，其中之德輔刑主、禮法合一恰是儒家所推崇的「禮治」觀念。《唐律》的基本立法精神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

而成者。」「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所謂「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禮義作為教化老百姓，以鞏固維護綱常倫理的道德基礎，刑罰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工具，兩者雖相輔為用，但教化是防範於未然，立法者以「本設法令，令人共解」的宗旨，讓人們明白法律的作用，以提升個人素質，導人修身養性，以整頓社會風氣。這就是高祖所說的「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唐朝立法指導思想是治國要治本，「德禮」為本，封建宗法倫理是「德禮」的核心內容，可見唐朝的立法指導思想是完全符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

3.2.7. 唐朝法律儒家化的主要內容

（一） 危害君權社稷罪列惡極。漢朝開始歷代就侵犯君權父權的罪狀都處以嚴刑重罰，但沒有具體的條目。疏義說：「漢制九章，雖並煙沒，其不道、不敬之目見存」，「周、齊雖具十條之名，無十惡之目。開皇創制，始備此科」，「自武德以來，仍遵開皇，無所損益」。可見《唐律》是以《北齊律》的「重罪十條」為基礎，沿用隋制而訂「十惡」。把十項犯罪獨列一類，置於《名例律》中，作為刑事治理的首項目標。疏議說：「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榜首，以為明誠。其數甚惡者，事類有十，故稱『十惡』。」依次為：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唐律》首要的任務是維護封建君權制度及尊貴階級制度，加強儒家倫常道德適用

於法律條文，貫徹三綱的旨意。君權是三綱之首，所謂「反天之道」，為天所不容，侵犯皇權、危及社稷的政治犯當然會遭誅滅。《唐律》把「謀反」、「謀大逆」、「謀叛」置於十惡之首三最，據疏義說：「謀反」是「謀危社稷」，「謀大逆」是「謀毀宗廟、山陵及官闕」；「謀叛」是預謀「背國從偽」。這三大罪狀全冠以「謀」字，意味着把罪惡扼殺在意圖、謀劃的階段；其次就是「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息輿服卿物；盜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官及封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這項規定不但要為皇室防偽防盜，還確保皇帝起居飲食的安全。「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蠱毒、魔魅。」雖然該項不屬於政治犯罪領域，但危及封建社會秩序，影響君主專制管治，必須悉力遏止和嚴加懲罰。可見《唐律》為打擊危害封建社會統治者專政地位的各種罪行是佈下天羅地網，密而不疏。

（二） 綱常名教盡入律。為維護封建宗族的地位，父家長作為君主在家庭中的代表、體驗家國一體、忠孝相通，《唐律疏律》在漢律尊尊親親和儒家三綱之義的基礎上，憑藉「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理論，對事親行孝、婦道貞節的倫常道德規範加強具體化、系統化。名目之多佔「十惡」之半。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

若供養有關；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不睦，「謂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不義，「謂殺本廟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率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改嫁。」內亂，「謂奸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從「十惡」內容來看，唐朝立法技術已超越歷代，但從文化角度來看，法律作為國家上層的建築物，仍然是操縱在統治者的手中，成為權貴的專利品。

（三） 孝在《唐律》中佔重要的地位。從「十惡」的定義來看，《唐律》為了確保父權在宗法家庭中的統領地位，儒家倫理觀「孝道」有較嚴密的規範。「孝」本是血緣之間家庭成員的關係，自從中國第一個國家夏朝的成立，把原始社會家庭關係中對父權的「孝」轉化為治理國家中對君權的「忠」，形成父權與君權一脈相承、互為表裏、這個觀念始於奴隸制社會，被封建制度的歷代統治者所垂青。「孝」在儒家思想法律化過程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對後世封建制度法律倫理化有深遠的影響。唐朝集結歷代的經驗和實踐，經過深層次地演繹「孝」的涵意，運用較高的立法技術，把「不孝罪」入「十惡」之列。具體的條文、定義、內容、量刑都詳列在《唐律》十二篇章目中之《鬥訟律》、《戶婚律》、《職制律》、《詐偽律》中。可見唐朝對「不孝罪」的立法是綱鉅目織、系統完備、條文縝密。顯示「孝」在《唐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四） 倫常規範對婦女不公。自從父權制取代母系氏族制度後，婦女的地位就好像天堂掉進地獄一樣，恩格斯認為：「母權責的被推翻，乃是女姓具有世界意義的失敗。」古代社會禮教本是架在婦女肩上沉甸甸的枷鎖，到了封建社會的國度裡，統治者透過法律予以活化。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過程中，漢儒的「三綱」、「夫者、妻之天也，」等學說，令婦女的地位顯卑微，倫常道德的法律規則，就像婦女身上的腳鐐，強制她們規行矩步。《唐律》的「十惡」條文，有許多對婦女造成不公之處，如「毆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可構成「惡逆」之罪。相反地，沒有同樣的法則規管為夫者。唐代摹仿漢朝的「七出」、「三不去」作為丈夫強行妻子離婚的條件，《唐律疏議·戶婚律》所說：「七出者，依令：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三不去者，謂：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受無所歸。」但女方若被認為患惡疾或犯了「奸罪」，「三不去」的原則將不適用。「三不去」可作為婦女在婚姻關係上遭受不公平對待時的護身符，但當時的禮教規範，妻子必須完全服從丈夫，要做到「直者不爭，曲者不能論」，如果婦女敢理直氣壯地站起來說話，馬上觸犯另一項規條「七出」中的「口舌」甚至被曲解為「不睦」中的「告夫」。可見離婚的主動權完全是操縱在丈夫手中。唐代的婚姻立法較漢代略為文明，設有由官方介入的條款，即因違反國家法律，官方強制離異的「義絕」；「若夫妻不相安」或「彼此情不相得，兩願離者」的「和離」。這些規定的確是提高婦女在婚姻制度上的權利，但當時社會的婦女是處於沒有說話權、沒

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位置。由於婦女處於無助的劣勢，結果是，縱有官方規矩相輔、惟恨婦女舉步維艱。

（五） 儒家經典註疏《唐律》。唐朝一統天下，政治局勢穩定，經濟順利發展，文化水平提升；依靠統治者的意志，高超的立法技術，學識淵博的擬律人才，促使《唐律》完成承先啟後的任務，順利頒佈天下，達到惠及後世遠播海外，儒家文化得以保全的壯舉。從高祖李淵登基到高宗完成《唐律疏議》，全程約 35 年，當中最重要的里程是註疏《唐律》的工序。公元 650 年，高宗即位，命唐儒大師長孫無忌，高祖年代制定的《武德律》及遵循太宗在朝制定的《貞觀律》為藍本而制定《永徽律》，目的是「舊制有不便者，皆隨刪改」，達到「劃一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疏而不漏」的原則。翊年，高宗認為有完備的法典，具體的條文，但缺乏對法律的解釋，難以達到劃一的適用和實踐，遂下詔令：「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參加「解律」、「修律」、「撰律」的人士，皆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大儒，展開一場中國法制史上具劃時代意義的立法活動——儒家經典註疏《唐律》。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倫理道德觀念為最高標準，為《唐律》進行註疏。公元 653 年，撰定《律疏》工作完成。《唐律疏議》的面世，實現律文疏文合為一體，同具法律效力，作為司法官員定罪刑的依據，「明法」考試的範本；闡明法學理論的原則，貫徹

司法制度劃一；摒除漢代創立的「引經斷獄」而產生「擅斷」的流弊，從此再也不重搬硬套，沿用了七百多年的「春秋斷獄」在此劃上句號。《唐律疏議》把刻板的條文注入活力，達到付諸實踐和適用，真正體驗的《唐律》的「一准乎禮」的方針，使到禮法結合的程度達到水乳交融、緊密地揉和在一起，把儒家思想法律化推到最高境界，也加速了中華法系的形成。

（六）《唐律》體驗「一准乎禮」的方針。《唐律》以儒家的「三綱五常」之說，倫理宗法觀念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達到「以禮入律」、「以禮為綱」、「一准乎禮」的立法目的。「三綱」的根本理念源自禮，其基本精神是貴賤有別。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和家族制。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實施管治效力，必須憑借法律作為推動禮的工具，為了使禮能夠付諸實行和運用，而禮的元素不斷滲透到法律條文之中，禮遂成為立法的核心內容。禮治和法治的配搭，達到鞏固封建社會父家長作為君主的代表在家中統領的地位，轉化為維護封建君主專政的統治地位。這些立法規定在「十惡」的條款中最為顯著。《唐律》沿用《曹魏律》的「八議」，《北魏律》的官當，以「八議」融合而立例，作為具權貴身份的皇親國戚犯法時獲得減免刑責的特權。《唐律疏義·名例律·議章》規定：「諸八議者，犯死罪，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唐代透過議、請、減、贖、當等形式，給予權貴官僚的特權予以規範化，「八議」條文較前朝更趨系統化、具體化。因而有「唐

律優禮臣下，可謂無微而不至」之說。基於「親親相隱」的原則，唐代擴大「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適用範圍。疏議說：「諸同居，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摘語消息，亦不坐。」招凡同居共財，即使不在互服內的都可相隱，規定四代親屬皆可相隱、僕為主隱，但犯「十惡」之罪者不得相隱。

3.2.8. 《唐律》起承前啟後的作用及對後世的影響

唐朝基本上已完成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過程，並得出豐碩的成果。《唐律疏議》不僅是中國封建時代成文法的典範，更是中華法系的代表作。日本中國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認為：「七世紀的唐律和十三世紀的西歐卡羅林納法典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和十七世紀的德意志法典相比毫無遜色之處」，它和羅馬法、拿破倫民法典是並駕齊驅的三部具世界意義的重要法典，（郭偉成，2007）可見它在世界法制史佔有重的地位。以中國封建時代的《唐律》為內涵，以周邊封建國家法律為外延，構建了區域性的法律系統。中華法系與世界其他四大法系並稱為世界五大法系。（曾憲義，2009a）它在中國法律史居於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唐代運用高水準的立法技術，把儒家傳統倫理道德融滙到具體法律的條文裡，達到儒、法一體化，禮法結合的效果，形成中華法系。「法律道德倫理化、道德倫理法律化」的特點。《唐律》集前代諸朝的法律形式、律例內容、典章條目的精髓，予以修定和發展而精鍊出正果。由於它結構精密、條文

清晰、文字簡潔、註釋精辟、內容完善，被廣泛沿用，成為後世歷代立法的藍本。中國歷史上儘管曾經歷元、清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他們原本以部族習慣法治國，條文簡陋且嚴酷，當這些統治者諳悉《唐律》治國的奧妙之道後，在漢儒的協助下，都以《唐律》為範本，進行修法和善法。如《金史·刑誌》指出，金代的法典《泰和律義》「實《唐律》也」；元朝的《至元新格》是參照宋制而立，《宋刑統》是摹仿《唐律》，《大元通制》及《元典章》基本上都是遵沿《唐律》而制；《大清律》以《大明律》為範本，《大明律》是以《唐律》為正宗。清代法學家沈家本在《重刻唐律疏義序》中說：「所載律條與唐律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與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據《明史·刑法誌一》引明代丞相李善長等說話：「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遵唐舊。」可見《唐律》是承漢律的精要而發揚光大，經後世代代相沿相襲，雖有損益，仍以《唐律》馬首是瞻。

《唐律》不僅對中國後世封建王朝產生深遠的影響，還影響亞洲地區和國家，如日本、朝鮮和安南的古代法律都是摹仿《唐律》而制。日本於公元 701 年頒佈的《大寶律令》無論是篇目、次序都與《唐律》一模一樣；繼而在公元 718 年頒佈《養老令》，基本上是沿襲唐令。（郭成偉，2007）據《高麗史·刑法誌》說：「高麗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予唐，至於刑法，亦採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楊延福更深入地考查：「高麗王朝的法律共七十一條，其實是在《唐律》

的五百條上擷取六十九條，從唐《獄官令》中摘錄二條而成。」(楊延福，1982)

根據《歷朝憲章類誌》記載，安南古代的《刑書》、《國朝刑律》和《鴻德刑書》的內容大多數參照唐制。

儒家核心價值的「孝道」，隨着《唐律》被移植到諸國，自然而然地在異國的土壤裡植根茁壯。當今處於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國家或地區，由於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絕大多數都制定了專門有關保障老年人權益的法律或社會福利政策，而且在制度中都體現了「孝道」是家庭養老的文化傳統，也是亞洲地區的家庭養老制度有別於西方國家一個顯著特徵，本文第二章已有討論，不作贅述。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它們「重新發現」了家庭養老價值所在，表現為對中國等深受傳統孝文化影響的國家的家庭養老方式的稱讚。(陳功，2003)

《唐律》達到儒法融合的最高境界，從一定意義上唐朝能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盛的國家；長治久安，延綿 290 年的大唐盛世，相信與其統治者積極完善法制，推行禮法並濟之治有莫大關係。《唐律》對內以完備的封建法典形態，直接影響歷代立法達千年之久；它以固有內涵、中華法系獨特的風範，迎合亞洲諸國的法律適用把其「本土化」²⁷。「孝文化」憑藉法律的翅膀而周遊列國，傳播中國社會傳統儒家倫理道德的價值觀和人生哲理，至今仍深深地影響着廣泛

亞洲地區的華人社會的生活習慣。「孝道」不再是只屬於家庭成員之間的「家教」、「身教」，而已延伸為「敬老愛老」的社會風尚。因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唐律》是宣揚中國「孝文化」的淵源。

4. 中國贍養歷史文化對近代處理贍養糾紛的啟示：調解制度的興起與情理法

4.1. 中國古代調解制度的起源

中國調解制度的起源，我們現在實難以考究，但在戰國時期的《韓非子·難一》典籍中是有跡可尋，文獻中作這樣的描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畊亩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耕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學者解說道：歷山的農民田界不清，舜到歷山，與農人一起耕地，一年後，劃分清楚了田界。在河濱以打魚為生的漁民爭奪有利的地勢，舜到河濱與漁民一起打魚，一年後漁民爭相將好的地勢讓給長者。東夷製作陶器的陶工制作的陶器不結實，舜到東夷與他們一起製陶，一年後陶工製出結實的陶器。韓非子引用孔子的評論說，舜原本沒有管理農耕、漁獵和製陶的職責，只是因為風氣敗壞，舜以德「救敗」，所以到了歷山等處，以仁義，誠信和自我的表率作用化解了糾紛。（曾憲義，2009b）

根據《周禮·地官·調人》的記載，西周時期設「調人」職掌為「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調人是當時的官銜，負責調解民眾之間的爭端，坊間的小事多由調人負責處理。可見遠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年代，中國已有較完備的調解制度，而是不容否認的，這些記載可參見《禮記》及《周禮》，也可以從考古發現中的文獻及青銅銘文中尋找得。（胡留元、馮卓慧，1989）

《唐律疏議》中有「義絕離之」之條。即「若夫妻不相安諧，調彼此情不相得，兩願離者。」《唐律疏議·戶婚律》規定：「諸犯義絕者離之，違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唐律》規定由官方介入強制處於恩盡義絕或感情破裂的夫婦透過和解方式離異。說明「和解制度」在唐代已被引用於婚姻立法。

中國古代調解制度不但被中原地帶的漢人所推崇，少數民族也以此作為穩定治理地方的法寶，由蒙古人統治的元代，《通制條格·十六卷》中的〈理民〉篇記載：「諸論訴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係違法重事，並聽社長以理喻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足見當時的統治者傾向於由鄉紳調理民間的瑣事，可以節省時間，人們不致於延誤農務生計，除非涉及重大案件才驚動官府。

明朝把調解制度發揮得淋漓盡致，規定在州、縣以下設「申明亭」和「勝善亭」，皆具有調解功能的坊間組織，由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州長、族長、里長、鄰長等擔任調解員。《大明律集解附例》中記載：「凡民間應有詞狀，許耆老里長准受於本亭剖理。」《太祖實錄》曰：「命有司擇間高年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鬥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又巡按四川監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在《日知錄》中記述：「洪武中，天下里邑，皆置申明、勝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鬥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顧炎武，不詳）當時的「申明亭」成為解決坊間爭端的平台，促進社區和諧、鄰里融洽；「勝善亭」則起揚善懲惡、教化群眾作用。

明朝的「申明亭」制度被清朝所沿用，《大清律例》註道：「州縣各里，皆設申明亭。里民有不孝、不弟、犯盜，犯奸一應為惡人，姓名事迹，具書於板榜，以示懲戒，而發其羞惡之心，能改過自新，則去之。其戶婚、田土等小事，許里老於此勸導解紛，乃申明教戒之制也。」

由以上資料看來，調解制度的意識早在四千多年前的舜帝時期開始萌芽，

先秦時期的西周對調解制度已有較具體的規定，把調解制度被列入治理地方體制，後被歷朝所沿襲，並因時因勢損益，延續至今。

4.2. 中國古代的主要調解形式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調解作為一種重要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地方行政領域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人們心中的法是「天理」、「國法」、「人情」三位一體的複合，這種多元的觀念是古代中國佔支配地位的法觀念，調解制度是如何能在古代社會穿插在錯綜複雜的情理法之中。嘗試透過民間調解、官府調解和官批民調三種形式予以闡述。

4.2.1. 情理為先的民間調解

民間調解是指當產生爭議時，邀請「中間人」出面調解，以使爭端得到解決的活動。民間調解的「中間人」主要包括鄉長、族長、德高年劭的老人以及地方官員等。民間調解包括宗族調解和鄰里調解兩種。古代中國是一個宗族社會，同姓或同宗聚居是一個原則，家法族規是宗族內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當宗族的成員之間發生糾紛之後，家法族規成為宗族首領居間調解的法律依據。需要強調的是，宗族首領不但可以調解宗族成員之間的糾紛，還可以對違反家法族規的成員進行處罰，且這種處罰是法律所認可的。例如唐朝宰相長孫無忌在《唐律疏議序》中闡述道：「刑罰不可馳於國，答捶不得廢於家，時遇澆

淳，用有眾寡。」《大清會典事例》也明確指出：「族長及宗族內頭面人物對於勸道風化戶婚田土競爭之事有調處的權力。」這說明宗族調解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並非當事人完全自願的接受調解。法律承認宗族首領以調解權和處罰權，形成了國法家規的雙重規則體系。鄰里調解是指由親友、鄰居、長輩或賢良人士作為「中間人」的調解方式。鄰里調解方式靈活，沒有時間、地點、調解形式的限制。鄰里調解遵循自願的原則，調解人由當事人自願選定。鄰里調解由於「中間人」在當事人雙方享有極高威信，所以調解方案往往都能得到落實。

4.2.2. 情理法兼備的官府調解

官府調解，又稱司法調解，它是指在官府長官的主持下對民事案件或輕微刑事案件的調解。依法裁判雖然是官府的職責，可訟清獄結被作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標誌，因此官府調解也異常盛行。相傳孔子為魯國司寇時，息訟寧人，施以教化的事例。《荀子·宥坐》記載，孔子認為：「對於百姓應該以教化為主。百姓不孝，罪不在民，而是為政者教化不到的緣故。為政者不行教化而一味以刑懲罰，與殺無辜之人沒有什麼兩樣。」清朝乾隆時，袁枚為上元縣令，「民間某娶妻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告孕後嫁訴其婦翁」。此案倍受民眾關注，「翌日，集訊於庭，觀者若堵牆」。而袁枚坐堂後，並沒有直接進行審訊，而是「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致使「某色愧，俯伏座下」。之後，經過袁枚耐心勸導，「眾即齊聲附和，於是兩造之疑俱釋，案乃斷，片言折獄，

此之謂矣」。(張晉藩，1988)官府調解與宗族調解一樣，具有一定的強制性，當當事人接受官府調解之後，不得再以同樣的事由進行訴訟。

4.2.3. 調解為先的官批民調

官批民調是指官府接到訴狀後認為，情節輕微或事關親族倫理關係及當地風俗習慣，不便公開傳訊，便將訴狀交與族長、鄉保進行解決的一種調解制度。族長、鄉保接到訴狀後，應立即召集原、被告雙方進行調解。因此有學者認為，官批民調是一種半官半民性質的庭外調解，(曾憲義，2009b)鄉保如調解成功，則上呈說明案件事實及處理意見，請求官府銷案；調解不成，則需說明理由，然後交與官府處理。中國古代縣級以下的基層組織，如鄉里、保甲、村社、宗族等，其負責人是官府在村社的代理人。如上文所述，這些人對宗族內部的糾紛有著官府賦予的合法裁判權。訴訟到官府的一些案件，或因案情輕微，或縣官認為其是非曲直由鄰里判斷更為公正，就會發回交由這些基層調解人審理。由於民事糾紛多產生於鄉里族裡之間，宗族首領與治安官員更容易獲得糾紛發生的真實原因，而州縣官員卻未必能獲知詳情，官批民調這種調解方式，更為實際地認識到訴訟中事實審理與法律審理的區分問題，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調解方式。

4.3. 「無訟」思想對古代調解制度的影響

「無訟」是中國古代司法的基本思想，被認為是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儒家學說主張以德治國，而反對刑罰統治。例如孔子在《論語·顏淵》教導世人：「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說就成了中國封建統治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也逐步融入到法律之中。及至唐朝，《唐律》實行「一準乎禮」的方針，即完全以儒家禮教綱常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論依據，從而實現了「禮」與「法」的合一、法律規範與道德規範的統一。但是「禮」和「法」的地位是不同的，「禮」正面引導人們的行為，而「法」則是對違背「禮」的行為的懲罰。在「禮」的規範下，一切都是有序的，即所謂親親尊尊、長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相反，訴訟則代表衝突與摩擦，這與封建社會有序的等級制度是背道而馳的，故主流的價值觀鼓勵人們之間的忍讓與包容，而不鼓勵通過法律途徑，對簿公堂，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息訟成為地方官治理地方的要務。古代的地方官每到一地都會發出告示，安撫民眾，告誡百姓不要為一些細故輕易到官府打官司。明末清初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李漁著作《資政新書》中，記江甯地方官俞硯如到管轄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告示「勸民息訟」，告示言「茲本縣下車伊始，職在親民，要知親民吃緊關頭，亦即在使民無訟」。在此書卷九《文告部·詞訟》中，記載了各地方官的有關詞訟告示 12 篇，其中勸諭民眾禁訟、息訟、停訟等內容的告示佔 9 篇，禁止利用息訟而魚

肉民眾的告示 1 篇。(李漁，1992)

4.4. 「和諧」是古代調解制度的核心思想

中國自古以來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這種長久的小農經濟產生了中國獨特的「和諧」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直佔據主要地位，這種經濟迫使人們過分依賴土地，這就使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有一種尋求安穩的心理。另外，宗族組織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層單元，在這個單元裡重視宗族成員的和睦相處，推崇禮教，強調家長、族長絕對地位，以尋求一個權力核心應對社會與自然災害的壓力。這些經濟與社會條件與「衝突」是相對的，而需要人們追求「和諧」。因此「和諧」思想應運而生。儒家追求個群關係、人我關係之間的和諧。例如，孔子強調人事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並將「和而不同」作為理想人格的標準。孟子則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²⁸認為人和是君主統治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大小由之。」和為貴，乃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不僅是儒家核心思想，如道、佛、墨諸家都主張人與人之間，人與大自然之間都應該和諧共處。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徵即為「和」即道家追求主客關係、物我關係、人與自然的和諧。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²⁹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莊子則提出：「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³⁰佛家反對殺生，主張與世無爭；墨家主張「兼相愛」，指倡

和平。這些諸子學家的「和諧」理念，古代中國人強調均衡與中庸的指導思想，竭力避免對立的矛盾和衝突，促進了古代調解制度的發展。著名法學家曾憲義為調解特刊撰文時指出：「在中國，調解制度之所以能自古至今行制不衰，決不可能只是靠制度條文的完善，也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種簡單、經濟而有多元的糾紛解決方法。其不衰的主要原因在於調解制度的一核心理念『和諧』，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具有普遍的意義及在現代社會中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曾憲義，2009b）

5. 小結

從遠古社會到近代奉行儒家孝道思想（包括中國及以外）的國家，實行的贍養父母制度可以清楚看到管治者都依靠一套法規以確立長者被尊崇的地位，稍有不同者是較早期的制度多先重視文化禮教的熏陶，後再依靠懲罰性的規條強制子女或鄉黨（類同現代社區照顧）養老，然而隨着農業社會和傳統家庭相互支援的沒落，政府管治及機構養老服務產業的興起，子女贍養父母的意識亦漸趨式微，而人口老化、個人主義抬頭等因素，逼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檢視有關政策是否能夠維持。香港政府亦處於此等困局，要應對急速增長的老齡人口之所需，就要維持家庭（子女）養老的承傳。然而香港經歷了百年的西方統治，恢復奉行華人傳統的養老文化是談何容易？百年來香港所依循的英式思維管理，雖然仍夾雜着華夏文化的餘萃，但透過政府的施政，一般市民都過着華洋

文化交錯的生活模式，意味着是「半西不中」的習慣，要理解當前港人子女的
養老概念，得先分析過去的養老政策。

第四章 香港養老政策的概況

1. 香港安老理念及政策進程

1.1. 60 年代至 70 年代——安老服務的萌芽和奠基

70 年代之前，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年青人，社會福利服務項目多為年青人為對象。1965 年政府發表的第一部白皮書《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指出：「在香港由中國各地傳入的傳統價值及義務觀念，迄今只受到極有限度的破壞。所以進行社會福利服務工作首先注意者為防止敗壞社會風氣之影響獲得支配社會之勢力，或任其加速破壞天賦或傳統之責任感。例如不應鼓勵家庭自然單位將其照顧老弱者道德上的責任，委諸公立或私立之社會福利機構。」由此可見，當時政府視照顧老人為個人或家庭的責任。

進入 70 年代，香港面對人口結構的轉變、核心家庭普遍化、婦女外出工作的趨勢等因素，政府不得不正視老人問題的重要性。1972 年成立「未來老人需要」工作小組。小組建議引入「家居照顧」（或稱「社區照顧」）的模式；推行給予 75 歲以上老弱人士津貼；提出實施家庭助理計劃，直接給予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幫助；設立更多院舍來收容無力自顧的老年人。建議被納入 1973 年發表的《香港福利未來發展計劃》白皮書，為香港安老政策揭開新的一頁。

1976 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草擬各項程序計劃，如推廣各項安老服務，包括經濟援助，家居服務，培訓護老工作人員等。重點載入 1977 年發表的《老人服務綠皮書》，也是 1979 年《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進入 80 年代的社會福利》組成的主要部份，為香港安老福利政策樹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正迎接 1981 年香港老齡化社會的到來。

1.2. 80 年代至 90 年代——安老服務的拓展

自 1979 年社會福利白皮書發表後，安老服務全速發展。以老人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志願機構如香港耆康福利會及伸手助人會等，也在 80 年代成為規模較大的機構。社聯和社署在衛生福利司召集下成立的小組在 1980 及 1982 分別對老人服務程序計劃的進度進行檢討，以監察老人服務的發展情況。到了 1987 年，由於老人服務供不應求及私營安老院急劇增加，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應立法和行政兩局福利小組的建議，催促政府成立老人服務中央委員會檢討老人服務的發展情況。委員會於 1988 年 9 月發表報告書，承認「家居照顧」的策略不能降低老人住院服務的需求。報告書發表後，老人服務在福利支出中所佔比率進一步上升，卻仍然追不上急劇上升的服務需求。1991 年，護理安老院的輪候人數便有 8,000 多人，私營安老院超過 300 間。自 1990 年開始，社會福利署設立私營安老院自願登記制度，有關法例其後提交立法局通過。

1991 年發表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仍然肯定敬老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每個家庭都有責任照顧家中的年長者，但政府也從實際環境察覺到，某些家庭因種種原因在照顧長者時遇到困難，亦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政府支援。一方面以「家居照顧」作為服務的發展策略，另一方面從老人的實際需要制訂各項目標。1993 年，政府委出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老人服務工作小組」，全面檢討香港老人服務，並就制訂未來政策及服務發展策略提供意見，完成一份具參考價值及極具影響力的報告書。工作小組肯定了社區支援是照顧長者不可缺少的一環，建議盡量讓長者留在自己熟悉的社區生活，以實踐持續照顧的理念。同時建議釐定老年人口與所需服務的比率。監管私營安老院及考慮買位計劃等。

1995 年立法局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主體法例，為爭議多年的退休保障政策規範化奠下基礎。

1.3. 特區政府的安老理念及政策

香港回歸後，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 1997 年 10 月 8 日的施政報告中指出：「關懷長者是每個家庭的責任，我們必須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就照顧長者政策訂下了目標。1998 年，特區政府成立高層次的「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就制訂全面的安老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統籌各項安老計

劃和服務的策劃和發展工作，向政府建議實施的先後次序；及監察政府落實各項安老政策和計劃等，令香港的安老服務更趨完善。踏入千禧年，政府仍朝着家居照顧及持續照顧方向改善安老服務，推出改善家居及社區支援服務，包括日間護理、物理治療、暫託服務等。實施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重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如提升長者綜合服務中心為長者地區中心，長者活動中心為長者鄰舍中心，加強外展工作，發展義工服務。把家務助理隊升格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以強化護老支援。成立「長者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增強編配服務的成效。與此同時，政府為着配合國際社會動態，推動了許多活動，如 1995 年，聯合國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討論人類社會發展的首腦會議上，建議以「建立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Towards Society for All Ages）」，作為 1999 年國際老年人年的主題。特區政府、安老事務委員會號召 18 區區議會、各階層人士齊心協力響應國際長者年，積極宣傳「人人共享的社會」這個具世界性、歷史性意義的概念。為着提倡敬老尊老的社會風氣，推出多項護老愛老的活動，相繼有「老有所為計劃」、「康健樂頤年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左鄰右里計劃」，成立「長者學苑」等。

2. 老年人口的特徵

香港於 1981 年踏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化將是香港 21 世紀的重大議題，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現時香港八個人當中就有一名老年人，廿五年後，四個

人當中就有一名老年人。預計到了 2014 年工作年齡人口將逐步降低，現時兩名老年人有十二名工作年齡人士支援，到了廿五年後，只有五名工作年齡人士支援兩名老年人，65 歲以上的人口增長情況，將由 2003 年的 11.7%至 2016 年的 14.3%，上升到 2033 年的 26.8%（圖 5）。年齡中位數由 1961 年的 23 歲，到 1996 年的 34 歲，上升到 2003 年的 38 歲，2016 年和 2033 年將邁向 41 歲和 49 歲，老年人的壽命預期，2003 年的男性是 77.4 歲，女性是 82.7 歲；踏入 2019 年，預計分別為 78.6 歲及 83.9 歲。老年人的撫養比率（每 1,000 個 65 歲以上對 15 歲至 65 歲人士的比例），將由 2007 年的 170 增加至 2033 年的 428（圖 6）。

圖 5：香港人口老化趨勢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³¹

圖 6：2007 至 2033 年總人口、長者人口及老年撫養比率的推算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³²

長者人口的數目在過去四十五年，即 1961 年至 2006 年期間，增加了 764 878 人，平均每年增長率為 5.1%。在 2006 年香港長者的數目有 852 796 人。以長者佔總人口的比例而言，其百分比在過去四十五年不斷上升，由 1961 年的 2.8% 上升至 2006 年的 12.4%。老年撫養比率（即 65 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 15 至 64 歲人口的比例），由 1961 年的 50 上升至 2006 年的 168，預計到 2033 年將達到 428。長者的性別比率（即每千名女性相對的男性數目）在 2006 年為 856，而整體人口的性別比率則為 911。女性長者較男性長者多主要是由於女性的壽命一般較男性長。在過去 10 年，長者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1996 年的 9.8% 逐漸下降至 2006 年的 7.0%。這是由於經濟環境轉變下越來越多長者在 60 多歲時退休，加上年老長者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導致長者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持續下降（圖 7）。（香港政府統計處，2008b）

圖 7：1961 年至 2006 年的長者數目及比例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³³

3. 現時香港退休保障制度

現時香港長者的經濟援助主要有三大支柱：（1）私人管理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2）為有需要長者提供經濟支援的社會保障安全網，由政府一般收入撥款，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高齡津貼，傷殘津貼，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省及福建省養老計劃；（3）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

3.1.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經過 30 年的冗長辯論，1995 年，獲得當時立法局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條例》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的主體法例，1998 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臨時立法會通過附屬法例。臨時立法會撥款 50 億元設立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Authority，簡稱強積金管理局或積金局）。為香港退休保障奠下了基礎。計劃於 2000 年開始累積及實行，經過多年的運作，不難發現其不足之處。（1）遠水不能救近火：強積金是一項長期供款計劃，必須假以時日才有收成。現時已屆退休年齡人士所累積的金錢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或紓緩他們退休後所需及所面對困難；（2）捉襟見肘：根據統計處 2004 年的數字，在香港工作人口中有半數的收入少於 9,500 元，以供款四十年計，強積金的人息替代率（Income replacement ratio）只有 27%，亦即是說有半數工作人口工作四十年後，其強積金化為退休後的每月收入低於 2,565 元。有 48% 工作人口工作四十年後，其強積金化為退休後的每月收入低於 2,400 元，即現時的綜緩標準金額。強積金的保障水平對這部份工作人口來說是連綜援也不如，（黃洪，2005）（3）欠缺全面：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04 年 2 至 4 月的勞動參與率約為 61%，這意味着近四成的適齡人士沒有投入勞動市場，因此沒有參加強積金供款計劃，因此不受強積金的保障。這些絕大部份是家庭主婦、低收入人士和老年人；享有退休保障的長者只有 16.7%；而 45 至 49 歲準退休人士，只有 30.4% 享有退休保障。此外，供款未能靈活處理供款，受託人收取的管理費過高，供款人對投資項目的認知不足等，都是不利強積金供款人的因素。看來強積金被賴以作為退休社會保障制度的保護傘需要擴大及修

補，方能達到老有所養的目標，這也是引起各界廣泛討論的議題。

3.2. 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制度對老年人的經濟援助，來自政府的一般收入。財政司司長每年按時向立法會報告預算案並公告全民，最後由立法會撥款委員會通過。現時香港政府對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的經濟支援主要有四種：（1）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2）高齡津貼；（3）傷殘津貼；及（4）領取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省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1）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法，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援助，幫助他們解決基本生活的需要。申請人的首要條件是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必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經醫生證明身體狀況不適宜親自提出申請人者，其申請可由社會福利署署長委任一名受委人代行辦理。一旦獲准，援助金會按月存入申請人或指定的銀行戶口。領取綜援者可獲發一份「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憑證在香港的公立醫院（包括急症室）或診所接受醫療服務，可獲豁免有關費用。

現時申請社會保障制度下的經濟支援，審查範圍只限於長者個人和其配偶

的資產，即使長者背後有家財萬貫的子女，只要申請人的子女在「供養父母證明書」上聲明沒有供養父母，申請人即可獲得批准領取相關的資助。因此長者與家人同住亦可獨立申請綜援而獲酌情處理(表 15)。(香港勞工及福利局, 2009)

表 15：自 2000 年 1 月起與家人同住長者獨立申請綜援的數字

財政年度 (除 1999-2000 年度，社 署祇有該年度最後三個 月的數字)	酌情批出「獨立申請」綜 援個案數目	拒絕批出「獨立申請」綜 援個案數目
2000 年 (1 月至 3 月)	31	7
2000 – 2001	63	32
2001 – 2002	70	10
2002 – 2003	44	8
2003 – 2004	32	5
2004 – 2005	31	7
2005 – 2006	20	13
2006 – 2007	18	2
2007 – 2008	16	0
2008 – 2009	19	0

資料來源：香港勞工及福利局³⁴

申請綜援的長者須通過入息和資產調查，單身長者的資產上限為 34,000 元，而長者夫婦則是 51,000 元，長者的人壽保險供款等亦被計算在資產總額內，若長者申領綜援，則必須終止供款，把超出限額的供款用掉才可提出申請。長者購買人壽保險的目的本來是用以保障晚年生活，但現行綜援政策卻要求申領者先放棄這種保障，才可申請綜援。在供款期完結前，投保人能夠動用這些供

款解決即時經濟問題的可能性不大，當局的規定沒有辦法協助長者解決燃眉之急，令到本來在供款期完結後無須依靠綜援生活的長者，不得不依賴綜援維持生活所需。[（香港社會工作論壇，2009）](#)截至 2009 年年底的 289,139 宗綜援個案中，共有 482,001 名受助人，較 1999 年增加 28%。按年齡分析，60 歲及以上的受助人（在綜援計劃下這些人士被視為長者）佔整體受助人的比例由 1999 年的 40.6% 下跌至 2004 年的 34.1%，其後則逐漸上升至 2009 年的 39.0%。同期間，長者受助人佔整體 60 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的比率在由 1999 年底的 15.6% 上升至 2004 年底的 17.4%，然後下降至 2009 年年底的 14.9%。[（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而根據 1999 年至 2009 年綜援個案的分類數目，長者佔總計的百分比每年皆超過一半（圖 8、9 及表 16），而獨居長者的數目佔絕大多數（見表 17）。

圖 8：1999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2 月綜援個案的分類百分比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³⁵

圖 9：1994 年至 2008 年綜援個案的分類數目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³⁶

從政府預算開支數字來看，政府撥予綜援開支由 1994-1995 年的 3.2% 到 2008-2009 年的 8.6%，除了 2000-2001 年及 2001-2002 年回落之外，其他年份的數字都在上升（圖 10、11）。

表 16：1999 年至 2009 年綜援個案的分類數目

個案類別 Case category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均每年 增幅 Average growth per annum
年老 Old age	133 613 (57.9%)	134 230 (58.9%)	138 232 (57.2%)	142 762 (53.6%)	147 032 (50.7%)	149 821 (50.7%)	151 934 (51.0%)	152 507 (51.6%)	152 515 (52.9%)	151 954 (53.4%)	153 448 (53.1%)	1.4%
永久性殘疾 Permanent disability	11 732 (5.1%)	12 243 (5.4%)	13 522 (5.6%)	14 717 (5.5%)	15 697 (5.4%)	16 764 (5.7%)	17 482 (5.9%)	17 989 (6.1%)	17 924 (6.2%)	17 796 (6.3%)	18 146 (6.3%)	4.5%
健康欠佳 Ill health	19 946 (8.6%)	19 800 (8.7%)	19 705 (8.2%)	20 874 (7.8%)	22 198 (7.6%)	23 201 (7.8%)	23 962 (8.0%)	24 301 (8.2%)	24 436 (8.5%)	24 440 (8.6%)	25 294 (8.7%)	2.4%

單親	25 476	25 902	28 504	33 156	37 301	39 536	39 755	38 449	37 036	36 192	36 233	3.6%
Single parent	(11.0%)	(11.4%)	(11.8%)	(12.4%)	(12.9%)	(13.4%)	(13.3%)	(13.0%)	(12.9%)	(12.7%)	(12.5%)	
低收入	8 008	8 432	9 008	10 607	13 534	16 176	18 089	18 257	17 221	16 080	15 633	6.9%
Low earnings	(3.5%)	(3.7%)	(3.7%)	(4.0%)	(4.7%)	(5.5%)	(6.1%)	(6.2%)	(6.0%)	(5.7%)	(5.4%)	
失業	28 085	23 573	28 886	40 513	50 118	45 231	41 436	37 819	32 893	31 772	33 279	1.7%
Unemployment	(12.2%)	(10.3%)	(12.0%)	(15.2%)	(17.3%)	(15.3%)	(13.9%)	(12.8%)	(11.4%)	(11.2%)	(11.5%)	
其他	3 821	3 880	3 816	3 942	4 326	4 965	5 353	6 011	6 120	6 335	7 106	6.4%
Others	(1.7%)	(1.7%)	(1.6%)	(1.5%)	(1.5%)	(1.7%)	(1.8%)	(2.0%)	(2.1%)	(2.2%)	(2.5%)	
總計	230 681	228 060	241 673	266 571	290 206	295 694	298 011	295 333	288 145	284 569	289 139	2.3%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釋： 數字為該年年底的數字。

括號內數字代表佔總計的百分比。

Notes :

Figures are as at end of the year.

Percentages in brackets denote proportions to totals.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³⁷

表 17：自 2001-02 年起長者領取綜援個案的分類數字及金額

財政年度	最年長的綜援長者年齡為 65 歲或以上			估計總開支 (百萬元)
	獨居個案數目	與其他家庭成員同住數目	其他	
		其他家庭成員均為長者		
2001 – 2002	95 947	16 110	14 473	7,218.8
2002 – 2003	98 319	17 752	17 776	7,645.8
2003 – 2004	98 996	19 056	20 682	7,909.1
2004 – 2005	99 966	20 029	22 019	7,903.1
2005 – 2006	100 745	20 739	22 438	7,982.2
2006 – 2007	100 389	21 099	21 806	8,062.3
2007 – 2008 [#]	99 500	21 196	20 707	8,410.5
2008 – 2009 [#]	98 958	21 203	20 007	8,919.3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福利署³⁸

圖 10：1994／1995 年度至 2003／2004 年度綜援開支對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

註釋：* 計算有關比率所用的政府經常開支總數是修訂預算數字。

Note: * In compiling the percentage, figure on total government recurrent expenditure refers to that in the revised estimates.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³⁹

圖 11：1998／1999 年度至 2008／2009 年度綜援開支對比整體經常政府開支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⁴⁰

(2) 高齡津貼：又分為普通高齡津貼及高額高齡津貼。1999-2000 年起至 2008-2009 年長者領取普通高齡津貼及高額高齡津貼的數目（見表 18）。前者供 65 歲至 70 歲的老年人申請，申請者必須通過收入及資產審查；後者供 70 歲以上老年人申請，無需要經過收入及資產查核。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領取者主要可分為三類：（1）有實際需要的貧窮老年人，可能同時有需要申請其他資助。（2）收入低微不符合條件申請其他資助的長者或因綜援的負面標籤而拒絕領取的長者。（3）沒有實際需要，津貼對申請人來說具濃厚的「生果金」意義，有些長者慷慨地用以捐獻、饋贈等。高齡津貼的多寡頗具爭議性，2008 年至 2009 年的財政預算案並沒有因應社會人士的要求而增加高齡津貼金額，只以一次性撥款 3,000 元取代。財政司曾俊華稱：「人口逐漸老化，估計到 2033 年，長者人

數會由現時 87 萬增加至 217 萬，即現時的兩倍半，而高齡津貼的開支亦會相應地增長，以現時金額計算，會由 2008 年的 39 億元增加至 2033 年的 97 億元，長遠來說，會對公共財政構成相當大的壓力。若我們向所有合資格的長者提供 1,000 元的高齡津貼，估計到 2033 年，這項津貼的開支更會激增至 140 億元。所以長遠而言，這建議是不可持續的，而有關開支也會對我們的社會構成沉重的負擔，政府用於長者服務的經營開支，由 1996 至 1997 年度的 14 億 4 千萬元，大幅上升至 2006 年至 2007 年度的 30 億 8 千萬元，增幅超過一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的長者個案數目由該段期間增加超過 60%，而相關開支更由 35 億 9 千萬元飆升至 82 億 8 千萬元，增幅超過 130%，若現時的社會保障制度維持不變，長者領取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有關開支，預計將由現時 131 億元，上升至 2033 年的 318 億元，升幅將超過 140%」。起初一段在此暫且不評述曾俊華的理由是否充份，但香港面對人口結構急劇變化，稅基狹窄等都是不爭的事實。政府欲訂立一個有關的高齡津貼的長遠方案，必須先檢討現行的高齡津貼制度。在宏觀層面，應該由研究香港的人口結構、社會因素、經濟發展等方面着手，同時探討老人的需要為微觀基礎。首先給予高齡津貼明確的定位、屬性和正名。高齡津貼與其他老人福利政策有何關係及有何分別？高齡津貼的功能和作用是什麼？那些人有資格申請？屬於給特定人士的社會保障支援還是人人有份的回饋？合理津貼數目的多寡？

表 18：自 1999-2000 年起，長者領取「普通高齡津貼」及「高額高齡津貼」的

個案數字及金額

財政年度	普通高齡津貼		高額高齡津貼	
	個案數目	津貼開支 (百萬元)	個案數目	津貼開支 (百萬元)
1999 – 2000	134 305	1,004.7	311 530	2,458.8
2000 – 01	126 055	951.1	327 679	2,611.4
2001 – 02	117 121	881.2	340 920	2,700.0
2002 – 03	106 921	805.8	348 012	2,768.2
2003 – 04	97 633	737.5	359 165	2,898.8
2004 – 05	89 916	675.9	367 984	2,982.9
2005 – 06	83 230	631.4	377 794	3,074.8
2006 – 07	75 287	583.4	390 985	3,215.3
2007 – 08	70 054	569.3	403 105	3,533.0
2008 – 09	69 401	872.3	416 454	5,542.6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福利署⁴¹

(3) 傷殘津貼：分為普通傷殘津貼及高額傷殘津貼，前者提供給有醫生證明或明顯嚴重殘疾人士的援助；後者為不能自顧需要護理的或嚴重殘疾的人士而設。

(4) 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1997 年 4 月，社會福利署推出這項計劃，讓領取綜援的長者在自願選擇之下回鄉生活。計劃以廣東省作為推行起點，2005 年 8 月擴充至福建省，這兩個省份都是最多香港人所屬的祖籍地。計劃的意義，以調節社會資源分配；實現中國人落葉歸根的理念；體驗

家人和社區照顧的優良傳統。計劃的監察和執行，很大程度上是依重社署所委任的代理機構。代理機構的主要職責包括：代社署覆核及調查受助人回鄉定居後的狀況，例如透過家訪、郵遞覆核或抽樣調查，確保受助人合法地、妥善地領取援助金；處理居於內地的受助人的查詢及申報資料更改；安排護送受助人有需要往返居住地及香港，例如受助人急需回港就醫或由香港啟程到居住地；處理突發性的特殊個案，例如受助人回鄉後精神出現問題而失去表達自己意願的能力，協助其在當地物色社署認為合適的受委人，協助不幸去世受助人的親友，向社署申請殮葬費津貼。這項計劃是為老年人提供退休生活及安渡晚年的方法之一，但也有不少問題受到社福界關注。（一）受助人的就醫問題；（二）個案和代理費的比例是否符合效益；（三）受助人居住地點的局限性。經過十多年的運作，累積了許多實踐經驗，這項計劃應是檢討的時候，況且中港兩地合作頻密，範圍廣闊，老年人自願回鄉生活計劃應有很大的發展及改善空間。

政府撥於安老服務的經費，近年有急增的跡象（表 19）。隨着人口老化，領取綜援長者的數目，近年急升到 2010 年的 19 萬人，10 年間上升超過兩成。預計來年人口老化約為綜援系統帶來更大的壓力，使人擔心未來綜援制度在財務上的可持續性以及是否因財務上的壓力而減弱對長者的保障力度。（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0）正如前文所述，基本法量入為出的規定、稅基狹窄及人口急劇老化等因素導致政府面對日益嚴峻的財政壓力，倚賴現時社會保障制度保障

老人明顯非長遠之計。

表 19：2009-2010 度社會福利署的開支預算

綱領（3）：安老服務

	2007-08 （實際）	2008-09 （原來預算）	2008-09 （修訂）	2009-10 （修訂）
財政撥款（百萬元）				
政府機構	180.7	152.5	146.7 （-3.8%）	154.4 （+5.2%） （或較2008-09原來預算增加1.2%）
受資助機構/私營機構	3,121.0	3,509.1	3,572.4 （+1.8%）	3,826.4 （+7.1%） （或較2008-09原來預算增加9.0%）
總額	3,301.7	3,661.6	3,719.1 （+1.6%）	3,980.8 （+7.0%） （或較2008-09原來預算增加8.7%）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福利署⁴²

3.3. 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

今天的長者大部分在經濟起飛前度過黃金歲月，當時工作的常態是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而家庭人口較多，令長者可資積蓄的金錢更有限。受滙

率波動、幣值不穩、外圍因素等影響，銀行存款利息偏低；而投資倘不得法，本金更很可能受高增長的通脹侵蝕。雷曼事件暴露了投資風險的潛在威脅。另一方面，長者往往過於節儉，以致影響生活質素，亦非社會所樂見。香港的年金制度源自英國，英國是個福利國家，有條件推行公民人人有份的養老金待遇，如全民平均津貼，帶福利制度的特點。香港則不同，推行的年金制度主要局限於公務員，是無須繳費而獲得的（non-contribution flat-rate），九十年代起，這種制度漸漸被其他退休保障方式取代。

4. 香港家庭養老的內涵和實踐

4.1. 香港家庭的變遷

香港地處中國東南部，由 230 多個島嶼和內陸組成，原屬新安縣管轄，開埠前是個只有二千多居民的漁村。19 世紀，英國殖民主義政府先後於 1840 年和 1860 年發動大規模侵華事件，歷史上稱為鴉片戰爭，清廷不敵之下，與英帝國簽訂兩份不平等條約，即《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英帝國以此為依據，確立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地位。儘管香港經歷英國的統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日本侵佔，主要的居民仍是華裔，95%的人口是華人，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和其後代。早期的華人家庭是以擴張式（大家庭）或主幹式核心家庭為主，傳承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奉行「父慈子孝、長幼有序」的家庭觀念。年長的男性家長在家庭中有絕對的權威和地位，領導家庭成員共同生產

和共同生活，建立農業經濟體系的生活模式。人們多以務農或捕魚維生，大自然的 land 和山河是當時香港家庭主要的依靠。

香港由一個寂寂無名的漁村變身為現代的國際大都會，被稱為香港的奇蹟，現高居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位置，世界第十一大貿易實體。由約 222 個家庭組成，擁有 700 萬人口的特別行政區。期間香港家庭模式經歷過重大的變遷，其中受人口結構和經濟因素互動影響至為重大，而直接影響人口結構導致家庭模式轉變的最顯著動力，是緣自「移民潮」和「工業化社會」的相互聯系和相互滲透發展而成。

4.1.1. 工業化對香港家庭模式的影響

19 世紀，以歐洲為基地的工業革命市場爭奪戰蔓延，導致新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向海外擴張，許多歐洲國家在亞洲、美洲、非洲各自建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不僅為它們提供原料和商品出口市場，還在推進世界貿易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19 世紀中期，英國相繼接管香港、九龍半島及強佔新界地區後，遂在香港拓展市場，如電筒、雨遮、防風燈、茶壺、火柴、造船、船隻維修等輕工業開始在香港土地上萌芽，標誌着香港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開端。到了 20 世紀的 20 年代，隨着土地不斷開發，香港轉口地位的確立，依仗殖民地勢力的英資機構，如滙豐、渣打、怡和、渣甸等率先在香港設分公司開展業務，一

個有別於內地傳統經濟貿易的特殊經濟地區逐漸形成。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數年光景，香港的玩具業、製衣業、塑膠花業、氣燈等工業迅速冒起。工業化的推動，以血緣家族為本位的家庭經濟體系起了重大衝擊。工業化社會的到來，人們不再是束縛在固定的土地上的農夫，而是勞動者自由投身工業生產，以個人為單位的勞動密集型市場漸漸取代傳統家庭集體生產方式。工業化社會的職業流動性大，保守且刻板的大家庭難以適應這種變化大、節奏緊張的生活方式，導致擴張式家庭向核心家庭的過渡，這不但影響家庭的模式，同樣地，家庭的功能也起了重大的改變。年青男士為口奔馳，早出晚歸，家務和教育小孩的工作則落在老人和婦女身上，家庭成員的親情和凝聚力再也不能與昔日相比；家庭不再是生產性單位，而是經濟消費性單位，農耕年代的家庭經濟基本原則「共產共享」已不合時宜。

4.1.2. 移民潮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

百多年，香港發生過多次移民潮，最早可追溯到 1850 年，華南地區發生動亂，大批內地居民帶同資本和技術人員移居到香港開展業務。到了 1930 年，中日戰爭爆發，1937 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件，中國展開全面抗戰，不到一年，日本攻陷全國大部份的主要城市，上海、東北和華南地區的居民紛紛逃至香港。據統計，1937 年底，香港人口首次破百萬大關。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香港人口激增至 160 萬。（鄭德良，1992）1946 年日本投降結束世界大戰，

中國國內的戰事未因此而結束，接踵而來的是 1945 年至 1949 年的內戰爆發。

1949 年中國解放，政權改變，大批軍人、資本家、知識分子湧入香港，到了 1950 年，香港人口突破 200 萬大關。許多文獻記載，稱這批移民謂「政治難民」，他們到港後首要的目的是找商機和工作，移民不但促進經濟繁榮，也為香港提供一批龐大的勞動力，1956 年的《香港年鑑》指出：「香港的經濟得以生存及擴展其工業，實有賴一批由中國來的政治難民，他們帶來了三份禮物：一是勞動力；二是先進的科技及管理技術；三是新的資金。」這次移民潮一直延續至上個世紀的 60 年代，1962 年，本是彈丸之地的香港人口竟高達 344 萬。[\(甘長求, 1989\)](#)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故此製造業以輕工業為主，塑膠業、電池業、玩具業、製衣業、紡織業、鐘錶業等，這些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工業，需要大量廉價勞工，香港的工業由 20 世紀 60 年代起步上揚，一浪接着一浪邁向高峰，「移民潮」無疑是香港得天獨厚的資源，為香港工業化插上一對翅膀，香港能贏得「亞洲四小龍」的美譽，移民的貢獻是功不可沒。

4.1.3. 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誠然，移民潮為香港創造許多奇蹟，但也給香港帶來了不少民生和社會問題，其中最嚴重是住屋問題。因國內戰事連連，社會動蕩不安，導致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他們處於身無分文，舉目無親的困境下，只能蝸居在木屋區或非法搭建的寮屋。1953 年聖誕節，九龍石硤尾木屋區一場大火，令 5 萬多災民失去

居所，引發港府決心推行安民的房屋政策，先是籌建「徙置區」安置流離失所的災民，繼之，於 1961 年，興建「廉租屋」予經濟條件比「徙置區」居民稍好的中下層人士。廉租屋面積細小，設備簡陋，沒有獨立廁所和浴室，面積由 80 到 150 平方呎，平均每個人只有 20 平方呎空間。這些被形容為「匣屋」的設計，地方狹窄，只適合核心小家庭居住，即夫婦和孩子，家中的老人逐漸被邊緣化。1972 年港督麥理浩提出「社區建設」，以提高廉租屋的質素，改善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推出加速發展新市鎮意念，誘導聚居在市區的居民向新界遷移，率先在荃灣、沙田、屯門發展新市鎮，計劃在 10 年內為 180 萬市民提供廉租屋。受工業化、現代化、西方化思維的影響，大多數的年輕一代婚後不願意與父母同住，新市鎮的廉租屋恰是迎合他們的需要，傳統三代同堂的家庭逐漸被核心家庭所取代。年輕子女遷往新市鎮，年老的父母仍留在舊區生活，因此子女供養父母再也不是必然的情理，「空巢家庭」這個名詞伴隨着家庭的變遷而產生，不僅是反映現實社會的親情冷漠，也可能是許多獨居長者晚年淒清生活的寫照。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年青人選擇婚後與父母分開住，可減少婆媳之間的磨擦，以維持跨代關係，真如中國人常說：「相見好，同住難」，有許多老人也樂於接受，也是反映現實社會的情景。

4.2. 子女供養父母現況

根據在 2001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進行的一項有關受供養父母特徵的主題性

住戶統計調查結果，在全港的 15 歲及以上人士中，約三成的人士在統計期的過去 12 個月內有供養父母。當中，58%與受供養父母同住；40%並不與受供養父母同住。按年齡組別分析，20 至 29 歲及 30 歲至 39 歲人士在統計期的過去 12 個月內有供養父母的百分比較高，分別為 51%及 50%。另外，在從事經濟活動人士中，45%在統計期的過去 12 個月內有供養父母。此外，根據在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2 月期間進行的一項有關香港居民運用時間的模式及他們參與各類活動的情況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結果，在統計時全港 15 歲以上人士平均每日用 2.1 小時於與其任戶有關的事務，當中包括照料家人、為自己或家人做家務，以及為自己或家人購物/服務。基本上可以說，時下香港人忙於工作之餘，仍未至太疏忽於照顧家人。

統計處於 2010 年 6 至 8 月，抽查全港約 1 萬個住戶，了解有關長者的經濟和家庭特徵，成功訪問率為 75%。調查結果顯示，全港共有 112.9 萬名 60 歲以上長者與家人同住，另有 5.8 萬名長者居於院舍。有 56%在社區居住的長者現已退休，另有約 13%仍然工作，其餘為主婦或失業人士等。調查披露，非院舍居住長者每月個人入息中位數為 3300 元，每月開支中位數為 2500 元，未出現入不敷支問題。有六成長者的收入來源為子女供養，另有五成長者領取生果金，依賴綜援的長者亦佔一成。（香港政府統計處，2009b）

另一項報道，花旗銀行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09 年 4 至 5 月進行了一項關於「港人對供養父母的觀念」調查，電話訪問超過 2100 名年齡介乎 18 至 75 歲的人士。調查顯示，五成一受訪者同意父母應有責任退休後經濟獨立，不應指望子女供養。另外，只有不足三成受訪者覺得可以犧牲自己生活質素供養父母。調查更發現願意犧牲生活質素以供養父母的兩成九受訪者中，有三成五屬單身，兩成六為已婚及有子女人士。相信是已婚人士一般經濟負擔較重，供養父母亦有一定困難。另外，只有三成二受訪者期望從子女得到財政上資助，而期望政府給予免費醫療、現金的退休援助，分別高佔四成及三成六，反映港人退休後期望倚靠政府高於子女。（星島日報，2009）

表 20：不同年齡群人士對供養父母的意願

年齡	供養意願（%）
18 – 29	33
30 – 39	28
40 – 49	25
50 – 59	27
60 – 75	36
婚姻狀況	供養意願（%）
單身	72
已婚	54

資料來源：《頭條日報》⁴³

4.3. 老年人的角色和地位

家庭是直系血緣關係及婚姻關係組成的私人生活空間，主要成員當然包括老年人，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傳統的華人社會觀念，認為老年人是一家之主，擁有權威和崇高地位，晚輩對其「敬之」、「畏之」。現今時代變遷，工業化、城市化取代農耕社會，科技知識遠勝經驗，自由、民主、平等理念的興起，老年人在家中的角色和地位逐漸褪色。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於 1996 年進行一項「長者角色和地位探討」研究。研究以調查方式進行，接受訪問的共分兩組，各 300 人。第一組年齡在 60 歲以上，全部都是安老服務的接受者；第二組年齡在 15 至 29 歲之間，全部是職業進修學校的學員。多項研究中，特別針對長者的角色和地位設計了兩組問題，一是被訪者心目中長者的角色和地位，二是他們現實裡看見的長者角色和地位。調查結果如下：

表 21：長者的理想和真實的角色和地位

項目	理想情況		現實情況	
	表示同意（%）		表示同意（%）	
	年老	年輕	年老	年輕
1. 一家之主	42.4	39.1	14.9	32.4
2. 在社會上有崇高地位	61.8	56.2	27.4	21.5
3. 受到他人敬重	88.9	88.7	65.7	46.8
4. 有智慧和經驗	84.5	66.8	66.0	49.7
5. 協助家人解決困難	87.8	63.2	64.7	42.6
6. 幫助家務	84.7	50.2	66.4	65.6
7. 協助看顧孫兒	86.4	72.5	68.7	87.6
8. 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88.2	62.2	79.0	33.4
9. 關心社會事態	89.2	64.2	78.3	33.2

資料來源：《香港老年人的樂與憂——餘暉晚照》⁴⁴

負責研究的學者對調查結果作出以下總結：「理想和現實有極大距離。大致上，長者對自己的期望較高，年輕人的理想和現實差距較少。總括而言，現今長者不再是一家之主，在社會上雖仍被視為尊敬的對象，但不再有崇高地位。長者的角色多限於一些家庭事務，他們雖有參與社會事務之心，但年輕一代不覺得他們在這面有積極貢獻，情況令人憂慮。」（周永新、齊鉉，2000）

5. 小結

近年福利國家的養老保障因財政緊絀而縮減，加上各種社會風氣因素使到家庭養老意識薄弱，形成整體邁向個人責任及移構養老模式。展望未來，若香港仍保持低稅率政策，而要按現時財政投放於長者身上的各項開支，恐惶日後

財政收入難以負擔。

如何為香港未來的養老政策定位？誰能養？個人（長者自己）？家庭？政府？答案應該是香港目前處於三難局面：（1）長者個人能力不足。英國統治香港百年之久，沒有為香港制定長遠的退休保障計劃，回歸之後，雖然已確立強積金制度，但強積金發揮效能須時，替代率低，覆蓋面不足等都顯示強積金制度出現重大缺憾，特區政並沒有積極回應各界意見和市民的訴求，只作了修修補補的工作，未能制定個長遠的、全民適用的退休保障政策。（2）家庭養老未能確立。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政府把養老視作家庭成員的責任，數十年來路向仍沒有改變，可惜政策含糊，「家庭養老」淪為空喊口號，對那些有心養老而經濟能力不濟的子女支援不足，令人喪氣；個人主義的抬頭，市民不願意犧牲個人生活質素而供養父母；年青一代養老文化意識薄弱；長者在社會或家庭的地位不受重視；家庭結構的改變等因素都不利於家庭養老政策的推展。（3）政府財政收支的局限。香港奉低稅率制，受制於基本法量入為出的規定，面對龐大的老年人口，資源開支承受極大的壓力；香港並不是個福利地區，只能扮演「小政府」角色，不能統攬「由搖籃到墳墓」的責任。

按以上情況來看，香港必須要制定長遠的、多元化的養老政策，包括考慮立法強制子女供養父母，令到家庭養老更具體化、規範化。透過立法手段要求

子女履行贍養父母的義務極具爭議性，必須有民意基礎、政治環境、社會風氣等因素的支持。而事實上有關討論在零六年亦甚囂塵上。當年政府在考慮防止家居虐老的法例時⁴⁵ 導引至全港熱烈討論是否要跟新加坡設立同樣的法律機制。爭論至今仍未平息。主要是贍養父母不能強制，要由心而發及必需自願。但亦未有提出另類方案。

本文曾引入 2001 年由政府統計處進行的一項有關受供養父母特徵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及 2009 年由花旗銀行委托香港大學進行的供養父母意願調查，從兩項調查中，發現第一項的 20 至 29 歲，及 30-39 歲年齡群組別的人士，在統計期的過往 12 個月內，有供養父母的分別為 51% 及 50%；而在第二項的 18 至 29 歲及 30 至 39 歲年齡群組別人士，有供養父母的意願的分別為 33% 及 28%；而單身人士有 72% 認為自己有責任供養父母，如果有子女的已婚人士則有 54% 的人士有供養父母的意願。當然願意供養父母不等同於支持立法要求子女供養父母，但至少可用作科學調查參考數據。

綜合外國的養老經驗，單靠機構或政府養老難以持續，倚賴家人子女養老亦不設實際。面對迎面而來的龐大高齡人口，贍養父母亦不能被視為一個私人家庭的問題；若處理失當會令整個香港社會陷於困境，故此政府亦有責任鼓勵甚或立法強制贍養父母。然而強制養老並不符合儒家文化，況且新加坡的經驗

是長者不願舉證控告自己子女。但事實上亦大有「不孝子」在侵食父母僅存的
養老錢財，香港應如何自處是一個相當值得待深思考的課題。

第五章 研究方法

1. 研究框架

至此，研究方向既已確立，商榷的是如何能較科學化地處理歷史、文化、人情世故的錯縱複雜資料，將其理順然後得出一個可行的操作框架。由於課題在近幾年才獲得關注，故報章傳媒資料相應較多，但學術論文卻不完備。應此情況下，研究工作必需先把相關資料覓集，再按邏輯思維分類鋪陳，然後反覆重整各類資料使其成為可操作的初步框架。按著這個立論方向，方法其實就是紮根理論的基礎。

簡單而論，本研究首先參考世界各國已確立之條例，再比併以香港特質來拼湊出一套初步的條例結構框架。

至於這套初步框架是否符合香港法規基礎或能否達到預期果效，則必須交由法律專業人士加以評證。再者，此法若能實行，受眾（長者及其子女）又是否接受？社工界的意見也很重要，故各種有關人士的意見都必需包括在內，不能草率，在方法學上來說，這都是一種傾向於質的研究，其重點暫不在能量的代表性（或要一定數量的樣本以求有統計學上的代表性），而是在資料提出者的專業性（就如制定國家律法上的必先由律政官員草擬）。本論文所採用的方法沿

於同一思維，並分為三個階段完善特設框架。

1.1. 文獻分析及初步歸納認為應有立法方向

要在眾多文獻中提煉出主幹性的資料，當中應包括以西方國家為主的相關資料，如英國《普通法》直接影響香港的法律框架、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和遠古的中國歷史資料，探討「孝」具有「齊家治國」功能的奧妙。擷取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作個比較，初步建構：（1）香港應立法強制子女贍養父母的理論；（2）法律的弱點有哪些？（3）如何補救法律未能解決的問題；（4）修正以上各點並建構一套可用於香港處理子女贍養父母的模式。本人具備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學歷，對法律條例有相當認識，對篩選工作具有一定的能力和經驗。此外，本人擔任區議員有 26 年之久，服務的主要對象是家庭、長者、兒童、婦女，與社會福利界有緊密的合作，對香港養老政策與長者的需要有深入的認識。

這種研究方法其實在社會學及人類學也經常被應用，如 1985 年的《在歐美的波蘭平民》研究。（Thomas & Znanieck, 1985）這種由研究員自己預先前設的理論框架過程紮根理論（Glaser & Strauss, 1967）有異曲同工之處。其好處在於芸芸眾多資料中能先由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工具）作大膽假設，道出框

架再予求證。在最初階段，本文設計框架包括訪談，意圖透過口頭談話方式，以瞭解受眾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價值觀念、情感感受和行為規範等，以助收集或建構第一手資料。當著手進行問卷設計時，發覺有不少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現時的香港普羅大眾對調解制度認識尚淺，意會到採用訪談方法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決定由社會研究規範質性研究深入探索開始，讓群眾對有關建議有所掌握之後，才用量化方法分析。所以本論文採用由專業人士評証及個案試行分析。

1.2. 框架交由專業人士作評証

專業人士應包括學者、律師、社工，目的是尋求初步共識。

1.3. 個案試行分析

框架經過第二階段後進行優化成為較可行的步驟：選取典型的真實個案進行試行，包括調解為先，尋求協商。如不成功，才介入審判機制及上訴程序等：

- (1) 通報或舉報機制；
- (2) 介入及審裁機制；
- (3) 上訴程序及判罰機制。

顯而易見，以上研究方法皆緣於社會學的紮根理論。本章先詳述採用紮根理論作為研究方法的基礎來由，再以同樣思維來解讀三個不同階段的研究方法設計。

2. 概述研究方法及前期工作

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是由原始資料開始，本文採用建構主義的探究循環設計模式，整個研究是在循環中，所有的組成部份都在流動中，中間沒有界線，也沒有結束。歷經收集資料、整理資料、閱讀資料、分析資料等的鞏固前期工作步驟；原始資料、研究者個人經驗及現有理論三者之間的循環往返交錯的互動過程，前期工作與操作程序及方法環環相扣，因此把前期工作列入本章並論，達到融滙貫通，前後相呼應的效果。

2.1. 紮根理論的起源與基本思路

紮根理論的策略是一種運用系統化的程序，針對某一現象來發展並歸納式地引導出紮根理論的一種質性研究方法。紮根的理論是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結果，換言之，紮根理論是經由系統化的資料搜集與分析，而發掘、發展，並已暫時地驗證過的理論。因此，資料的搜集和分析，與理論的發展是彼此相關、彼此影響的。紮根理論的始創者之一 Strauss 說：「發展紮

根理論的人不是先有一個理論然後去證實它；而是，他先有一個待研究的領域，然後自此領域中萌生出概念和理論。其目的是要去建立能忠實反映社會現象的理論。」(Strauss & Corlin, 1990)

圖 12：紮根理論基本思路

資料來源：《紮根理論研究法與管理學研究》⁴⁶

2.2. 研究設計模式

研究的開始必須就研究項目勾劃出一個研究設計，以簡要的方式提煉出研

究的具體思路、步驟和實施方案，目的是為今後的研究實踐提供一個綱領性的指南。質的研究者認為，研究的各個部份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線性的關係，按照一定的前後步驟逐步地進行研究，而是一個循環往返、不斷演進的過程。研究中的每一部份工作都不可能一次性完成，都受到上一輪循環中其他部份的影響；質的研究的循環過程表現為一個建構主義的探究循環（圖 13）。在這個循環中，所有的組成部份都在流動之中，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圖 13：建構主義的探究循環設計模式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質的研究》⁴⁷

2.3. 蒐集資料

收集資料（Data collection）是項艱巨的工程，從收集得第一份資料開始，就進行比較以刺激思考，以使全面而扼要地抓住所研究對象的主要特質。知識領域是深廣博大、文獻浩瀚、學海無涯，絕對不能無止境地蒐集資料。質的研究中的「質料」與其他類型（如量的研究）有所不同，定義比較廣泛，一條基本的原則是：只要這些「東西」可以為研究的目的服務，可以用來回答研究的問題，就可以作為研究的「資料」，即：研究是如何搜集和分析這些資料？這些資料被拿取做什麼用？這些資料與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目的是否匹配？因此本文收集資料必須是聚焦於有助展現養老背景及貼切主題理論的特質，冀能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建構出有意義的研究方向和理論架構。本文收集資料的方法主要是實物分析，這些資料可以是歷史文獻、文字資料或書面材料。最基本的途徑是從書店、圖書館、網上、導師、朋友、報章、雜誌而獲得，主要包括：國際性文獻、香港官方文件、法律文獻、中國古典書籍、學術文獻。

2.4. 理論觸角與閱讀文獻的關係

收集資料的種類有了基本的方向，接踵而來的是在這些資料中應該檢索多大範圍的文獻。面對千年積澱的書籍、卓爾不群的學說，林林種種的報告書，從哪裡開始下手？到哪裡為止？紮根理論要求研究者必須有理論觸覺。理論觸

覺指的是研究者一種個人特質，一種能察覺資料內涵意義精妙之處的能力；而研究過程亦可以培養出理論觸覺，因此，理論觸覺就是研究者有能力去賦予資料意義，能了解、能區分相關和無相關的事物，並且有洞察力。理論觸覺來源之一是問問題，學者提出七個 W：who（誰），when（何時），where（何地），what（甚麼），how（如何），to what degree（程度），why（為何）。適當時候，還要搖紅旗，即是避免把個人的偏見、信念和假定帶入研究中；當發覺資料中一些看似平淡無奇，但看起來符合常識或法規說法時，都要在心中搖起那面紅旗子，告訴自己不可輕易放過這些。

2.5. 文獻的運用和互動關係

文獻的運用和檢索是一個不斷演化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原始資料、現有理論和研究者個人經驗三者之間的一個循環往返又交錯作用的互動過程（圖 14）。

（吳芝儀、廖梅花，2001）

圖 14：研究互動關係圖

Triangulation of Sources of Data : Researcher-stake Holders-Current Models

2.6. 比較

紮根理論的主要分析思路是比較（comparative），在資料和資料之間、理論和理論之間不斷進行對比，然後根據資料與理論之間的相關關係提煉出有關的類屬及其屬性。這種比較必須貫穿於研究的全過程，包括研究的所有階段、層面和部分。因其持續性和不間斷性，這種方法被稱為「不斷比較的方法」（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Glaser 和 Strauss 認為這種方法通常有如下四個步驟：

- (i) 根據概念類屬與類別對資料進行比較。首先對資料進行細緻的編碼，

將資料歸到盡可能多的概念類屬下面；然後將編碼過的資料在相同和不同的概念類屬中進行比較，為每一個概念類尋找到其屬性。

(ii) 將有關概念類屬與它們的屬性進行整合，同時對這些概念類屬進行比較，考慮它們之間存在什麼關係，如何將這些關係聯繫起來。

(iii) 勾勒出初步呈現的理論，確定該理論的內涵和外延。將這個初步的理論返回到原始資料進行驗證，同時不斷地優化現有理論，使之變得更加精細。如果發現這些理論可以基本解釋大部分（或者所有）的原始資料，那麼其概念類屬就可以被認為是「有力的」和「合適的」。

(iv) 對理論進行陳述。將所掌握的資料、概念類屬、類屬的特性以及概念類屬之間的關係一層層地描述出來，最後的理論建構可以作為對研究問題的回答。（Glaser & Strauss，1967）

2.7. 資料分析的具體步驟

2.7.1. 整理資料

紮根理論的開展工作由整理原始資料開始，整理資料/分析資料作為一個整

體蒐集資料之間，並不是分開兩個階段來進行，是相互交叉、重疊發生、同步進行的過程。學者對整理資料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只提供一些參考模式，視乎研究者個人的需要和取向。有學者認為，對原始資料的處理有三種方式，可以與螞蟻、蜘蛛和蜜蜂類比。（陳波，1989）本文參考此類比作為整理資料的步驟。

(i) 第一步：資料搜集，螞蟻工作方式。透過書店、圖書館、網上、導師、朋友、報章、雜誌等途徑，按原訂計劃的範圍搜集資料，像螞蟻那樣把資料往屋裡放，將其堆積起來，不進行分析，也不建立理論。經過這個步驟把本文所需要的資料，經過省覽、檢視後，逐步累積起來。

(ii) 第二步：資料展示，蜘蛛工作方式。當資料收集越來越多的時候，面對數以百本的雜亂無章的書籍、一大堆、一大疊的文獻、報告書等，就應該想法子，如何把它們系統地整理。就如日常穿着的衣物，分為一年四季；上班、休閒、運動、睡衣、禮服；鞋襪、帽子都必須擺放得整齊有序，最好的辦法就是掛在衣櫃裡或放在架子上。操作的靈感來自小學生撿色豆遊戲。遊戲方法，用一個盆裝滿大小不同各色各樣的豆，參加者用筷子鬥快把豆夾起按顏色分開，訓練其定力、耐力、敏捷度，為了能形象化地刺激思維，我做了一次打碎重組的實物試驗，摔破一瓶裝滿紅豆、綠豆、白豆、黑豆、腰豆、眉豆、小紅

豆的玻璃樽，清脆的「咔嚓」一聲，隨着是不同顏色、不同形狀的豆，各自有節奏地跳躍、滾動，朝不同的方向慢慢散去。繼之，細心地把逐粒豆撿起，分開顏色放在不同的玻璃瓶子裡，給予命名標貼，分別為：A) 紅豆、B) 綠豆、C) 白豆、D) 黑豆、E) 腰豆、F) 眉豆、G) 小紅豆。這個略帶衝動的實物試驗，為本文搭建起擺放資料的框架，完成展示資料任務。把資料分為 15 類，分別為：A) 聯合國文獻、B) 老齡學問題參考書、C) 長者權益保障著作、D) 社會福利政策、E) 中國傳統孝道、F) 家庭養老、G) 官方文件、H) 法律文獻、I) 中國古典書籍、J) 圖書館借書記錄、K) 網上文章及資料、L) 社會學書籍及工具書、M) 導師講座、N) 剪報資料、雜項。每類再給予每本書或每份材料標籤，如 A1) 聯合國老齡化問題會議等；B1) 老齡學概論（鄔劍萍，2006）；C1 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歷史與變革（姜向群，2005）。無論掛在衣櫃裡的衣物，或是放在架子上的豆只可作為展示其顏色、式樣、形狀，但無法凸顯其特質、屬性。這種就像蜘蛛工作狀況只顧吐絲埋頭佈網，目的是等待獵物掛到網上，與實際情況脫離，因此下一步必須將資料加以提煉、濃縮。

(iii) 第三步：資料濃縮，蜜蜂工作方式。資料濃縮是資料分析的實質，其目的是將具體、零散的資料提煉為具有一定意義關聯的資料。資料濃縮的步驟主要有：將資料中重要的核心概念或主題提升出來，使用這些概念或主題將所有的資料內容統領起來，然後再將這些核心概念或主題放回資料之中，使它們

在特殊、具體的事物中表現出來。資料濃縮的具體手段包括比較、類比歸納、外推、演繹、溯因、分析和綜合等。在濃縮的過程中需要經常尋找類屬之間的相關關係，將不同的類屬合併成類群（Miles & Huberman, 1994）。就像蜜蜂從花園裡採集花蜜，帶回巢中，對這些資料進行加工、分解、釀出蜂蜜。操作過程的靈感來自中國麻將遊戲的洗牌到勝出過程。（麻雀源自明代民間的「馬吊紙牌」遊戲，發展於清朝，是一種集益智性、趣味性、博弈性於一體的運動，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於 1998 年頒佈一套麻雀規則以推廣麻雀成為一種體育項目。每副麻雀共 144 隻牌，包括「萬字」、「索子」、「筒子」、「『風向』和『花』」四種類群。一般是由四個人參加比賽，每玩完一局必須要把牌反過來洗勻，也就是經打散、重組、比較、取捨、拼湊、統合的過程。開始時每人有 13 隻基本牌，四個人依次輪流從公海中（放在中間未被分配的牌）抓牌，替換、觀察、取捨、互動，按規則而鋪設個人的思維，運用個人技巧、智慧、敏銳、觸覺、判斷力、經驗，找出牌與牌之間的類別，範疇、關聯，予以搭配、重整，達到統合而勝出的目的。運動對參加者的修養有嚴格的要求，即：「入局鬥牌、必先練品」。

濃縮的過程中尋找類屬之間的相聯關係，得出四個由不同類屬合併的類群：國際、中國、香港、工具書。經過抽取、摘錄、影印、掃描儲存、電腦操作，給予每資料編號，然後建立一個編號和歸納系統。這個時候，保留資料展示的面貌，以便回過頭來翻查資料。因此資料分析像一個圓圈，圈中各個部份相互關聯、循環往返，如圖 15。

圖 15：資料分析的組成部份：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質的研究》⁴⁸

本文不但仿效蜜蜂的工作方式，還要學習蜜蜂的勤懇、嚴謹、忠於工作的態度，向研究目標進發，從整理資料順利過渡到閱讀原始資料。踏上把原始資料「打散」、「揉碎」、「分解」、「濃縮」、「重整」、「統合」的歷程，達到紮根理論研究的基本原則：從原始原料出發，通過歸納、分析而逐步產生理論。

2.7.2. 閱讀原始資料

分析資料的第一步是認真閱讀原始資料，熟悉資料的內容，仔細琢磨其中的意義和相關關係。在對資料進行分析之前，研究者起碼應該通讀資料兩遍，直到感覺已經對資料瞭如指掌，完全沉浸到了與資料的互動之中。在閱讀原始資料的時候，研究者應該採取一種主動「投降」的態度。這意味著研究者把自

己有關的前設和價值判斷暫時懸置起來，讓資料自己說話。研究者只有徹底敞開自己的胸懷，騰出一定的空間，才能讓資料進到自己的心中。質的研究認為，搜集到的資料已經成為了「文本」，而文本是有它自己的生命的。我在單獨與資料共舞、與資料對話的日子裡，嘗盡了甘甜苦澀的味道，尤其是閱讀中國古文、社會學大師的英文原著作時遇到困難重重，必須要刻苦耐勞。憑我個人的耐性、堅毅、發奮；導師的指導和激勵，付出足的時間對資料加深瞭解、溝通、互動；它的確向我展現了真實面貌。

2.7.3. 分析資料的技術

紮根理論分析資料的技術，胡幼慧（2009）認為主要有：

(i) 開放式登錄：目的就是藉著對文字資料逐字、逐句的分解，以便指出研究者感興趣而所觀察的研究情境內是重要、突出、屢次出現的社會現象，主要工作為賦予一個名字，即範疇（category）；此為「分解」的過程；

(ii) 命名：在逐字逐句分析的過程中認定某一社會現象是重要的給予命名，使它具有理論發展中概念性的地位，作為一個概念，範疇是一個工具，成為可以被處理、分析的對象。Strauss 稱之為「in vivo concepts」，是質化研究方法裡由當事人眼光來看社會現象的具體作法；

(iii) 找出「核心範疇」(core category)：每個範疇都有它所呈現的不同，是為面向 (dimensions)，也有它的所屬的特徵 (properties)，這些面向、特徵是紮根理論中的構成成分。此核心範疇就成為研究報告的主題，凝聚其他範疇關係。

(iv) 摘寫備忘錄：此為「綜合」的過程：

- a) 研究者對資料的回應；
- b) 研究者對資料加以理論性的瞭解；
- c) 下一步驟採取的思路過程；
- d) 研究中各階段的研究設計；

(v) 排列備忘錄：研究者從分析回到綜合，貫穿於整個研究之中，最後由個別主題的備忘錄轉到更有系統，顧及資料全面的寫作。

2.7.4. 描述

由於質的研究強調研究的結論，必須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性情境化的描述。細心閱讀經濃縮資料，進行登錄，尋找概念；尋找意義；撰寫備忘錄，加以悉心編排，分為三個範疇；國際、中國、香港。描述成為一份可供分析的文本。換言之，全文論文在不斷分析、整合、歸納、反覆思考和比較與寫作中完

成，務求達到既有社會實況也有理論的學術文章。

2.7.5. 核心範疇

以法為本體的範疇，包括：

- a) 中心範疇：權利、義務；法律行為、法律關係
- b) 指稱範疇：立法背景、立法的目的、立法的意義、立法內容的特點、調解制度、法律框架。

2.7.6. 操作程序及方法

對資料進行逐級編碼是紮根理論中重要的一環，其中包括三個級別編碼，其作法及任務分別如下：

表 22：各級編碼的作法及任務

編碼級別	作 法	任 務
(1) 開放性編碼 (一級編碼)	對於資料分析，所出現的任何可以編碼的片語或段落於予概念性標籤。	發掘範疇
(2) 主軸編碼 (二級編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發展範疇的性質和面向，使範疇更為密實；▪ 重新閱讀前面文獻資料的描述，尋找和這些主要範疇有關的段落和篇制，加以編碼作為這些主要範疇的屬性或面向。	發展主要的範疇

(3) 選擇性編碼 (三級編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主要的範疇發展得差不多，範疇與範疇之間的關係可能逐漸浮現； 系統地開始處理範疇之間的關連。 	找出核心範疇，進入統合的步驟。
---------------------	---	-----------------

紮根理論編碼的操作程序，並非機械式地進行、刻板地依樣畫葫蘆。本文配合研究議題的特質和需要，沿用學者的指點，按以下幾個規律進行編碼：

(i) 這三種分析之間的界線人為的，所以為使紮根理論的研究可信度高，必須在分析過程中，保持創造性、嚴謹、持續性、理論觸覺四者之間的平衡；(徐宗國，2005)

(ii) 在紮根理論研究法的研究過程中，並非先做完開放性編碼，然後再做主軸編碼，最後再做選擇性編碼。雖然這三種編碼程序確實有先後次序，但它們其實是交錯進行的；(齊力、林本炫，2006) 撰擇編碼與主軸編碼差別不大，選擇編碼的分析層次更抽象而已；(陳向明，2005)

(iii) 紮根理論研究方法是一項由人的經驗開始，也回歸人的生活經驗的探索過程。本文研究主題來自人類生活養老問題的經驗觀察，也要將此建構的理論應用於具體問題的解決，因為理論的貢獻就在於此；(齊力、林本炫，2006)

(iv) 這套編碼程序中的很多具體步驟和技巧與一般質的研究所用的編碼

方式之間存在類似之處，其主要的不同在於，當這些編碼技術用於紮根理論這一特殊研究方法時，具有十分強烈的建構理論目的；(同上)

2.7.7. 條件矩陣

如何把前面各章已分析好的資料統攝起，面對很大的挑戰。紮根理論研究方法用編碼典範來分析社會情境，而行動/互動是這個典範的核心。為了有助增進理論觸覺，周全思考與研究現象有關的各種狀況；為了讓我能區分並聯結條件和結果的各種層次。參考紮根理論始創者之一 Anselm Strauss 倡導的分析圖表條件矩陣（conditional matrix）方法（圖 16），按由外向內的層次，分為國際動態、國家行為、個別國家行為、香港社會老人居住與家庭養老情況、各界意見與互動狀況及行動策略概述本研究的條件矩陣一般性質：

圖 16：條件矩陣

表 23：條件矩陣一般性質

層次	範疇	事項
最外層	國際動態	國際社會關注全球老齡化問題，1982 年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在維也納召開，制定《維也納行動計劃》，之後十年，聯合國有關老齡問題的會議通過了《聯合國老年人原則》、《全球目標》、《世界老齡問題宣言》。2002 年第二次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在馬德里召開，通過了《政治宣言》和《馬德里行動計劃》。聯合國主要會議和各國首腦會和其他通過的文件也對推動老齡問題的政策框架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阿拉木圖宣言》、《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動綱領》、《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人居議程》、《伊斯坦布爾宣言》、《達喀爾行動綱領》、《澳門宣言》、《亞太老齡問題澳門行動計劃》、《關於社會發展的進一步倡議》、《聯合國千年宣言》、《上海執行策略》及《審查和評價〈上海執行策略〉的指導方針》等。

第二層	國家行為	<p>英國、德國早在 16 世紀以立法形式開展社會救濟活動，如 1601 年的《伊利沙白濟貧法》和德國公佈的世界第一部《年金法典》。20 世紀 70 年代前西方全面發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包括養老金、疾病和健康保險，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後發生經濟危機，對福利制度進行了調整和改革。</p> <p>世界各國或地區保障老年人權益立法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分散或包含在其他法律的老人政策，如英國、德國、澳洲、俄羅斯、韓國等、另一種是專門老年人立法保障模式，如新加坡、中國、印度。處於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地區和國家的贍養父母立法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響。東西方國家的家庭養老方式，各有特點，西方的家庭代際關係屬於「接力式」，東方社會的代際關係為「回饋式」。西方國家在「未老先富」的條件之下，有較健全的養老福利和退休制度，普遍認為養老更多的是國家責任而非子女責任；東方社會則認為贍養老人是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p>
第三層	個別國家行為	<p>中國</p> <p>中國在四千多年前（公元前 2070 年）的夏朝已有尊老敬老的立法制度，歷經奴隸制時期、封建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和社會主義社會，在不同階級統治之下，以「孝」為核心訂立不同類型的養老政策。儒家思想的孝主要分為「養親」、「敬親」、「安親」、「終身孝」四個涵意，彼此融滙貫通缺一不可。儒家思想對中國封建法律的影響，主要是體驗在封建時期儒家思想法律化，其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漢朝、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和唐朝。《唐律疏義》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成文法的典範，中華法系代表作，它和羅馬法、拿破崙民法典是並駕齊驅的三部具世界意義的重要法典。儒家核心價值的「孝道」，隨着《唐律》被移植到東南亞諸國，現代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新加坡、韓國、台灣的養老制度皆承傳中國傳統文化。新中國成立後，《憲法》、《婚姻法》、《繼承法》等都有贍養父母的規定，1996 年更通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範贍養父母的規定。調解制度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公元前 1046 年的西周已有「調人」制度，負責調解民間糾紛，尤其是家事鄰里之間的糾紛。側重情理為先的民間調解一直流傳至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就有由基層負責調解的規定。</p>

		<p>新加坡</p> <p>1995 年新加坡通過《贍養父母法案》，是世界上第一個以單行法規定子女贍養父母的法例。以引入調解制度實施調解為先的政策，成立贍養父母審裁處為減低對抗制訴訟給家庭成員帶來傷害。</p>
第四和第五層	香港養老制度概略及長者貧窮狀況	<p>60 年代至 70 年代是香港安老服務的萌芽和奠基。政府先後於 1965 年、1973 年、1979 年、1991 年發表白皮書：《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香港福利未來發展計劃》、《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 – 進入 80 年代的社會福利》、《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白皮書》。政府對養老的基本原則，供養父母的責任應首先在子女身上，政府只會協助那些沒有經濟能力的人。1998 年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監察政府落實各項安老政策和計劃。現時朝着家居照顧及持續方向改善安老政策，為了宣揚敬老愛老，推出一系列尊老護老的活動，如「老有所為」、「康健樂頤年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左鄰右里計劃」，成立「長者學苑」等。現時香港長者退休保障主要來自三大支柱：強積金計劃；高齡津貼及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香港老年人貧窮問題頗為嚴重，根據資料，全港 65 歲或以上長者的貧窮率為 26.5%。2006 年，長者貧窮率升至 35.9%。2005 年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發表了《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p>
第六層	香港老人居住與家庭養老情況	<p>根據統計處 2001 年 8 月至 10 月間進行的一項有關受供養父母特徵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約三成的 15 歲或以上人在統計期前 12 個月內有供養父母，按年齡組別分析，20 至 29 歲及 30 至 39 歲人士在統計前 12 個月內分別有 51% 及 50% 供養父母。從事經濟活動中，45% 在統計期前 12 個月內有供養父母。統計處於 2008 年抽樣訪問一萬個住戶，瞭解有關長者的經濟家庭特徵，成功訪問率為 75%，推算出有 112.9 萬名 60 歲以上的長者與家庭同住，另有 5.8 萬名長者居於院舍。</p>

第七層	各界意見及互動狀況	立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各界有不同的意見，從正面來講，紓緩政府開支；仿效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提倡孝道，創建和諧家庭；把家庭養老制度化；令香港養老制度更趨完善；為保障長者權益添一支柱；提升長者晚年生活的安全感等。當然也有負面的勁能，如：訴訟引致成員之間感情破裂；打官司破壞跨代共融；長者難以接受與子女對簿公堂；產生不良的標籤作用；必須顧及長者的顏面問題等。政府於 1998 年派三人小組到新加坡考察立法強制供養父母有關的問題。若建議立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會不會得到各界的支持？受眾（長者）又如何看法？必須透過指導、討論、辯論、徵詢、試行、檢討，才能取得共識。
最內層	行動策略	制定法律框架雛型，交由專家評證，選擇典型的真實個案進行試行分析，強調必須設立瞻養父母審裁處，以配合切實的需要；引入調解制度，在進入法律訴訟程序前啟動調解機制，協助爭議雙方協商和解，儘量減低對家庭成員做成的傷害。立法必須經過嚴密的程序，需時甚久。建議政府在未立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之前，仿效家事調解的制度落實推行瞻養父母調解先導計劃，計劃可委託非政府組織承辦。最終達到建立「瞻養調解前置機制」。

2.7.8. 編碼

2.7.8.1. 開放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是將蒐集到的一手資料，將內容進一步概念化予以分析，透過發現概念，將資料打散成獨立部份之後，再詳細檢驗和比較其異同，把大量的資料濃縮成不同的類別。

本研究運用實境編碼的方式，將所有資料經逐段、逐篇分析及概念化後，

共得出 516 個片語、段落和篇則，進行歸納、濃縮、比較、整合後，予以概念性標籤，發掘範疇。開放性編碼與情境說明如表 24 所示。

表 24：開放性編碼與情境說明

範 疇	開放性編碼	情境說明
1. 國際	1.1. 聯合國對全球老齡化問題建立的指導性目標	聯合國於 1956 年發表《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後，世界性老齡化問題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聯合國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先後於 1982 年和 2002 年召開。制定行動計劃和發表綱領性的宣言、文獻等，呼籲各國做好養老工作並認真看待老年人權益問題，實施法制化保護的重要性，當務之急就是如何供養老人；強調老人應受家庭和社區的照顧和保護；重視長者權益，世界各國都應有敬老護老行動，促進社會和諧有助穩定經濟發展。1994 年世界銀行出版《防止老齡危機——保護老年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向各國政府推薦建立公共養老金、強制性養老金和自願性養老金三支柱養老保障形式。2005 年發表報告《21 世紀老年人支援：關於養老金及其改革的國際觀察》，建議由三支柱擴展到五支柱政策建議，包括「零方案」和建立在家庭和代際基礎上的非正規保障形式。
	1.2.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及其對養老政策的影響	人類受惠於科學發明、醫療進步，壽命得以增長，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推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人們追求高水平教育、婦女紛紛投入生產市場、節育知識的提高、對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的改觀，長壽低生育等因素，構成人口老齡化的要素。西方發達國家在「先富後老」的優厚環境之下，實行「由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建立較完善的養老制度。1973 年經濟危機發生之發，西方國家面臨巨大的經濟挑戰，不得不走向改革的制度，包括削減福利開支、實行跨代養老制度、延長退休年齡等。

2. 世界各國	2.1. 近代各國對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立法概況	<p>世界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把老年人權益保障的規定分散在其他相關法律，老年人同其他群體一併受到某個法律規範的保障；多數屬於公共政策或社會福利，如英國《國民保險法（1946）》、美國《社會保障法（1935）》等。另一種是專門立法，如美國《老年人法（1965）》、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65）》、中國《老年權益保障法（1966）》、印度《老年人法案（2007）》等。專門為老年人立法的國家或地區並不算多，西方來講多數都是較發達的國家，亞洲大多數處於儒家文化圈，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有着「行孝」的意念。</p>
	2.2. 各國家庭養老的情況	<p>無論東西方社會，家庭都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要發揮着重要的支援作用，與國家老年福利制度配合，共同構成老年人保障制度，兩種制度都存在宣傳子女孝順父母、贍養父母的道德禮儀或宗教信仰等養老文化。伴隨着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影響，東西方社會都經歷了家庭功能的削弱，家庭結構逐步核心化，從合居養老向分居養老轉變，婦女傳統照顧者角色遭遇挑戰。東西方社會也存在家庭養老方式的不同，主要是體驗在養老文化、養老居住、家庭贍養的功能、贍養提供者等。亞洲儒家文化圈的國家或地區受儒家孝道熏陶或經濟能力不足（除日本），家庭養老仍佔重要地位。國際社會認同強化家庭養老功能，《聯合國老年人原則》強調老年人應受家庭、社區的照顧和保護。</p>
3. 個別國家和地區	3.1. 中國國家的產生和法律起源的特點	<p>中國古代社會，由原始群到氏族習慣、母系氏族習慣向父系氏族習慣，由父系氏族習慣向奴隸制轉變，經過數十萬年的演進，其中以父權制社會的習慣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父權制促進了等級社會的萌芽和發展，成為奴隸習慣法和法律的淵源。中國法律起源特點，主要有禮法結合、貴族宗法統治、維護專制王權、民刑不分等。禮法結合對中國歷代法制產生深遠的影響，具有等級制特徵的「禮」，成為一種政治法律制度，以被稱為封建法律典範的《唐律》為例，以禮作為立法依據，與家庭倫理相關的</p>

		立法制度包括：親屬相隱、存留養親、不孝罪都構成中國法律所獨具的特色。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家族與宗族制度，形成父權與君權一脈相承，互為表裡，嚴密以孝為中心的宗法倫理得以使封建專制統治長治久安，孝道穩定了家庭生活秩序，也穩固了封建專制統治秩序。
	3.2. 中國歷代有關尊老養老的法律與制度	中國在公元前 2070 年已建立養老制度，歷代的養老制度可以概括 10 個共同點：(1) 就不孝罪立法；(2) 養老制度與教育制度相結合；(3) 無論哪一個民族當權執政都重視養老政策；(4) 以宴會、物質贈予長者以示尊敬；(5) 以榮譽旌表彰顯長者，提升長者社會地位；(6) 設立養老機構；(7) 建立退休制度；(8) 給予長者刑事寬免；(9) 國家主導養老政策；(10) 敬老養老制度化。中國歷代養老制度都具有使家庭和諧、社會祥和、政治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意義，當然立法的内容、宗旨、技術、實施的手段和方法等，必須以現代的政治角度嚴加審視，其中尤其是「不孝罪」最受非議和批判。
	3.3. 儒家的孝道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孝」是儒家思想的最基本規範，與「親親、尊尊」是相一致的。其具體內容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其中的慈是父母而言，「孝」是對子女而言，可見最初的家庭倫理是雙向的，對父母和子女分別課以不同的道德義務，到了戰國末期，韓非把「父慈子孝」這一規範絕對化和片面化，免除父母仁愛的義務，強調是管教和統領（尤其是父權）的地位。漢代的董仲舒創立的「三綱五常」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後，「子孝」的要求得到進一步強化，「父慈」的內容逐漸減弱，「父為子綱」強調子女對父母絕對服從，是封建宗法家長制強化的體驗。由漢朝武帝開始，儒家孝道對內要求「親親」完全是上對下，幼對長的尊親；對外要求「尊尊」，即尊重封建社會制度之特定人物，平民和奴隸必須服從奴隸主貴族，下級貴族服從上級貴族，所有貴族服從天子，通過「移孝作忠」，傳統的「孝」與「忠」結合，「孝」成為統治者的工具，宣揚「以孝治天下」，標緻「忠孝一本」思想的形成。

		<p>經過不同朝代的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演進，傳統孝道轉化為封建倫理的一個重要標誌。</p> <p>「孝」跨越政壇達四千多年之久，由純樸人類本性轉化為不具血肉之軀的統攝者，不斷受到後世的批判。到了清末「禮法之爭」，西學東漸，人們從法律陣痛中甦醒過來，「孝」逐漸重返家庭倫理的崗位上，展現其純樸的角色，在華人社區的現代被視為是促進家庭和諧、穩定社會的瑰寶。</p>
	3.4. 新中國有關瞻養父母法律的發展	<p>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法制建設經歷了曲折的發展，直到確立改革開放的國策之後，才逐漸走向正軌。1982 年的第四部《憲法》為標誌，有關老年人瞻養與權益保障的法律開始逐漸形成一個體系。但最早開創新中國子女瞻養父母先河的是 1950 年的《婚姻法》。1986 年的《民法通則》，1997 年修訂的《刑法》等都有關瞻養父母立法的規定。1995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以憲法為根據，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國情出發，與其他有關法律銜接，重點突出老年人需要特別保護的權益。同時，注意汲取國外「福利國家」的經驗教訓，保持中國家庭養老的傳統和特點。</p>
	3.5. 新加坡《瞻養父母法案》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比較	<p>選取世界上最早用單行法規定了子女瞻養父母的法例，新加坡《瞻養父母法案（1995）》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比較兩部法案出台的背景、立法內容、法律特點、法律實施、立法意義，供香港借鑒。雖然兩部法律各具特點，但兩者也有許多共同點。從出台背景來說都是以儒家孝道紮根於社會文化之中，子女瞻養父母被視為當然的義務；內容方面雖然有較大的差異，但兩者皆引入調解制度以減低對抗制的民事訴訟給當事人帶來的傷害。法律實施方面，因為新加坡運用單獨的法規闡明瞻養父母的條文，操作性較強，每年都有公佈數字供參考。中國多個部門法規都有瞻養父母的規定，《老年法》獨立請求權的基礎不多，難以確實數據作進一步分析。從意義上講，都將對老年父母的瞻養納入</p>

		<p>法律調整的範圍，有利於借助法律強制性來維護老年人的基本權益。通過法律調整，有助於明確老年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其權益範圍以及權利的強制執行方法，這些都是道德約束所不具備的，兩部法律的出台，都有助於家事法律體系的完善。</p>
<p>4. 香港地區</p>	<p>4.1. 香港安老理念及政策進程</p>	<p>香港「家庭養老」制度最早出現於 1965 年政府發表的第一部白皮書《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當時政府視照顧老人是個人或家庭的責任。到了 70 年代，香港在工業化推動下，家庭結構產生極大的轉變，80 年代初，香港步入老齡化社會。政府在 1973 年發表的《香港福利未來發展計劃》白皮書引入「家庭照顧」（社區照顧）模式，但子女贍養父母責任的基本原則並沒有改變，也沒有一套「養老」的全盤計劃，長者或其子女遇到贍養困難只當作個案處理，政府角色完全處於被動。1995 年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主體法例，為退休保障政策規劃化奠下基礎。回歸之後，以「老有所養」作為治港方針之一，如何「養」？誰負責養？只是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缺乏具體化和整體化，未見有長遠的目標。</p>
	<p>4.2. 現時香港退休保障制度</p>	<p>現時香港長者經濟援助的三大支柱：</p> <p>(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不難發現其不足之處， (1) 遠水不能救近火；(2) 捉襟見肘；(3) 欠缺全面；</p> <p>(二) 社會保障：(1) 沒有針對老人社群的需要而制定長遠政策；(2) 受稅基狹窄，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制肘，政府是否能負擔得起日益龐大的福利開支；(3) 長者回鄉養老已實行了 13 年，成效如何未曾檢討，將來的目標欠奉，引起各界批評；</p> <p>(三) 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1) 今天的長者普遍是經濟起飛前渡過歲月，當時工作常態是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難以有很多積蓄，何況一半以上的婦女，早年的就業率不高，大多數是家庭主婦；(2) 滙率波動、幣值不穩、外圍因素影響，雷曼事件暴露投資潛在</p>

		<p>的危機，有不少長者把錢存入銀行作為定期存款，收取利息維生，但近年銀行利息偏低，還要面對通脹侵蝕，長者愁對「坐食山崩」之苦；(3) 香港只有少數的人享有年金制度。</p>
	4.3. 家庭養老的內涵和實踐	<p>香港面對人口結構的轉變，核心家庭普遍化、婦女外出工作的趨勢，難以重回「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的昔日的家庭觀念。根據統計處 2008 年資料推算，有 112.9 萬名 60 歲以上的長者與家人同住，另有 5.8 萬名長者居於院舍，那麼老年人在家中的角色和地位又是如何？根據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1996 年進行的調查顯示，現今長者不再是一家之主，在社會上雖仍被視為尊敬的對象，但不再有崇高地位。長者的角色多限於一些家庭事務，他們雖有參與社會事務之心，但年輕一代不覺得他們在這方面會有積極貢獻。</p>
	4.4. 香港立法贍養父母過往的討論	<p>古今中外家庭在孕育人類繁衍、扶老携幼、生活安全感、精神慰藉等作用，是沒有其他功能可以取代；贊成香港應透過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人士，認為用現代文明制度和生活文化的角度，重塑「孝道」，使照料老人的責任能在個人、家庭、社區、政府組織和政府間取得合理分擔。不同意規範立法要求子女贍父母的人士擔心會激化家庭矛盾，破壞血緣紐帶關係。</p>
	4.5. 香港贍養父母立法的契機	<p>經濟和社會隨時勢不斷轉變，香港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老年貧困人口的數目快速增長，使到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處於世紀機遇和養老問題相互交錯的十字路口。香港固有的家庭養老政策和社會風氣，現仍存在，根據統計有一半以上的人士贊成供養父母。</p> <p>西方福利國家經濟危機的啟示，儒家文化圈地區的立法贍養父母行為，值得香港反省。在稅基狹窄，《基本法》量入為出的規定，是否能夠負擔龐大的財政開支。香港政府於 1998 年曾委派三人小組到新加坡考察立法強制供養父母有關議題，可見政府已注視</p>

		這個透過立法要求子女贍養父母的可行性；2005 年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發表《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當中有許多建議值得借鑒。
--	--	--

2.7.8.2. 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的目的是將概念化後的資料，在類別與類別之間相互關聯，是處理資料的第二道步驟，務求使到現象有更精密的解析方式。主軸編碼的過程，必需延續不斷比較；經過分析和歸納而完成。主要的任務發掘範疇的性質和面向，使範疇更為密實，重新閱讀前面文獻資料的描述，尋找和這些主要範疇的段落和篇則，加以編碼作為這些主要範疇和面向。本文是以法為本體的範疇，中心範疇是權利和義務。在主軸編號的質化資料中，把核心主題關聯性類別，逐一挑出，建構起範疇間關聯性的脈絡，把早前所得出的 516 編碼，進入統合步驟得出 15 個核心範疇，如表 25。

表 25：主軸編碼

核心範疇	說明	開放編碼
1. 世界老齡大會呼籲各國實施法制化做好養老工作	國際社會公認經濟保障是老年人生活基礎，在世界性人口老齡化影響之下，如何供養老年人是各國當務之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維也納行動計劃》 • 《維也納行動計劃》後續行動 • 《聯合國老年人原則》 • 《聯合國千年宣言》 • 《政治宣言》 • 《馬德里行動計劃》 • 《亞洲及太平洋老齡問題澳門行動計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上海行動策略》 • 《審查和評價〈上海策略〉的指導方針》
2. 各國在家庭和代際基礎上建立非正式養老模式	家庭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要發揮着重要的支援作用，與國家福利政策配合，共同構成老年人保障制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防止老齡危機——保護老年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 • 《21 世紀老年人支援：關於養老金及其改革的國際觀察》 • 非正式養老模式（非正式制度安排） • 正式養老模式（正式制度安排） • 家庭養老 • 居家養老（社區照顧）
3. 西方「由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經不起經濟危機考驗	西方國家面對經濟危機而進行福利制度改革，採取增收節支措施，縮減社會保障開支，對現收現付的國家保險型福利制度進行結構性調整，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情況 • 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情況 • 20 世紀 70 年代前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 •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發展歷程 •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功能 • 福利國家的經濟危機 • 20 世紀 70 年代後的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改革 • 改革概況 • 改革啟示
4. 東西方國家運用法律行為規範子女履行贍養父母的責任	政府介入透過立法促使個人、家庭、組織、政府共同履行供養老人義務的法律關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各個國家和地區對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立法情況 • 世界各國規範養老的立法方式 • 近代各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特徵 • 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 • 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 印度《老年人法案（2008）》
5. 國際社會認同強化家庭養老的功能	家庭具有物質及情緒支持，延續勞動力及社教功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維也納行動計劃》 • 《聯合國老年人原則》 • 《全球目標》 • 《上海執行策略》 • 《馬德里行動計劃》 • 《21 世紀老年人支援：關於養老金及

		<p>其改革的國際觀察》</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家庭養老 • 家居養老（社區照顧）
6. 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都以子女孝順父母為核心思想	東西方社會都經歷了家庭養老功能的削弱，家庭結構逐步核心化，但家庭養老在亞洲地區仍佔重要地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家庭養老的形成與特點 • 西方國家家庭養老的特點 • 亞洲地區家庭養老的特點和轉變 • 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比較 • 《聖經》 • 《四書五經》 • 古代家庭和現代家庭主要功能的異同
7. 儒家的孝道核心思想是「善養」、「能養」	儒家「孝」的主要涵意包括：「養親」、「敬親」、「安親」和「終身養」。最初的孝是以父慈子孝闡明父母和子女分別課以不同的道德義務，後經歷代的儒家思想法律化，統治者「以孝治天下」，「孝」成為政治工具，使到中國古代歷經千多年的長治久安、社會穩定、家庭和諧的局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國古代歷朝尊老養老的法律與制度 • 儒家的孝道思想內容 • 儒家思想法律化及孝道對中國封建立法的影響 •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遠因 •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過程 • 漢代法律儒家化的內容 •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儒家化的內容 • 唐朝完成法律儒家化的過程 • 唐律起承前啟後的作用及對後世的影響 • 中國古代調解制度與情理法
8. 以現代法治文明和生活方式重塑「孝道」	用現代角度審視孝道，不偏頗儒家文化的傳承，也不站在西方個人主義的立場，走的是社會現實道路來重塑孝道，加以發揚光大、潤育後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禮法之爭 • 父權制法的維護下傳統家庭與現家庭比較 • 傳統孝道和現代孝道的對應特徵 • 儒家孝道的思想內容
9. 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單行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	新加坡《贍養法》與《婦女憲章》一樣，有助於家事法體系的完善，構成對家庭中弱勢群體的全面保護。修訂案擴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立法背景 • 新加坡儒家思想傳統 • 立法內容 • 直接與贍養法令相關制度 • 贍養審裁處的成立及其他配套

	<p>瞻養父母專員的權力，運用調解制度在啟動訴訟程序前先調解，減低對抗制訴訟對家庭成員造成的傷害。</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最低道德義務法律化 • 立法的意義 • 法律的實施 • 調解為先的制度 • 2010 年 11 月 23 日通過的修定案
<p>10. 中國以嶄新的手法制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p>	<p>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老齡化問題較嚴重的國家，新中國建國後，雖然以《憲法》為核心的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法律已零星出現於各部門之中，如《婚姻法》、《繼承法》、《民事通則》、《刑法》、《勞動法》，條文簡略難以操作，有必要制定一部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專門立法。</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立法背景及必要性 • 立法內容 • 家庭瞻養與扶養 • 立法意義 • 法律的獨立請求權低 • 精神瞻養的空泛 • 調解制度
<p>11. 香港養老政策的歷程</p>	<p>香港政府對養老的基本原則，一向認為供養父母的責任應首先在子女身上，政府只會協助那些沒有經濟能力的人士。</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0 年代至 70 年代是安老服務的萌芽和奠基 • 8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安老服務的招展 • 特區政府的安老理念及政策 • 《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 • 《香港福利未來發展計劃》 • 《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進入 80 年代的社會福利》 • 《跨越 90 年代——香港社會白皮書》 • 1997 年施政報告中的「老有所養」 • 安老事務委員會
<p>12. 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缺陷</p>	<p>香港在英國百年統治之下，既沒有制定完善的退休制度，也沒有較長遠的養老政策。養老模式在非正式制度安排和正式制度安排的夾縫中</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老年人口的特徵 • 香港家庭的變遷 • 香港稅基狹窄，《基本法》規定量入為出的政策 • 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啟示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p>蝸行。政府聲稱具有世銀倡議的三大養老支柱，相比其內容卻相差甚遠，更遑論五大支柱。</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社會保障 • 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 • 香港固有的家庭養老政策 • 老年人貧窮問題 • 子女供養父母的情況 • 老年人的角色和地位
<p>13. 香港各界對立法要求子女贍養父母持不同意見</p>	<p>學者和坊間討論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問題時，大多數持贊同的意見，即使持反對意見者，亦認為需要加強教育，要求年輕一代孝敬父母。其中有一點是大家共同的憂慮是，長者難以接受與子女對簿公堂的情景，既傷感情也有損尊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98 年 6 月 14 日《蘋果日報》的調查 • 1998 年《明報》羅致光的意見 • 1998 年《信報》鍾劍華的〈強制供養父母有何不可？〉 • 1998 年《信報》緋雲的〈養老模式與安老政策〉 • 1999 年《松柏之聲》第三期的〈若要強制執行，倒不如加以教育〉 • 2006 年《文滙報社評》的〈從道德和法律層面強化家庭倫理〉 • 2006 年《文滙報論壇》胡志偉的〈強化家庭、人人有責〉
<p>14. 香港政府在處理養老問題上態度曖昧</p>	<p>特區政府難以擺脫受英國統治下「半西不中」的現實環境，也沒有決心建立市民對家庭觀念的價值觀，在各項養老政策只是受了政黨壓力下做些修修補補的短線工作，毫無長遠目標及持續發展可言。過往雖然做了些調查或考察，卻不見「學以致用」、「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許多過時法例也沒有適時檢討，白白失去許多商機並蹉跎光陰。</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98 年派三人小組往新加坡考察贍養父母法 • 2005 年立法會進行《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研究 • 長者回鄉養老計劃 • 高齡津貼

15. 立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必須先解決現時法律的弱點	鑒於父母子女之間特別親屬關係，道德義務法律化可能會破壞家庭和諧，從而動搖家庭的穩定性。香港畢竟是華人社會，中華傳統思想的「家醜不外揚」影響，亦深深植根於家庭文化中。立法的内容建議引入調解制度和設立特別的瞻養父母審裁處以補救法律的弱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瞻養父母法案》 • 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 2008 年 4 月香改實行調解為先制度 • 香港的家事法調解制度 • 律政司《調解工作小組報告》 • 法律改革委員會《排解家庭糾紛程序》 • 中國古代調解制度與情理法
-----------------------------------	---	---

2.7.8.3. 選擇性編碼

經過多年與資料共舞，是時候把分析資料過程中得出的豐富材料統合起來，心情既興奮又疑惑，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語：我研究些什麼？什麼結果？如何去統合所有的範疇，建構紮根理論？為了完成這些目標，需要幾種步驟。首先用搜集來的資料以及由開發出的範疇、關係等等，來思考一個可以扼要說明全部現象的核心，稱之為故事線（story line）。

Strauss 曾授以六道步驟。（徐宗國，2005）參閱了六道次序之後仍然感到困惑。回過頭去重溫選擇編碼時運用的典範模型：（A）因果條件（多數）→（B）現象→（C）脈絡 →（D）中介條件（多數）→（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多數）→（F）結果（多數），再次借助條件矩陣的功能，促進理論、系統地思考後得

出五個選擇性編碼。

表 26：選擇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	說明	主軸編碼
香港應完善保障長者權益法律體系	香港現時養老政策正徘徊於十字路口，政府應下定決心，仿效各國透過立法行為達到完善多元化的養老目的，給予保障長者生活的規定予以具體化、法制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世界老齡大會呼籲各國實施法制化做好養老工作 西方「由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經不起經濟危機考驗 東西方國家運用法律行為規範子女履行贍養父母的責任 香港政府在處理養老問題上態度曖昧 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單行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 中國以斬新的手法制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欲強化家庭養老功能必先重塑孝道	中華民族傳統的孝道能使到中國古代社會長治久安、穩定社會，也受過不少非議和批判，欲強化家庭養老功能，必須彰顯孝道，弘揚敬老文化，從回顧原義時作出反思，加以回應並借此為鑒，用現代的文明法治和生活習慣角度重塑孝道。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各國在家庭和代際基礎上建立非正式養老模式 國際社會認同強化家庭養老的功能 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都以子女照料父母為核心思想 儒家的孝道核心思想是「善養」、「能養」 以現代法治文明和生活方式重塑「孝道」 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單行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 中國以斬新的手法制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為長者生活保障增添一支柱	香港人口老化給公共財政帶來沉重壓力，稅基狹窄，《基本法》量入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各國在家庭和代際基礎上建立非正式養老模式 世界老齡大會呼籲各國實施法制化做

	<p>出的政策，未來政府實難以應付龐大的福利開支。現時退休保障存在許多缺陷，必須完善多支柱的養老服務，以民事立法規定子女瞻養父母，為長者生活增加一支柱。</p>	<p>好養老工作</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瞻養父母法案（1996）》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單行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 • 中國以斬新的手法制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 香港養老政策的歷程 • 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缺陷 • 香港各界對立法要求子女瞻養父母持不同意見 • 香港政府在處理養老問題上態度曖昧
闡明立法背景、目的、意義和建構框架	<p>完善家事法律體系，現時香港側重保護家中的妻子及兒童，老年父母成為家庭中的弱勢群體，在相當長時間老年人權益被邊緣化，通過法律調整關係，有助於明確老年人的法律地位，這些都是道德約束所不具備的。</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世界老齡大會呼籲各國實施法制化做好養老工作 • 新加坡《瞻養父母法案（1995）》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單行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 • 中國以斬新的手法制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如何補救法律未能解決的血緣親情問題	<p>鑒於父母子女之間血緣親情關係，道德義務法律化可能會破壞家庭和諧，從而動搖家庭的穩定性。香港畢竟是華人居多的社會，中國傳統思想「家醜不可外揚」影響，已植根於家庭文化中。立法的内容應引入調解制度和設立特別瞻養父母審裁處以補救對抗制訴訟帶來的後遺症。</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瞻養父母法案（1995）》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單行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 • 中國以斬新的手法制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 • 立法規範子女瞻養父母必須先解決現時法律的弱點

2.8. 建構理論

本文立基在質性研究中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紮根理論特別強調從資料中提升理論，強調重點放在建構「實質理論」，認為只有通過對資料深入的分析，理論框架才能逐步形成。本文沒有事先的假設，是自下而上的不斷將原始資料歸納、濃縮、比較、分析；從大量的事實經驗基礎上探討理論依據(圖 17)。為着達到建立高密度的理論，我在演進過程中保持創造性、嚴謹性、持續性、理論觸覺四者之間的平衡。把資料進行細緻的編碼、建構理論。最後在所有類屬關係都建立起來以後，本文在選擇性編碼過程中將核心類屬定為法為本體的「香港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建構和策略」，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對原始資料作進一步分析後，建立了兩個議題：

- (1) 香港應透過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建議框架；
- (2) 引入調解制度補救對抗制訴訟的弱點。

按以上兩個議題，以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為藍本，編譯創建一套以調解為先解決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初步法律框架。

圖 17：研究方法流程

第六章 創建框架及個案試行分析

本文立基於社會學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與法律社會學相關基礎理論的研究方法有機地結合，從原始資料出發，通過歸納分析逐步產生理論。本文研究的主題是香港應否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由於沒有先例，必須借鑒外國經驗，需要收集大量與議題匹配的文獻，包括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策略；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的概況；各國保障老年權益的法律規定；中國古代養老制度和現代贍養父母法律的發展，儒家孝道對養老制度的影響；香港安老政策相關文獻。經過細心分析後濃縮資料，進行登錄及建立概念，利用編碼找出軸心類屬，鋪砌出本文的故事線，從而建立理論建構的雛型。

1. 香港應透過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

1.1. 立法的背景

根據 2010 年 7 月 30 日香港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字，30 年後香港 65 歲以上長者人口佔整體人口比例將由現時的 13% 升至 28%。料屆時男性平均壽命達 83.7 歲，女性更達 90.1 歲。撫養比率較現時每千人供養 337 名上升至 625 名。現時香港的長者保障制度存在許多缺陷和漏洞，未能給長者提供足夠的、可承受和可持續的經濟支持，必須完善多支柱的養老制度。參考國際社會老年保障制度改革的經驗，各國贍養父母立法的實例，配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建議增加

一個老年人贍養的途徑，以民事立法規定子女必須贍養父母，調整的對象是家庭內部子女對父母必須盡最低限度的物質贍養義務；至於精神贍養方面從中國《老年法》實踐經驗所得，相關的法例難以執行，因而忽略這項規定，建議作為宣傳教育層面的社會政策。

1.2. 立法的目的

聯合國世界老齡大會呼籲各國實施強制化做好養老工作以應對全球性老齡化問題，認同必須強化家庭養老功能；香港應借鑒東西方國家運用法律行為規範子女履行贍養父母的責任，仿效處於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制定一套單一的、清晰的、完善的贍養父母法例，保障沒有能力供養自己的長者；讓市民更能掌握法律的依據，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最低道德義務的法律化將促進家庭贍養的可執行性，成立贍養父母審裁處，保障贍養令的獲得；道德義務雖然具有自發性，但同時具有不確定性，而法律義務內容的確定性的特點，將為老年父母的贍養提供法律上的預測力，這對降低老年父母生活的風險，提供另一個法律層次的贍養來源有著重要意義；立法有助於香港家事法體系的完善，構成對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的全面保障。

1.3. 立法的意義

建議引入調解制度作為補救法律未能解決的血緣親情糾紛問題，在啟動法律程序前為當事人雙方安排調解會議，尋求共識和修和；達到「和諧」、「和為貴」的崇高目標；法律只允許確實沒有能力供養自己的 65 歲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提出申請贍養令；法律賦予子女有權利先就供養家庭成員的所有開銷後視乎能力所及而供養父母；供養的數目必須只是合理的生活費及基本醫療費。闡明法律不單止要求給予長者的物質供養，背後的意義是同時給予長者精神上的支持；長者如果未曾盡照顧子女的責任將成為影響獲得贍養令的重要考量；立法只是制定最低的道德標準，懲罰少數的違反者；立法背後重大的精神和意義是公民教育，一旦法律通過，鼓勵全民透過不同形式去認識贍養父母的立法宗旨和意義，從而達到社會和諧、家庭融洽的目的，彰顯孝道，弘揚敬老愛老的良好社會風氣。

1.4. 建議法律框架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運用紮根理論研究方法的操作程序，從原始資料開始，經不斷比較、歸納、分析、整合、統攝；運用分析條件矩陣，通過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及選擇性編碼各程序，當進入選擇性編碼過程中將核心類屬定為法為本體的「香港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建構和策略，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對

原始資料作再進一步分析後，得出兩個議題：「香港應透過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建議框架」以及「引入調解制度補救對抗性訴訟的弱點」。框架必須有實質的建議，即設計具有法律條文的法律框架，在香港沒有先例下，採納了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1995）》的藍本，編譯一套以調解為先解決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初步法律框架。

贍養父母條例（雛型）：

本條例旨在就管限子女贍養父母訴訟方面的法律，和就贍養父母訴訟及相關事宜定立條文。〔20 年 月 日〕201 年第 號 法律公告

目錄

- 1.4.1 簡稱
- 1.4.2 釋義
- 1.4.3 贍養父母審裁處的設立
- 1.4.4 贍養令的申請
- 1.4.5 應訴人連帶方
- 1.4.6 贍養命令
- 1.4.7 審裁處命令為贍養提供擔保的權力
- 1.4.8 贍養令的期限

- 1.4.9 審裁處變更或撤銷贍養命令的權力
- 1.4.10 禁止讓與贍養利益
- 1.4.11 贍養命令的執行
- 1.4.12 喪失能力的申請人
- 1.4.13 任命贍養父母專員
- 1.4.14 贍養父母審裁處的組成
- 1.4.15 審裁處對申訴的聆訊及裁決
- 1.4.16 審裁處或專員所要求的資料
- 1.4.17 藐視法庭
- 1.4.18 審裁處提請特別案件要求高等法院裁決的權力
- 1.4.19 高等法院可審議審裁訴訟程序
- 1.4.20 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 1.4.21 訴訟費用
- 1.4.22 行政長官修訂附表的權力

1.4.1. 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贍養父母條例》。

1.4.2. 釋義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申請人 (Applicant)」包括按本條例的規定，已頒贍養令所針對的個人；

「獲批准的個人或組織 (Approved person or organisation)」指按本條例的目的已經獲得專員書面批准的個人或組織；

「子女 (Child)」包括非婚生子女、有法定地位的收養子女及繼子女、不包括義子女（俗稱乾子女）；

「應訴人 (Respondent)」包括按本條例的規定，已頒贍養令所針對的個人；

「專員 (Commissioner)」指根據第 13 條任命的贍養父母專員，包括副贍養父母專員，助理贍養父母專員；

「審裁處 (Tribunal)」指根據第 3 條設立的贍養父母審裁處。

1.4.3. 贍養父母審裁處的設立

現設立一個名為贍養父母審裁處的審裁處，該審裁處是一所紀錄法庭。

1.4.4. 贍養令的申請

- (1) 任何香港的永久居民，其年歲已達 65 歲或 65 歲以上，沒有能力足夠地供養自己者（在本條文中所指的父母）皆可向審裁處申請命令，要求其一或多個子女按月或按期或一次性支付一整筆款項以作贍養父

母之用。

- (2) 獲批准的個人或組織，如在照顧父母，可以向審裁處申請命令，要求其一個或多個子女付給該個人或組織按月或按期或一次性支付一整筆款項以作支付贍養該父母之費用和開支。
- (3) 如任何人在此條例下提出申請，不管是代表自己或者代表父母，而如果該項申請是一項之前從沒有在此條例下提出過的申請，該申請人應在提出申請前將該項申請提交專員為施行根據第 13（5）條的覆核（review）。
- (4) 如父母已經不在獲批准的個人或組織的照顧下，任何按月或按期或一次性所支付的款項的剩餘款項，將以信託形式代該父母持有。
- (5) 就這條款而言，父母沒有能力足夠地供養自己是指他的整體或預期的收入和其他經濟來源不足夠支付他的基本生活條件和基本物質需要包括（但不限於）住所，食品，醫療開支和衣服。
- (6) 儘管父母一方年齡低於前述第（1）款所規定的最低年齡，此條例仍可適用於該父母，如果審裁處信納該父母患有體力或智力衰弱，以至妨礙其供養自己，或使其供養自己有困難，或其他特別的理由。
- (7) 如果審裁處的庭長或副庭長認為該申請是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或者申請人沒有遵守前述第（3）款的規定，他可以駁回任何根據這條例作出的申請和提出駁回的理由。

- (8) 任何申請人因為前述第(7)款的決定而感到受屈，可以在決定的 14 天內，向審裁處書面提出上訴。
- (9) 作出前面第(7)款裡的決定的庭長或者，視乎情況而定，副庭長，均不可以參與就該決定提出的上訴聆訊或決定。

1.4.5. 應訴人連帶方

應訴人可以按規定的格式送達通知，要求應負有對申請人提供贍養責任的其他人士，在該申請中並列為應訴人。

1.4.6. 贍養命令

- (1) 審裁處可頒發贍養命令，如認為應訴人贍養申請人是公平和公正的，而且認為：
 - a) 應訴人在提供自己、配偶及其子女的需求後，有能力贍養申請人；及
 - b) 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能力通過工作，或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來供養自己。
- (2) 在作出命令贍養申請人的時候，審裁處應考慮與本案件的所有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 (a) 申請人的金錢需求，應考慮到居住及醫藥開支的合理開銷；

- (b) 申請人的收入，工作能力，財產及其他財經濟來源以及申請人如何開銷其儲蓄或消耗其經濟來源；
 - (c) 申請人的任何身體或精神不健全；
 - (d) 應訴人的收入，工作能力，財產以及其他經濟來源；
 - (e) 應訴人在供養其配偶或子女中所產生的各種開支；
 - (f) 應訴人在承擔申請人的贍養責任中所做的分擔和貢獻，不管是金錢或其他任何形式。
- (3) 在不損害審裁處在這條例下的權利，審裁處的庭長或副庭長可以，基於申請人和應訴人雙方的同意，作出一個贍養命令反映雙方就有關申索所同意的內容。該命令將被視為本條例的贍養命令並根據其內容予以執行。
- (4) 如審裁處在適當的證據下滿意，申請人曾經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應訴人，審裁處可以駁回申請或在贍養命令中的贍養金額減除被認為公平的遞減金額。
- (5) 應訴人負有聲稱被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的舉證責任。
- (6) 凡應訴人超過一人時，審裁處可以，以被認為公平的形式，將贍養責任在不同的應訴人之間作分攤。
- (7) 在進行聆訊根據本條例作出的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移交調解員（**conciliation officer**），讓雙方進行調解。

1.4.7. 審裁處命令為贍養提供擔保的權力

- (1) 贍養命令可以一次性給付 (lump sum) 贍養費用、按月給付 (monthly allowance) 或由審裁處決定有關期間，定期給付 (periodical payment)；
- (2) 命令給付贍養費用時，審裁處可根據酌情決定，命令應訴人提供擔保擔保全部或部份贍養金額，以移送財產方式移送給信託人作為信託財產，用該信託財產的收入支付贍養金額或其部份。
- (3) 審裁處，當作出贍養命令時，命令應訴人：
 - (a) 存入銀行一筆由審裁處決定的最低金額，或
 - (b) 用以此最低金額向保險公司購買年金 (annuity)。
- (4) 當審裁處作出贍養命令時，審裁處可以就給付的方法或形式作出規定。

1.4.8. 贍養命令的期限

- (1) 除非贍養命令中規定較短的期限，或者此贍養命令已被撤銷，否則贍養命令將按下列情況期滿失效：
 - (a) 如贍養命令沒有擔保，申請人的死亡或者應訴人的死亡，以較早的時間為準，
 - (b) 如贍養命令負有擔保，申請人的死亡。

- (2) 如贍養命令頒令於多於一個應訴人時，其中某一應訴人的死亡並不影響其他應訴人繼續承擔贍養的責任。
- (3) 如一應訴人死亡時，其他應訴人可以向審裁處提出申請，要求重新分配尚存的應訴人之間的贍養責任。

1.4.9. 審裁處變更或撤銷贍養命令的權力

- (1) 審裁處可以改變或撤銷任何現存的贍養命令，不管此贍養命令有沒有擔保，如審處認為該命令的作出是基於失實陳述，或事實的錯誤，或申請人或應訴人的情況有重大的改變，或當有其他人士並列為應訴人，或審裁處認為滿意的其他充份理由。
- (2) 修訂贍養命令的申請，可以由下列各方提出：
 - (a) 申請人；
 - (b) 應訴人；
 - (c) 專員；
 - (d) 在第 4（2）條所提及的獲批准的個人或組織；或
 - (e) 在有擔保的贍養情況，應訴人的法定遺產代理人。
- (3) 當贍養命令的應訴人超過一人時，或有其他人士並列為應訴人時，審裁處可以在修訂贍養命令的申請時，重新以其認為公平的原則分配贍

養的責任。

- (4) 在進行聆訊根據本條款作出的申請前，審裁處認為如有需要或可取，可將雙方的分歧移交調解員（**conciliation officer**），讓雙方進行調解。

1.4.10. 禁止讓與贍養利益

在此條例下的任何贍養利益的支付，均不得被給予、被轉讓或者就任何的債務或申索在法律上加於償還責任、被扣押或被針對執行。

1.4.11. 贍養命令的執行

本法令規定下的贍養命令應被視為等同於區域法院的命令，可以根據香港法例規定引用同樣強制執行贍養妻子和子女的命令的方法，在加以必要的變通後該規定的各項具體細則均適用強制執行贍養命令。

1.4.12. 喪失能力的申請人

如任何申請人（因為身體或精神不健全或其他理由）無法根據此條例提出申請，該等申請可以由下列人士代為提出：

- (c) 他的任何一個家庭成員；
- (d) 任何一個照顧他的人；
- (e) 任何獲得申請人的授權的人士。

1.4.13. 任命贍養父母專員

- (1) 行政長官可以任命：
 - (a) 一名執行贍養父母條例的專員；以及
 - (b) 行政長官認為有必要任命若干名副專員以及助理專員，以處理贍養父母條例的執行並決定其任命的條件和條款。
- (2) 專員可以有權代表 65 歲或 65 歲以上的人士提出申請(不管申訴人是否有能力自行提出申請)，或者根據此條例的申請審理或上訴中，代表此申請人。
- (3) 專員可以諮詢和指示副專員或助理專員或其他專員認為合適的人士諮詢，有關父母及子女協助他們通過調解達成協議。
- (4) 儘管申請人年齡低於前面第（2）款所規定的最低年齡，專員可以酌情代表該申請人提出申請，如果審裁處接納該父母患有體力或智力衰弱，以至妨礙其供養自己，或使其供養自己有困難，或其他特別的理由。
- (5) 就根據前述第 4（3）條提交給專員的申索，專員必須覆核該申索並可以進行下列所有或其中部份的事情：
 - (a) 轉介有關父母到有關政府部門或其他機關接受援助；
 - (b) 轉介父母和子女間的分歧作調解；
 - (c) 其他專員認為合適的措施。

- (6) 如果根據上述第(5)款，經轉介到有關政府部門和其他機關，或調解，或其他措施的有關申索還沒能獲得解決，申請人可根據上述第(5)款向審裁處作出申請。
- (7) 專員可以書面通知要求任何人士在合理的時間和適合的地點，出席上述第(5)(b)款的調解。如該人士沒有根據要求出席調解，審裁處在聆訊和決定有關贍養的申請時，可以根據審裁處的合適決定將該缺席事實一併考慮。
- (8) 專員有權進行與執行他在此條例中功能和行使他在此條例中的權力一切有關和相應引致的事情。

1.4.14. 贍養父母審裁處的組成

- (1) 審裁處由以下的成員組成：
 - (a) 一名庭長（**President**），他須由其中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出任，並須由行政長官委任；
 - (b) 第(2)款提述的各法官；
 - (c) 行政長官委任的其他成員，而該等成員是有資格根據第(3)或(4)款獲委任的；及
 - (d) 暫委成員。
- (2) 各區域法院法官及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均憑藉其所任職位出任審裁處

成員。

(3) 任何人如符合以下條件，即有資格根據第(1)(c)款獲委任為審裁

處成員：

(a) 該人有資格在香港或任何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任何法院執業

為大律師、律師或訟辯人，而該法院是在民事或刑事事宜上具

有無限司法管轄權的；及

(b) 自具有上述資格後，該人已在一段不少於 5 年的期間或在不同

期間而合共不少於 5 年的期間是：

(一) 在任何上述法院執業為大律師、律師或訟辯人；

(二) 按照《區域法院條例》(第 336 章)第 14 條委任的司

法常務官、區域法院副司法常務官或區域法院助理司

法常務官；

(三) 按照《裁判官條例》(第 227 章)第 5 條委任的常任裁

判官；

(四) 按照《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504 章)第 3 條委任的死

因裁判官；

(五) 按照《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第 338 章)第 4 條委任

的審裁官；

- (六) 按照《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 章)第 4 條委任的審裁官；
- (七) 《律政人員條例》(第 87 章)第 2 條所界定的律政人員；
- (八) 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第 91 章)第 3 條委任的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助理署長或法律援助主任；
- (九) 按照《破產條例》(第 6 章)第 75 條委任的破產管理署署長、助理破產管理署署長(法律)、助理首席律師、高級律師或律師；或
- (十) 按照《知識產權署署長(設立)條例》(第 412 章)第 3 條委任的知識產權署署長、知識產權署副署長、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高級律師或律師。
- (4) 儘管有第(3)款的規定，任何人如為學者、社工、議員、醫護界等從事長者服務超過 10 年以上或具專業資格。
- (5) 為計算第(3)(b)款提述的 5 年期間——在該款任何節範圍以內各段不足 5 年的期間可合併計算。
- (6) 庭長及審裁處的每位成員任期為 3 年，或在行政長官的裁定下也可短於 3 年，而且有資格再次任職。

- (7) 庭長或審裁處的任何成員可以離職：
- (a) 當他要求辭職時；或
 - (b) 當行政長官鑒於其不適合繼續任職，或沒有能力很好地完成其職責時撤銷該成員的任職。
- (8) 當庭長或審裁處任何成員停止任職，行政長官應立即在合理和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填補空缺。而審裁處任何空缺不會使審裁處的作為無效。
- (9) 如審裁處庭長或任何成員在當其時，無論是一般情況或者某特定的法律程序，無法執行他的職務，行政長官有權任命其他人執行庭長或該成員的職務，每次任期以不超過六個月為限，或根據情況，與該特定法律程序為限。在次期間內，該被任命得人士將擁有與原任職成員的同樣權力。
- (10) 行政長官可為審裁處任命一位秘書，調解員或其他任何有必要為審裁處配置的官員及職員。

1.4.15. 審裁處對申請的聆訊及裁決

- (1) 審裁處有權根據此條例，聆訊及決定在此條例下的申請。
- (2) 審裁處的聆訊地點及時間安排，均按審裁處庭長的決定進行安排。
- (3) 任何有利益關係的人士均由以下的代表出席審裁處的聆訊：

- (a) 經該人士申請和有充份的理由下，審裁處可批准由代理人代表出席，唯該代理人不得收取費用、利益、回報或與此有關的期望；
 - (b) 如有關人士為申請人，可由專員代表出席；
 - (c) 如有關人士是為獲批准的個人或組織，可由該獲批准的個人或組織的僱員或職員代表出席。
- (4) 參與審裁處任何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均不得由律師或者大律師代表出席。但專員代表申請人出席除外，即使該專員本身為律師或大律師。
- (5) 每個經由審裁處秘書簽發與任何人士的傳票或通知，都視為由審裁處簽發的傳票或通知，並可以以下列方式送達該人士：
- 1. 將傳票或通知送遞至該人士最後所知的住所面交該人士或其家庭的成年成員；
 - 2. 將傳票或通知用寫上該人士為收信人的信封放在該人士慣常或最後所知的住所或營業地址；
 - 3. 將傳票或通知以用寫上該人士為收信人的信封掛號郵寄至該人士慣常或最後所知的住所或營業地址；或者
 - 4. 如該人士為團體或公司：
 - (i) 將傳票或通知送遞至該團體或公司的登記地址或主要營業地址面交其秘書或相類的職員；或者

(ii) 將傳票或通知以用寫上該團體或公司為收信人的信封掛號郵寄到其登記地址或主要營業地址。

(6) 任何按照第(5)款所發出的掛號郵寄傳票或通知，均被視為在信件按一般郵遞程序送達的時間妥為送達收信人。在證明送達該傳票或通知時，只需證實內藏傳票或通知的信封有適當的地址，郵票及以掛號形式寄出。

(7) 審裁處有下列各項權力：

(a) 可根據誓詞或其他書面證供，在聆訊階段，剔除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的申索；

(b) 有權傳召任何人士參加出席調解員的調解；

(c) 有權傳召任何審裁處認為可以提供證據的人士出席申請的聆訊；

(d) 有權以宣誓或其他形式對證人詢問，並且按照審裁處認為法律程序所需要的，要求該證人呈交有關紀錄，文件或物品；

(e) 按審裁處的決定，准許因為出席法律程序的人士所必須產生的合理費用，由與訟其中一方支付；

(f) 作出與訟各方同意的命令；並且

(g) 就強制證人出席聆訊和以宣誓方式作供，所有區域法院具有的權力。

- (8) 所有在法庭或由法庭作為證人被詢問的人士，無論是否以宣誓或其他形進行，作為法律的責任，必須作出真實的證言及按照審裁處的要求呈交有關紀錄，文件或物品。
- (9) 審裁處無須受證據法規則的約束，審裁處可以自行決定法律程序的進行。

1.4.16. 審裁處或專員所要求的資料

- (1) 審裁處或專員在執行本條例的職能時，有權從由行政長官不時在憲報刊登通知所訂明的政府機關或法定團體的人員，獲得任何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如審裁處或專員，根據情況，認為該等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對執行以下第（2）款列出的目的有需要或適宜。
- (2) 審裁處或專員可以處理任何根據前述第一款獲得的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作以下任何一個用途：
 - (a) 識別和找尋有關父母的子女的所在處，
 - (b) 對真實性的評估或者補充有關父母、申請人、應訴人或有關父母的子女所提供的資料，
 - (c) 評估父母贍養自己的能力和每一個有關父母的子女贍養父母的能力，包括但不限於其相關的收入、謀生能力、財產和其他的經濟來源、開支和負債。

- (3) 任何一位審裁處或專員的成員，就任何根據前述第（1）款獲得的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和已向他披露的，必須：
- (a) 採取合理步驟確保該等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在審裁處或專員處保密；
 - (b) 不可使用該等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作為前述第（2）款列出的目的以外的目的；和
 - (c) 該等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的披露只能：
 - (i) 在審裁處和專員和審裁處的官員，或者任何根據審裁處指示或代表審裁處的人士之間作前述第（2）款列出的目的之用；
 - (ii) 在得到由行政長官不時在憲報刊登通知所訂明的有關政府機關或法定團體即提供與審裁處或專員該等資料、紀錄、文件或物品的政府機關或法定團體的書面同意後；
 - (iii) 在法庭和任何法律法規要求下；
 - (iv) 在為施行任何刑事法律程序或法律法規要求或授權需要披露的其他目的。

1.4.17. 藐視法院

- (1) 任何人：

- (a) 在開庭時或在開庭前或開庭後的途中，攻擊、故意侮辱或妨礙庭長，審裁處的成員或官員或任何證人；
 - (b) 襲擊、故意侮辱或妨礙任何出席審裁處聆訊的人士；
 - (c) 在審裁處開庭時，故意中斷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者
 - (d) 在審裁處開庭時，沒有合法理由而違反審裁處的命令或指示。
- (2) 在審裁處開庭時，沒有合法理由而違反審裁處的命令或指示，即屬犯罪，可被處罰款及監禁。
- (3) 審裁處有權作出口頭命令驅逐任何干犯前述條款罪行的人士，無論該人士是否就有關罪行被檢控。

1.4.18. 審裁處提請特別案件要求高等法院裁決的權力

- (1) 審裁處可以在審理申請過程中的任何階段，就申請或法律程序中產生的法律問題，作為特別案件提請高等法院進行考慮，特別案件應是：
- (a) 由庭長提請，並且應簡短列出法律條文適用的事實，而且說明有關法律的問題內容；
 - (b) 由庭長送交最高法院的司法常務官；和
 - (c) 按高等法院的要求定出辯論的日期。
- (2) 高等法院應就有關特別案件中提出的法律問題展開聆訊，並作出裁

定。並將案件連同高等法院的意見一併退回庭長，該意見對審裁處具有約束力。

- (3) 此條款中的任何事項不得理解為妨礙審裁處就處理申請或法律程序中所產生的法律問題作出裁決。

1.4.19. 高等法院審議審裁處的訴訟程序

- (1) 高等法院可以自行動議，或者由任何一方對審裁處的決定認為基於判決有誤為理由表示不滿，並在決定以後的 14 天內提出訴訟，高等法院就可要求按訴訟程序要求審裁處重新審理，或認為必要時採取最大公平的措施。
- (2) 在本章節中給予高等法院的修正權力不應擴展至對審裁處就贍養父母費的安排，或在本法例下作出的比例要求分配的決定。

1.4.20. 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 (1) 除非遵照本條款和第 18 及 19 條款規定外，審裁處的決議將是最終的議決。
- (2) 申請人、代表申請人的專員、應訴人，獲批准的個人或團體或其他受影響的人士，都可以向高等法院就審裁處的決定，基於法律問題或者法律兼事實的問題，提出上訴。除非審裁處的決定是基于雙方的同意

包括由審裁處的庭長或副庭長決定並根據本條例第 6（3）條被視為本條例的贍養命令的。但如果聲稱該同意是經欺詐行為、威逼手段、恐嚇或失實陳述而獲得者除外。

- (3) 此等上訴至高等法院的程序，將與由區域法院上訴至高等法院的程序相同。
- (4) 高等法院具有聆訊和決定該等上訴的司法管轄權，可以確認、改變或撤銷被上訴的審裁處決定並有權在上訴中，只要法院認為適合，頒佈進一步或其他的命令，不管是否跟訟費或其他有關。
- (5) 就高等法院的裁決，已經沒有當然的權利提出上訴，除非高等法院保留，在上訴過程中引起和將會影響上訴結果並包含重大公眾利益的法律問題，由上訴法庭決定該等問題。

1.4.21. 訴訟費用

- (1) 在本條例下進行的聆訊，訴訟費用由審裁處決定；
- (2) 上訴的訴訟費用由審理上訴的法庭決定；
- (3) 有關以案件呈述形式在高等法院的法律程序，訴訟費用由法庭酌情處理，並以法庭命令形式處理。

1.4.22. 行政長官修訂附表的權力

行政長官可藉在憲報刊登命令而修訂附表。

1.5. 本法令的立法歷程

20xx 年 xx 月 xx 日發表諮詢文件

20xx 年 xx 號法例 - 贍養父母案例，20xx

一讀日期：20xx 年 xx 月 xx 日（法案號 xx/xxxx，20xx 年 xx 月 xx 日公佈）

二讀日期：20xx 年 xx 月 xx 日

呈交立法會專責委員會：20xx 年 xx 月 xx 日提交立法會大會

三讀日期：20xx 年 xx 月 xx 日

執行日期：至 20xx 年 xx 月 xx 日實施

圖 18：瞻養令申請的流程

向秘書處詢問提出申請前的工作，瞭解審裁處的職能和程序，盡量避免訴訟，利用較溫和的方法或途徑解決問題，如透過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或老人中心與子女溝通，尋求輔導或調解。

2. 驗證結果

專家驗證是本研究的三個階段之一，目的在確認一種行為模式、政策、介入手法是否達至預期效能；當中亦兼顧及其施行的法、理、情三方面。縱合專家的驗證意見如下：

2.1. 成立「贍養父母審裁處」的可行性

「贍養父母審裁處」是一個十分有建設性之建議。雖然審裁處於香港之設立並不是新鮮事物，但為針對贍養父母而設立則是一件創新之思維。審裁處的制度在香港已行之有效，勞資審裁處、土地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等，已普為社會所認識及接受，若然再設立新的「贍養父母審裁處」，既實際及可行性又高，不難被社會的接受。

2.2. 建議內容，程序及可達至調解結果的意見

2.2.1. 調解的提出

- (1) 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必須提交贍養父母專員進行覆核（第 4（3）條）。

專員在覆核時，可以：轉介政府部門或其他機關援助、轉介調解或進行其他合適的措施（第 13（5）條）。

- (2) 在進行聆訊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移交調解員進行調解（第 6（7）條）。

- (3) 在進行聆訊變更或撤銷贍養命令的申請前，審裁處可以將雙方的分歧移交調解（第 9（4）條）。

- (4) 審裁處的傳召權力

審裁處有權傳召任何人士參加出席調解員的調解（第 7（a）條）。

(5) 拒絕出席調解的後果

如果經書面通知後，任何人士拒絕出席調解，審裁處在聆訊和決定有關贍養的申請時，可以將該缺席事實一併考慮（第 13（7）條）。

2.2.1. 提出調解及舉證

從上述的條文內容來看，草擬法例已經清楚規定調解是聆訊申請前必經的階段，並在申請變更或撤銷贍養命令的時候，可以轉介調解。而且在專員審核有關申請的時候，和審裁處還沒開始審理該申請的時候，專員也可以轉介調解。有關條款相信已經足夠實現該條例的立法目的。而且在實際操作中，一般審裁處都會在審理過程中主動鼓勵雙方進行庭外協商和解。在草擬的法例中，審裁處也有法定的權力傳召任何人士參加出席調解員的調解。

由於轉介調解後，雙方會進入專業調解的階段，所有的調解程序將依照有關調解專業調解員或調解機構的規定進行。草擬條例的框架並沒有涉及調解的具體程序和規定。

贍養命令的申請一般是申請人提出，申請人可以包括父母自己、照顧父母的人或機關、和在特殊情況下，父母的家庭成員和贍養父母專員。舉證的責任一般是在申請人，申請人需要向審裁處證明有關父母沒有能力足夠地供養自

己。但根據第 6 條的規定，如果申請人曾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應訴人，審裁處可以駁回申請或者遞減贍養的金額。在這環節中，應訴人便負有被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的舉證責任。這個特殊的舉證安排並沒有違反舉證的一般法律要求，而且這個安排也符合誰主張誰舉證的大原則。

2.2.2. 調解的安排及過程

由於移交調解後的程序都會依照調解專業人員和機構的規定進行。所以草擬的法例並沒有特別規定調解的程序和過程。

2.2.3. 調解可達至的結果

根據以往司法的經驗，調解是可以幫助雙方當事人重審視他們的立場和要求，從而調整他們對案件的理解和期望，有助雙方進行和解。在此草擬的法例中，也跟隨了一般立法模式，把調解的程序和過程從條例中分割出來，另案處理。

3. 如何補救法律的不足及未能解決的問題

3.1. 引入調解制度補救對抗制訴訟的弱點

立法不是一蹴即就，必須先醞釀社會共識，再經過嚴緊的立法程序，兼且

要具備成熟的政治氣候，深厚的文化背景，基本的民意支持。香港必須要立法強制子女贍養父母的論點，雖然是經過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理論，研究過程中認識到法律本身有許多弱點，況且真正付諸實行必須走過一條漫長的立法里程，因而必須就補救法律的不足作出建議。誠然，立法可以立竿見影，但傳統華人社會一向有「厭訟」、「懼訟」、「息訟」的觀念，有「生不入官府，死不進地獄」的說法。所謂「家醜不可外揚」，做父母的到法院向子女追討米飯錢是多麼丟臉的事，因此要達到令有需要的父母得到有能力的子女給予供養的目的，單靠「高壓」的立法手段，仍然有一定的難度，因而我們必須承認法律並不是萬應仙丹，有必要引入替代性方法補救法律的不足及未能解決的問題。新加坡的《贍養父母法案》和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都引入現代西方社會普遍採用的替代性解決紛爭方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調解制度。所不同的是，香港尚未就規定子女贍養父母而立法，在這樣情況之下，建議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制訂一套政策和教育兼備的措施，符合當今社會情、理、法情境的調解制度，以解決長者與子女的紛爭，奠定本土贍養父母立法的基礎。

3.2. 落實長者調解服務建議作為《贍養父母》本地立法的前期工作

1984 年，香港政府率先選擇建築爭議調解作為首個香港調解試驗計劃，雖有 20 多年的時間，但市民對調解服務的認識尚淺，政府必須透過立法、教育、

宣傳等手段加以推廣。2010 年 2 月政府就有關調解服務未來路向展開公眾諮詢，以推動在商業糾紛及社區層面更有效及廣泛地應用調解服務。建議制定一條獨立的《調解條例》，目的是提供適當的法律架構以進行調解。目前香港提供的調解服務主要有：建築爭議調解、家事調解、建築物管理調解、親子調解、校本朋輩調解及受害者與犯罪者和解會議，其中家事調解和建築物管理調解都有司法機構設立的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又 2011 年 2 月 15 日政府宣佈就強拍調解實施為期一年的試驗計劃，根據指示，土地審裁處在處理強拍個案時，須考慮雙方有沒有經過調解。目前，政府並沒有就長者調解服務作獨立分類，家事調解服務只是處理分居和離婚案件，解決家庭成員的糾紛多由負責各類調解的專業團體處理（例如香港和解中心及家庭福利會等），被列入一般調解之類別。事實證明，政府為老年父母提供的調解服務近乎零。避免老年父母作為弱勢群體中的弱勢被邊緣化，政府應及早落實長者調解服務，參照家事調解進程為模式，作出以下建議（表 27）。

表 27：調解服務進程模式

第一階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以試驗計劃模式落實長者調解服務，建議委託非政府組織或社署屬下的家庭服務中心承辦； ➤ 擬訂調解服務的範圍； ➤ 釐訂調解服務的層次：社區調解、專業調解員調解； ➤ 招募義務專業調解員，為財政困難的長者排憂解難； ➤ 設置長者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 ➤ 舉辦研討會或工作坊就長者調解服務徵詢意見，加強教育及宣傳； ➤ 制定通報及舉報機制；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如有需要在合法合理合情之下允許個案轉介，交由社工跟進及向長者或家人提供支援； ➤ 建立中央蒐集數據庫收集資料，供未來發展參考。
第二階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委託學術機構就試驗計劃進行評估； ➤ 發表報告書； ➤ 向公眾公佈建議； ➤ 諮詢公眾意見以便進一步優化長者調解服務； ➤ 制定介入及跟進個案機制； ➤ 規範不適用於調解服務的案件範圍； ➤ 優化通報及舉報機制。
第三階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法律改革委員會成立工作小組，在調解為先的基礎下，就《瞻養父母法案》草案諮詢公眾。

3.3. 通報及舉報機制

政府必須設立一個關顧長者生活的跨部門、跨界別的救援機制，利用家庭、社區、鄰舍關係建立一個專門為長者提供經濟保障的保護網，有別於現時所提供的一般服務，要求各政府部門介入。

1. 舉報人：

- i. 當事人（有需要瞻養的長者）；
- ii. 家人、鄰居、社工、醫護人員、長者的朋友，原工作單位的工會組織、宗親組織、街坊福利會。

2. 接受舉報部門：

- i. 政府設立的舉報中心熱線電話；

ii. 社會福利署屬下的家庭服務中心；

iii. 當事人所屬的老人中心。

3.4. 個案試行分析⁴⁹

本人從事 26 年區議會工作，曾經處理數以千計的個案，單涉及家庭事宜的也有數百件，所以制定出一個撰取個案的準則：（1）必須是投訴者本人親自講述經歷和訴求；（2）必須是真實性事件；（3）投訴者與被投訴者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4）明確知道投訴者的訴求和目的；（5）明確知道投訴者的精神狀態良好；（6）成功接觸到被投訴者聆聽他（她）的說解；（7）雙方的意見經入檔的個案；（8）不具刑事成份的個案；（9）不涉及法院已作出判案的個案（如遺產繼承或分配）。經精心篩選取後擷取典型的贍養父母真實個案共 17 個，分為兩個步驟：（1）模擬調解：由專業調解員負責；（2）個案試行分析：把個案融入初步法律框架的含義就法例的適用予以分析（詳細個案內容參見附件四）。

3.4.1. 模擬調解

陳幼美（下簡稱甲），嫁給比她年長 17 年的關先生做繼室，並沒有生育子女，但關先生的前妻育有三男一女。65 歲那年，關先生逝世，留下一間個人名下的自住單位並立下遺囑，遺囑主要內容有三點：（1）繼室陳幼美，身份證號

碼： Axxx012 (x) 享有居住權，一直到她百年歸老或自動放棄，改嫁作自動放棄論，否則任何人不得干涉；(2) 陳幼美死後或自動放棄，房產則歸其女兒關敏清，身份證號碼： Kxxx471 (x) 所有；(3) 陳幼美若因環境變故而出售物業，必須得到關敏清同意。關敏清（下簡稱乙）在她父親死後不久即搬入該單位與繼母同住，她求財心切，千方百計想把繼母趕走，乙在家中養大狼狗，播放新潮音樂及成人電影，故意做出許多令甲難堪的事。有一天，甲精神恍惚地走在街上被的士撞傷送往醫院，康復後，她害怕乙會繼續對她不利而不願意出院，向社工和區議員求助，幫忙勸乙搬走，並把所有的首飾贈送乙以示友善。社工和區議員多次聯絡乙，希望從中介入調和，但乙不合作也不給予正面答覆。有一天晚上，乙單獨到醫院與甲會面，友善地表示接納各方的意見而決定搬出，但要求甲必須簽署一份文件以便辦理她父親名下的銀行賬戶手續。甲不以為然，簽署了一份英文文件，翌日，社工陪同甲出院回到家中，乙擋住大門不讓她入屋，並出示甲無條件自動放棄並願意搬出該單位的文件，經核對後，的確是甲的親筆簽名，日子則是在甲入院前，甲簽名下方還有一個見證人及簽名，但甲並不相識此人。

負責的社工，啟動緊急援助機制，把甲安頓在臨時宿舍後，馬上向部門主管滙報實情。商討如何協助甲討回公道，包括調解、報警求助或聘請律師循民事途徑打官司。經徵詢甲個人意願後，她有以下幾項見解：家醜不外揚，不想

把事情鬧大；手頭沒有充裕的現金支付律師費；很想早日能安頓下來，找個住所存放先夫遺物；精神難以支撐；如果報警，一旦真相大白，擔心乙會有牢獄之災，對不起死去的丈夫；財產帶不進棺材，死後也是歸乙，倒不如趁早分給她。經多方考慮後，建議交由專業調解員協助。

社工與乙取得聯絡後，觀察所得，文件上的見證人是她由內地到港公幹的同居男友所簽署。乙有 6 個月身孕，將不能從事按摩師工作，急需有一筆錢維持生活；乙明白誘使繼母簽署文件，用不正當的方法騙取利益是刑事罪行；難以應付正義的社工和區議員；乙瞭解調解的好處，包括自願性參加、保密、花費不多、時間快捷、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協議、經雙方簽署的協議書具有法律效力。最後她同意用調解方式解決問題，在社工協助下，甲乙雙方簽署《調解服務同意書》，交由專業調解員負責調解。

在調解員協助下，經過 3 小時的會議雙方達成共識，簽署下列具法律效力的《和解協意書》。

和解協議書

本協議訂立於 2008 年 12 月 12 日。訂約一方為陳幼美，身份證號碼：AXXX012 (X)，地址是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以下稱甲方），另一方為關敏清，身份證號碼：KXXX471 (X)，地址是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以下稱乙方）。

茲鑒於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物業分配權事宜，經公正調解中心調解員曾善基協助調解後，同意遵守及執行下列各項條款：

- 甲自願放棄居住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即日起搬離該單位。乙可繼續住在該單位，一直到樓宇出售交吉；
- 甲乙雙方同意委託 ABC 律師行辦理上述物業的遺產繼承手續，律師費由雙方平均分擔；
- 甲乙雙方同意把物業在市場公開出售，由乙君負責議價；
- 所有賣樓手續交由 ABC 律師行辦理，涉及賣樓的款項交由 ABC 律師行代管，待全部手續辦妥後扣除相關費用，ABC 律師行分別開出兩張支票予甲乙雙方，分配比例：甲取三分之一，乙取三分之二；
- 雙方不得干預對方如何使用賣樓所得的款項；
- 任何一方不得再就遺囑內容提出異議；
- 當雙方履行所有協議後，乙負責安排與所有家庭成員一起聚餐，費用由乙支付；
- 乙產下孩子後，甲以祖母身份擺四席滿月酒宴親戚朋友；
- 在甲乙雙方完全履行此和解協議後，雙方須放棄一切控訴對方的權利；
- 甲乙雙方必須遵守會議內容保密原則；
- 本協議以香港法律詮釋及執行。

陳幼美（簽署）

關敏清（簽署）

甲方姓名

乙方姓名

3.4.2. 個案試行分析

表 28：個案試行分析

案例編號	申請人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職業	經濟來源	居住狀況	子女情況	子女教育程度	子女經濟情況	長者訴求	背景資料	案例分析
一	林麗貞	78 歲	女	未受正規教育	寡婦	曾做女傭	拾荒	獨居	有兩子一女	皆專科或大學	良好	期望子女接她回家一起生活，不想終死在老人院	<p>她育有兩子一女，40 多歲守寡，獨力把子女培育成才。她 50 歲那年結識同鄉男友，不幸被他騙走金錢和房產，被逼搬往天台居住，此事得不到子女的同情和原諒，子女成家後，相繼捨棄她而去，她拾荒為生。</p>	<p>(一) 根據本條例第 4 條第 (1) 款的規定，申請人林麗貞已 78 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條例第 5 條規定，申請人所有子女，可被並列為應訴人連帶方；</p> <p>(三) 根據本法案第 6 條第 1(a)、1(b) 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四)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4) 款規定，若審裁處在適當的證據下，申請人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應訴人，審裁處可以駁回申請或在贍養命令中的贍養金額減除被認為公平的遞減金額；</p> <p>(五)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5) 款規定，應訴人負有聲稱被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的舉證責任；</p> <p>(六)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6) 款的規定：凡當應訴人超過一人以上，審裁處可按此類合理情況下，對各應訴人按比例作出贍養分配；</p> <p>(七)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7) 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二	邱平	68歲	男	小學	已婚	退休夜總會職員	祖業收租	與妻女同住	有兩女	大學	良好	要求兩女兒每人每月交 4000 元作為生活費用	<p>邱夫婦年輕時同在一家夜總會工作，不到 50 歲兩人就退休。由於父親邱老先生擁有兩個產業，生活費用無憂。邱老先生死後，其妻子（即邱平先母）前夫之子甲君透過律師與邱平爭產，結果邱輸了官司，甲君贏取了商業單位。由於沒有租金收入邱夫婦要求兩女兒每人每月交 4000 元作為生活費用。</p>	<p>（一）根據本條例第 4 條第（1）款的規定，申請人邱平夫婦已 68 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根據本條例第 5 條規定，申請人所有子女，可被並列為應訴人連帶方；</p> <p>（三）根據本法案第 6 條第 1（a）、1（b）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四）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4）款規定，若審裁處在適當的證據下，申請人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應訴人，審裁處可以駁回申請或在贍養命令中的贍養金額減除被認為公平的遞減金額；</p> <p>（五）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5）款規定，應訴人負有聲稱被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的舉證責任；</p> <p>（六）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6）款的規定：凡當應訴人超過一人以上，審裁處可按此類合理情況下，對各應訴人按比例作出贍養分配；</p> <p>（七）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	----	-----	---	----	----	---------	------	-------	-----	----	----	-------------------------	--	--

三	溫彬義	72歲	男	初中	鰥夫	退休制衣廠領班	積蓄	與岳母同住	有一養子一親子	小學	破產	要求養子和媳婦盡孝，留在身邊一起生活，並供養長輩	<p>溫有兩個兒子，大兒阿寬為從幼收養，二兒阿興是親生的。10年前，阿興死於交通意外，留下一孫子阿旺。5年前兒媳改嫁，溫太思子心切，為要留孫子在身邊，不惜將僅有的一住宅抵押給銀行貸款100萬付給兒媳作為換取孫兒的條件。金融風暴侵襲使樓價出現負資產，寬還不起樓宇貸款，宣告破產生活陷入困境，溫太傷心過度而病逝。不久，阿寬把阿旺送交其親生母親，攜同妻子離家而去，留下父親與外婆。溫彬義一向重視孝道，要求阿寬留下來一同生活，供養長輩，並要留住孫子阿旺。</p>	<p>(一) 根據本條例第4條第(1)款的規定，申請人溫彬義已72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條例「子女」釋義，應訴人是溫彬收養的兒子，被列入應訴人；</p> <p>(三) 從事實來看，應訴人阿寬是破產人士，根本沒有能力供養父母和外婆，明顯地不符合本條例第6條第(i) a、(i) b款規定；</p> <p>(四) 溫彬義要求阿寬夫妻留在身邊盡孝，不屬本條例規定的範圍；</p> <p>(五) 在法律規定以外，申請人可透過職工會理事長，社工等介入調解，對促進家庭成員感情，有助於社會和諧，值得推崇。</p>
---	-----	-----	---	----	----	---------	----	-------	---------	----	----	--------------------------	---	--

四	顧 勇 成	75 歲	男	小 學	鰥 夫	無 業	領 取 綜 援	獨 居	有 一 非 婚 生 女 兒	初 中	富 有	要 求 非 婚 生 女 兒 代 交 每 月 房 租 ， 並 給 5000 元 生 活 費	<p>早年與劉姓女子同居，生下一個女兒珍妮。珍妮 13 歲那年，劉女士在一宗工業意外中身亡，珍妮尚未成年，劉女士也沒有近親，所有保險公司的賠款和所屬公司的撫恤金約 120 多萬，全部由顧領取。15 年過去了，顧揮霍無度把所有的金錢花光，靠領取綜援過日子，但他覺得領取福利津貼限制多錢少，打算要求女兒每月給他繳租金，再加零用錢 5,000 元。</p>	<p>(一) 根據本條例第 4 條第 (1) 款的規定，申請人顧成勇，已 75 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條例「子女」釋義，應訴人是珍妮是申請人，顧成勇的非婚生女兒，被列入應訴人；</p> <p>(三) 根據本法案第 6 條第 1 (a)、1 (b) 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四)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4) 款規定，若審裁處在適當的證據下，申請人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應訴人，審裁處可以駁回申請或在贍養命令中的贍養金額減除被認為公平的遞減金額；</p> <p>(五)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5) 款規定，應訴人負有聲稱被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的舉證責任；</p> <p>(六)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7) 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	-------------	---------	---	--------	--------	--------	------------------	--------	---------------------------------	--------	--------	--	---	--

五	甘志強	58歲	男	中學	鰥夫	破產商人	沒有	獨居	有一子	大學	良好	要告他兒子，要求兒子接他回家，並安排他的生活所需	甘志強，經營裝修公司。栽培獨生子添生到意大利留學，並資助他開設理髮店，成為一名頗有名氣的髮型設計師，收入豐厚。甘志強因工程失利，債台高築，而告破產後不堪刺激中風，並四肢癱瘓，經濟陷入困境，生活也不能自理，唯一的希望是依靠兒子照顧他。	<p>(一) 根據本條例第4條第(6)款的規定，儘管父母一方年齡低於第4條第(1)款規定的最低年齡，此條例仍可適用於該父母，申請人甘志強難未滿65，但已是破產兼殘疾；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法案第6條第1(a)、1(b)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三)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六	李伯雄	75歲	男	中學	鰥夫	退休文員	積蓄	獨居	有一女	大學	良好	要求女兒供養，不願意領取綜援	他因心臟病入院接受手術，其中有一項是用者自付的醫療費用約萬多元，李先生因手頭緊絀，向住院社工求助並申請豁免，但李先生填報的資料是女兒供養，因而不獲接受。李先生找到女兒甲君商量，但甲君不願供養父親及繳付費用，也不簽署聲明放棄供養父親，令李先生處於兩難位置。	<p>(一) 根據本條例第4條第(1)款的規定，申請人李伯雄，已75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法案第6條第1(a)、1(b)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三)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七	林洛	73歲	男	未受正規教育	鰥夫	退休建築工人	由子女供養	獨居	有一子一女	大學	良好	要求子女交租金，另加5000元生活費	林 73 歲那年，妻子去世，子女給他安排入住一套房，每月給 4000 元生活費。林洛不滿，經常到子女家吵罵，甚至打電話給女兒的上司，投訴子女不供養他。最後還到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投訴。	<p>(一) 根據本條例第 4 條第 (1) 款的規定，申請人林洛，73 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申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條例第 5 條規定，申請人所有子女，可被並列為應訴人連帶方；</p> <p>(三) 根據本法案第 6 條第 (2) 規定，審裁處在作出命令贍養申請時，應考慮與該案所有的情況包括：申請人的金錢需求，應考慮到居住及醫藥費的合理開銷；應訴人在承擔申請人的贍養責任中所做的分擔和貢獻，不管是金錢或其他任何形式；</p> <p>(四)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4) 款規定，若審裁處在適當的證據下，申請人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應訴人，審裁處可以駁回申請或在贍養命令中的贍養金額減除被認為公平的遞減金額；</p> <p>(五)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5) 款規定，應訴人負有聲稱被遺棄、虐待或疏忽照顧的舉證責任；</p> <p>(六)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6) 款的規定：凡當應訴人超過一人以上，審裁處可按此類合理情況下，對各應訴人按比例作出贍養分配；</p> <p>(七)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7) 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	----	-----	---	--------	----	--------	-------	----	-------	----	----	--------------------	--	--

八	蕭和年	65歲	男	小學	已婚	退休餅店師傅	積蓄	與妻及岳母同住	有一子	大專	一般	要求兒子供養	<p>蕭為一餅店師傅，他有一子阿潮，大專畢業後任職航空公司，後與劉姓同事結婚，婚後與女方父母同住，後又添一對子女，也交女方母親照顧。蕭已退休多年，靠積蓄供養年邁的岳母和妻子。因購買雷曼兄弟金融產品，金融危機下使他血本無歸，又逢岳母中風住護理安老院，要求兒子阿潮供養。</p>	<p>(一) 根據本條例第4條第(1)款的規定，申請人蕭和，65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申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條例「子女」釋義，沒有指明人贍他家兒子，應否被列入應訴人的規定，但根據事實，應訴人阿潮，是申請人的兒子，應是應訴人。</p> <p>(三) 根據本法案第6條第1(a)、1(b)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四)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	-----	-----	---	----	----	--------	----	---------	-----	----	----	--------	---	--

九	陳伍四妹	88歲	女	未受正規教育	寡婦	家庭主婦	領取傷殘津貼	住安老院	有兩子一女	中學	良好	外甥女代訴，要求子女供養	育有兩子一女。大兒子陳友利是位印刷商人，二兒子陳友友是位工業原料推銷員，本與二兒子同住，因中風下半身癱瘓，並患老人痴呆症，得不到子女照顧，由外甥女曾萍萍代向鄰近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及區議員求助。	<p>(一) 根據本條例第4條第(2)款的規定，獲批准的個人或組織，如在照顧父母，可以向審裁處申請命令。申請人陳伍四妹，88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申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條例第5條規定，申請人所有子女，可被並列為應訴人連帶方；</p> <p>(三) 根據本法案第6條第1(a)、1(b)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四)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6)款的規定：凡當應訴人超過一人以上，審裁處可按此類合理情況下，對各應訴人按比例作出贍養分配；</p> <p>(五)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	------	-----	---	--------	----	------	--------	------	-------	----	----	--------------	---	---

十	鄺美蓮	77歲	女	未受正規教育	寡婦	退休小販	積蓄	獨居	有一子一女	大學	良好	要控告兒忤逆，並要求供養	鄺女士年輕時就守寡，是個賣雞小販，兒子阿勝是位室內設計師，阿勝與妻子離婚，結識一位來自台灣女子阿芳，一起做生意，誘騙了她的惟一產業，鄺生活陷入困境，阿勝不顧母親反對，偷偷與阿芳結婚並搬離，也不給予供養。	<p>(一) 根據本條例第4條第(1)款的規定，申請人鄺蓮，65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法案第6條第1(a)、1(b)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三)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十一	李小媚	83歲	女	初中	寡婦	退休托兒所助理	由兒子和乾兒子供養	與乾兒子同住	一養子一親子	中學	良好	乾兒子代訴，要求其子女安排母親生活	已患老年癡呆症。由她的乾兒子阿強代為申述。李女士有一子一女，本有一個近700呎的自住單位，與丈夫，兒子阿紳，乾兒子阿強同住，生活融洽，互相照應。丈夫死後，因自己體弱多病，把產權轉給兒子。不久，李女士失憶，阿紳把物業出售套現300萬，歸為己有，並要求阿強帶母親搬出，每個月給母親2000元。2010年聖誕夜，李女士到友人家聚餐後，回家路上被人撞跌倒地，盆骨爆裂，左腳骨折住院。出院後，生活不能自理，遂找阿紳討論安排李女士日後生活問題。	<p>(一) 根據本條例第4條第(1)款的規定，申請人李小媚，83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條例第5條規定，申請人所有子女，可被並列為應訴人連帶方；</p> <p>(三) 根據本法案第6條第1(a)、1(b)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四)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6)款的規定：凡當應訴人超過一人以上，審裁處可按此類合理情況下，對各應訴人按比例作出贍養分配；</p> <p>(五) 根據本條例第6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十二	梁帶銀	71歲	女	未受正規教育	寡婦	家庭主婦	領取綜援	住安老院	有一子	中學	一般	不願意領取綜援，要求兒子供養	<p>梁老太雖然勤奮持家，沒有得到家人的欣賞和尊重，孫女對她諸多挑剔，有一天，梁老太在家跌倒，由救護車送急診室，經醫生診斷為中風而跌導致骨盆爆裂。經治療後，她須坐輪椅渡餘生。後經社工協助，領取政府傷殘津貼，並被安排入住私人安老院，但每月尚欠 2000 多元住宿費。而她的兒媳不願供給。</p>	<p>(一) 根據本條例第 4 條第(1)款的規定，申請人梁老太，74 歲，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足夠的能力適當地供養自己，初步符合條件向審裁處申請贍養令；</p> <p>(二) 根據本法案第 6 條第 1(a)、1(b) 款規定，應訴人在滿足自己、配偶和其子女需求後，是否有能力供養申請人；及申請人，雖然已作出努力，但仍沒有能力通過本人的財產或其他來源供養自己；</p> <p>(三) 根據本條例第 6 條第(7)款的規定：審裁處在接受進行聆訊申請前，審裁處必須將雙方的分歧交調解員協助雙方進行調解。</p>
----	-----	-----	---	--------	----	------	------	------	-----	----	----	----------------	--	---

第七章 結論

1956 年，聯合國發表第一部研究世界人口老齡化的專著《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它向全球發出人類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命運的預警。聯合國老齡化問題世界大會，先後於 1982 年和 2002 年召開，透過發表《政治宣言》，制定行動綱領和各項計劃，呼籲各國遵照和參與。

香港於 1981 年步入老齡化社會。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調查報告，現時 65 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口佔香港總人口的 12.4%。預計未來 20 年，長者人口將會迅速增加，到了 2033 年將佔總人口的 26.8%。香港一向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安老政策。1965 年發表的第一部白皮書《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中說：「不應該鼓勵家庭自然單位將其照顧老弱者道德上的責任，委諸公立或私立之社會福利機構。」之後，都以此為養老政策基調，可惜數十年過去了，港英政府未曾為「家庭養老」政策紮根，就像大榕樹上的一支未到地的氣根，缺乏營養和水份，面臨枯萎危機。進入 90 年代，老齡化帶來的民生問題逐漸浮現，寒流襲港奪走百名長者的生命、自殺率站在全球的三甲的位置、老年人貧窮數字上升、虐老問題頻生，港英政府的夕陽性質，始終未為香港制定長遠的養老政策。1997 年回歸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他首份施政報告中指出：「關懷長者是每個家庭的責任，我們必須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董先生的壯志令人鼓舞，很不幸 1997 年底，出現亞洲金融風暴，2000 年科網泡沫爆

破、2003 年發生伊拉克戰爭，加上非典型肺炎爆發，2008 年受外圍經濟衰退影響，種種因素曾經在一定時期上令香港面臨財赤困局、經濟不振、失業率高企、通縮持續，試問回歸 13 年，香港特區有多少好光景？香港實行低稅政策，加上《基本法》量入為出的規定，特區政府是否有能力負擔沉重的福利開支？對安老服務帶來哪些影響？老有所養對社會的穩定起重大的作用，也是人類共同的願望。但誰來養？政府該做些甚麼？子女該做些什麼？社會人士如何理解養老問題？縱觀香港社會經濟越是發達，家庭卻越是鬆散，照顧者的能力越是薄弱，這又是何解？目前的趨向是政府取代了多種傳統家庭的養老功能，說成是人心所向，但為人子女供養父母的責任仍應否存在？傳統的孝道與家庭養老有何關係？或如何維持？又或以立法強制子女供養父母是否可行？

近年香港各界針對香港應否立例強制子女供養父母有不少的討論，政府曾於 1998 年派員到新加坡考察相關的情況，可見研究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的可行性具有實際的意義。新加坡和中國先後於 1995 年和 1996 年通過採取立法手段強制子女供養生活有需要的父母，但是，在「家庭贍養」的訴訟中，訴訟雙方並不僅僅是純粹的經濟關係而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由血緣和親情支持的家庭關係，並不是對抗制訴訟所能完全解決的。相反，對抗制的訴訟體制可能激化家庭矛盾，扯斷家庭紐帶，從而導致家庭的不穩定，甚至破裂。因此，充分考慮其解決糾紛的對象是十分必要的，為了更符合家事訴訟的需要，新加坡和中國大陸都

引入不同形式的調解制度以減免家庭成員之間因訴訟而產生的傷害。1980 年代後期，非政府機構率先在香港提供家事調解服務，主要是處理婚姻問題，現有多個涉及民事糾紛的領域皆不同程度地引用調解制度，已經有良好的發展。政府正擬議制定獨立的《調解條例》，目的是提供適當的法律架構以推行調解。香港被英國統治達百年之久，法律制度是奉行普通法系，家庭觀念既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保持固有的儒家傳統孝道思想，在探討透過立法手段要求子女履行供養父母的責任時，必須在有助於維護家庭孝道價值觀前提下，把贍養人的義務合理性地規範化，利用調解制度在進入訴訟程序之前發揮其有效的功能。

本文以社會學角度循實踐過程去探討長者權益法律保障的核心要素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而勾劃出本文的理論主線。在洋洋灑灑數拾萬字的文獻分析中，從多方位觀點出發，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程式、技術進行研究，冶鍊出兩塊供香港借鑒的養老瑰寶：一、現代各國養老制度的立法保障。借鑒外國實踐的經驗，建議作為香港子女贍養父母立法的理論依據並撰寫建議法律框架。二、中國優良傳統的揚孝敬親。建議以孝道作為立法的支持和補充。藉著立法的過程，徵集公眾意見，加強討論，透過傳媒的報導、加強公民教育；重振中國優良傳統的揚孝敬親，以現代的理念重塑孝道功能和作用；重新認識傳統家庭的價值和倫理觀念。

1. 現代養老制度的立法保障

（一） 聯合國的行動和綱領性文獻呼籲各國做好養老工作並認真看待老年人權益實施法制化保障的重要性，香港面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完善多支柱的養老制度是刻不容緩的。

聯合國世界老齡大會的決議和行動計劃，呼籲各國必須透過制度和政策保障老年人應有的權益，其中以維持老年人的收入，保障老年人被供養的權利為首要問題。1982 年維也納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上強調：「對於老年人來講，關於老齡問題的任何問題都不如保障、維持收入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道出經濟保障是老年人生活基礎，在世界性人口老齡化影響之下，如何供養老人是各國當務之急。

1994 年，世界銀行出版《防止老齡危機——保護老年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一書，第一次向各國政府推薦建立公共養老金，強制性養老金和自願性養老金在內的三支柱養老保障模式，具體分析了退休保障的再分配、保險和儲蓄功能，充份體驗為老年人提供較好保障時應促進經濟的增長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自從世銀推行多支柱模式後，成為世界各國養老模式改革的首選。到了 2005 年，經 11 年的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實踐經驗後，發佈報告《21 世紀老年人支援：關於養老金及其改革的國際觀察》，將三支柱建議進一步擴展到五支柱的政策建議，包括「零支柱」方案：

零支柱，社會援助性方案，即社會保障制度內非繳費型的最低保障支柱：

第一支柱，為繳費型保障制度及與個人收入水準掛鈎的社會保障模式；

第二支柱，強制性的儲蓄制度；

第三支柱，自願性儲蓄制度、年金制度；

第四支柱，建立在家庭和代際基礎上的非正規保障形式。（穆懷中，2002）

香港現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充其量只接近三支柱，仍缺乏完善和深度，為著面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特區政府應根據現時的情況而進行改革並保持各支柱之間適當地平衡。

（二） 香港《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必須量入為出及保持低稅率，況且汲取西方國家福利制度面臨危機及改革的啟發，還幸處於家庭解體、集體意識沒落的十字路口，應及早完善立法規範家庭養老制度。

《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作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第一百零八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

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說明特區政府可以靈活地處理社會福利的發展和服務種類的擴張，但必須配會實際需要，視乎經濟情況而定，必要是可透過立法保障市民應有的權利，當然包括就贍養父母立法。

1973 年經濟危機發生之後，在人口老齡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多重影響下，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開始相互牽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惡性循環；西方福利國家面臨著巨大挑戰。走過半世紀的風光年代，時勢所逼之下，不得不走向改革的路向，如 OECD 國家為了減少養老金支出及積極老年，鼓勵人民延長工作年限，多個國家已通過立法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或通過延長計算養老金的平均工資的年限，甚至通過降低根據生活費提高而增加的養老金幅度，以減輕老齡化帶來的國家財政負擔；（楊燕綏，2002）亞太地區有許多國家重塑傳統，走向發展子女供養、政府資助及建立適合他們需要的養老保障制度，包括立法。

過往香港人供養父母的情況處於中等，相對來說比西方福利國家好得多，有幸是處於家庭解體，集體意識沒落的十字路口，政府還可以有時間把握時機及早完善立法規範子女供養父母的制度。

（三） 國際組織建議發展和加強社區服務以支援老年人和家庭照顧者，使照料老年人的責任能在個人、家庭、社區、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間取得合理分擔，

香港可借鑒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政策的共性和個性制定適合香港的政策。

《維也納行動計劃》（1982）的原則強調各國政府在老齡政策的制訂和執行時，應當注意支持對老年人的家庭照顧和社區照顧，指出：「不同形式和結構的家庭是連接各代人的一種社會基本構成單位，應當根據每一個國家的傳統和風俗習慣予以延續、加強和保護。」

《聯合國老年人原則》（1991），確立了關於老年人地位五個方面的普通性原則，對家庭養老和家居照顧極具指導性和啟發性的意義。

《全球目標》和《世界老齡問題宣言》（1992），其中之家庭目標，肯定老年人在家庭的地位，闡明通過立法確保老年人獲得照顧和收入保障。

《馬德里行動計劃》（2000）及《上海執行策略》（2002）強調跨代關係的重要性，並鼓勵建立世代之間的平等互惠的關係，建議採取措施加強凝聚力和代際關係。

本文第二章就東西方社會家庭養老制度作個比較。無論是在東西方社會，家庭都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要發揮著重要的支援作用。一些西方國家在發展

國家老年福利制度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家庭在養老中的重要作用，過於依賴以機構養老取代家庭養老，不僅有損於老年人的保障水準的改善，還加劇了本國的財政困境。此後西方各國才重新認識到家庭養老的重要性，它們「重新發現」了家庭養老的價值所在，表現為對中國等深受傳統孝文化影響的國家的家庭養老方式的稱讚。(陳功，2003) 2002 年亞太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發表的區域性，調查報告的建議：發展和加強社區服務以支援老年人和家庭照顧者，使照料老年人的責任能在個人、家庭、社區、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間得到合理分擔，作為中國的特區、亞洲的一員的香港應鑒古知今在家庭養老問題上予以制度化。

(四) 世界各國面對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的嚴峻挑戰，為確保老年人得到適當照顧，以穩定經濟和調整社會關係，立法保障老年人權益成為大趨勢，不少國家規範子女必須贍養父母，香港應汲取經驗而研究子女供養父母本土立法。

弱勢社群的權利常常是「權利木桶」中最短的一塊木板。(湘君，2004) 如果我們要追求的理想是平等地關懷和維護每一個人的權利，弱勢社群中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就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只有弱勢者的權利被充分尊重和保護，權利的堤壩才足堪抵禦撲向它的每一股激流。法治社會往往透過立法保障長者權益，包括贍養父母。

從本文第二章世界部份國家和地區保障老年人權益立法資料分析，不難發現一個特點，制定老年人權益保障專門立法國家當中，大部份都是出自儒家文化圈（除印度）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尤以新加坡、中國是最早就規範子女贍養父母作了專門立法，印度於 2008 年的《老年人法案》是在新加坡的《贍養父母法（1995）》基礎上制定。

本文選取新加坡的《贍養父母法（1995）》（簡稱《贍養法》）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簡稱《老年法》），比較兩部法律的出台的背景、立法內容、法律特點、法律實施、立法意義供香港借鑒。

表 29：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與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比較

	新加坡	中國
立法背景	減低政府因老齡化問題帶來的社會風險； 弘揚孝文化	在《憲法》基礎上，透過立法保障長者以減低老齡化問題帶來的壓力：承傳孝文化
立法內容和特點	法律保障長者透過申請贍養令獲得合理的供養； 成立贍養父母審裁處； 引入調解制度，實行調解為先	內容廣泛，非常籠統； 引入調解制度
法律的實施和執行	條文清晰，操作性強，有實際的數據供參考	沒有具體條文只作原則性規定，結合其他法律而適用，獨立請求權的基礎很少；操作性差
立法意義	有助家事法體系的完善；構成對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的全面保護，重塑孝道	有助家事法體系的完善；構成對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的全面保護，重塑孝道
法例的修定	2010 年 11 月 23 日國會通過《贍養父母法案》修定案，強制當事人雙方接受調解安排，贍養父母條例專員在合法的情況下協助長者找尋失去聯絡的子女（如透過中央公積金戶口資料）	有關部門正着手研究就《老年法》作出修改，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已收集了許多建議資料和各界意見

表 30：新加坡、中國、香港保障長者權益立法比較

項目	新加坡	中國大陸	香港
法系歸屬	英美法系（普通法系）	社會主義法系（有學者認為是民法語系，即大陸語系）	英美法系（普通法系）
代表性法例	《 瞻 養 父 母 法 案 》 (1995) The 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 of 1995.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1996)	沒有專門立法
相關法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97 年人民協會（社區）發展理事會規則》 • The Provisions in the Penal Code (Cap 224) • The Women's Charter (Cap353)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憲法》(1982) 2. 《婚姻法》(1950) 3. 《繼承法》(1985) 4. 《民事訴訟法》(200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社會保障計劃屬於行政管理計劃 • 《家庭暴力條例》(2008 修訂後，為受到身體、心理和性虐待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額外保護、受害人可向法庭申請強制令)
執行機構及職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社區發展青年及體育部負責制定政策 • 社區發展理事會負責管理各項社會保障計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各級人民政府制定政策 • 民政局負責執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負責制訂政策 • 社會福利署推行社會保障政策
調解及裁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申請瞻養令前必須先進行調解； • 成立瞻養父母審裁處 • 高院裁決（只限於特殊案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居民委員會或村委會調解 • 法院終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沒有具體規定 • 涉及《家庭暴力條例》的案件由法院處理

2. 中國優良傳統的揚孝敬親

（一） 研讀中華民族發展史，瞭解中國國家和法律起源的特點及歷代尊老養老的法律制度。這些制度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後世應從回顧原意作出反思，從今義加以回應並藉以為鑒，有助研究香港未來養老制度的發展。

縱觀原始資料，中國歷代的養老體制，是以倫理思想的「孝」核心而逐漸建立起來，統治者以「禮」、「仁」為立法指導思想，歷經千餘年的發展、嬗變，成為中國獨樹一幟以孝文化為思想中心的養老立法制度。其內容之豐富，條文之精密令人嘆為觀止。涵蓋鄉飲酒禮的特殊意義、養老與教育相結合、與養老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設置專門的養老機構、官員退休制度、囤積糧食防饑荒的制度、家族和宗教養老事業；還有各式各樣的敬老活動，其意義之重要、規模之大與今天香港社會的敬老活動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不孝罪成為尊老養老制度的刑法保障是歷經四千多年而不衰，「孝」不單是中華文化的主幹，也是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浩瀚的卷宗資料，經過精細的分析濃縮，晶結出中國歷代的法律與制度及其典籍的依據，以概覽表形式示下：

表 31：《中國歷代養老的法律與制度》概覽

朝代	內容簡介	參考文獻
夏朝 約西元前 2070 年 至約西元前 1600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以「饗禮」侍奉老人； ➤ 把養老與教育相結合：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 不孝罪的規定； 	《禮記·王制》 《禮記·王制》 《孝經·五刑》
商朝 約西元前 1600 年 至西元前 104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以「食禮」侍奉老人； ➤ 養老與教育相結合：「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于左學」； ➤ 不孝罪的規定； 	《禮記菁華錄·王制》 《禮記·王制》 《呂氏春秋·孝行》
西周 約西元前 1046 年 至西元前 771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以「饗禮」和「食禮」侍奉老人； ➤ 國家舉行「鄉飲酒禮」，以示尊老敬老； ➤ 養老與教育相結合：「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 設立專門的養老官員及推行養老令； ➤ 退休制度及賜杖的意義； ➤ 設立老年人刑事赦免制度； ➤ 不孝罪的規定； 	《禮記菁華錄·王制》 《禮記·鄉飲酒禮》 《禮記·王制》 《周禮·地官司徒》 《禮記·曲禮》《禮記·王制》 《周禮·秋官司寇》 《尚書·康誥》
春秋戰國 約西元前 770 年 至西元前 221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儒家孝道思想的形成，沒有被引用於法律，但對後世有重大影響； ➤ 《法經》中出現對老年人刑事赦免的具體規定； 	《論語》等 《法經·具律》
秦朝 約西元前 221 年 至西元前 20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嚴懲「不孝」行為； 	《秦律》
漢朝 約西元前 206 年 至西元 220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加強對老年人的救濟，如「受粥法」； ➤ 設立王杖制度； ➤ 完善退休制度； ➤ 頒佈老年人刑事赦免的詔令； ➤ 頒佈正式的法律對不孝罪進行處罰；鼓勵同居共財； ➤ 親親得相首匿的趨形； 	《漢書·文帝紀》等 《王杖詔令冊》 《白虎通·致仕》等 《漢書》、《刑法誌》 《二年律令·賊律》《後漢書》 《二年律令·賊律》

<p>魏晉南北朝</p> <p>西元 220 年</p> <p>至西元 581 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官方的養老機構首次設立； ➤ 「不孝」被列入「重罪十條」； ➤ 留養制度的起源； 	<p>《梁書·武帝下》</p> <p>《北齊律》</p> <p>《北魏律》</p>
<p>唐朝</p> <p>西元 618 年</p> <p>至西元 907 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皇帝舉行尊老宴會的制度； ➤ 設「養病坊」，專門收養窮苦老幼； ➤ 對老年人的刑事赦免制度正式確立在刑法典之中； ➤ 「十惡」之「不孝」的法典化； ➤ 官員退休制度； ➤ 設王杖制度； ➤ 沿襲留養制度； 	<p>《全唐文·千秋節賜父老宴飲敕》</p> <p>《唐會要·病坊》</p> <p>《唐律·名例律》</p> <p>《唐律疏議·名例律》</p> <p>《通典·職官十五·致仕官》</p> <p>《新唐書·玄宗本紀》</p> <p>《新律·名例律》</p>
<p>宋朝</p> <p>西元 960 年</p> <p>至西元 1279 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加強物質獎賞； ➤ 賜予官爵，以示尊老； ➤ 養老機構的快速發展； ➤ 老年人的刑事赦免制度的延續； ➤ 建立家庭養老的各種保障政策，包括「不孝」列入「十惡」； ➤ 留養制度的延續； 	<p>《宋史·太宗紀》等</p> <p>《宋史·真宗紀》等</p> <p>《宋史·食貨志》等</p> <p>《宋刑統·老幼疾及婦人犯罪》</p> <p>《宋刑統·告祖父母、父母》</p> <p>《宋刑統》</p>
<p>元朝</p> <p>西元 1206</p> <p>至西元 1368</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對老年人的物質救助； ➤ 對高年蒙古老人的榮譽旌表； ➤ 繼續維持老年人刑事赦免制度； ➤ 繼續設立官方養老機構——養濟院； ➤ 以蒙古人為主的致仕官員的養老政策； ➤ 傷害尊長不孝罪的刑法和處罰； 	<p>《元史·食貨志》</p> <p>《元史·惠宗紀》</p> <p>《元史·刑法志》</p> <p>《元史·食貨志》</p> <p>《元典章·職制》</p> <p>《元史·刑法志》</p>
<p>明朝</p> <p>西元 1368 年</p> <p>至西元 1644 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物質賞賜、賦稅減免； ➤ 鞏固老年人社會地位； ➤ 繼續設立養老機構； ➤ 繼續實行老年人刑事赦免制度； ➤ 致仕官員的養老政策； ➤ 「不孝」罪行刑法； 	<p>《明太祖實錄》</p> <p>《明史·羅復仁傳》</p> <p>《明太祖實錄》</p> <p>《大明會典·老小廢疾收贖》</p> <p>《明史·禮志》</p> <p>《大明會典·律例》</p>
<p>清朝前期</p> <p>西元 1644 年</p> <p>至西元 1840 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物質賞賜、賦稅減免； ➤ 皇帝舉行「千叟宴」； ➤ 繼續設立養老機構； 	<p>《清史稿·世祖本紀一》等</p> <p>《養吉齋叢錄》</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繼續維持老年人寬刑政策； ➤ 致仕官員的優待； ➤ 「不孝」罪行的刑法； 	《清世祖實錄》 《大清律例·名例律》 《大清會典事例》 《大清律例·名例律》
清朝末期 西元 1840 年 至西元 1911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廢除「十惡」制度； ➤ 「禮法之爭」； 	《大清新刑律》 朱勇《中國法制史》
民國 西元 1912 年 至西元 1949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民間組織的慈善機構開始發展 	1949 年《中國年鑒》

就上述概覽表，把歷代法律和制度，可概括為 10 項共同點：（1）就不孝行為立法；（2）養老制度與教育相結合；（3）無論哪一個民族當權執政，都重視養老政策；（4）以宴會、物質饋贈予長者以示尊敬；（5）以榮譽旌表彰顯長者，提升長者社會地位；（6）設立養老機構；（7）建立退休制度；（8）給予長者刑事寬免；（9）國家主導養老政策；（10）敬老養老制度化，如減免稅項等。細味歷代養老的法律和制度，都具有使家庭和諧、社會祥和、政治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意義。鑒古知今，感嘆現代政府不如我們祖先重視尊老養老問題，當然，立法的内容、宗旨、技術，實施的手段和方法等，必須以現代的政治角度嚴加審視，其中「不孝罪」最受後代非議和批判。

「不孝罪」能跨越千秋萬代，歷久不衰有其原因，第三章已就孝道的法律化過程，孝道對家庭、社會、國家的影響、孝道如何傳播至東南亞地區等已作評論，不再贅述。但有一點要補充的是，古代「不孝罪」刑事化的原因。民刑不分或刑

重於民是中國法律起源的特徵之一，一直到清朝末期，才開始逐漸改善。以《唐律》為例，不孝罪的定義是民刑混合式，如咒罵父母和長輩、供養有關（缺）、摑打父母或長輩、殺害父母或長輩等，近似現代的精神虐待、疏忽照顧、遺棄父母、虐老。如果是當今的法例，必定會清晰地界定每種行為屬於哪一個哪一門法律規管，輕者可能會被社會人士譴責的道德行為，重者則抵觸刑事法。

清朝末期，西學東潮，經歷「禮法之爭」，新學派思想的洗禮，「不孝罪」被廢除，象徵法律改革、社會進步，但「孝道」沒有因此被「貶值」。經「五四」及多次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孝道得以重塑，摒棄封建時代的專制性、絕對性，使到傳統的孝文化融入現代生活的內涵，第三章已有論述。新型孝文化不但在儒家文化圈內發揚光大，更成為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養老政策的依據，透過立法把儒家思想「善養」父母的制度傳承下來。

（二） 家庭是孝道產生的領域，父權依附家庭而建立，父權憑借孝作為道德規範約束家庭，還擴及家族以外的領域，影響中國社會達數千年之久，父權制家庭制度瓦解後，留下唯一的寶土，就是孝文化體驗人類倫理道德的家庭養老制度，仍然影響著許許多多的華人社區，屹立在現代法治社會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環境中繼續發揚光大。家庭功能隨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轉變，以孝道為基礎的家庭養老制度仍具有重大的價值。

儒家的孝其中的「慈」是對父母而言的，「孝」是對子女而言的，可見最初的家庭倫理是雙向的，對父母和子女分別課以不同的道德義務。但是，及至戰國末期，韓非就把「父慈子孝」這一規範絕對化和片面化，到漢代董仲舒創立的「三綱五常」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後，「子孝」的要求得到進一步強化，「父慈」的內容逐漸減弱，（李桂梅，2002）本來出自人類純樸感情的孝親，失去了其本性而淪為政治工具，使到「孝」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糾正了愚忠愚孝等腐敗的思想，拆除苛刻的禮教樊籬，摒棄殘酷不仁的條文，逐步邁向法治社會之道，本文第三章已深入論述中國歷代有關尊老養老的法律與制度，顯見歷朝立法內容都包括「不孝罪」。到了清朝末期，西學東漸，歷經「禮法之爭」，新學派思想的洗禮，中國人才從法律改革的陣痛中醒覺過來。

家庭功能因執行的主體轉移和多元化，夾雜著文化、經濟、制度及個人觀念的各種原因，令家庭功能產生此起彼落的變化，意味著人類家庭生活方式伴隨著社會因素之間的融和、替代、互補、調節，導致傳統功能的減弱、回歸、外化，新產生的功能得以適應、提昇、完善、理性、優化。有關家庭功能的轉變和再生，有不少的研究和爭議，本文忽略各學派的理論，透過常見的家庭功能實行的空間和時間，用平鋪直敘的方法分析傳統家庭與現代家庭功能的變化，經觀察後，發覺萬法不離其宗，優良的傳統家庭制度的內涵仍牢牢地植根在現代家庭當中，其中尤以繁衍後代，養老扶幼、家庭成員共聚天倫之樂等功能，是任何組織所不能

代替。

表 32：傳統家庭和現代家庭的規範和功能比較

一、 父權制法律維護之下傳統家庭和現代家庭比較

規範內容	傳統家庭	現代家庭
家庭制度	父系父權制度	平權家庭
女性地位	夫為妻綱，男尊女卑，婦女沒有繼承祖業的權利。	男女平等
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多妾制，異姓結成夫婦 根據俗例習慣制定的婚嫁儀式宣告婚姻合法性。在「七出」的規定之下男方可隨意休妻，女方沒有提出離異的權利。	維護一夫一妻平等制度，不拘儀式。離婚必須附合法律，規定的男女雙方平等權利。普遍意識上接受同居，部份人包容同性戀。
婚姻自主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自由婚姻
服從家長	絕對服從，否則以法律懲罰	家庭民主化
傳宗接代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婦女沒有生育屬犯「七出」之條，丈夫以此作為休妻的依據	自由選擇
祖先祭祀	視為家法、家規，服從家長（父）領導	信仰自由
家產繼承	長子嫡孫優先、父系的男性後裔為主	男女平等
居喪規定	子女或晚輩、妻子必須依法守孝。喪期不作樂、不嫁娶、不赴喜宴	因人制宜，自由選擇
孝道力量	不孝入律，而不孝的法律規範很廣；道德規範；不但是維繫家庭秩序的法寶，更是治國的利劍，奉行泛孝主義。	孝仍是被認為是道德規範； 子女供養父母被視為是優良傳統的孝道，受到推崇、表揚、肯定。
養老制度	子女對父母供養有關觸犯刑事將受到懲罰； 道德規範	奉行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在自願選擇之下履行義務； 有許多國家立例規範子女必須瞻養父母。

二. 傳統家庭與現代家庭功能的變化

家庭功能	傳統家庭	現代家庭
經濟功能	同居共財。每個家庭成員必須從事生產工作，如農耕、畜牧、捕魚業等賴以維生的事務，履行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的分工，所有收穫必須歸公，共同維護和保護家庭經濟穩定的責任，家庭是每個成員生活的依託。	家庭仍是經濟的基本單位，夫妻共同承擔家庭的開支，供養子女、父母、祖父母；有工作的未婚子女，一般會偏向經濟自主，財政獨立，不會把收入全部上繳給家長，但會分擔家庭開銷的責任，因此家庭之間的互濟互助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家庭仍是每個人的生活依托、精神所繫。
扶養及保護功能	是每個人人生、老、病、死的依靠，保護家庭成員的安全，也是每位成員的避風塘。在沒有社會福利制度下，一個人由呱呱墮地到入土為安，誰也脫離不了家庭的庇護。家庭是養老扶助功能的基本單位。	社會進步，家庭的保護功能顯得沒有那麼重要，病了可以看醫生，警察負起除暴安良的責任，意外事故有保險或慈善賑助，這只能說明社會制度的提升，制度的完善；長幼仍是最需要家庭保護。孩子成長過程中，父母給予呵護是最大的支持；年長者能在家中安享晚年是最大的幸福。有許多國家對家庭養老都有法律規定，香港法律規定父母必須扶養未成年的子女，並沒有規定子女必須照顧父母，仍有一半以上的人有供養父母，因此家庭仍不失其養老扶幼的功能。
教育功能	古代教育以訓導子女如何處世、待人接物為要，包括孝道、禮儀、習慣、閭里關係，通過代代相傳，由父母傳授學問、知識、技能。即使父母的學識水準不高，但憑家教也可以培養品格優良的後代，子女憑藉家傳的一技之長賴以為生。	現代社會，學校是擔任教育下一代的主要機構，也說明教育制度的多元化。家庭教育仍十分重要，家長的以身作則、諄諄善教、子女經耳濡目染，取得潛移默化的效果，因而教育是每個人的紮根教育。但現代社會生活緊張，父母為口奔馳，往往把子女交由家庭傭人、補習社、托兒中心照管，因而缺乏親情、溫情、融洽、和諧。有許多年輕夫婦借助祖輩幫忙照顧下一代，這恰恰說明跨代共濟或代際互惠可作為家庭教育的補充。

宗教信仰功能	<p>古代人認為祖先死後會成為神靈，祭祀是對祖先的尊敬和供奉。家中有喜事必先稟報祖先，同樣地，有困難就會祈求祖先保佑。透過祭祖宣示孝道，加強家庭成員的凝聚力。祖先神是家庭成員的精神依託。</p>	<p>現代宗教信仰自由，包括無神論，家庭成員不一定會有共同的信仰。朋輩、工作、學校都可能影響宗教信仰的選擇。家庭雖不是惟一建立共同信仰的領域。但共同信仰對促進家庭成員的溝通和融洽有一定的幫助。</p>
生育功能	<p>無論古今中外家庭都具有生兒育女的功能，古代社會視傳宗接代為人生第一大事，添丁一般是指男孩，由於古代中國以農耕為主，需要男丁從事勞動力工作，因而男丁視為家庭興旺的源頭。多子多孫是家庭的財富。</p>	<p>受世界人口膨脹、老齡化社會的影響，人們提倡高質素的生活，重視优生健康，為了要專心專意培養下一代，大多數的夫婦選擇家庭生育計劃，這說明家庭功能因人類追求優生理念而理性化。雖然家庭作為生育功能角色退化，但人類得以繁衍延續，除了家庭，還有甚麼組織可以取代？</p>
娛樂消閒功能	<p>古代缺乏物資和互動、消閒活動多局限於家庭成員之間，吃喝吟唱、賞花行令，再高層次的有琴、棋、書、畫、射、騎等，小孩遊戲大多數取材於民間手藝，如蹴鞠（足球）是發明自中國，踢毽子、放風箏、轉陀螺、騎竹馬等，但古訓有「勤有功、戲無益」。一般家庭不鼓勵有太多的娛樂。</p>	<p>現在是花花世界，商業化年代，娛樂節目應有盡有，商人千方百計吸引人們消費，娛樂場所分佈大街小巷，雖然家庭不再擔當提供娛樂的主要角色，但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共同策劃消閒活動，是凝聚家庭最重要的動力，而一家人透過娛樂共聚天倫樂是沒有任何功能可以取代。此外，陪伴子女參加戶內外活動是親子最佳的管道；子女能夠偷閒以愛心娛親，陪他（她）們聊聊天、散散步、看看影片、喝喝茶、吃頓飯，對長輩來講是最大的慰藉和關愛。</p>

（三）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工業化社會，孝道的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劇變。現代民主社會不提倡為孝道立法，但遺棄、虐待、疏忽照顧父母等忤逆行為是中西方社會所不容的違法行為。香港一方面必須用現代的理念給予孝道分析和梳理，重塑孝道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應透過立法把「善養」父母的制度傳

承下來。

家族是農業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核心，則家族的穩定、延續、和諧與團結異常重要，而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的孝道觀念，目的在於創建一個長幼有序的宗族體系。由於孝道觀念可以促成秩序的建立，其重要性自必超越其他諸道德與諸善之上。（葉光輝、楊國樞，2009）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這些少數民族的政治家深諳「以孝治國」之道，以清朝為例，歷代皇帝大力倡導孝道，讓人人在家做孝子，不會鋌而走險，搞反清復明，滿族得以穩穩當當地統治萬萬漢人達 360 年之久。總而言之，孝道作為社會性的倫理規範，有利於調整傳統社會君臣關係、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穩定社會秩序，增強社會成員的責任感，有效地適應了傳統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陳功，2009）

在個人主義色彩日漸濃厚的社會，以家族為核心的集體主義的孝道觀念必然發生轉變，孝不可能重回昔日的光輝日子裡，但有許多國家和華人社區認為孝在當今的家庭和社會存在有一定的價值，必須用現代的理念，給予孝道加以分析和梳理，重塑孝道的功能和作用，讓以自然的血緣紐帶為基礎的孝親情、親子情活在我們的生活裡；讓人們以真實的情感，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現今欲重新建立孝的形象，必須從孝的本質出發，用家庭生活角度審視孝的

功能及作用，換句話說，還給孝一個公道，讓牠返璞歸真，繼續潤育後世。清朝末期，西學東漸，經歷「禮法之爭」，新學派思想的洗禮，「不孝罪」被廢除，象徵法律改革、社會進步，但「孝道」沒有因此被「貶值」。經「五四」及多次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孝道得以重塑，摒棄封建時代的專制性、絕對性，使到傳統的孝文化融入現代生活的內涵。孝文化不但在儒家文化圈內發揚光大，更成為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養老政策的依據，透過立法把儒家思想「善養」父母的制度傳承下來。因此本文在分析和梳理孝的功能和作用時，不偏頗儒家文化的傳統思想，也不應站在源自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的視角審視孝道，而走的是社會現實、取向生活的路徑，道出現代孝道和傳統孝道的分別。

表 33：傳統孝道和現代孝道的對應特徵

傳統孝道	現代孝道
<u>泛孝主義的延展性：</u> 擴及家庭以外領域，即泛孝主義心態。有「移孝作忠」、「以孝治家」、「以孝治國」的作用	<u>崇尚親情的局限性：</u> 孝屬於家庭內的親子關係，形成父母慈、子女孝的親子、孝親的溫馨生活。
<u>刻意塑造的角色性：</u> 父母以家長自居，在家中角色鮮明，長幼有序，各守崗位，子女屈於父母的威嚴之下稱孝。	<u>自然本色的感情性：</u> 建立在親情間的瞭解及感情基礎，父母以疼愛子女為出發點，子女對父母滋生敬愛，孝由此自然滋生。
<u>不合時宜的他律性（強制性）：</u> 孝不但是家規、家教、家法、還是強制性的社會規範、國家律例。曾在許多朝代中，「不孝罪」被列十惡。	<u>文明社會的自律性：</u> 孝是自願遵守的道德規範。父母善誘子女尊親敬親，透過心靈教化感染子女，使到子女能自動自覺地履行適當的孝義。
<u>欠缺道義的獨益性（片面性）：</u> 認為「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強調其管教的權利。違背父母命令、意志，不聽教令即屬「不孝」。	<u>公平原則的互益性：</u> 孝是互惠的、相互善待、相互調適、彼此體諒、包容。注重公平原則，彼此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父母子女分別課以不同的道德義務和權利。

<p><u>情理為先的絕對性：</u></p> <p>強調孝道的絕對化，子女必須對父母「反哺」盡孝，「供養有闕」是一種不孝的罪行。為行孝可以不顧法理，公然以「報父仇」、「代父刑」及隱瞞真相等行為挑戰法律。</p>	<p><u>符合法理的多樣性：</u></p> <p>公認子女不違背公序良俗供養父母是盡孝的行為，不僅從物質生活上關心老年人的需要，還應從精神生活上給予慰藉關愛。雖然現代民主社會不提倡為孝道立法，但遺棄、虐待、疏忽照顧父母等忤逆行為是中西方社會所不容的違法行為。</p>
<p><u>應以傳承的善養性：</u></p> <p>儒家思想的孝道中「養親」、「敬親」、「安親」、「尊親」是符合現代社會提倡的「老有所養」、「老有所屬」的理念。「善養」父母的制度被多個國家和地區所承傳。</p>	<p><u>適當輔助的替代性：</u></p> <p>子女為口奔馳，聘請家傭照顧父母並供給物質所需，利用工餘陪伴父母，時加關懷父母生活起居，心理和生理狀況；子女收入不濟，心有餘而力不逮，人窮志不移，對父母不離不棄，呵護有加，政府或團體應給予支援。這種採取替代方法能達到給父母物質和精神的贍養，在當今社會來講堪稱孝道，也是「善養」、「能養」的體現。</p>

3. 總結

1965 年，香港發表第一部白皮書，福利制度開始萌芽，強調養老政策是屬於個人和家庭的責任，政府只是輔助那些盡一己力量的人士。香港不是福利社會，政府必須是「小政府」，社會福利不應佔太多的社會資源，福利開銷也應有規限，這種政策可以說是符合當時香港實際情況。在工業化、現代化推動下，上個世紀 70 年代的香港面對人口結構轉變，核心家庭普遍化，婦女出外工作的趨勢等因素，港府才開始正視照顧老人的問題重要性，引入「家居照顧」模式的安老政策。緊接着是 1981 年，香港步入老齡化社會，也是國際社會籌備第一屆老齡化問題世界大會的時刻。英國政府統治香港百年之久，沒有把握良機利用上世紀 60 年至 90 年代 30 年間，香港經濟蓬勃的黃金年代，體察人口老化的問題，配合香港特區有的經濟體系、文化背景而制定一套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有關家庭養老政策方面

只見零星鬆散地分佈在各部門政策領域，如供養父母免稅制、與年長者同住的房屋政策、長者家居照顧服務、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這些條件都可以成為促進家庭養老成效的因素，政府並沒有予以規範化、具體化，也沒有把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有機地結合，發揮其互補不足的作用。經過 30 年冗長的辯論，1995 年，立法局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主體條例，惟為時已晚，夕陽心態的港英政府，自然把這個落實推行強積金的重大責任過渡給特區政府。2000 年，這個屬於香港人的退休保障計劃在經濟困境中誕生。10 多年過去了，因強積金而產生的陣痛瘀痕仍未完全癒合。現時號稱長者經濟援助的三大支柱（強積金、社會保障及個人存款、投資和年金）並不穩固，人口老齡化給香港帶來的影響及其後果仍是本世紀重大的民生議題。隨著香港民主化而生的是立法養老的考慮。

早在上世紀末，學者、社福界都有對香港贍養父母立法的討論，特區政府也曾於 1998 年 6 月派代表到新加坡考察相關法例的實施，這些文獻都成為本文的參考資料。本文帶出以立法推動子女供養父母的社會價值觀念極可能帶來許多激烈的爭論，跟港英政府年代至目前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確實有不少分歧，這意識形態的考慮較草案本身的可行性可能更為重要，這些問題在研究過程中已反覆思考和分析。社會富裕了，人們生活水準提高，人心思變，都是社會物質文明的進步。如果社會福利不斷擴張，香港維持低稅政策、狹窄的稅基、量入為出的基本原則，如何應付日益龐大的福利開支呢？

立法必須顧及與現時相關法例的配合，如最低工資法例、以房養老（正在計劃中的「逆按揭」政策）、高齡津貼、長者回鄉養老政策等，這些制度對立法建議可能是阻力，亦是動力。其中尤以香港獨特的綜援制度值得特別一提。目前與子女同住或有子女供養的申請綜援長者，只要子女簽署不供養父母聲明（俗稱「衰仔紙」），就可以向社署申請領取綜援，而其子女可以私底下用各種方式資助父母，對既得利益者來講，為何要支持新法例？同樣地，香港有許許多多忠實的納稅者，又近一半的人在供養父母，他們又會有甚麼心聲？因而本文建議立法制定最低的道德標準，懲罰少數的違法者，而立法背後重大的意義是公民教育。

本文借鑒新加坡和中國贍養父母的法例實踐經驗，建構法例框架雛型，引入調解制度，以減免家庭成員之間因訴訟而產生的傷害，在進入訴訟程序前發揮調和功能，建立「贍養調解前置機制」。目前香港具有完善的調解制度，普遍地應用於各範疇的民事訴訟，家事調解就是個成功的例子，憑藉這個優勢作為推動立法規範子女贍養父母的動力，建議立法與調解制度是雙軌相輔而行。

然而在探究適當立法的同時，研究亦深入考究了養老概念和立法在中國歷史的延展，結果顯示，中國自遠古以來都將贍養長者放在人倫法規的最高位置，甚至君主每年國宴亦需特別招待退役侍臣及立法建構民間養老、敬老和愛老風氣。然而時而易近，隨著社會進步，加上西方個人主義的入侵，以家庭、鄉黨養老的

基礎受到翻天覆地的改革，至當前香港要面對「長者無法在家受到供養，子女養老意識薄弱及社會敬老文化缺乏主體」等危機。要處理好日後龐大的退休長者群的生活，及重新締造社會敬老、愛老文化，立法導引或協調家庭養老似是必須的一條路徑。本人能完成此研究報告不足為傲，實在有許多不完善之處，在學術界講只能說是恆河一沙、滄海一粟。但願以小見大，讓此一小沙在大水池裡掀起一個小漩渦向外擴散；讓此一粟有萌芽的機會。期望此研究報告能得到執政者的垂注，就此議題展開深入研究，透過諮詢、討論、驗證；引發理性的辯論、辯證；用宏觀視角博覽國際社會應對人口老化的策略；由微觀角度審視香港因老齡化引致的養老問題，一直達到尋得真理的出現。

4. 論文不足之處

4.1 理論框架

論文以紮根理論，透過文獻整理得出初步家庭調解理論框架，顧名思義，紮根理論存在的弱點，本文亦然，包括：

1. 理論框架有其局限性，基礎框架並不能廣泛地涵蓋所有家庭糾紛，亦未能每個個案都適用。故此框架仍得不斷的引證和實踐，才能有廣泛的認受；

2. 框架資料整理是基於作者一己喜好，故此框架容易存在作者自身的價值取向。亦因此本論文框架部份再經專家審核批改，務求達到業界專家要求水平；

3. 在選取文獻資料，亦難保有所遺漏。故論文提出的框架並非唯一理論；這點要讀者留意。

4.2 研究方法

1. 正如紮根理論的兩位大師的爭論，由作者一己選取的資料其客觀性實在存疑！然而所有課題總要有個開始，重要是作者自己憑著開放的態度，清晰地交待選取資料及分析步驟的每一細節，讓讀者理解本研究的操作及每一環節的演譯。那樣，讀者自然能有自己的判斷。這點相信論文是做到的；

2. 個案選取方面難免以偏蓋全，畢竟時間和資源皆有限。然而本文已嘗試以多種不同的個案來測試同一理論框架的可行性（Invariance across different groups），初步結果是正面的。

4.3 環境現實

1. 上文說過，若資源時間無限，框架隨着紮根理論的思維是不斷驗證、不斷更生優化。但目前只用三年時間完成面前論文，個案數目亦是有限，未能涵蓋

所有不同種類的情況。

2. 個案的敏感性亦是一個問題；要知家庭養老糾紛對中國人來說確是難以啟齒，能給作者見面詳談的皆是較為願意接受調解的一群。亦因此目前框架確實較適合這群人士使用。

如此種種，論文道出了無論作者如何努力，都有其局限性。一如其他論文，重要的並非是推砌一份無瑕的巨著，卻是要提出新的論點及自知其弱點在何處。

參考文獻

- Asian-Pacific Center. (2001).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lderly Care in Asia-Pacific Region – Malaysia, China, Australia & Japan. Fukuoka: Asian-Pacific Center.
- Barr, N. (1992).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2), 741-803.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Hon, M. S.-m. (1998, June 25). Law to enforce care of parents studi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 4.
- Jayaram, P. (2008, July 3). Delhi to help old, abandoned parents. *The Straits Times*.
- Liu, W. T., & Kendig, H. (2000). *Who Should Care for the Elderly? An East-West value divid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 Morgan, L. H. (1977). 古代社會. (楊東莼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Ruggles, S. (2007). The Decline of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0-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pp. 964-989.
- Sieg, L. (2007, September 12). Japan: Facing Economic Headache From Ageing

Population. Retrieved August 2, 2011, from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7/09/13/us-japan-ageing-idUST209928200>

70913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Stunson, R. J. (2002). *The Retirement Village Industry in Australia: Evolution, prospects, challenges*.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Thomas, W., & Znaniecki, F. (1958).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Tomoka, B. (2003). Wester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in a long-ru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2, 249-260.

United Nations. (2005).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rsons Around the World*.

Retrieved August 5, 2011, from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livingarrangement/report.htm>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DESA PD]. (2007a).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Retrieved March 8, 2009, from

http://esa.un.org/unpd/wpp/unpp/panel_population.htm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DESA PD]. (2007b). 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DESA PD]. (2010). The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09 Report. Retrieved

August 2, 2011, from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WPA2009/WPA2009_Workin

gPaper.pdf

大清法規大全・法律部 (卷1). (不詳). 政學社.

文滙社評. (2006, 9月6日). 從道德和法律層面強化家庭倫理. 文滙報, 頁A02.

王伯琦. (2005). 近代法律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王思斌. (2000). 試論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 載於何國良、王思斌 (編), 華人社

會——社會工作本質的初探 (頁173-190). 新澤西州: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王彩波、李豔霞. (2003). 西歐福利國家的理論演變與政策調整. 教學與研究, 11,

53-58.

王興亞. (1994). 明代的老年人政策. 南都學刊 (哲學社會學版) (4), 61-70.

世界銀行. (1996). 防止老齡危機.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左秀榮. (1992). 未來的婚姻、家庭與社會. 吉林: 吉林教育出版社.

甘長求. (1989). 香港經濟教程.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田雪原. (2007). 構建和諧社會——關注老齡化影響.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2005). 選定地方扶助貧窮長者的社會保障制度. 香港: 立法會秘書處.
- 全球養老保障——改革與發展. (2002). (楊燕綏譯) 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 朱青、郭雪劍. (2007). 養老保障——多支柱養老體系下的公共養老金計劃. 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 朱勇. (2006). 中國法制史 (第2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朱紹侯等. (2004). 中國古代史.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朱嵐. (2008). 中國傳統孝道七講. 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 呂克勤. (2007). 中國古代史 (第3版).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桂梅. (2002). 衝突與融合——中國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向及現代價值. 長沙: 中南大學出版社.
- 李漁. (1992). 李漁全集 (卷17). (浙江古籍出版社編)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 李寶庫. (2005). 一顆閃耀人倫的璀璨明珠.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 全球華人孝親敬老研討會論文集 (頁10-13). 香港: 精文社.
- 沈家本. (不詳). 書勞提學新刑律草案說帖後. 載於沈家本, 寄移文存 (卷8).
- 貝弗里奇. (2004). 貝弗里奇報告.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研究所組織譯) 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周永新、齊鈺. (2000). 香港老年人的樂與憂——餘暉晚照. 香港: 天地圖書公司.

周建明. (2005). 社會政策——歐洲的啟示對中國的挑戰.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周葉中. (2005). 憲法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明報. (1998, 6月25日). 供養父母周潔冰促立法; 無助揚孝羅致光反對. 頁A8.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4). 香港人口推算2004-2033. 香港: 香港政府統計處.

林嘉. (2002a). 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考察之三——福利國家的建立與社會保險制度的發展. 9月6日, 2011擷取, 摘自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網:

www.cnsslw.com/list.asp?Unid=708.

林嘉. (2002b). 社會保障法的理念、實踐與創新.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林閩鋼. (1997). 現代社會保障. 北京: 中國商業出版社.

姜向群. (2005). 老年社會保障制度——歷史與變革.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洪煜. (1997). 西周和秦漢時期的父權家長制. 殷都學報 (1), 28-32.

胡幼慧. (2009).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胡志偉. (2006, 9月6日). 強化家庭、人人有責. 文匯報, 頁A29.

胡留元、馮卓慧. (1989). 長安文物與古代法制. 北京: 法律出版社.

香港社會工作論壇. (2009). 長者貧窮. 9月17日, 2009擷取, 摘自

<http://ihome.cuhk.edu.hk/~s067376/soc2204/project>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09, 6月). 香港安老服務概況. 9月17日, 2009擷取, 摘自

http://www.hkcss.org.hk/download/folder/el/el_chi.htm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0, 12月18日). 對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的意見. 8月12日, 2011

擷取, 摘自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papers/ws1218cb2-534-4-c.pdf>

香港社會福利署. (1965). 香港社會福利工作目標與政策. 香港: 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社會福利署. (1994). 引言. 載於香港社會福利署, 老人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

(頁i-xii). 香港: 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社會福利署. (2009, 7月8日). 2001-02年長者領取綜援個案的分類數字及金額.

8月12日, 2011擷取, 摘自

http://www.lwb.gov.hk/chi/legco/20090708_11_3.pdf

香港社會福利署. (2010, 1月2日). 2009-2010年度社會福利署開支預算. 8月12日,

2011擷取, 摘自

http://www.swd.gov.hk/doc/finance/swd_0910expenditureC.pdf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4). 一九九四至二零零三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

字. 香港統計月刊 (7).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8a). 香港統計月刊 (9).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8b). 2006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 9月17日, 2009擷取,

摘自

http://www.byccensus2006.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962/06bc_op.pdf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9a).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 香港統計月刊 (8).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9b, 8月).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號報告書：長者的社會與人口狀況、健康狀況及自我照顧能力. 7月3日, 2009擷取, 摘自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lication/stat_report/social_data/B11302402009XXXXB0100.pdf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0). 香港統計月刊 (9).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1, 5月4日). 香港統計資料：統計表. 8月2日, 2011擷取, 摘自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

p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 (2009, 7月8日). 長者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高齡津貼. 9月17日, 2009擷取, 摘自http://www.lwb.gov.hk/chi/legco/08072009_11.htm

香焯. (1999, 3月). 若要強制執行，倒不如需加以教育. 松柏之聲, 259(3).

孫炳耀. (1999). 人口年齡結構與老年社會保障籌資模式. 中國人口科學 (3), 18-25.

孫家紅、龔汝富. (2007). 略論唐律的「不孝罪」. 中國文化研究 (冬之卷), 40-51.

恩格斯. (1995).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載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卷4, 頁1-3).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馬憶南. (2002). 婚姻家庭法新論.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國際勞工組織. (1986). 經濟活動人口1995-2025. 日內瓦: 國際勞工組織.
- 康學偉. (2000). 先秦孝道研究.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張志雲. (2005). 唐代悲田養病坊初探. 青海社會科學 (2), 106-108.
- 張晉藩. (1988). 清代民法綜論.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張晉藩. (2003). 中國法制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張敬偉、馬東俊. (2009). 紮根理論研究法與管理學研究. 現代管理科學 (2), 頁 115-117.
- 曹方林. (2000). 論孝的起源及其發展. 成都師專學報(3), 34-39.
- 梁向陽. (1990). 危機中的福利國家.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處編) 北京: 華夏出版社.
- 梁治平. (2002). 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梁洵瑜. (1998, 6月14日). 依靠子女渡餘生, 每月僅得二千元. 蘋果日報, 頁A4.
- 符祝慧. (2008, 4月16日). 向老人收「長壽醫療保費」日本政府被批「棄老」. 聯合早報, 頁20.
- 郭成偉. (2007). 中國法制史. 北京: 中國法制出版社.
- 陳功. (2003). 中國養老方式研究. 北京: 北京大出版社.
- 陳功. (2009). 社會變遷中的養老和孝觀念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 陳正怡. (2009, 7月3日). 逾半受訪者不願供養父母. 星島日報, 頁A13.

陳向明. (2005).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陳叔紅. (2007). 養老服務與產業發展.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陳波. (1989). 社會科學方法論.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陳蘇鎮. (1983). 商周時期孝觀念的起源、發展及其社會原因. 載於三聯書店 (編),
中國哲學 (頁39-48). 北京: 三聯書店.

陸緋雲. (1998, 10月22日). 養老模式與安老政策. 信報, 頁23.

曾憲義. (2009a). 中國法制史 (第3版).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曾憲義. (2009b). 關於中國傳統調解制度的若干問題研究. 中國法學 (4), 34-46.

湘君. (2004). 老年人權益保障百例解析. 北京: 機械工業出版社.

費孝通. (1982). 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 天津社會科學 (3), 2-6.

費孝通. (1983). 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
北京大學學報 (3), 6-15.

費孝通. (1998). 家庭結構變中的老年贍養問題.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 2-6.

黃大仙區長者貧窮研究. (2009). 9月17日, 2009擷取, 摘自

<http://ihome.cuhk.edu.hk/~s067376/soc2204/project/>

黃洪. (2005). 「老有所養」: 在香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建議. 載於中國老齡事業
發展基金會, 全球華人孝親敬老研討會論文集 (頁 166-169). 香港: 精文
社.

黃劍波. (2005). 福利慈善、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論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參與

需要和可能. 廣西民族研究 (3), 33-40.

楊延福. (1982). 唐律初探.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葉光輝、楊國樞. (2009). 中國人的孝道——心理學的分析. 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

鄒根寶. (2001). 社會保障制度——歐盟國家的經驗與改革. 上海: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鄔滄萍 (編). (1983). 社會老年學.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鄔滄萍. (2006). 老年學概論.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熊必俊. (2002). 人口老齡化與丁持續發展.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趙昆坡. (2002). 中國法制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齊力、林本炫. (2006). 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嘉義: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劉松林. (2000). 古代的養老制度. 文史知識 (3), 81-88.

劉夢、付愷斐、楊衡平. (1997). 世界家庭養老探析. 北京: 中國勞動出版社.

劉憲權. (2005). 刑法學.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2001). (吳芝儀、廖梅花譯) 嘉義: 濤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質性研究概論. (2005). (徐宗國譯) 台北: 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鄭德良. (1992). 香港奇蹟. 香港: 商務印書館.

鄧大松. (1992). 社會保險比較論. 北京: 中國金融出版社.

黎安國. (2005). 24 孝與 24 小時——全球化經濟生產. 載於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 全球華人孝親敬老研討會論文集 (頁 91-109). 香港: 精文社.

穆光宗. (2002). 家庭養老制度的傳統與變革——基於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一項比較研究. 北京: 華齡出版社.

穆懷中. (2002). 社會保障國際比較. 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出版社.

蕭捷. (2007). 養老服務與產業發展.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頭條日報. (2009, 7月3日). 不同人士對供養父母的態度. p. 20.

聯合國. (1982). 1982年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 6月22日, 2009擷取, 摘自
http://www.un.org/chinese/esa/ageing/vienna1_2.htm

聯合國. (2002). 2002年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 5月12日, 2009擷取, 摘自
<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ageing/ecn5-01pc19.pdf>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2003). 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 (中國老齡協會譯) 北京: 北京華齡出版社.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1997). 1950-2050年中間變數預測. 載於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世界人口展望1996年修訂本. 紐約: 聯合國.

鍾劍華. (1998, 7月16日). 強制供養父母有何不可?. 信報, 頁23.

聶明雋. (1995). 養老保險解答. 北京: 北京改革出版社.

蘇保忠等. (2008). 中國古代養老制度及其對農村養老的啟示. 當代經濟 (11上), 40-42.

黨俊武. (2004). 老年社會引論. 北京: 北京華齡出版社.

顧炎武. (不詳). 日知錄 (卷八). 8月9日, 2011擷取, 摘自

<http://www.guoxue123.com/biji/qing2/rzl/008.htm>

附註

¹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DESA PD], 2007a

² UN DESA PD, 2007a

³ 黎國安，2005

⁴ Stunson，2002

⁵ 詳細討論可見：<http://qcobass105els.blogspot.com/2010/09/71-p287.html>

⁶ 註：出自 2010 年 6 月 9 日，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香港大學秀園老年研究中心等主辦之「強化香港家庭：跨代責任須關顧」研討會，丁國輝教授講題《孝道觀念與老年關顧問題》的摘要。

⁷ 註：香港銀行被指誤導顧客購入包含美國投資企業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次級按揭的投資產品，銷售時沒有向顧客準確全面地向顧客披露產品的性質及風險，然次按泡沫爆破使雷曼兄弟於 2008 年金融海嘯中破產倒閉，令相關衍生工具的持有人蒙受損失，當中不乏投入畢生積蓄的長者。

⁸ UN DESA PD，2007b

⁹ UN DESA PD，2007b

¹⁰ Sieg，2007

¹¹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1997

¹²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2003

¹³ 林閏綱，1997

¹⁴ Tomoka，2003

¹⁵ Barr，1992

¹⁶ 國際勞工組織，1986

¹⁷ United Nations，2005

¹⁸ 世界銀行，1996

¹⁹ 註：Punaluo 為夏威夷部落中兄弟共有妻子、姐妹共有丈夫的多夫多妻制度。

²⁰ 註：仰韶文化的遺址最早在 1921 年發現於河南繩池仰韶村，故以仰韶為名。又因遺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被稱為彩陶文化。

²¹ 註：龍山文化，又稱黑陶文化，因首次發現於山東章丘龍山鎮而得名。

²² 註：根據《儀禮·鄉飲酒禮》的記載，席間的奏樂也很講究。《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

²³ 《唐律疏議·名例律》：「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蠱毒、壓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盜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

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關；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律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買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日內亂（謂奸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

²⁴ 註：唐朝以后的《宋刑統》、《大元通制》、《大明律》以及《大清舉例》的「名例律」中都把「不孝」設立為「十惡」之一。

²⁵ 《儀禮·喪服》：「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諸侯為天子，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筓，髻，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禮記·喪服小記》：「斬衰括發以麻。」

《清史稿·禮志十二》：「斬衰三年，子為父、母；為繼母、慈母、養母、嫡母、生母；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子之妻同。女在室為父、母及已嫁被出而反者同；嫡孫為祖父、母或高、曾祖父、母承重；妻為夫，妾為家長同。」

²⁶ 詳見《大誥·耆紀奏有民事善惡第四十五》。

²⁷ 「本土化」是一個含意廣泛的概念，學者有不同的解釋。王思斌認為：「本土化指的就應該是外來的東西進入某一社會文化域，與原有社會制度相配合，共同支持人們共同生活的過程。」（王思斌，2000）從個理解來看，香港有許多「本土化」的例子，如社會工作，教會工作，以及本文所涉的調解制度，是引自西方國家的替代性解決紛爭方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之調解（Mediation）。中國學者在討論法律本土化時，經常是把移植與本土化並用，如林嘉所說：「法律移植著重強調一國在立法時對同時代的國外法律進行引進借鑒和吸收。而法律本土則注本國法律文化的傳統並立足本國的實踐。」（林嘉，2002b）本文使用本土化時，是借鑒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等外國經驗，必須配合香港人們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經濟狀況、政治氣候，經過本地立法的程序，才能成為香港的法例。

²⁸ 見《孟子·公孫醜章句下》

²⁹ 見《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³⁰ 見《莊子·天道》

³¹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4

³²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4

³³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8b

³⁴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2009

³⁵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

³⁶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8a

³⁷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

³⁸ 香港社會福利署，2009

³⁹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4

⁴⁰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9a

⁴¹ 香港社會福利署，2009

⁴² 香港社會福利署，2010

⁴³ 頭條日報，2009

⁴⁴ 周永新、齊鉦，2000

⁴⁵ 法例重點是要防止家庭施虐者接近受害人，故賦予受害人（長者）主動權向法庭申領禁制施虐者在其居所或附近範圍出現的法令。

⁴⁶ 張敬偉、馬東俊，2009

⁴⁷ 陳向明，2005

⁴⁸ 陳向明，2005

⁴⁹ 註：個案中所有稱謂均為化名

附件一. 聯合國關注老齡化問題的歷史和背景

目錄

1. 聯合國關注老齡化問題的會議和文獻撮要	1
1.1. 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	1
1.2. 《維也納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後續行動	3
1.3. 第二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	6
1.4. 《亞洲及太平洋老齡化問題澳門行動計劃》及其後續行動	9
參考資料.....	14

1. 聯合國關注老齡化問題的會議和文獻撮要

1.1. 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

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經過世界範圍內的充分準備，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於 1982 年 7 月，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共有 124 個國家的代表團、162 個聯合國專門機構、政府間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代表、顧問、觀察員等共約 1000 餘人參加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聯合國指導老齡工作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1982 年《維也納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以下簡稱《維也納行動計劃》），全文分序言、前言和四個章節，即 1.〈導言〉、2.〈原則〉、3.〈行動方面的建議〉和 4.〈執行方面的建議〉，另有文件和附件約 8 萬字。這次大會第一次在全球範圍內喚起人們對老齡化問題的關注，把老齡化問題提上了世界議事日程，對世界

老齡化事業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1) 會議對 2025 年以前全球人口老齡化形勢作了科學預測。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差異進行了對比分析，通過大量人口統計資料，預測人口老齡化在不久的將來將波及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人口老齡化將成為世界性問題。

(2) 第一次公開地、正式地提出老齡化問題的內涵，把老年人問題與人口老齡化問題區分開來。這次大會原擬用「世界老年人會議」為大會題目，最後確定命名為「老齡問題世界大會」(World Assembly on Ageing)。更名明確了老齡化問題與老年人問題是兩個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老齡化問題是隨人口老齡化的出現、加劇而產生的新問題，主要包括人道主義問題和發展方面的問題兩個方面：「人道主義問題涉及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問題」，除了和其他人口共有的問題外，還包括「健康與營養、居住與環境、家庭社會福利、收入保障與就業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問題」；「發展方面問題涉及的是以總人口中老年人所佔比率增加為其主要特徵的人口老齡化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一題目下除了別的以外，將考慮在老年人受撫養的比率日益增長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對生產、消費、儲蓄、投資，以及反過來對一般社會經濟狀況和政策所起的影響。」

(3) 《維也納行動計劃》就國際社會、各國政府、其他機構和整個社會應付社會逐漸老齡化的挑戰和滿足全世界老年人需要的方法，提出了有關總的指導方針、一般原則和行動與執行方面的建議，並敦促各國政府按照本國結構、需要和目標切實實施這些原則和建議。其中《維也納行動計劃》的原則強調各

國政府在老齡政策的制訂和執行時，應當注意支持對老年人的家庭照顧和社區照顧，「不同形式和結構的家庭是連接各代人的一種社會基本構成單位，應當根據每一個國家的傳統和風俗習慣予以延續、加強和保護」；「各國政府和特別是地方當局、各非政府組織、各志願個人及志願組織包括各種老年人協會應為家庭和社區中的老年人的支援和照顧工作做出重大的貢獻。各國政府應當支持和鼓勵這種性質的志願活動。」（聯合國，1982）

1.2. 《維也納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後續行動

《維也納行動計劃》實施以後，為了進一步推動全球老齡事業的發展，聯合國又採取了一系列的後續行動：

(1) 1990 年，第 45 屆聯合國大會第 45/106 決議決定 10 月 1 日為「國際老年人節」，以引起全球重視老齡化問題。決議中提出節日進行的活動和國家、各大城市和各組織領導人當天發表講話，組織宣傳活動並舉辦青年和老年人討論會等。

(2) 1991 年，聯合國大會第 46/91 號決議通過了《聯合國老年人原則》，讚賞了老年人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強調要使老年人得到社會的保障和照顧，確立了關於老年人地位五個方面的普遍性原則：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實現和尊嚴，鼓勵各國政府將這些原則納入本國國家方案。

獨立原則，即老年人應能通過收入、家庭和社會支助以及自助，享有足夠的食物、住房、衣著和保健；享有工作機會和創造收入的機會、接受教育和訓練的機會；應能生活在安全且適合個人選擇和能力變化的環境；應能盡可能地長期在家居住。

參與原則，即保障老年人能夠始終融合於社會，能夠參與制定和執行直接影響其福利的政策、尋求和發展為社會服務的機會、組織老年人運動或協會等。

照顧原則，即老年人得到家庭和社區的照顧和保護；得到醫療、保健、社會和法律服務；居住在任何住所、安養院或治療所時，均應能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自我實現原則，即老年人應能追尋充分發揮自己潛力的機會；應能享用社會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娛資源。

尊嚴原則，即老年人生活應有尊嚴、有保障，不受剝削和身心虐待；應受到獲得公平對待，不論其經濟貢獻大小，均受到尊重的原則。（[聯合國，1991](#)）

(3) 1992 年，即《維也納行動計劃》通過並實施十周年之際，聯合國大會召開了老年問題國際會議，通過了《1992-2001 年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全球目標》（47/339 號決議，以下簡稱《全球目標》）和《世界老齡問題宣言》（47/5 號決議），指明了進一步執行《維也納行動計劃》的方向。

《全球目標》有以下八個方面：(1) 制定國家目標和指導原則；(2) 國家（老齡）基礎設施的基本目標。主要講建立國家各級老齡機構及其活動的規則；(3) 健康和營養目標。主要講如何保持老年人終身健康的各級、各項預防、基礎和公共衛生；(4) 住房和生活環境目標。主要講老有所居和按老年人意願的居住安排；(5) 家庭目標。主要講老年人在家庭的地位，幫助做好家庭照顧，對家庭提供服務等；(6) 教育和宣傳媒介目標。主要講對老年人提供資訊、掃盲教育和繼續教育和在整個社會中進行老齡教育等；(7) 社會福利目標。主要講通過立法確保老年人獲得公平的社會福利和做好正式與非正式照顧工作；(8) 就業和收入保障目標。主要是對老年人收入保障計劃和對無收入老人納入安全網的國家計劃等。（鄔滄萍，2006）

《世界老齡問題宣言》重申歷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有關老齡化問題決議的必要性，要求國際社會促進執行《維也納行動計劃》，廣泛宣傳《聯合國老年人原則》，支持實現《1992-2001 年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全球目標》，全面加強老齡工作。此外，宣言還促請聯合國將 1999 年定為國際老年人年。這是對《維也納行動計劃》的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標誌著全世界對老齡化問題認識的深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老齡化問題。

(4) 1997 年第 52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秘書長關於 1999 年國際老年人年的框架報告，將 1999 年設立為國際老年人年，並將 1995 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世界首腦會議主題「人人共用的社會」應用到老齡問題，確定國際老年人年的主題為「建立不分年齡人人共用的社會」，強調代際間在互惠與平等

原則下，對社會做出貢獻同時分享社會發展成果。國際老年人年慶祝活動的概念框架在 4 個方面的問題展開：老年人的處境；終身的個人發展；代與代之間的關係；發展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關係。

(5) 聯合國主要會議和各國首腦會議和其通過的文件也對推動老齡問題的政策框架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會議和文件包括：1978 年國際初級衛生保健大會《阿拉木圖宣言》、1993 年世界人權會議《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1994 年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行動綱領》、1995 年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動綱領》、1995 年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和 1996 年第二次聯合國人類住區會議關於人類住區的《人居議程》和《伊斯坦布爾宣言》、2000 年世界教育論壇《達喀爾行動綱領》、2000 年大會第二十四屆特別會議《關於社會發展的進一步倡議》和 2000 年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聯合國千年宣言》。(聯合國，2002a)

1.3. 第二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

2002 年，聯合國第二屆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出席大會的有 160 多個國家和地區政府、非政府組織組織、老齡問題專家、學者等共約 5000 餘人，參會人數比第一屆世界老齡化問題大會增加了 4 倍。大會全面回顧了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以來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進一步敦促國際社會高度重視老齡化問題，特別還重點討論了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問題。這次大會通過了《政治宣言》，並結合新世紀的社會、文化、經濟和

人口方面的實情，制定了新的行動計劃，即《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以下簡稱《馬德里行動計劃》），要求國際及國內的所有政策議程，以及促進社會權利、經濟權利和人權發展的其它重要文件，都要把老齡化問題擺在主要的位置上。

《政治宣言》共 19 條，重申了這次會議是為了應對 21 世紀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機會和挑戰，並促進發展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用」的社會。其中第 5 條「我們重申決心不遺餘力地促進民主，加強法治，促進性別平等，並增進和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發展權。我們決心消滅一切形式的歧視，包括年齡歧視。我們確認，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他們應當享受充實、健康和有保障的生活，並應積極參加各自社會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我們決心增進對老年人尊嚴的認識，並消除對老年人的一切形式的忽視、虐待和暴力。」集中表達了對老年人保護的政治目標。第 13 條則宣導老年人的保護需要通過「中央政府、地方當局、民間社會、包括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志願者和志願組織、老年人自己、老年人協會以及家庭和社區共同努力。」第 15 條明確「除了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之外，家庭、志願人員、社區、老年人組織和其他社區組織可在向老年人提供非正規照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聯合國，2002b）

2002年《馬德里行動計劃》是對1982年《維也納行動計劃》的傳承和發展，其總目標是「確保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夠有保障、有尊嚴地步入老年，並作為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參與社會。」它總結了1982年以後對老齡化問題的新認識，提出行動建議，要求各成員國務必努力在以下三個優先方向促進老年人保障：

老年人與發展；關注老人健康與福利；確保老年人有利的支助性環境。

老年人和發展，包括促進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發展進程、為老年人提供就業和教育機會、改善農村地區老年人境況、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和預防老年人貧困，以及加強世代之間的團結等問題。其中加強世代間團結的問題上，《馬德里行動計劃》指出在家庭和社區兩級，世代之間的聯繫對所有人都很寶貴，老年人也不例外。老年人應與家庭保持密切聯繫；老年人在受到家庭照顧的同時，可以在孫子輩和其他親屬的教育和照料方面發揮作用。因此各社會部門都應該鼓勵加強這種聯繫，鼓勵建立世代之間的平等互惠的關係。同時計劃還關注了老年人的不同生活安排，指出應當對不同文化和背景下老年人與親屬共居和老年人獨立生活的利弊進行研究。

關注老年人健康和福利，包括致力減少老年人疾病、加強老年人保健服務、培訓護理人員和保健專業人員、關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需求和加強對殘疾老年人的保護等。

確保有利的支助性環境，包括改善老年人的住房與生活環境，加強老年人的照顧和對照顧提供者的支持，消除家庭、社區和養老機構對老年人的忽略、虐待和暴力，改變公眾對老年人的形象等。在老年人的照顧問題上，《馬德里行動計劃》指出，老年人的照顧，大多數是由家庭和社區進行的，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各國應當通過公共政策，建立和加強切實提供預防、治療、照顧和支助服務所必需的人力資源以及保健和社會基礎設施，以加強和鞏固這種提供

照顧的制度。各國應建立正規和非正規的社會支助制度，採取措施以提供社區照顧和支持家庭照顧，包括加強家庭成員在家庭內照顧老年人的能力，尤其是向人數日益增多的年老體弱的人提供長期支助和服務；促進社區護理的發展以支持家庭護理。

《馬德里行動計劃》指出，執行計劃將需要在各個層次持續採取行動。各國政府應採取國家行動將計劃的概括性建議付諸執行，將老齡化問題和老年人的關切納入國家發展框架和消除貧困戰略的主流，建立老齡化問題機構和國家委員會，加強政府、民間社會各方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等，並且強調非政府組織在支援各國政府實施、評價和後續落實《馬德里行動計劃》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除國家行動外，《馬德里行動計劃》認定，一個不斷老化的社會帶來的挑戰還必須通過全球發展議程來解決，針對老齡化問題制訂的政策必須納入國際一級的跨部門的政策、方案、目標和優先事項。在國際行動執行計劃上，面對全球化日益深化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必須加強國際合作，支援和援助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實施計劃；聯合國各機構，包括各基金和規劃署、系統行政首長協調委員會、經濟和社會事務部、聯合國各區域委員應切實履行計劃執行中的職責。（聯合國，2002a）

1.4. 《亞洲及太平洋老齡化問題澳門行動計劃》及其後續行動

亞洲及太平洋（以下簡稱亞太）地區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同時也是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地區。2002年，全球52%的老齡化人口生活在這一地區，

預計到 2025 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 59%。近年來亞太各國已充分認識到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相關政策和財政上的影響及其所構成的挑戰。(United Nation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 ESCAP], 2003) 亞太經濟和社會理事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Pacific [ESCAP]) 和本區域各政府進行合作，制訂了人口老齡化區域和國家政策指南。

1998 年底，亞太各國政府聚集澳門，通過了《澳門宣言》和《亞太老齡化問題澳門行動計劃》(以下簡稱《澳門行動計劃》)，並於 1999 年獲得經濟和社會理事會 (以下簡稱經社會) 通過 (見經社會決議 55/4)。《澳門行動計劃》在 1982 年《維也納行動計劃》和 1992 年《世界老齡化問題宣言》等國際老齡化問題檔的基礎上制定，與 2002 年聯合國通過的《馬德里行動計劃》有許多相同與共通之處。在老齡化問題上，《澳門行動計劃》強調以下七個方面的關注：(1) 老年人的社會地位；(2) 老年人與家庭；(3) 健康和營養；(4) 住房、交通和環境；(5) 老年人與市場；(6) 收入保障與就業；(7) 社會服務和社區。計劃還指定亞太經社會為本區域老齡化及老年人事務聯絡中心，與會各政府承諾建立組織系統，解決老齡化問題。(Chan & Phillips, 2004)《澳門行動計劃》為各成員國制定和實施本國老齡政策建立了合作與經驗分享的地區平台。許多政府此後都通過了國家老齡化行動計劃，貫徹澳門指南。

2002 年 6 月，亞太經濟與社會委員會秘書處對國家老齡政策和計劃進行了一項區域性調查。同年 9 月，第二次老齡化問題大會亞太區域後續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審查了該區域性調查的結果，並確定了執行《澳門行動計劃》和《馬

德里行動計劃》的優先方向和關鍵行動。會議通過了《上海執行策略：馬德里國際老齡化問題行動計劃及亞洲及太平洋老齡化問題澳門行動計劃區域執行策略》（以下簡稱《上海執行策略》Shanghai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SIS]），為兩項計劃的執行制定了更加具體的政策框架。《執行策略》宣導各國政府在以下四個領域開展行動：（1）老年人與發展；（2）促進老年人的健康與福利；（3）確保能動和支持性環境；（4）執行和後續行動。其中，在確保能動和支持性環境方向，《執行策略》強調了本地區家庭和社區對老年人的重要支持作用。策略指出雖然家庭為老年人提供照顧的能力由於城市化和勞動力遷移等因素而受到壓力，但家庭仍然是絕大多數老年人最重要的照顧提供者。儘管加強傳統照顧體制和代際團結以及支持缺乏家庭照顧的老人被認為十分重要，但根據2002年的區域調查，不少國家沒有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援（如居家服務、老年人照顧培訓等）給予足夠的重視。為了保證家庭和社區繼續發揮對老年人的重要照顧作用，政府和其他相關因素必須提供強力的支持：（1）採取措施加強家庭凝聚力和代際團結；（2）發展和加強社區服務，以支援老年人和家庭照顧者，使照料老年人的責任能在個人、家庭、社區、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間得到合理的分擔。

（UN ESCAP，2003）

2004年10月，為了指導和協助亞太各國對《上海執行策略》的審查和評價活動，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在澳門召開了區域研討會，提出了《審查和評價〈上海執行策略〉的指導方針》（Macau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Shanghai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以下簡稱《指導方針》）。《指導方針》旨在協助各成員國收集《上海執行策略》執行情況的相關資訊，為各成員國評價

本國老齡政策形成議定書，以及為各成員國提供評價工具和指標的建議。由於《上海執行策略》不僅由政府機構負責實施，也強調民間社會和私人部門在執行和監督行動計劃中的作用，因此《指導方針》除由各國制定和實施老齡政策的政府機構使用外，還適用於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私人部門以及老年人自身對政策實施過程和結果的監督。《指導方針》不僅提供了評測執行情況的指導原則和具體方法，還列舉了一些地區的良好實踐，以供各國借鑒參考。

《指導方針》確定了自下而上的參與方法，鼓勵成員國通過分享觀念、資料和不斷改進的實踐來促進計劃的實施。自下而上的參與方法是一個開放的、參與性的過程，它強調老年人應當有機會就地方到國家層面的政策行動對其生活的影響表達意見，能夠參與包括政策制定、實施、監測和評估在內的所有階段的老齡化問題政策行動。通過這種自下而上的參與方法，老年人的需求能夠順暢地從地方傳遞給國家政府，從而使老齡政策的相應變化能夠滿足不同地域和社區的老年人的需求。方針還提出了一系列審查和評估《上海執行策略》實施情況的指標，這些指標可大致分為兩類：工具性指標和結果性指標。前者主要是定量指標，主要用於評估老齡政策的有效性、範圍和覆蓋率。後者主要是定性指標，主要用於評價老齡政策和正負面影響。在相關資料的收集上，《指導方針》建議通過對老年人、相關利益者、社區訪談和小型調研等管道收集基本資料，結合從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學術機構等獲得的次要資料的補充，來分析和評估現行老齡政策的影響。這種從不同層次的參與者獲得資料的持續過程，可以成為有效的政策監測和評價機制，從而使各國老齡政策能夠定期得到必要的改進。對所收集的資料的分析和解釋應由當地的、區域的和全國的不同

層面的不同參與者同時進行。通過對執行計劃的快速審查和反思，個人和社區對於老齡政策的意見才能被及時的傳遞給全國政策的制定者和其他各層次的參與者，以改進老老齡行動計劃的實施。

《指導方針》為成員國提供了一個在老齡政策和行動上交流和合作的資訊框架，也為《澳門行動計劃》和《馬德里行動計劃》的實施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評價機制。方針建議，在未來，成員國間應當召開常規性會議，以改進審查和評估的指標和方法，並在亞太經濟和社會委員會內建立中央資料庫。該資料庫將供各國交流經驗，並提供更多的全面的資料和資訊以檢測各項政策是否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質。(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DESA PD], 2007)

參考資料

Chan, A. C., & Phillips, D. R. (2004). *Macau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Shanghai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Hong Kong: 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Ageing Studies, Lingnan University.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DESA PD]. (2007).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0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 ESCAP]. (2003). *Shanghai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Region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or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ing 2002 and the Macao Plan of Action on Aging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9*. Retrieved July 12, 2009, from <http://www.unescap.org/esid/psis/ageing/strategy/shanghai.pdf>

鄔滄萍. (2006). *老年學概論*.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聯合國. (1982). *1982 年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 6 月 12 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un.org/chinese/esa/ageing/vienna1_2.htm

聯合國. (1991). *聯合國老年人原則*. 5 月 20 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un.org/chinese/esa/ageing/principle.htm>

聯合國. (2002). *2002 年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 12 月 5 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ageing/ecn5-01pc19.pdf>

聯合國. (2002). *馬德里政治宣言*. 5 月 5 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un.org/chinese/esa/ageing/declaration.htm>

附件二. 概述部份國家的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

目錄

1. 美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2
2. 德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6
3. 澳大利亞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12
4. 俄羅斯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17
5. 日本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21
6. 韓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23
7. 印度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28
8. 新加坡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30
9. 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34
參考資料.....	39
附註.....	45

1. 美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美國建國二百多年，現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 2.8 億多人口的發達國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經濟危機，使美國認識到，唯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使人民生活有一定的保障，社會才能安定。

1935 年，美國頒佈了《社會保障法》，此舉標誌著救助貧困者的責任由地方組織、民間組織轉向了聯邦政府。《社會保障法》中重點就是關於老年人的主要條款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授權州建立老年救助制度，支持州建立老年福利專案；第二章——建立聯邦老年保險制度，即全國範圍內大多數僱員必須參加的老年保險制度。美國「老年保險計劃」從 1935 年設立以來，無論在保險物件、受益範圍、管理辦法及稅率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35 年設立之初，《社會保障法》規定只有退休人員才能領取退休金。1939 年修正案增加了相關受益者，即退休人員的配偶和未成年兒童，這一改變使得社會保障項目成為了以家庭為基礎的保障項目；1939 年修正案增加了遺屬撫恤計劃；1956 年修正案又增加了殘疾人福利計劃，為年齡在 50 ~ 64 歲的殘疾工作人員及其殘疾子女提供補助金，至此三者合稱「老年、遺屬和殘疾保險」(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OASDI])，即我們通常所稱的美國社會保障制度。1956 年修正案還允許女性工作人員在 62 歲到 64 歲之前退休領取減額退休金，1961 年把這一規定擴大到男性工作人員。1965 年修正案增加了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老年人獲得醫療保障。1972 年修正案，建立了補償保障收入制度，引入了退休金調整機制。1975 年退休金開始根據消費價格指數每年進行調整，但這種

調整出現了問題，因為按照當時的調整方案，退休後的月收益比工作時還要多。因此在 1977 年的修正案中又進行了修正。到 1995 年，「老年、遺屬和殘疾保險」項目已使 4300 萬美國人受益，這些群體包括，2600 萬退休人員，600 萬退休人員配偶和兒童，700 萬退休人員的遺屬和 400 萬殘疾人。[\(上海市民政局，2009\)](#)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06 年統計，美國有約 3550 萬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12.1%。[\(U.S. Census Bureau，2006\)](#) 如果沒有社會保障，近乎半數的美國老年人口要陷入貧困。

1965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醫療保險法案》、《醫療救助法案》，修訂了《社會保障法》，增加了以老年人為服務物件的醫療保險制度以及低收入老人、盲人、殘障者、兒童和懷孕婦女為服務物件的醫療救助制度等條款，並於 1966 年 7 月起實施。此兩項法案現已成為美國老年人醫療保健制度的主要立法。在此之後，美國國會多次通過法令，擴大老年醫療保健服務物件的範圍和老年醫療保健的服務專案。服務物件和專案的擴大無疑加重了老年醫療保健計劃的財政負擔，同時自 90 年代以來，隨著嬰兒潮一代步入老年，醫療服務費用迅速上升的情況更加嚴重，老人醫療服務的費用以 3 ~ 4% 的速度快於整個經濟的增長，老年醫療保健計劃面臨著破產的危機。1997 年，克林頓總統時期，平衡預算法([The Balanced Budget Act of 2007](#)) 通過。這項法案對老年醫療保健計劃進行了自建立以來最大的改革，旨在降低老年醫療保健計劃信託基金的赤字，改革的主要內容有：(1) 增加老年保健計劃選擇的新內容，讓參加者有機會到自由市場選擇其他保險計劃；(2) 對老年醫療保健計劃的其他服務實行和住院費用一樣的預定報銷額制度，降低醫療服務者付費上漲的速度，以控制費用的增長；(3)

擴大對疾病預防的服務；(4) 將家庭護理服務從醫院保險轉入補充醫療保險部分。(上海市民政局，2009) 1999 年，為了減輕平衡預算法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衝擊，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先後通過《醫療保險平衡預算修正案》(The Medicare Balanced Budget Refinement Act of 1999) 和《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預算修正案》(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Budget Correction and Refinement Act of 1999)，對 1997 年的法案作了修改，對包括醫院門診服務、住院服務、家庭醫療保健和專業機構護理服務等在內的醫療服務，鬆動了某些付費原則，包括提高聯邦對部分服務的付費和延遲付費降低計劃等(O'Sullivan, Merck, Smith & Tilson, 1999)。

1965 年國會又通過了《老年人法》，截止到 2000 年該法先後進行了 13 次修改，已從最先的物質生活保障擴展到目前的物質、營養、健康、就業、教育、居住、護理等全方位的保障。《老年人法》還設立聯邦老齡署，專門負責全國的老齡事務，州和地方政府也相應建立了組織機構以管理老齡專案。《老年人法》頒佈後，美國相繼出台了《老人志願工作方案》、《老年人營養方案》、《多目標老人中心方案》、《老年人社區服務就業法》、《老年人個人健康教育與培訓方案》。除了以上直接影響老年人生活的社會福利立法外，還有一些非專為老年人而設，但是與老年人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社會福利立法，如《食品券法案》、《住房補助法》等。(程勇，2009)

受社會文化的影響，美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強調「國家責任」和「自我責任」，不夠重視家庭的作用。但仍有 30 個州立法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法律責任，要求有經濟能力的子女，在年邁父母難以自我供養時，必須為其提供充

分的食品、衣物、住房和醫療照顧等。有 21 個州通過民事訴訟，12 個州通過刑事處罰，來保證子女贍養責任的履行。(Parkula, 2005) 近年來聯邦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法律支持家庭養老。1993 年聯邦政府頒佈了《聯邦家庭與醫療病假法》(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of 1993)，在第 102 ~ 104 款規定擁有 50 人以上的企業必須給予需照顧病重家人的全職僱員（要求職員在企業工作超過 12 個月，且在過去 12 個月中工作超過 1250 小時）長達 12 周的不帶薪假期，員工在休假期間仍有權獲得企業的各種福利，休假後仍保持原有的或獲得等同於原職位的職位、福利等工作狀況。這項法律通過給予在職員休假時間和待遇保證，使病重老人能更好地獲得家人的照顧。(Bengtson, Kim, Myers & Eun, 2000)

2000 年美國國會再次通過《老年人法修正案》，建立起全國家庭照管者支援項目 (The 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 Support Program)，向各州提供資金，支持照顧老人（60 歲以上）的家庭和那些照顧孫子孫女的祖父母。2003 年有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資金用於那些提供照顧的家庭，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 有關當前支援專案的資訊以及如何接觸這些專案；(2) 提高照顧方式效果的培訓；(3) 使得照顧者暫時從照顧責任中解脫出來得以休息的費用。(Anderson & Wilde, 2008)

政府還通過了「社會服務街區補助計劃」(The Social Services Block Grant Program)，以健全社區養老服務，為老年人提供家政服務、運輸、供給膳食等各種服務專案，說明老年人在家裡獨立活動。(陳潔君, 2006)

此外，有 34 個州政府還對贍養父母者提供減稅或支付補貼等的優惠。表 1 概括美國在 20 世紀有關老年權益保障的立法：

表 1：美國聯邦政府關於老年人權益保障的主要立法

年代	年份	與老年人相關的立法
20 世紀 30 年代	1935 年	《社會保障法》
	1937 年	《房屋法》
20 世紀 60 年代	1964 年	《食品券法》
	1965 年	《老年人法》
	1965 年	《醫療保險法》
	1965 年	《醫療救助法》
	1967 年	《年齡歧視就業法》
20 世紀 70 年代	1970 年	《城市公共交通法》
	1974 年	《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
	1975 年	《禁止歧視老年人法》
	1978 年	《房屋和社區發展法案》
20 世紀 80 年代	1984 年	《退休平等法》
	1987 年	《公共預算調整法》
20 世紀 90 年代	1990 年	《殘疾人法案》
	1993 年	《家庭和醫療病假法案》

資料來源：上海市民政局¹

2. 德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德國是歐盟中一個核心成員的發達國家。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統計，2004

年德國人口達 8,250 萬人，佔歐盟 25 個成員國總人口的 18%，但是，其中 15 歲以下人口比例僅為 14.7%，而 65 歲以上人口則已達 18.2%，德國也是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本世紀內均為負增長，到 2100 年才出現正增長。(湘君，2007) 可見養老保障對德國的重要性。

德國是世界上最先建立現代養老保障制度的國家之一，經過多年的努力，已經構建起一個從國際公約到國內立法的多層次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律體系。

在國際公約層面，作為歐盟成員國，德國締結並遵守《歐洲社會憲章》(1996 年通過，1999 年生效)，憲章第 23 條指出「每個老年人享有社會保障權。為保障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權，締約國同意直接或與有關組織合作，採取適當有效措施：(1) 為老年人提供足夠的資源，使之能夠體面生活。為老年人提供服務設施和服務資訊，使老年人能夠在身體、心理和智力方面盡可能長久地作為社會的完整成員。(2) 為老年人提供適合其需要和健康狀況的住宅（或相應足夠的資助）。提供必要的健康保健服務，使老年人能夠自由選擇生活方式，並在其熟悉的環境中過他們所希望的獨立生活。(3) 保證生活在社會事業機構中的老年人得到適當資助，同時尊重他們的隱私並能參與該機構有關生活條件的決策。」此外，2000 年通過的《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25 條也規定「聯盟承認和尊重老年人享有體面地和獨立地生活權利以及參加社會文化生活的權利。」

在國內法層面，德國也相繼建立了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護理保險等在內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並在民法典中確認了家庭在養老方面的責任。

早在 1889 年，德國俾斯麥政府就頒佈了《傷殘和養老保險法》創立了法定養老保險制度，該制度最初只適用於產業工人，覆蓋 1/5 的從業人員和 1/10 的人口。1911 年，德國政府將法定養老保險適用範圍擴展到職員和遺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的自由行業工會成員增長迅速，這對養老金立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57 年的《養老金改革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 1989 年間最為重要的養老金改革。此前，養老金的目標一直是確保沒有其它撫養選擇的養老金領取者的生活水準，而 1957 年則改為在所有僱員退休時維持其退休前的相對生活水準。立法修改了養老金的計算公式，建立了基於總工資指數的養老金調整指數，退休時養老金的價值是以投保時間和該僱員該年相對於平均工資的工資為基礎的，從而使退休者也能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趙立新，2008）按照這一新原則設計的養老金，其發放金額隨全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提高和提高。同年，政府還頒佈了《農民老年救濟法》，將農業勞動者也納入法定養老保險範圍。

1972 年，政府再次對法定保險制度進行改革。改革法案引入了靈活退休年齡規定，規定有 35 年以上工齡的僱員在提前退休時（63 歲退休）可以拿到全部養老金，同時法律允許家庭主婦參加這一計劃。另一改革是對已經工作了 25 年及以上的低工資工人的養老金計算方式的改變。如果某人的養老金低於某一特定水準，允許用該時期平均工資的 75% 來代替其工資數，這使養老金更具有最低工資救濟金的功能。

為了彌補法定養老保險在保障水準上的不足，政府還鼓勵僱主為職員辦理企業養老保險。企業養老保險採取「直接支付原則」，即職工在工作期間繳納了多少養老保險費，退休後他就能得到相應數額的養老金，故屬於積累制的養老保險。職工繳納的企業養老保險費佔工資的比例每年由行業勞資部門和政府協商決定，且這部分養老保險可以享受稅收優惠。1974 年 12 月德國頒佈《改進企業養老金法》，對企業養老金的失效時限、企業養老金的調整、無償債能力保險和稅收等問題作出了規定。雖然政府以立法形式對企業養老保障進行了規範，但是，是否引入企業養老金及其數額高低、實施方式等仍由僱主自由決定。（鄭春榮，2000）

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人口老齡化加劇，養老保險繳費者（20 至 60 歲的就業者）和養老金領取者（60 歲以上）人數之比不斷降低，以及經濟發展的放緩，使得建立在現收現付制度基礎上的德國養老保險體制出現危機。在體制內部，危機主要表現為支出的急劇增長和不堪重負，繳費諸方如僱員、僱主和公共財政幾近極限。政府財政赤字嚴重，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自主經營能力和競爭力受到削弱。為了應對危機，政府不得不對養老保險制度再次進行改革。

1989 年政府制訂了《1992 年養老金改革法》，1996 年科爾政府又制訂的《1999 年養老金改革法》，對養老保險法作出了以下幾方面的修訂：（1）推遲退休年齡，限制提前退休。1992 年改革法案規定正常退休年齡推遲至 65 歲，並規定了嚴厲的懲罰提前退休措施（每提前一年，養老金削減 3.6 %）；1999 年改革更是將重殘、無從業和無職業能力者退休年齡從 60 歲提高到 63 歲。（2）在養

老金計算中，1999 年改革法案引進人口因素，降低養老金標準。通過削減每月領取的養老金數額，延長養老金發放的總年份，以平衡因老年人口平均餘命延長所帶來的養老金支出缺口。(3) 通過重新劃分傷殘標準，將不易操作的無從業能力和無職業能力養老金改為從業能力減退養老金。工作能力下降的評估和養老金的領取，只取決於當事人的健康狀況而不管勞動力市場的狀況。然而 1997 年施羅德政府上台後就迅速取消了科爾政府的 1999 年養老金改革法案中的許多規定，如暫停兩年實施 1999 改革法中有關養老金待遇計算公式中的「人口因素」規定；取消原法有關重殘、無職業和從業能力養老金領取年限，推遲至 63 歲及提前退休須扣罰等條例。(丁純，2000)

但是，鑒於人口老化、養老保險費進一步攀升的壓力，施羅德政府也不得不採取措施。1998 年 6 月 23 日，政府正式向議院和公眾提交和公佈了名為《革新德國：聯邦政府保障就業、增長和社會穩定的未來計劃》。該方案最引起爭議的是在 2000 和 2001 年，養老金水準將中斷現行的按淨工資增長作相應調整的作法，恢復 1992 年改革前按通脹率核算的方法。而預計今後兩年的淨工資增長率將達 3.15 %，而通脹率卻為 0.7 % 和 1.6 %。實際支付水準下降了。2002 年，德國政府推出了「里斯特改革方案」，希望通過補助和稅收優惠的形式鼓勵個人在參加法定養老保險的同時也參加其他養老保險。該方案規定現就業者每年投保一個附加養老金，投保額逐年增加。同時，政府專門負責對養老保險提出改革意見的「呂魯普委員會」建議，減緩養老金的增長並逐步降低養老金水準，使法定養老保險適應人口結構的變化。(同上註)

早在 1883 年德國國會通過《疾病社會保險法》，建立了法定醫療保險制度，並在 20 世紀經過數次改革，這項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為老年人的晚年健康提供了保障。就法定醫療保險而言，保費多少取決於投保人的經濟收入，但享受的醫療服務則不以保費高低而有所區別，這一原則使健康人與患病者、高風險者與低風險者、單身與家庭、年輕人與老年人、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等之間實行共濟互助，體現「公平」宗旨。目前，德國八千多萬人口中，90% 以上參加了法定醫療保險。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德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德國醫療保險體系也面臨嚴峻挑戰。首先收繳保險費的增長速度趕不上醫療保險費用支出的增長速度，即入不敷出的矛盾日趨尖銳；其次，德國醫療保險體系完全在國家監控之下運轉，內部競爭不足，存在大量資源浪費、效率低下的問題。

有鑑於此，德國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對醫療保險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81 年 12 月頒發了《第一次醫療保險費用控制方案》，1989 年，政府頒佈了《衛生改革法》，以建立保險及醫療機構的競爭機制，樹立成本意識。2004 年施羅德政府開始實施《法定醫療保險現代化法》，對醫療保險制度進行大幅改革，在繼續堅持團結互助、社會共濟的基礎之上，增強國民對醫療健康的「自我責任」：一方面鼓勵投保人積極參與疾病預防和及早診治計劃，一方面要求投保人個人承擔部分醫療費用。（於濤，2005）改革後，德國法定醫療保險佔整個衛生事業支出的比例從 2003 年的 60% 降至 2004 年的 56%，而私人保險支出比例上升，暫時緩解了醫保支出無限膨脹的不利局面。（呂鴻，2007）

除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外，德國還在 1995 年實施《護理保險法》建立

起老年護理保險制度，以增強對老年人的長期照顧。該法規定除了國家官員、法官和職業軍人外，其他公民都應參加護理保險。僱主和僱員共同繳納保險費，在年老需求護理時，由保險提供居家護理和機構護理兩大類服務，服務的提供既可以是相關機構提供的實際護理服務，也可以是發放現金津貼由老年人自行選擇和支付護理服務的提供者。《護理保險法》還確立了護理保險跟從醫療保險的原則，即所有醫療保險的投保人都要參加護理保險。目前，德國參加法定醫療保險人口的覆蓋率已達 90%，（戴衛東，2007）因而護理保險也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人群，有效地減輕了中低收入家庭在未來步入老齡階段或遭遇病殘時購買護理服務的經濟負擔，切實有效地保障了老年人和病殘者應該享有的基本護理權利。

在家庭養老上，根據《德國民法典》關於家庭成員間扶養義務的規定，有能力的成年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項義務可通過民事法庭和行政法庭強制執行。

3. 澳大利亞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早在 1900 年，澳大利亞的一些地方政府如新南威爾士和昆士蘭就已建立了養老金制度，而澳大利亞聯邦關於養老金制度的首次立法則是 1908 年眾議院頒佈的《傷殘和老年年金法》（The Invalid and Old-Age Pension Act 1908）。該法所確立的政府養老金制度向年滿 65 歲的老年人提供養老金，但最初，政府養老金給付標準較低，每人每年只有 26 英鎊，僅相當於當時在職職工平均工資水準

的 20 ~ 25%，且個人還必須符合數項標準才能獲得領取養老金的資格。如他必須在澳大利亞居住 25 年以上並具有良好的品格（由特別地方官員判斷）。當時澳大利亞原著民、亞非裔人以及來自太平洋群島的土著人均被排除於此項制度外。此外，與一些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同，這項養老金制度屬於非繳費型的，養老金來源於政府當年的財政收入，但公民要獲得養老金領取資格，必須經過收入和財產審查。在當時，凡每年收入超過 52 英鎊或總財產超過 310 英鎊則不能再獲得退休金。（Skwirk，2011）

多年以來，政府養老金被長期認為是特權而非廣大民眾的權利。直到 1966 年改革，澳大利亞原著民才獲得領取養老金的完整權利；1974 年改革，才明文取消了由地方官員判定申請者是否具有良好的品格以獲得養老金領取的資格的規定；1975 年改革才建立起關於養老金領取的申訴權。隨著政府不斷的努力和改革，到 2004 年，此項養老金的覆蓋率已達到 72%（1910 年僅為 34%）真正成為全民性的福利養老制度。（Macklin，2008）

由於政府養老金的支付標準僅相當於在職公民平均工資水準的 20 ~ 25%，略高於國家貧困線，對多數澳大利亞人來說，這樣的保障標準顯然是偏低的。但是澳大利亞一直沒有實行西方多數國家採取的標準較高的公共養老保險計劃。不過早在澳大利亞聯邦成立以前，各自治州政府僱員和銀行職員中就實行一種職業年金計劃。1915 年，政府開始對職業年金計劃實行稅務減讓，1936 年進一步放寬了稅務減讓的條件。但直到 80 年代中期，職業年金計劃依然局限於政府及公營部門，私營部門只有 30% 左右實現了類似的安排。（中華會計網校，

2006)

1983 年新一屆工黨政府上台，為了實現增加國民儲蓄、提高未來退休工人更多的養老金和減輕政府的長期財政預算的壓力等目標，在其執政的 1983 年至 1996 年的 13 年期間，通過立法進行了如下改革：(1) 加強了對收入和財產的審查制度，重新制定養老金標準。經過收入和財產審查後，最終養老金的受益以低比例的受益為準。(2) 為了鼓勵工人將養老金保存到退休時享用，澳大利亞政府在 1983 年制定了兩項政策，一項是允許澳大利亞工人調換工作時轉移養老金，另一項是如果提前（55 歲前）支取養老金將受到嚴厲的懲罰，其必須支付 30% 的稅。(3) 1985 年澳大利亞政府和總工會、總商會達成一項協定，企業主為每個工人繳納工資 3% 的養老金到獎勵養老基金以取代工資的增長。這一協議於 1986 年開始執行，到 1991 年已經有 72 % 的澳大利亞工人參加了獎勵養老保險計劃。1992 年澳大利亞政府將獎勵養老保險計劃進一步推廣到全體澳大利亞工人，稱澳大利亞養老金保證計劃。企業主必須將不低於工人工資 3 % 的資金繳入工人養老金帳戶（這一比例將逐年提高）。同時，也強制工人繳納一定比例的資金到個人的養老金帳戶上。逐步建立起政府養老金以外的「第二層次」養老保險——職業年金制度。在此之後，職業年金計劃迅速擴大到所有私營部門，1999 年的社會覆蓋面達到 92%。

1996 年由自由黨和國家黨聯合執政的政府，對養老金保證計劃又進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包括優惠的稅率和提供給工人更多的選擇基金的權力等。(蔣岳祥，2001)

聯邦政府於 1973 年頒佈了《國家健康保險法》(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1973)，實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為老年人提供了健康保障。該法規定，每個居民都必須參加醫療保險，所有居民均可免費在公立醫院得到基本醫療服務。國家健康保險基金一部分來源於公民繳納的 1.5% 收入稅 (20%)，其餘則來源於政府的財政撥款 (80%)。雖然澳大利亞實行全民醫療保險，但由於《國家健康保險法》明文規定，在公立醫院就診時病人無權選擇醫生和病房，也不享受優先住院和治療。因此，在澳大利亞，大約有 40% 的居民同時購買私人醫療保險。

除了養老金制度、健康保險制度外，澳大利亞政府還特別注重通過立法構建老年人照顧服務體系，如通過 1954 年《老年人家庭法》(Aged Persons Homes Act)、1956 年《家庭護理補貼法》(Home Nursing Subsidy Act)、1969 年《家庭照顧津貼法》(States Grants [Home Care] Act) 和《護理機構津貼法》(States Grants (Nursing Homes) Act)、1972 年《老年人公寓法》(Aged Persons Hostels Act) 和 1974 年《護理機構援助法》(Nursing Homes Assistance Act) 等法律，促進了老年人的居家服務和機構服務的發展。八十年代後聯邦政府又頒佈了兩部重要的法律：1985 年《家庭與社區照顧法》(Home and Community Care Act) 和 1997 年《老年人照顧法》(The Aged Care Act)。

澳大利亞人口相對稀少，國土面積大，資源豐富，工農業比較發達，而人口老齡化程度也很嚴重，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 280 萬，佔總人口的 12% 以上。

1985 年開始實施的《家庭與社區照顧法》，是為了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支援家庭養老，幫助老年人提高獨立生活能力，使他們能夠更長期地在家中或社區居住，繼續有尊嚴地生活著，避免老年人過早地進入長期照料機構。服務物件基本上是老年人，服務內容包括居家服務和社區設施服務等。該專案資金由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和各洲政府共同出資，20 多年來全國提供家庭與社區照顧服務的機構已超過 3500 個，接受服務的人數 70 多萬，其中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佔全部服務物件的 80%。(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2008) 政府的這一舉措，對廣大老年群體居家養老、安度晚年發揮了積極作用。

1997 年實施的《老年人照顧法》適用於全國範圍，涵蓋內容很廣，涉及對老年人的居家照顧、社區照顧和靈活照顧等；對照顧服務的計劃、服務提供者的批准、服務的補助以及服務者的責任等相關事項都做出了全面的規定。該法的目標是確保每個老年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照顧服務，而不因國家來源、生活方式、語言、居住環境等因素而遭到拒絕；確保老人的各種服務需求能得到滿足；幫助他們享有與其他群體平等的權利；幫助他們在自己的意願的處所安度晚年；居家照顧者應受到尊重等。2007 年全澳共安排 10518 個照顧老人的點，包括 2377 個社區照顧中心，671 個居家老人照顧和 6525 個居住地老人照顧中心。政府為此每年補助 3.31 億澳元。(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ing, 2008)

4. 俄羅斯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前蘇聯時期，俄國已開始建立養老社會保障制度。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先後頒佈了《勞動者社會保障條例》、《殘恤金條例》、《退休金條例》等社會保障條例。1956 年蘇聯制定了全國統一的《國家退休法》，該法概括了過去實行的 960 多項優撫法令，對退休條件、退休金的數額都作了明確規定，是實行普遍的社會保障措施的一個重要步驟。1965 年蘇聯通過《集體農莊莊員養老金和補助費法》，將享受退休金的範圍擴大到集體農莊莊員。1987 年頒佈的《進一步改善集體農莊莊員老殘撫恤金待遇法》使農莊莊員與全民職工在享受社會保障待遇方面的差別更為縮小。經過多年的修改、補充，蘇聯形成了一套頗為完整的養老社會保障體系，其內容包括：退休金、醫療保健、貧困戶救濟等。（李傳桐，2008）

這種由國家全面承擔的福利型養老社會保障制度，是同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但隨著計劃經濟的弊端日益明顯、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以及人口的老齡化和退休人員數量的增多，國家的財政負擔不斷加重，原有養老社會保障體制已難以維持正常運轉。1987 年蘇聯部長會議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頒佈《關於實行工人、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附加退休金自願保險的決議》，規定採取個人和國家共同集資的辦法設立保險基金，保險基金一半來自個人繳納的保險費，一半來自國家預算，在職人員自願投保，按月繳納保險費，退休後每月可領取 10、20、30、40、50 盧布不等的附加退休金。同時，對一些診所實行經濟核算制，並考慮由各單位自己支付本單位職工的部分醫療費用和設立

部分由個人出資的健康基金。(同上注)但在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職工的一切都依附於國家和企業，要打破由國家統攬一切的社會保障機制並非易事。這種改革嘗試未能取得實際效果。

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濟陷入長期危機之中，加上日益嚴重的人口及老齡化危機，社會勞動力儲備日益減少，使現收現付制的養老金體系無法為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並發揮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至 2001 年，俄羅斯必須靠最低養老金來維持生計的有四百多萬人，然而養老金拖欠以及郵政和銀行系統的問題意味著數以百萬計的俄羅斯人連續幾個月都無法從政府領到他們應得的補助。社會保障體系的失靈是俄羅斯進行艱難的經濟轉軌所產生的最不幸的結果。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以及制度設置自身存在的衝突（如新舊制度同時運行）和來自外部的意見和壓力，也深刻地影響著政府的政策抉擇。(刁莉、高玉芳，2003)如何制定一個與日益嚴重的人口問題和老齡化危機相適應的養老保險制度是俄政府必須要面臨的一個難題。

俄羅斯退休養老制度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以 1990、1991 年先後通過的《國家養老金法案》和《退休養老基金法》為標誌，俄羅斯開啟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第一階段。這兩個法案確立了國家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並確立俄羅斯將從完全由國家撥款的退休金分配制度逐步過渡到同市場經濟原則相適應的，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的養老金分配制度。法案規定養老金由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共同分擔；提高了養老金的最低標準，並實行養老金指數化。養老金給付額根據參保年限和工資水準確定，每 3 個月根據物價變化情況進行

調整，以減小通貨膨脹帶來的壓力；對養老金的計算方式進行改革，新的養老金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按平均收入或最低生活費標準的一定百分比發放，所有退休人員數額都相等，另一部分是浮動的，與領取者的工齡和收入水準掛鉤。然而，隨著人口老齡化，退休人員增多，國家養老基金的缺口變得越來越大。企業除了要繳納養老基金外，還要按照職工工資的 10.5% 來負擔職工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許多不堪重負的企業為了少繳費，紛紛隱瞞職工收入。再加上企業繳費情況與本單位職工領取養老金不掛鉤，時常會造成拖欠繳費，從而造成這一階段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無法得到很好的貫徹與落實。（李傳桐，2008）

俄羅斯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第二階段從 1995 年開始，其核心是建立「三支柱」養老保險制度。1997 年俄公佈了調整後的「三支柱」養老保險制度思路，其主要內容包括：第一支柱：社會養老保險，僅提供給無力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特困人群，其資金由政府財政提供；第二支柱：強制養老保險，它是養老保險體系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國家為所有退休人員建立個人帳戶，提供養老保險，其資金來源於受保者的繳費以及基金的收益；第三支柱：補充養老保險，它是私人管理的退休計劃，所有人員都可以自願參加。但由於 199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之後持續的經濟低迷，「三支柱」養老保險制度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也無法得到很好的落實。

2000 年普京總統上任後，俄政府開始啟動一系列改革，其中首先進行的就是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和稅制改革。這是俄羅斯實施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第三階

段。2001 年年底，俄開始落實「三支柱」養老保險新制度。政府連續出台了 4 個改革養老保險制度的聯邦法案，分別是《俄羅斯聯邦國家養老保險法》（第 166 號）、《俄羅斯聯邦強制養老保險法》（第 167 號）、《俄羅斯聯邦勞動保險法》（第 173 號）和《俄羅斯聯邦稅法及關於稅收和保險繳納金規定的增補與修正》（第 198 號）。這次推行的「三支柱」制度對 1997 年的構想進行了較大的改進與完善，如放棄採用建立在現收現付制基礎上的名義規定繳費，養老保險則由繳費形式變為按統一社會稅的形式繳納等。統一社會稅把原來的 3 種國家預算外基金，即養老基金、社會保險基金、強制醫療保險基金的保險費合併到一起。其中，用於養老基金部分的 50% 要作為養老金基礎部分的保險費交入聯邦財政部門，並通過聯邦財政預算的方式予以發放，另外一半作為養老金保險和積累部分的保險費。這些都標誌著俄對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根本性的變革。（同上注）

除了養老社會保障外，俄羅斯也有較濃重的家庭養老傳統。子女與父母同居並照顧父母的晚年生活是社會上較為普遍的現象。為了維護家庭養老的優良傳統，1995 年俄羅斯聯邦杜馬通過了《俄羅斯聯邦家庭法典》（1997 年修訂）（The Family Code of the Federation of Russia），法典第 87 條、第 88 條明確規定成年子女對父母的贍養責任：有能力的成年子女必須為喪失能力而需要援助的父母提供照顧；如若子女不能與父母達成支付贍養費的一致意見，父母可以通過向法庭訴訟取得贍養費；但是如果父母沒有履行父母職責的時，法庭可以免除子女的支付贍養費的義務。此外，在父母遭遇重病、重傷或需要支付外界說明等特殊情況時，子女也應當向父母提供錢財上的支援。

5. 日本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日本具有健全的老年人法律保障體系。戰後，隨著日本經濟的日益強盛、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和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日本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律制度也經歷了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目前《國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和《護理保險法》四部法律構成了老年人社會保障基礎，它們分別從經濟收入、社會福利、醫療保健和生活護理等方面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楊天博，2007）

1959 年 4 月，日本頒佈《國民年金法》，採取國家、企業、個人共同分擔的辦法，強制 20 歲以上 60 歲以下的全體國民都必須加入國民年金保險，加入期間滿 25 年可在規定的年齡起享受老齡基礎年金。該法從 1961 年起實施，所確立的公共養老金制度可以分為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共濟年金三個部分。1985 年，日本政府對公共養老金制度進行了整合，把國民年金改為包括工薪收入者的全體國民參加的國民基礎年金，把厚生年金、共濟年金改為工薪勞動者的第二層次年金。（姜向群，2005）養老金制度的實行，為老年人退休後的生活經濟來源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日本在發達國家老齡化社會發展中，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 65 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已達 2234.3 萬，佔總人口的 17%，而增速極快；二是日本人均壽命已成為世界上最長的國家，男性平均 77.01 歲，女性平均為 83.59 歲。因此，如何使老年人生活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積極應對未來的需求，成為國家重大的

議題。

1963 年 7 月，日本政府又推出了宣導保障老年人整體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後經 1972 年、1986 年、1994 年修訂。該法是日本政府在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頒佈的一部老人福利大法，被日本各界稱為「老人憲章」。其主要內容有：政府出資修建特別養老院，為癡呆、臥床不起等體弱老人提供服務；強調開拓高齡者對福利社會創造的參與機制，發揮老人豐富的經驗和知識特長，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探索和逐漸確立一種適合於老人居家養老的方式和體制，強化對居家養老提供家庭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和組織建設，並在財政預算上實行優惠政策；組織「老人俱樂部」，吸引老人參與社會活動；強調社會福利的地方化和多元化，加強地方政府對老人福利的責任和職權等（秦嶺、張秋秋，2002）

日本政府 1972 年對《老年福利法》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法律在第 10 條針對 70 歲以上的老人特別設立了一種「老年醫療費制度」，即把這些人原來醫療保險中的患者負擔部分改為由政府負責，實際是一種「免費醫療制」，這種制度的實行大大提高了 70 歲以上老年人的就診率，導致政府醫療保險支出大增，後來受到了嚴厲批評。（趙立新、周秀芹，2002）1982 年 8 月，《老人保健法》頒佈實施，綜合實施疾病預防、治療以及功能訓練等保健事業，以提高老年人的保健水準。該法廢除了 1972 年實施的老年免費醫療制度，在為老年人提供健康和醫療服務的同時，平衡各醫療保險的開支，讓老年人也負擔少部分費用，實現財政、在職員工和老年人本人共同負擔機制。1986 年修訂的《老年人保健法》再度提高了老年人本人承擔醫療費用的比例。（姜向群，2005）

隨著老年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對老人福利服務以及特殊照料服務等方面的需求增大。日本政府從 2000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行《護理保險法》，這個制度通過社會保險來共同支援老年人護理所需要的設施、服務等費用，國家、政府、企業、40 歲以上的人和老年人本人都負擔護理費用。護理保險制度的對象是 40 周歲以上的人，其中又分為兩種保險人：一是 65 歲以上的老人，稱為第一種被保險人；二是 40 歲至 64 歲的參加了醫療保險的人，稱為第二種被保險人。這兩種被保險人在他們因臥床不起、癡呆等原因需要起居護理或需要有人說明料理家務和日常生活時，可以得到護理保險服務。護理保險制度提供包括保健、醫療、福利在內的綜合服務，可大致分為居家服務和設施服務兩種類型。（王偉，2000）

在家庭養老上，1947 年日本政府頒佈的經過大幅度修改的民法，廢除了專制的家長權和長子優先繼承權，規定直系血親及兄弟姐妹有互相贍養的義務，在特殊的情況下三等親範圍內的親屬也要承擔贍養義務。因而明確了子女等親屬贍養老人的法定義務。《生活保護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和《殘疾人福利法》等也有強制家庭和親屬贍養老人的規定。（王偉，2004）

6. 韓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韓國老齡化速度發展很快，65 歲以上的老年人比重已超越總人口的 7%，已步入老齡化社會。

韓國老年人立法保障體系的構建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最先建立的是養老金制度。1960 年，政府制定了《公務員年金法》，開始實施公務員養老金制度，1963 年和 1975 年又分別頒佈了《軍人年金法》和《私立學校教職員年金法》，從而形成了適用於政府官員、軍人和私立學校教職員等特殊職業範圍人員的養老金制度。1973 年韓國制定了《國民福利年金法》，並計劃從 1974 年開始實施。但是，由於石油危機所帶來的經濟狀況的惡化，未能全面加以實施。15 年後，即 1988 年，韓國施行《國民年金法》始建立國民養老金制度，該法最初要求 10 人以上的企業必須保障 18 ~ 59 歲的職工參與國民養老計劃，繳費後職工從 60 歲開始領取養老金。1992 年又把養老保險適用範圍擴大到 5 ~ 9 人企業，1995 年起，適用範圍擴及農民、漁民等農村地區的自我僱用者，1999 年進一步擴大到城市地區的自我僱用者。

但是國民年金計劃仍然面臨著實際覆蓋率低的問題。2005 年，僅有 14% 的老年人領取公共養老金，2006 年，只有 39.9% 的工作年齡段（18 ~ 59）人群在向國民年金計劃繳費。（Lee，2007）另一方面，面對迅速增長的老齡化挑戰，國民養老計劃還出現了可持續性問題，在現存的「低繳費、高支付」結構下，國民養老計劃將於 2031 年出現資金枯竭。因此，2007 年政府制訂改革計劃，採取了逐步降低收入替代率、提高付費率等措施。（Yang，2001）

為了彌補國民養老金計劃覆蓋率的不足，解決老年人貧困問題，政府在 2007 年啟動國民養老金計劃改革時，同時通過了《基本養老金法》，於 2008 年開始實施基本養老金計劃，向低於特定稅收起征點的家庭收入的老年人按月支

付養老金。2008 年該計劃覆蓋了 60%的老人，2009 年擴增至 70%。(Minist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amily Affairs, Republic of Korea，2008) 因為該方案對於領取養老金者沒有必需繳費的前提條件，所以完全不同於國民養老金制度。其資金來源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般財政預算，從這種意義上說，基本養老金可被歸為一種公共的補充方案。國民養老金計劃(NPS)與退休養老金計劃(RPS)和個人養老金計劃(PPS)相結合，是以保證參保者退休後的經濟投入將不低於退休前。再加上，近年推行的住宅養老金計劃(HPS)和基本養老金計劃(BOAPS)，可以彌補上述三種養老保障制度的不足。(金辰洙，2008)

在醫療保險方面，韓國於 1963 年制定了《醫療保險法》，但由於當時經濟條件不允許，直到 1977 年才開始部分實行，直到 1989 年才完全得以實施，成為國民皆保的醫療保險制度。20 多年來，韓國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數不斷擴大，國民的基本醫療需要得到了保障。

韓國的醫療保險分為單位醫療保險、地區醫療保險（又分為農村地區醫療保險和城市地區醫療保險）、公務員和私立學校教職員醫療保險三類。單位保險物件為有 5 人以上就業的單位，5 人以下就業的單位加入地區保險。醫療保險由保健福利部醫療保險局主管，公務員及私立學校教職員醫療保險由管理公團暫行管理。(胡廣翔，1997)

韓國的醫療保險對老年人沒有特殊的優惠措施，只是從 1996 年開始把原來每年 180 天的保險適用天數延長了 1 個月。從 2000 年 7 月 1 日開始，韓國把

原來分散在 139 個以行業為主的各種醫療保險統一起來，實施了統一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新的《國民健康保險法》的實施，把 70 歲以上老年人的醫療費減輕措施擴大到 65 歲以上老年人。(張寶仁、張慧智，2000)

護理保險制度的建立。2006 年 2 月，國會通過《老年人護理保障法案》，從 2008 年 7 月開始，針對癡呆症以及腦中風患者、日常生活自理困難的老年人提供居家或設施護理服務。韓國把全體國民納入到長期護理保險的加入物件範圍內，但是服務物件範圍限定在 65 歲以上老年人或 65 以下國民中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的人員，如癡呆、腦血管疾病患者等老年性疾病患者，而且必須由護理程度審查委員會認定為 6 個月以上行動無法自理的老年人。符合這些條件的要經過審查認定過程，達到長期療養等級 1 ~ 3 級，可以接受護理服務。從 2008 年 7 月開始，對身患重症的老年人給予護理給付，從 2010 年 7 月開始，給付的範圍擴大到中等疾病的老年人。實施長期療養保險制度後，全體老人中有 3.6% 取得了接受護理服務的資格。目前，老年人長期療養保險種類分為居家服務 6 種（訪問護理、訪問看護、訪問沐浴、晝夜護理、短期護理、租賃福利用具等）和設施服務兩類（入住設施、共同生活照料等）。只有在特別情況下才提供現金給付（家屬護理費、特別療養費、療養醫院看病費）。但這些服務種類與日本相比非常少。(田香蘭、嚴基郁，2009)

除了幾種保險制度外，韓國還先後於 1961 年、1968 年、1977 年、2000 年制定了《生活保護法》、《指導事業法的臨時措施法》、《醫療保護法》、《國民基本生活保障法》等法律，建立和完善了國家公共救助系統，對無人撫養的 65 歲

以上的高齡者、未滿 18 歲的兒童、產婦和殘疾者等需救護者提供居宅保護、設施保護和自救保護和醫療保護等保障。在對老年人的救助方面，1961 年《生活保護法》規定，對無人撫養或扶養義務者喪失勞動能力的 65 歲以上老年人提供生活保護。2001 年《國民基本生活保障法》則將此規定放寬到即使有子女的老人，如果子女因疾病、失蹤、入獄、移居海外等原因無法提供扶養，亦被列入保護物件。（李相文，1998）

1981 年 6 月，韓國制定了《老年人福利法》，1989 年 12 月對其進行全面修改，1993 年 12 月又進行了部分修改。韓國老年人福利法的框架同日本 1963 年制定的《老年人福利法》很相似。修改後的韓國《老年人福利法》規定，國家或地方政府向 65 歲以上老年人支付老齡津貼，老齡津貼的支付對象由總統令來決定。老齡津貼主要以經濟困難的老年人為對象，實際上是救濟政策的一部分。1991 年領取老齡津貼的老年人數量為 17.1 萬人，約佔 65 歲以上老年人總數的 7.7%。1998 年 7 月開始，為了充實老年人收入保障政策，韓國實行了敬老年金制度，對低收入的老年人發放一定數額的養老金。為此，1998 年 6 月廢止了從 1991 年開始實施的老齡津貼制度。為了擴大敬老年金的發放對象，韓國政府修改了《老年人福利法施行令》，把低收入老年人的標準從原來佔城市勞動者人均月收入 60% 以下，提高到 65% 以下。其結果，敬老年金的發放對象 1999 年為 66 萬人，2000 年則增加到 71 萬 5 千人。除為老年人發放金錢補貼外，《老年人福利法》內容還包括擴大老年人就業機會、建設老年人住宅、建設老年人福利會館、向老年人提供免費或低廉的福利設施、鼓勵老年人在養老設施養老、加強居家老年人的保健福利服務等。（尹豪，2000）

除了老年人社會保障立法外，《韓國民法典》第 974、975 條還規定了家庭成員間（包括直系親屬、配偶和其他共同居住的親屬）的扶養義務。因此，在老人無法自力維持生活時，子女和配偶等家庭成員有贍養老人的法律義務，這與韓國深厚的孝文化傳統也是一致的。為了鼓勵家庭養老，尤其是成年子女對老人盡贍養義務，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 1992 年韓國制定了各種優惠稅制，對扶養老人 5 年以上的三代同居家庭，在繼承財產時對其追加扣除額 90%，對每一老人扣除 3 千萬韓元（即從所繼承的財產總額中減去扣除額後再計算稅額）；計算所得稅時，如果家裡有 60 歲（女 55 歲）以上直系親屬扶養者，每年扣除 48 萬韓元。又如 2007 年韓國建設交通部發佈的《住房認購制度改革方案》規定，那些贍養父母、岳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家庭將獲得優先購房權，最高可在申購房屋時加上 3 分。（中國老年網，2007）

7. 印度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印度人口有 11.7 億多，其中 60 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百分比為 8.1%，此百分比排名為第 90 位（見聯合國 2007 年世界老齡人口報告）。雖然如此，印度政府仍重視對老年人的福利保障。

印度憲法規定，政府有責任保障老年人福利。憲法第 41 條指出，政府應當在經濟能力和發展限制下，採取措施保障老年人、失業者、殘疾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享有獲得公共援助的權利。其他憲法條款也包含了政府保障老年人權益的要求，比如政府有責任建立養老金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

1950 年到 1980 年間，聯邦政府出台了一些法律為老年人提供社會保障。1952 年《僱員退休儲備基金和其他專款法》(The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ct) 為私營企業僱員提供準備金、家庭養老金和保證金相聯繫的保險，目前涵蓋現在的 177 個行業，根據限額支出的方法於退休時一次性給付。但此項法律僅覆蓋了印度 10% 的勞動者，農民及小商業經營者都不受其保障。1972 年通過《養老金支付條例》，為企業僱員提供養老金。1973 年《刑事程式法典》規定子女在父母自身無法維持生活時必須對父母提供充分的照顧。同時，一些州也頒佈法律建立地方養老金專案，不少州則頒佈法律要求子女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1961 年所得稅法 (Income Tax Act) 及 1972 年《捐贈支付法》(Payment of Gratuity Act) 為 65 歲以上老年人提供稅收優惠。(Liebig & Rajan, 2005) 1995 年國家養老金計劃 (National Old Age Pension) 實施，為 65 歲以上的貧困老年人每月發放 75 盧比 (約合 2 美元) 的支助，但是受益人數相當有限，只有 10% 的人被覆蓋。同年還設立了僱員退休金計劃 (Employee Pension Scheme) 替代了 1971 年提供撫恤金的家庭退休金計劃 (FPS)，與僱員退休儲備基金 (EPF) 共同構成正規私人部門的僱員可參加的退休金計劃。(廉海東, 2008)

印度社會公正與權力部是負責老年人社會福利保障的專門機構。為了保證老年人過體面的生活，同時保障老年人在社會上應有的法律地位，該部制定了《老年人國家政策》，旨在把老年人的關切當成國家的關切，讓老年人過一種受保護、受尊重的晚年生活。根據該政策，只要是印度公民，年齡在 60 歲以上，就可以享受印度政府提供的各種優惠政策。如免費向老人開放幾乎所有公園、

博物館及旅遊景點。印度各部委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照顧老人的措施。如印度農村發展部規定：在農村，年齡在 65 歲以上、生活極度貧困的老人，每月可以從政府領到 75 盧比的老年人津貼及 10 公斤免費大米和麵粉。印度鐵道部規定：60 歲以上的老人可以買到折扣為 30% 的車票。印度衛生與家庭福利部規定：60 歲以上的老人優先得到免費醫療，因為印度實行全民免費免疫計劃和公立醫院免費治療項目，所以政府醫院裡往往是人滿為患。(Jayaram, 2008)

由於經濟發展水準的限制，目前印度的老年社會保障立法還相當不足，社會保障項目較少、覆蓋率低、保障水準低，老年人權益保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家庭實施。但是近年內，隨著工業化、西方化的影響，印度家庭觀念正在喪失，虐待和遺棄老年人的現象時有發生。因此，2007 年 12 月印度議會通過《老年人法案》，規定子女、親屬或繼承人有義務為長者提供經濟資助。印度政府希望這項法案能夠強化印度的孝順傳統，並將這種傳統以更嚴格的法律條令的方式固定下來。法案規定當老人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就有權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從自己的子女或親屬那裡得到生活津貼，這種津貼每月最高可達 1 萬盧比（約 250 美元），子女遺棄老人將被處以 3 個月的監禁和 5000 盧比的罰款。(同上注)

8. 新加坡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養老問題，經過半個世紀的摸索實踐後，逐漸形成了一套以自我保障、家庭保障為基礎，輔之以社會保障的養老體系，較妥善地解決了老年人權益保障問題。

1955 年，政府通過《中央公積金法》建立了中央公積金制度，採取了強制個人儲蓄、建立個人公積金帳戶的完全積累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建立中央公積金的最初目的是通過公積金這種強制儲蓄制度，預先籌集個人養老資金以解決職工的養老問題，為僱員退休後或不能繼續工作時提供一定的經濟保障。此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準的不斷提高以及中央公積金會員人數的不斷增加，新加坡政府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不斷調整放寬對公積金用途的限制，陸續推出了醫療保健、住房、教育、家庭保障、增進資產等一系列保險計劃。這樣，中央公積金制度就由最初的僅提供退休養老保障，逐步擴展到醫療保健、退休養老、教育、購買住房和投資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展成為一項涵蓋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多功能、綜合性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能夠給予國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者有其屋」等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

在資金來源及分配上，中央公積金制度規定由僱主和僱員雙方繳費，政府只承擔讓利、讓稅的義務，即中央公積金存款和利息免稅。僱主和僱員繳納的所有公積金款項都存入政府為每位參加者設立的「個人帳戶」中，根據《中央公積金法》的規定，55 歲以下的公基金會員擁有的個人帳戶一分為三：一是普通帳戶，佔公積金的 72.5%，可用於購置政府組屋、支付獲准情況下的投資、保險、教育支出和轉撥款項填補父母退休帳戶之用；二是特別帳戶，佔公積金的 10%，只限於養老和特殊情況下的應急支出，一般在退休前不能動用，達到退休年齡時方能領取；三是保健儲蓄帳戶，佔公積金的 17.5%，主要用於支付住院醫療費用和獲准情況下的醫療專案支出。會員年滿 55 歲後，特別帳戶與普通帳戶合併改為退休帳戶，個人帳戶結構由普通帳戶、保健儲蓄帳戶和特別帳

戶轉變為退休帳戶和保健儲蓄帳戶。根據《中央公積金法》規定，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計劃由隸屬於勞工部的中央公積金局統一管理，由勞工部制定有關政策並進行監督。（李珍、孫永勇，2004）

作為一個功能全面、綜合性的自我保障制度，中央公積金制度通過強制儲蓄，實行與個人收入關聯的完全積累制的籌資模式，在國民中強調自我保障意識，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同時也能夠激勵國民更加勤奮工作，增加個人收入和公積金存款，以使自己能夠退休後過上體面的老年生活；實施多層次、多樣化的保障計劃，給予會員及其家屬「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者有其屋」等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大大改善了公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福利待遇，促進了國民素質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由於完全依靠公民個人儲蓄的保障模式，也使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缺乏互濟性。由於國民個人收入的差別，很容易導致會員之間在公積金存款上差距懸殊，進而致使他們在退休後養老待遇極不平衡，很難為會員提供公平有效的社會保障。特別是對那些年輕時喪失勞動能力職員和低薪職員的老年生活不能起到充分的保障作用。為了彌補這種不足，新加坡政府先後設立了最低存款計劃、填補最低存款計劃和家屬保障保險計劃等。

1987 年，中央公積金局推出「最低存款計劃」，規定公積金會員在年滿 55 歲提取公積金存款時，必須在其退休帳戶中保留一筆存款作為最低存款，最低存款額為 3 萬新元。1995 年，公積金局又將最低存款額提高至 4 萬新元。1987 年，中央公積金局同時推出了「最低存款填補計劃」，規定公積金會員可在父母年齡超過 55 歲而公積金存款少於最低存款額的情況下，自願填補父母的退休戶

頭，填補金額是最低存款額和他的父母年齡達 55 歲時退休帳戶結存額之差。從 1995 年 7 月 1 日起，會員也可以為配偶填補，以保障其配偶晚年生活。（郭偉偉，2009）1980 年 5 月政府開始實行家屬保障保險計劃，規定如果公積金會員在 55 歲前不幸死亡或終生殘疾，該計劃將提供 3 萬新元的保險金以幫助會員家屬渡過最初幾年可能困難的生活。（樊天霞、徐鼎亞，2004）家庭保障計劃和「填補最低存款」政策的實施，強化了公民對家庭、社會的責任意識，使得家庭各成員之間的社會保障利益相關聯，加強了家庭和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了家庭養老保障功能。

中央公積金制度還為老年人的健康提供了保障。通過法令，政府分別於 1984 年、1990 年、1992 年將保健儲蓄計劃、健保雙全計劃、保健基金計劃引入公積金保障制度。這些計劃為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全體公民獲得更充分的醫療和保健服務。其中保健儲蓄計劃屬於一項全國性、強制性的儲蓄計劃，在醫療保障體系中起主導作用，健保雙全計劃和保健基金計劃起輔助作用。根據 1984 年保健儲蓄計劃，公積金會員每月須把部分公積金存進保健儲蓄帳戶，公積金會員可以動用保健儲蓄帳戶的存款，為本人、配偶或是任何一個直系親屬如子女、父母和祖父母支付在當地的醫療費用，主要支付公立醫院和獲准私人醫院的住院費和某些門診費。1990 年 7 月開始，公積金局又實施了健保雙全計劃。這是一項大病醫療保險計劃，它允許會員以公積金保健儲蓄帳戶的存款投保，確保會員有能力支付重病治療和長期住院而保健儲蓄不足的費用。1990 年開始，所有 75 歲以下保健儲蓄儲戶除非選擇不參加這項醫療保險，都被自動納入該保險計劃內。（同上注）儘管保健儲蓄計劃和健保雙全計劃覆蓋了絕大多數新加坡人

口，但仍有少部分貧困國民無力支付醫療費。為此，議會於 1992 年通過了《醫療基金法案》，於 1993 年開始實施保健基金計劃，由政府出資建立醫療保健基金，對無力支付醫療費的窮人給予醫療補助。

在家庭養老方面，面對傳統孝順觀念日漸淡薄的現象，新加坡國會在 1995 年通過了《贍養父母法案》，要求成年子女承擔贍養 60 歲以上的年老父母的法律義務。

根據《贍養父母法案》的規定，贍養令被視為地方法院發佈的命令，並可與《婦女憲章》中為妻子和子女而頒發的贍養令同樣被強制執行。如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而違背贍養令，可被判處不高於 10,000 新加坡元的罰款，或者不超過 1 年的監禁。2010 年 11 月 23 日新加坡國會通過《贍養父母法案修正法案》，修訂的內容主要是提高贍養父母專員的權力及強制進入法律程序前，先接受調解。

9. 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簡述

歷經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保障長者的立法制度，源遠流長、文獻浩瀚，將在本文的第三章論述。新中國的法制建構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直到了 80 年代確立改開放的國家政策之後，才建立起中國特色結合現代文明的中國法律體系，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也逐步成熟。學者把中國老齡政策法規的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 1949 ~ 1981 年人口年齡結構向成年型過渡時期，是中國老齡政策法規的初步建立階段；1982 ~ 1988 年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向老年型發展時

期，是老齡宏觀政策法規快速發展階段；1999 年以來我國人口年齡結構開始邁入老年型的時期，是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策略全面啟動的階段。（王珣、洪國棟、劉毅強、陳可冀，2002）

1982 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憲法》規定老年人對國家和社會的物質幫助權，體驗老年人享有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權利。要求的子女對老年人的贍養扶助的義務，以及禁止虐待老年人的規定，成為中國公民處理家庭關係的一項基本原則。（周葉中，2005）《憲法》中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及其贍養的規定，為部門法的立法提供了依據，有助於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形成一個逐漸充實的法律體系。

從專門立法來看，《婚姻法》是開了贍養父母立法的先河。1950 年的《婚姻法》規定：父母對於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於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雙方均不得虐待或遺棄。1980 年制定的取代該法的新的《婚姻法》保留了該條的規定。2001 年修定 1980 年的《婚姻法》作了補充：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全法權益。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及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會給贍養費的權利。《婚姻法》的規定沒有具體列明「贍養、扶助」的內容，但贍養，應該是指子女對父母的供養，提供日常生活基本物質和金錢；扶助，應該包括精神慰藉、關懷和照顧等。

中國保障老年人的立法，也零散地分別在其他專門立法內有所規範，如《民法通則》、《刑法》、《勞動法》及《個人所得稅法》。1986年《民法通則》作出概括性及原則性的規定：婚姻、家庭、老人、母親和兒童受法律保護。1997年，就1979年的《刑法》作出修定，嚴罰虐待罪，如虐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包括肉體虐待和精神虐待，輕者，將被拘役或管；重者，將處以有期徒刑。如果拒絕履行贍養父母者，將被視為遺棄罪，《刑法》就此有極具震懾性的規定：對於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情節惡劣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980年《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經批准的殘疾、孤老人員可減徵所得稅。1994年制定的《勞動法》，開始就社會保障、職業福利、特殊福利作出規定：國家發展社會保險事業，建立社會保險制度，設立社會保險基金，使勞動者在年老、患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獲得說明和補償；勞動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一）退休；（二）患病、負傷；（三）因工傷殘或者患職業病；（四）失業；（五）生育。1991年的《收養法》規定：收養關係被解除後，經養父母撫養的成年養子女，對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養父母，應當給付生活費。

中國以《憲法》為核心的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法律已零星出現於各個部分法當中，但各個法律的規定極為簡略、難以操作，且遠不能形成一個健全的體系，這些零星的法律規定，已不能滿足保護老年人權益的社會需要，特別是中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需要有具系統性、穩定性、權威性的保障老年人權益立法。1996年8月29日第八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一般簡稱《老年法》。

《老年法》主要為六章：第一章是「總則」，主要規定立法的目的、老年人的定義以及各項尊重養老的原則等；第二章是「家庭贍養與扶養」，主要規定家庭養老的內容，即在家庭層面老年人享有的權益；第三章是「社會保障」，主要規定國家與社會在保障老年人權益中的義務；第四章是「參與社會發展」，主要規定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再發展和再教育；第五章是「法律責任」，主要規定各種損害老年人權益行為的法律責任；第六章是「附則」，主要規定法律的變通和實施時間等。

「家庭贍養與扶養」是養老的主要方式，《老年人法》對家庭贍養與扶養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根據該法，家庭養老主要包括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即物質贍養）和「精神上慰藉」（即精神贍養）的義務兩個方面，並且應「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第 11 條第一款）。

法律對贍養人作出了規定，贍養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負有贍養義務的人，贍養人的配偶應當協助贍養人履行贍養義務（第 11 條第一款、第二款），且老年人與配偶有相互扶養的義務（第 16 條第一款）。

贍養人若未能履行責任，根據《老年法》的規定：「老年人與家庭成員因贍養、扶養或者住房、財產發生糾紛，可以要求家庭成員所在組織或者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調解前款糾紛時，對有過錯的家庭成員，應當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

「人民法院對老年人追索贍養費或者扶養費的申請，可以依法裁定先予執行。」（第 45 條）

參考資料

Minist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amily Affairs, Republic of Korea. (2008). *Basic Old Age*

Pension. Retrieved June 11, 2009, from

http://search.korea.net:8080/intro_korea2008/society/pdf/01_11.pdf

Anderson, J., & Wilde, J. (2008). *美國的家庭政策概述*. 六月 15 日, 2009 擷取, 摘自上海

社會科學院:

www.sass.org.cn/eWebEditor/UploadFile/00n/ull/20081129203926238.doc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ing. (2008). *Ageing and Aged Care in*

Australia: Aged Care Legislation. Retrieved July 12, 2009, from

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ageing-publicat-aged-care-australia.htm~ageing-publicat-aged-care-australia-pt2~ageing-publicat-aged-care-australia-pt2-2

Bengtson, V. L., Kim, K.-D., Myers, G. C., & Eun, K.-S. (Eds.). (2000). *Ageing in East and*

West: Families, States and the Elderl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Jayaram, P. (2008, 7 3). Delhi to help old, abandoned parents. *The Straits Times*.

Lee, J. Y. (2007). *Pension Reform in Korea*. Retrieved May 12, 2009, from Welfare

Economic Policy Division, Economic Policy Bureau, Republic of Korea:

<http://www.afdc.org.cn/afdc/UploadFile/20089938753657.ppt>

Liebig, P. S., & Rajan, S. I. (2005). *An Ageing India: Perspectives, Prospect, and Policies*.

New Dehli: Rawat Publications.

- Macklin, J. (2008, 6 5). *Centenary of the Age Pension*. Retrieved July 11, 2009, from
Minister for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and Indigenous Affairs:
http://www.facs.gov.au/Internet/jennymacklin.nsf/print/centenary_age_pension_05june08.htm
- O'Sullivan, J., Merck, C., Smith, M., & Tilson, S. (1999). *Medicare: Changes to Balanced Budget Act of 1997 (BBA 97.P.L. 105-33) Provis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eceived through the CRS Web)*. Retrieved May 12, 2009, from
<http://pages.stern.nyu.edu/~jasker/BBA.pdf>
- Pakula, M. (2005).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Adult Children to Care for Indigent Parents*. Retrieved June 5, 2009, from <http://www.ncpa.org/pub/ba521>
- Skwirk. (2011, 7 16). *Invalid and old age pension schemes: The Commonwealth old-aged pension*. Retrieved July 12, 2009, from
http://www.skwirk.com/p-c_s-14_u-127_t-352_c-1220/invalid-and-old-age-pension-schemes/nsw/history/australia-to-1914/social-legislation-1901-1914
- U.S. Census Bureau. (2006). *Age Data of the United States*. Retrieved June 15, 2009, from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socdemo/age/age_2006.html
- Yang, B. M. (2001). *The National Pension Schem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etrieved June 11, 2009, from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WBI/Resources/wbi37162.pdf>
- 丁純. (2000). 德國養老保障體制的改革. *歐洲*(2), 66-73.

刁莉、高玉芳. (2003). 過渡中的俄羅斯社會保障制度解析.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4), 101-105.

上海市民政局. (2009). *美國老年人立法考察報告*. 5月15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sj.shmzj.gov.cn/gb/shmzj/node6/node592/node596.userobject1ai21463.html>

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 (2008). *赴澳大利亞 新西蘭考察老齡工作的報告*. 7月12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shrca.org.cn/en/big/3283.html>

中國老年網. (2007). *韓國發佈規定——贍養老人者買房優惠*. 7月2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chelder.com.cn/zcfg/2007/23839.html>

中國會計網校. (2006). *澳大利亞養老保障體制及其特點*. 7月11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chinaacc.com/new/287/293/343/2006/4/sh126811465974600215129-0.h
tm](http://www.chinaacc.com/new/287/293/343/2006/4/sh126811465974600215129-0.htm)

尹豪. (2000). 韓國人口老齡化與老年人社會保障. *人口學刊*, 123(5), 21-34.

王珣、洪國棟、劉毅強、陳可冀. (2002). 我國人口老齡化軟觀政策和法規的現狀及建

議. 載於陳可冀 (編), *老齡化中國——問題與對策*. 北京: 中國協和醫院出版

社.

王偉. (2000). 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轉折——簡析日本護理保險制度. *日本學刊*(3),

112-125.

王偉. (2004). 日本家庭養老模式的轉變. *日本學刊*(3), 98-109.

田香蘭、嚴基郁. (2009). 日韓老年人護理保障制度比較與借鑒. *東北亞論壇*, 18(2), 54-60.

呂鴻. (2007, 4 月 6 日). *德國：雙管齊下辦醫保*. 7 月 12 日, 2009 擷取, 摘自人民日報: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5571636.html>

李珍、孫永勇. (2004).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管理模式及其投資政策分析. *東北財經大學學報*, 34(4), 14-18.

李相文. (1998). 韓國的社會保障制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 65-73.

李傳桐. (2008). *新自由主義與俄羅斯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7 月 7 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11/9/143487.html>

周葉中. (2005). *憲法*.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於濤. (2005). *綜述：德國醫療體制改革經驗初探*. 7 月 12 日, 2009 擷取, 摘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8/16/content_3363361.htm

金辰洙. (2008). 韓國老齡化與養老保障制度. *學海*(4), 195-201.

姜向群. (2005). *老年社會保障制度——歷史與變革*.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胡廣翔. (1997). 韓國的社會保障制度. *當代韓國*(4), 97-98.

秦嶺、張秋秋. (2002). *借鑒日本老年福利制度提高中國老年福利水準*. 7 月 11 日, 2009 擷取, 摘自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網:
<http://www.cnlslaw.com/list.asp?Unid=402>

- 郭偉偉. (2009). *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透視*. 7月5日, 2009 擷取, 摘自復旦大學選舉與人大制度研究中心: <http://www.fepc.org.cn/Article.aspx?ArtID=145>
- 陳潔君. (2006). 國內外養老模式的比較與借鑒. *經濟與社會發展*, 4(4), 68-70.
- 張寶仁、張慧智. (2000). 韓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分析. *人口學刊*(4), 8-12.
- 湘君. (2007). *德國的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及其實施*. 9月2日, 2011 擷取, 摘自《人權》2006 年第 6 期:
http://big5.showchina.org:81/gate/big5/www.humanrights.cn/cn/zt/qita/rqzz/2006/06/t20070209_207704.htm
- 程勇. (2009). *美國老年福利和社會為老服務*. 6月5日, 2009 擷取, 摘自
<http://www.caps.com.cn/show-2366.htm>
- 廉海東. (2008). *印度保障窮人的有效措施*. 6月12日, 2009 擷取, 摘自《瞭望》新聞週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3/31/content_7893217.htm
- 楊天博. (2007). 日本的老年人權益保障立法. *社會福利*(1), 56.
- 蔣岳祥. (2001). 澳大利亞的政府養老保險制度. *社會*(3), 36-37.
- 趙立新、周秀芹. (2002). 日本的年保健制. *國外醫學·社會醫學分冊*, 19(4), 171-173.
- 趙立新. (2008). 德國養老保險法的發展與改革. *校社科動態*(3), 42-46.
- 鄭春榮. (2000). 德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障體制分析. *德國研究*(1), 20-24.
- 樊天霞、徐鼎亞. (2004). 美國、瑞典、新加坡養老保障制度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1(3), 84-89.

戴衛東. (2007). 德國護理保險介紹. *中華護理雜誌*, 42(1), 85-86.

附註

¹ 上海市民政局，2009

附件三. 概述部份西方國家家庭養老的情況

目錄

1.	部份西方國家家庭養老的情況	2
1.1.	美國家庭養老	2
1.1.1.	居住安排和贍養.....	2
1.1.2.	家庭養老的功能.....	3
1.1.3.	性別與照顧的提供.....	4
1.1.4.	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持.....	4
1.2.	德國家庭養老	5
1.2.1.	居住安排.....	6
1.2.2.	照顧的提供者.....	6
1.2.3.	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持.....	7
1.3.	英國家庭養老	8
1.3.1.	居住安排.....	10
1.3.2.	合居的情況.....	10
1.3.3.	子女與父母分開居住情況.....	10
1.3.4.	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持.....	11
2.	部份亞洲國家和地區家庭養老的情況	12
2.1.	日本家庭養老	12
2.2.	韓國家庭養老	15
2.3.	中國家庭養老	18

2.4. 新加坡家庭養老	22
2.5. 印尼家庭養老	25
參考資料.....	27
附註.....	32

1. 部份西方國家家庭養老的情況

1.1. 美國家庭養老

家庭是美國老人最主要的支持者，儘管近年來，多種因素影響使美國家庭結構發生了變化，家庭仍是老年人照顧的支柱性力量。據美國國家統計局（Bureau of the Census）1993 年的一項調查，家庭成員為老人提供了 80% ~ 90% 的照顧和支援，其中成年子女是父母的主要贍養者。雖然聯邦政府沒有關於贍養父母的統一立法，但有 30 個州都出台法律確立成年子女從經濟上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法律要求有經濟能力的成年子女，在父母收入難以滿足基本生活的維持時，必須為其提供充分的食品、衣物、住房和支付醫療費用等。有 21 個州通過民事訴訟，12 個州通過刑事處罰，來保證子女贍養責任的履行。（Pakula，2005）

1.1.1. 居住安排和贍養

在美國，老年人與子女合居的現象很少並且呈不斷減少的趨勢。據統計，1950 年各州 65 歲以上老年人與子女合居的平均比例為 34.1%，到 2000 年這個

比例已經下降到 14.5%。(圖 1)大多數老年人選擇生活在自己的家中(夫婦二人或獨自一人)，僱保姆或由社區的服務人員提供照料。居住較近的子女不時為父母提供代為購物、修理房屋等服務，而居住距離較遠子女和父母通常通過電話、相互探訪、共度假期等方式保持聯繫，父母與子女間形成了「有距離的親密關係」。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 1994 年的一項調查，在有老年父母(包括婚姻另一方的父母)並與父母居住距離在一小時車程範圍內的情況下，有 92%的人認為自己會為有需要的父母提供幫助，而在居住距離超過一小時車程的情況下，仍有 85%的人認為自己能為父母提供幫助。

圖 1：1950~2000 年美國 65 歲以上老人與子女共居的比例

資料來源：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¹

1.1.2. 家庭養老的功能

美國家庭為老年人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照顧和情感關懷，經濟支助現象較少。AARP 在 1994 年的調查顯示，在所調查的 45 至 59 歲的人群中，

只有 18% 的子女在過去 5 年中為父母提供了經濟援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社會保障系統為老年人提供了較為充分的經濟保障，養老金構成老年人的主要經濟來源。另一方面，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女需要供養，對於那些非高收入的家庭來說，向老年人提供經濟支援的壓力很大。

1.1.3. 性別與照顧的提供

女兒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照顧者，但這並非意味著兒子不提供照顧，只是他們提供的通常是修理房屋和財產管理等更能體現男性特徵的行為。在老人沒有女兒或女兒居住離老人較遠時，兒子成為主要的照顧者，妻子通常提供很大的協助。近年來，許多女性家庭成員（包括女兒和兒媳）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一方面她們希望能夠在外從事工作，追求自己的興趣；另一方面，她們又需要擔負照顧家庭、照顧老人的傳統責任。目前外出工作的女性的比例已經是大蕭條時期的四倍，這不可避免增大了女性的壓力，同時對老人的照顧產生負面影響。

1.1.4. 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持

面對家庭在養老方面與日俱增的壓力，近年來聯邦和各州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法律以支持家庭養老。1993 年聯邦政府頒佈了《聯邦家庭與醫療病假法》，在第 102~104 款規定擁有 50 人以上的企業必須給予需照顧病重家人的全職僱員（要求職員在企業工作超過 12 個月，且在過去 12 個月中工作超過 1250 小時）長達 12 周的不帶薪假期，員工在休假期間仍有權獲得企業的各中福利，休假後

仍保持原有的或獲得等同于原職位的職位、福利等工作狀況。這項法律通過給予在職人員休假時間和待遇保證，使病重老人能更好地獲得子女的照顧。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老年人法案修正案》。該修正案建立了全國家庭照管者支援項目，向各州提供資金，支持照顧老人（60歲或以上）的家庭和那些照顧孫子孫女的祖父母（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4）。2003年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資金用於那些提供照顧的家庭，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有關當前支援專案的資訊以及如何接觸這些專案；（2）提高照顧方式效果的培訓；（3）使得照顧者暫時從照顧責任中解脫出來得以休息的費用。（Anderson & Wilde，2008）政府還通過了「社會服務街區補助計劃」（The Social Services Block Grant Program），以健全社區養老服務，為老年人提供家政服務、運輸、供給膳食等各種服務專案，說明老年人在家裡獨立活動。（陳潔君，2006）此外，有34個州政府還對贍養父母者提供減稅或支付補貼等的優惠。

1.2. 德國家庭養老

德國是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國家之一，也是目前老齡化程度世界排名第三位的國家。截止2008年，德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近1650萬，占總人口比例達20.1%，預計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27.61%。嚴重的老齡化使得養老成為德國重要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在德國，大多數的老年人選擇居家養老，僅有4%的老年人居住在護理之家等養老機構。而居家養老的老年人中，只有1/3獲得過正式照顧機制的服務

和支援，且這些服務常常只是家庭照顧的補充。因而可以說家庭是德國老年人獲得支持的主要來源。(Dallinger, 2002)

1.2.1. 居住安排

大多數德國人在年老時選擇與子女分開居住。據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s (GSS) 的一項調查，在老年人無法自我照顧時子女是否應該和老年人一起居住的問題上，有 57% 的德國老年人（60 歲以上）持否定態度。而事實上，在德國有超過 90% 的老年人與子女分開居住，享受獨立生活。但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子女鄰近，並與子女保持密切聯繫。(Gierveld, Dykstra, & Schenk, 2009)

1.2.2. 照顧的提供者

與其他歐洲國家相同，老年人的首要照顧者是配偶，其次是女兒和兒媳。但對於更老一些的老年人（80 歲以上），由於他們大部分喪失了配偶，其照顧責任就主要由女兒和兒媳（主要是 45 ~ 65 歲的中年女性）承擔了。總的來說，女性家庭成員是老年人的主要照顧提供者（表 1）。

表 1：德國親屬關係與老年人照顧的提供（%）

照顧提供者為：	需要照顧人士年齡	
	65-79 歲	80 歲或以上
妻子	39	12
丈夫	22	5
女兒	24	44
兒子	2	6
媳婦	6	17
其他親戚	6	9
朋友、鄰居	4,5	4,5
總數	100	100

資料來源：: *Ökonomie der Moral: Konflikt zwischen familiärer Pflege und Beruf aus handlungstheoretischer Perspektive*²

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德國（西德）35 ~ 55 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比例超過 4/1 達到 70%，這使得政治家們不得不擔心為老年人提供照顧的人力資源正在不斷萎縮。事實上，家庭成員是否能兼顧工作和照顧，主要取決於老年人需求照顧的程度。（表 2）但女性在就業與照顧的提供上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衝突，據調查在德國有 12% 的女性為了照顧家人而不得不選擇辭職。（Dallinger，2002）

表2：照顧者（18~24歲）的勞動參與率與老年人需求照顧的程度（%）

照顧需求	僱員	非僱員
一周幾次	47.9	52.1
每天	31.7	68.3
持續需求	20.5	79.5

資料來源：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³

1.2.3. 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持

除了不斷完善的養老金制度減輕了家庭對老年人的經濟供養負擔外，政府

於 1996 年建立的護理保險制度是對家庭養老的最重要支持措施之一。在護理保險制度實施之前，需要長期照顧的老年人必須自行為所享受的機構或居家養老服務付費。如果這些費用超過了老年人的個人收入，則需由子女或社會救助系統支付。基於機構養老服務的高費用和法定贍養老人的義務，許多子女不得不選擇讓父母居家養老由自己提供照顧。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家庭養老的負擔。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許多女性面臨著就業與家庭照顧責任的衝突，處於放棄就業或者削弱照顧的困境。護理保險制度實施後為老年人提供了護理服務和現金津貼的兩種選擇（現金津貼低於直接護理服務的價值），前者使老年人直接享受相應機構提供的護理服務，而後者則賦予老年人自行選擇和支付照顧者的權利。據統計，1998 年選擇直接接受護理服務的老年人比例僅有 10.5%，大部分老年人（75.5%）選擇現金津貼並通常支付給女兒或兒媳以獲得她們的照顧，還有 13.5% 的老年人選擇了護理服務和現金津貼組合。（Dallinger，2002）護理保險制度的實施，從經濟上和照顧的實際提供上很大程度地減輕了家庭成員的負擔，也緩解了婦女在就業與家庭照顧上的矛盾，為家庭養老提供了很大的支援。

1.3. 英國家庭養老

英國是世界上最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之一。二戰後，英國老年人口增長迅速，至 1950 年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到 1100 萬，佔總人口比重為 10.7%，這一比例在 1975 年、2007 年分別增至 14.0% 和 16.1%，並預計在 2025 年突破 20%。（UN DESA PD，2007）

伴隨着現代的發展，英國家庭養老的功能已日漸衰退，英國並沒有規範子女必須贍養父母，而老年人也非常開明，認為子女有自己的生活，父母不應該拖累他們。作為最早宣佈成立的福利國家，英國政府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就建立了養老社會保障制度以幫助老年人安享晚年，社會保障的範圍和水準不斷發展，使國家（政府）成為英國國民養老的重要支柱。40 至 50 年代，英國政府廣泛推行的是機構式照顧，由政府財政出資大力興建養老院、護理院等公共養老設施供老年人入住，並僱用大量專業人員為老年人提供集中照顧。但從 80 年代開始，面對嚴重的財政危機，福利國家制度的改革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爭論。政府的養老政策逐步由機構式照顧向社區照顧轉變，家庭在養老中的作用也獲得了重新認識和重視。儘管作為普通法系國家，英國並無成文民法典規定子女對老年父母承擔經濟供養的義務，但贍養父母仍是社會所認同的一項道德責任。根據 OASIS（Old Age and Autonomy: The Role of Services Syst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2000~2001 年的一項調查，在英國有 41% 的受訪人認為老年人應當有權依靠他們成年子女的幫助以實施某些必要的事務，有 26% 的受訪人認為父母有權因其對子女的付出而在年老時獲得子女的回報。

（Daatland & Herlofson，2003）而 1994 年英國家庭普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也證實，家人和親屬是老年人獲得幫助最為通常的來源。（Phillipson，1997）以家庭成員照顧為主的非正式照顧是支持居住於社區的老人的主要力量，機構和專業人員的正式照顧服務往往針對的是那些沒有子女或者獨自居住又缺乏鄰近親人照顧的老年人。

1.3.1. 居住安排

20 世紀 50 年代，老年人獨居的比例是相對較低的。但 60 年代以後，老年人獨自一人居住或與配偶一起居住的現象明顯增加。調查顯示，1962 年 42% 的英國老年人是與子女一起居住的，但到了 1980 年這一比例就已下滑到了 14%。

（同上注）1994 年已降至 11%（65 歲以上女性）和 12%（65 歲以上男性）。

（Iacovou，2000）

1.3.2. 合居的情況

子女往往對年邁父母要承擔更重更密集的照顧工作，也相應地承受了更大的身心壓力。全國社會工作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ISW]）的一項研究就發現，在對神智障礙的老年人的照顧中竟有高達 27% 的照顧者由於精神壓力患上了抑鬱症。（The Royal Commission on Long Term Care，1999）對於那些已出現神智障礙的老人和喪偶的老人，與子女共同居住獲得照顧的安排更為常見。但另一方面，在合居情況下，不少老年人也會支付部分家庭費用甚至為對子女提供一定經濟支助，健康狀況較好的老人，還能幫助子女照顧小孩和完成部分家務，從而形成代際間的雙向支持。

1.3.3. 子女與父母分開居住情況

大部分子女也與父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時常提供照顧。據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BHPS）2001~2002 年間對 5500 個家庭超過 10000 人進行的調查顯示，60% 以上的子女居住在離父母住處一小時里程之內；大多數的

子女都能每週探訪和致電父母一次以上；子女為父母提供的經常性幫助包括載送、購物、煮飯、房屋修理、個人護理，例如穿衣、洗澡等。（Ermisch，2004）調查資料還表明，居住得離父母更近的子女，探訪與致電父母的比例也越高；女性在代際交互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比如受到子女的日常幫助的母親的比例（50%）要明顯多於父親（35%）；女兒無論在探訪還是在致電父母的頻率上都要高於兒子。此外，日常活動因身體狀況欠佳而受限的老年人，與子女保持著更密切的聯繫，獲得子女的幫助也更多。

1.3.4. 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持

除了發展社區照顧體系為照顧老人的家人、親屬提供服務支援，以及發展和完善養老金制度外，英國還給照顧父母的子女提供了一些經濟支助。比如 1975 年建立起的病殘照顧補貼制度為因在家照顧病殘家屬（涵蓋部分老年人）而無法外出工作掙錢的人員提供補貼。最初這項補貼只適用於男性和單身女性，但在 1968 年擴大到已婚女性。根據規定，每週照顧病殘者超過 35 小時，並且工薪收入不超過 50 英鎊的照顧者，均可享受此項補貼，（The Royal Commission on Long Term Care，1999）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子女贍養父母的經濟壓力。

英國家庭養老的意義，同其他國家地區一樣，輔以家庭照顧，這是政府為使老人留在社區、留在家庭而採取的一種政策措施，具體表現為由家庭成員進行照顧，但政府發給適當的護理津貼。

(i) 設立短期護理機構——暫託處：這主要是為了解決因家庭成員有事外

出或度假而得不到照顧的老年人、殘疾人的問題。

(ii) 上門服務：這是對居住在自己家里，但子女因生活問題而力所不逮的，或為那些尚有部分生活能力但又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的一種服務。服務項目包括上門送餐或做飯、洗衣、洗澡、理髮、打掃衛生、購物、陪診等。從事這種服務的工作人員，既有政府僱員，又有社區志願服務人員，一般都是無償或低償服務。

2. 部份亞洲國家和地區家庭養老的情況

本部分著重討論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家庭養老制度的傳統與變革。其中東亞地區以中國、日本和韓國為例，三者同屬儒家文化圈，傳統上均為父系家族制度，但由於老齡化程度及經濟發展水準有所區別，故家庭養老制度上在存在大量相似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差異。東南亞地區大多數老齡化程度較低，目前還屬於「年輕型社會」，但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步伐也在加快。這一地區除新加坡屬新興工業化國家外，大多為發展中國家，故以新加坡和印尼為例介紹本地區家庭養老情況。

2.1. 日本家庭養老

日本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齡化國家，根據日本 2007 年版《老齡社會白皮書》，截至 2006 年 10 月 1 日，日本總人口約為 1.28 億，65 歲以上的老齡

人口為 2660 萬，老齡人口佔日本總人口的 20.8%。

日本具有悠久的家庭養老傳統。二戰結束以前，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資源基本上都是由家庭來提供的。在父權制直系家庭，實行長子繼承制，繼承人婚後仍與父母同居、形成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二戰以後，日本制定了新憲法，1947 年頒佈了經過大幅度修改的民法，廢除了專制的家長權和長子優先繼承權，規定直系血親及兄弟姐妹有互相贍養的義務，在特殊的情況下三等親範圍內的親屬也要承擔贍養義務，因此贍養老年父母的義務擴大到所有子女，日本家庭「孝」文化仍然受到重視。(王偉，2001)

在日本，家庭的合居贍養功能得到重視和提倡。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進入經濟騰飛階段以來，日本的家庭結構便經歷著由傳統大家庭向核心小家庭的變遷。據日本政府公佈的《日本社會福利 1986》，「六十年代日本老年人與親屬主要是兒子與兒媳共同生活的比率高達 90%，然而到 70 年代這一比率下降到了 80%，今天該比率已下降到 70% 以下。相反，與此同時老年核心家庭、獨身老人以及生活在養老院的老人卻一直增多」。根據 1996 年《健康與福利的生活情況調查》，老年夫妻兩人居住和一人獨居的比例分別為 30.6% 和 12.6%，與子女合居的老年人比例下將到 53.1%。(Asian-Pacific Center, 2001) 而至 2007 年老年夫妻兩人獨居和在老人一人獨居的比例幾乎達到所有老年人家庭的 50%，在各種民營及公共福利設施等生活的老人佔 11.6%，和子女一起生活的老人只有 41.2%。(張豔萍，2007) 儘管如此，對比歐美等西方國家，日本老人生活在同居家庭的比率仍舊是很高的，合居養老仍是日本家庭養老的重要模式。

在日本，由於較高的養老金保障水準，經濟贍養不再是家庭養老的主要功能。（表 3）長媳和長女是老年父母日常照顧與情感關懷的主要提供者。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婦女參與就業，1975 年 25~35 歲的婦女就業率為 40% 左右，到 1990 年，25~30 歲婦女的就業率超過了 60%，30~35 歲婦女的就業率超過 50%，在婚後及生育後想工作下去的婦女也逐年增多。（王偉，2001）分居養老及婦女就業增多的趨勢，使得家庭養老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弱化。為了彌補這種弱化，保障老年人的生存狀況，日本政府發展了新的老年福利制度以支持家庭養老。

表 3：日本某些年份老年人收入來源構成（%）

年份	自己勞動所得	財產所得	退休金給付	退休金之外的社會保障給付	他人給予等其他所得	平均收入（萬日元）
1980	44.2	7.8	40.3	2.2	5.6	190.1
1985	39.6	6.8	47.2	3.9	2.6	239.3
1990	30.4	9.2	54.8	2.1	3.5	289.8
1993	30.9	7.0	58.9	1.8	1.5	292.8
1996	26.6	6.0	62.5	1.0	3.9	316.0
1999	27.7	7.3	61.8	1.4	1.8	328.9

注：1991 年之前老年人的定義是男 65 歲以上，女 60 歲以上，1992 年以後使用的定義是男女均 65 歲以上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情報部⁴⁵

日本政府從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老人福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中看到，由國家大量投資興建老人福利設施，不僅加大了國家財政的負擔，而且福利設施這種老人集居型的養老方式，雖然可以解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難，但也隔斷了老人與家人及朋友等的外界聯繫，容易使老年人產生社交和情感方面的問題。

而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照顧為依託的養老模式，不僅成本相對較低，更能滿足老年人的社交和情感需求。因此，從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日本政府開始把老年人福利的重心從老人福利設施轉移到居家服務模式上。2000 年 4 月日本正式啟動了以 1997 年出台的《護理保險法》為基礎的「護理保險制度」，該法規定，凡 40 歲以上的人都必須加入「護理保險」，被保險者在 65 歲後便可得到國家提供的相應的護理服務，這些服務大致可以為分兩類：「居家服務」和「機構服務」（即老年人入住福利機構）。其中，政府更為鼓勵以家庭養老為主的「居家服務」，即被保險人大部分時間住在自己家裡接受各種服務，包括上門護理（家庭服務員）、上門幫助洗浴、上門幫助康復、日托康復、居家療養指導（醫生上門診斷、治療）、日托護理、短期入住設施、癡呆老人共同生活護理、收費老人福利院護理、支付租賃及購買福利用具費用、支付住房改裝費（安裝扶手、拆除台階等）。（王偉，2001）護理保險制度一方面使傳統家庭的護理功能社會化，把家庭成員從繁重的老人護理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使傳統家庭結構和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得到維繫，成為亞洲各國發展養老制度值得借鑒的經驗。

2.2. 韓國家庭養老

2007 年韓國擁有超過 700 萬的老年人口（60 歲以上），佔總人口比例為 14.6%，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這一比例預計到 2025 年上升至 27.3%，2050 年達到 41.2%，（UN DESA PD，2007）韓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嚴重挑戰。

受到儒學文化的影響，韓國社會十分重視孝道。在古代，韓國的每個村子都曾有過「鄉約」，其第一條第一款就是「孝」，違反孝道，不管是貴族或是平

民，都要受到嚴厲的處罰。進入現代社會，民間和政府依然鼓勵孝道文化。各地學校通過舉辦「忠孝教育」講座，宣傳「忠、孝、禮」等傳統倫理道德，使韓國人從小就樹立孝敬老人、贍養父母的價值觀。韓國自古就有由長子負責贍養父母的規矩，如長子去世，則由次子贍養，以此類推。長子在贍養父母時，父母都和長子一家住在一起，所以四代同堂的家庭在韓國很常見。(徐寶康)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大家庭正日益減少，家庭養老的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一些變化。

老年人獨自以及和與配偶兩人居住的比例從 1975 年的 7% 上升到 1996 年的 53% (Korean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1996)，而在 2008 年已達到 61.8%，父母與子女分居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但是在分居的情況中，約有 53% 的老年人都居住在距離子女居住地 1 小時的行程範圍內，這些分居子女大多通過拜訪、打電話、寫信等方式與父母保持聯繫，並且仍然承擔經濟贍養義務。據悉，韓國用於老人的福利預算僅為 2.619 萬億韓元，不過是政府總預算的 1.2%，與美國的 20%、日本的 14% 相比少得可憐。(金泓振，2008) 因此社會保障為老年人提供的經濟支援相當有限，子女往往需要對老年父母給予了較大的經濟幫助，所以經濟贍養仍是韓國家庭養老的重要功能之一（表 4）。

表 4：韓國老年人生活來源分佈（%）

收入來源	總計	地域		性別		年齡組		
		城市	農村	男	女	65~69	70~75	75+
自己工作	33.7	23.1	52.0	48.2	25.2	46.8	32.3	18.0
不動產	12.0	13.2	9.8	13.6	11.0	12.8	13.4	9.4
儲蓄	5.7	6.8	3.7	8.1	4.3	6.7	4.3	5.8
公共養老金	2.8	4.0	0.9	5.1	1.5	3.8	4.2	0.2
退休年金	0.9	1.0	0.7	1.7	0.4	1.6	0.5	0.3
私人養老金	0.2	0.3	0.2	0.2	0.3	0.3	0.4	0.0
分居子女供養	66.3	64.0	70.3	62.4	68.6	62.5	68.3	69.2
戶內子女供養	23.3	24.8	20.8	16.3	27.5	20.2	22.7	28.3
其他親屬	1.2	1.8	0.2	0.7	1.5	1.1	0.9	1.6
社會救助	8.5	8.6	8.3	6.8	9.5	6.5	10.0	9.7
機構幫助	0.7	0.8	0.3	0.6	0.7	0.4	1.0	0.6

資料來源：Korea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⁶

贍養的提供者上，長子夫婦承擔主要的贍養職責，（表 5）其中長媳是老人日常照料和感情支援的最主要的提供者。但這種長子、長媳贍養為主的格局正在向逐步向多元的家庭支持共同責任制方向發展。（穆光宗，2002）韓國統計局最新發表的《2008 年社會調查》反映了韓國社會在家庭養老上的觀念變化及目前狀況。調查顯示，40.7%的人認為「父母應由子女等家人贍養」，這比 2002 年的 70.7% 及 2006 年的 63.4% 有大幅下降。43.6% 的人認為「應由家人、政府、社會共同照顧老人」，比 2002 年的 18.2% 及 2006 年的 26.4% 有大幅增加。58.6% 的人認為「應由子女共同贍養」，這遠遠超過了回答「長子撫養」的 17.3%。此外，也有 11.9% 的人認為「父母應自己負責」。

表 5：韓國子女贍養老人情況（%）

	子女養老							自己 養老	其他 人
	合計	長子	非長 子	所有 兒子	女 兒	所有 女兒	所有 子女		
1994 年	62.1	33.1	7.6	8.7	1.6	-----	11.1	37.6	0.3
城市地區	58.8	29.9	7.0	8.8	1.6	-----	11.4	40.9	0.3
農村地區	77.8	48.4	10.4	7.9	1.5	-----	9.6	22.1	0.1
男性	63.2	33.9	8.2	9.4	0.9	-----	10.8	36.6	0.2
女性	56.4	28.7	4.6	4.6	5.7	-----	12.9	42.9	0.7
1998 年	58.2	27.0	10.9	8.9	1.4	0.4	9.6	41.6	0.2
城市地區	55.8	24.5	10.3	9.1	1.4	0.4	9.9	44.0	0.2
農村地區	73.0	42.3	14.6	7.3	1.1	0.2	7.5	26.8	0.2
男性	59.0	27.8	11.4	9.7	0.5	0.2	9.2	40.8	0.2
女性	53.8	22.4	8.3	4.1	5.9	1.8	11.3	45.7	0.5

資料來源：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Korea⁷

為了給予居家養老支持，更好地保護老年人，韓國國會於 2006 年 2 月通過《老年人護理保障法》，從 2008 年 7 月開始實施，也建立起了護理保險制度。

（田蘭香、嚴基郁，2009）

2.3. 中國家庭養老

中國不僅已步入老齡化社會，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2006 年，中國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到 1.49 億，佔總人口的比例為 11.3%，佔全球老年人口的 21.4%，相當於歐洲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總和。（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2007）在今後較長時期內，中國 60 歲以上人口還將繼續以年均約 3.2% 的速度增長。據預測，到 2020 年，老年人口將達到 2.4 億，佔總人口的 16% 以上；2050 年，老年人口將超過 4 億，約佔總人口的 25%。（潘屹，2008）

中華民族素有敬老、養老的優良傳統，自先秦時期起，傳統的儒家孝道觀念與尊老養老思想就已經形成，並一直延續至今。其中子女尊敬和贍養老人，不僅是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也被納入各代法律，「不孝」將受到嚴厲的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早在周朝時期，「不孝」不僅會被處以刑罰，而且居八刑之首。時至秦漢，有老人告子女不孝，子女也會招致嚴酷刑罰。（劉乃睿、於新循，2008）這些對於孝道的推崇使得以子女贍養為主要內容的家庭養老一直是我國養老的重要傳統，這樣的傳統一直到當代仍然繼承和延續著。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通過並實施，該法第二章就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員應當關心和照料老年人；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負有贍養義務的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

一直以來家庭養老是中國最基本、最主要的養老方式，子女承擔了養老的主要責任。近代中國，由於經濟發展水準較低，社會保障水準不高和傳統家庭文化的影響，家庭養老依然是主要養老方式。但是現代中國家庭養老不是傳統家庭養老的翻版，而是處於變化或轉型中的家庭養老。

在家庭結構上，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堅持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四二一」結構成為中國社會主流家庭結構，一對年輕夫婦同時贍養 4 位老人，家庭養老的人力資源萎縮。

在家庭養老方式上，傳統上老人與子女合居是養老的主要方式，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中青年人群生存競爭加劇，城市大量人群跨地

域求職，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子女與父母分開居住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傳統大家庭模式逐步解體，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空巢家庭（即無子女共處，只剩下老年人獨自生活的家庭）。1993 年，中國空巢家庭在有老人的家庭中所佔比例只有 16.7%，（李虹、徐新為，2008）但到 2006 年底，城市老年人獨立居住的比例已增至 49.7%（其中獨居戶佔 8.3%，夫妻戶佔 41.4%），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居住的佔 50.3%；農村老年人獨立居住的佔 38.3%（其中獨居戶佔 9.3%，夫妻戶佔 29.0%），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居住的佔 61.7%。（張豔萍，2007）養老方式的多樣化，使人們對家庭養老的理解不再局限於合居養老。除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願意與父母分開自立門戶，也有更多的老年人有了獨立居住的意願。調查顯示，城市中老年人表示願意與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僅為 37.2%，無所謂 21.0%，不願意則有 40.8%。而農村中，老年人願意與子女住在一起的為 54.5%，無所謂 24.0%，不願意的為 20.5%。相比而言，農村老年人更傾向與子女生活在一起。（同上注）

在贍養主體上，傳統男權社會結束，實現了男女平等，婦女地位明顯提高，但同時也承擔起相應的義務。傳統「養兒防老」、「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兒子養老、女兒無責的情況發生變化。現代法律明確規定，子女平等享有受撫養權和繼承權，同時也平等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事實上女兒同兒子平等承擔贍養父母義務的做法也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城市地區，相較而言這一變化在農村地區進程稍緩。

在贍養內容上，雖然家庭在經濟供養、日常照顧和精神慰藉三個方面均發

揮著重要作用，但側重點正在並將繼續發生變化。中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尚處於較低水準的情況下就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政府和社會對養老資源的供給有限。養老社會保障水準不高，養老保險覆蓋率和支付水準都較低，家庭是老年人的主要經濟供養來源。但社會保障制度畢竟是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發展，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都在建立或完善中。調查表明，城市老年人養老金（退休金）保障覆蓋率 2000 年男性為 85.6%，女性為 53.6%，2006 年男性上升為 89.1%，女性上升為 64.6%。與此同時，從 2000～2006 年，城市老年人在養老保障的選擇上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把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作為養老意願首選的比例已由 23.4% 升至 50.3%，而優先選擇依靠子女養老的比例則由 52.3% 降至 18.4%。相較而言，農村地區社會養老保障發展緩慢，2006 年僅有 4.8% 的老年人享有養老金保障，（同上注）絕大多數的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子女提供經濟供養，但在這一情況也將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各地的進一步推行和完善後發生變化。除發展社會保險事業外，中央政府還在 2006 年發佈《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意見》，各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方針，以期推動養老服務業的發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託、機構養老為補充的服務體系。養老服務業未來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為家庭對老人照顧提供強大的支援。然而在對老年人的情感慰藉方面，家庭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與親人保持密切的情感交流、享受天倫之樂無論在哪個社會階段都是老年人的重要需求。可以預見，隨著養老社會保障制度和養老服務業不斷完善，未來中國家庭養老功能將逐步以物質贍養及精神慰藉為主。

2.4. 新加坡家庭養老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新加坡尚屬年輕型的國家，但是近年來也呈現出迅速老齡化的趨勢。1999 年新加坡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到 7%，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至 2007 年老年人口已達到 39 萬，佔總人口的 8.5%。據預計，這一比例還將繼續上升，在 2030 年達到 18.7%。(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05)

受儒家「孝」文化的影響，新加坡歷來有尊老敬老、贍養老人的良好的社會氛圍。政府十分重視發揮家庭在養老中的重要作用，鼓勵和要求成年子女承擔起贍養父母的責任。前總理李光耀在 1971 年春節的一次電視講話就指出「孝敬父母、重視家庭是亞洲文化的精髓，是亞洲三大文化最值得也最應該保留的部分。」1995 年 11 月新加坡政府頒佈了《贍養父母法》，首次將子女贍養父母的責任法定化。該法規定凡拒絕資助貧困的年邁父母者，其父母可以向法院起訴，如發現被告子女確實未遵守「贍養父母法」，法院將判決對其罰款一萬新加坡元或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在新加坡，絕大多數的老年人選擇居家養老的養老方式，其中有 76.4% 的老人與子女共同居住，三代同堂的傳統家庭結構在新加坡社會得到了較好的保持。在合居養老的方式下，老年人除方便從子女處獲得的照顧和關懷外，有時還在家務和孫子女的照料上為子女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調查顯示，有約 1/3 的老年人為孫子女提供了經常的照顧。(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MCDS], 2005)

儘管政府推行的以強制儲蓄為原則的中央公積金制度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經濟保障，但家庭仍是老年人經濟供養的重要來源。《2001~2003 年新加坡人社會態度調查》（Survey on Social Attitudes of Singaporeans [SAS]，2001-2003）顯示，幾乎所有的新加坡人（98%）都認為子女應當向他們年老的父母提供經濟供養。而這一態度與實際行為也是吻合的，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實際履行了他們從經濟上贍養父母的義務。（MCDS，2004）根據 2005 年的一項全國調查，有 66% 的 55 歲以上的老年人獲得子女提供的現金支助，其中女性老年人獲得支助的比例更高達 77.3%。調查還表明老年人對子女經濟幫助的依賴程度是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的：對於處於 55~64 歲年齡段的老人，僅有 56.3% 獲得子女的經濟支助，而這一比例在 75 歲以上的老年人上升至 77.9%（表 6）。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2007）

表 6：新加坡老年人獲得子女經濟支助的比例（%）

55 歲以上總計	年齡段		
	55~54 歲	65~74 歲	75 歲以上
66.0	56.3	76.0	77.9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⁸

除了從子女處獲得經濟支持外，大多數老年人都通過各種方式與子女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和情感交流，這些方式主要有與子女聊天、一起進餐、共度假期、商討家庭事務等。2005 年調查顯示，有 94.9% 的老年人每週與子女至少談話一次，81.6% 的老年人每週都與子女一起進餐，79.8% 的老人與子女一起度過閒暇時間，69.9% 的老年人與家人商討家庭事務。（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2007）

此外，在老年人體弱多病時，家人也是首要的照顧提供者。

總而言之，不管是經濟供養、生活照顧還是感情慰藉，家庭都是新加坡老年人尋求幫助的首要場所。表 7 的統計資料有力地證明了這一結論。

表 7：55 歲以上老年人尋求幫助的來源

幫助來源	全部 55 歲或 以上	年齡組別 %		
		55 至 64 歲	65 至 74 歲	75 歲或以上
當生病時				
家人	92.1	93.0	91.3	90.6
朋友	4.2	4.5	4.3	3.2
沒有	5.6	5.5	5.9	5.6
需要經濟幫助時				
家人	87.5	86.5	88.2	89.2
朋友	4.4	5.8	3.3	2.0
沒有	10.1	10.9	9.6	8.5
需要傾談對象時				
家人	91.4	93.3	89.5	89.1
朋友	36.2	36.3	39.3	30.3
沒有	2.2	2.0	1.8	3.4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⁹

政府對家庭養老的支持。為了保持和發揚家庭養老的傳統，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鼓勵和支持措施。為了鼓勵子女與老人同住，政府在住房和稅收政策上提供了許多便利和優惠。如在分配政府組屋時，對三代同堂的家庭給予價格上的優惠和優先安排，同時規定單身男女青年不可租賃或購買組屋，但如願意與父母或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同住，可優先照顧。又如子女同喪偶的父親或母親一起居住，對父母遺留下來的那一間房屋子女可以享受遺產稅的減免優待；如果

納稅人和父母或有殘疾的兄妹一起居住，該納稅人還可享有「父母及殘疾兄弟稅務扣除」的優待等。(韋紅，2000) 政府還推出一系列津貼計劃，為需要贍養老人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養老、醫療方面的津貼，以減輕其家庭負擔，提高其贍養老人的積極性。新加坡政府自 1993 年以來曾推出 12 個「公積金填補計劃」，其中有 4 個是專門的「敬老保健金計劃」，每次計劃政府都撥款 5000 多萬新加坡元，受惠人數達 17~18 萬，每次老年人只要在自己的戶頭裡存入 250 元，就可獲得政府 100~350 元的補充金額，在每次執行填補之前，政府都通過多方呼籲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為家中沒有能力的老人填補戶頭，以讓他們能享有政府的填補數額。(填補戶頭知多少，2001) 此外，政府還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服務體系以減輕家庭養老的負擔。如 2009 年新加坡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決定在未來 5 年內撥款 1800 萬新元在全國增設 6 個老年人日間護理中心和 22 個老年人活動中心，為老年人居家養老提供更完善的社區服務。(呂清，2009)

2.5. 印尼家庭養老

2007 年印尼擁有近 2000 萬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 8.5%，尚屬「年輕型社會」，但近年老年人口迅速增長，預計到 2025 年 60 歲以上老齡人口將佔總人口比例 13.1%，正式進入老齡社會。(UN DESA PD，2007)

家庭養老的傳統價值仍然受到重視，子女均有責任贍養父母，老年人也將兒女作為防老的重要資源。在落後的社會保障體制下，家庭是老年人的主要照顧提供者。由於國家養老金及企業年金計劃覆蓋率均很低，只有 10% 的被覆蓋，

且保障水準也低，老年人的經濟供養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Noveria, 2006) 健康保險覆蓋率低，公共養老機構的稀少，同時也未發展社區照顧體系，老年人的日常照料主要由家庭成員尤其是女性成員承擔。而對於那些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人及患病老人，大量且長期的照料工作及高昂的經濟開支使得部分家庭成員難以承擔。

在養老居住方式上，1997 年有 24.2% 的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與子女分開居住（7.3% 獨居，16.9% 與配偶居住），而有 68.9% 的老人與子女和孫子女共同居住，(Teng, 2007) 因此合居養老仍是主要方式。在居住安排上，與泰國等其他東南亞國家類似，老人偏好與女兒、女婿合住或住得更近，這與日本、韓國偏好與長子合住做法有所不同。(穆光宗) 此外，養老居住方式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響，據一項 2001 年的案例研究，Javanese（印尼最大的民族）老年人更傾向於與成年子女合居的大家庭模式，而 Batak Karo 老年人則喜歡與子女分開居住。(Beard & Kunharibowo, 2001)

印尼中央統計局（BPS）人口調查資料顯示，2000 年有 63.5% 的老年人口居住在農村地區。隨著大量年輕人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或工作等原因遷入城市，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留在農村獨自居住。同時，隨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婦女參與就業。1990 年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為 38.79%，1995 年上升為 40.96%，2000 年上升到 56.52%。(BPS 1993; BPS 1997; BPS 2001) (MCDS, 2005) 城市化與婦女職業化的趨勢，都使得家庭在贍養老人中的職能受到削弱。通過公共政策支持家庭養老，將是印尼政府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參考資料

填補戶頭知多少. (2001, 1 月 21 日). 聯合早報.

Anderson, J. R., & Wilde, J. L. (2008). 美國的家庭政策概述. 7 月 8 日, 2009 擷取,

摘自上海社會科學院:

www.sass.org.cn/eWebEditor/UploadFile/00n/ull/20081129203926238.doc

Asian-Pacific Center. (2001).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lderly Care in*

Asia-Pacific Region - Malaysia, China, Australia & Japan. Fukuoka:

Asian-Pacific Center.

Beard, A.V., & Kunharibowo, Y. (2001).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Support

Relationships among Elderly Indonesians: Case Studies from Java and

Sumat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7(1), 17-33.

Chung, K. et.al. (1998). *Living Profile and Welfare Service Needs of Older Persons*

in Korea.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Daatland, S., & Herlofson, K. (2003). Family Responsibility Norms in European

Countreis: Contrasts and Similarities. *Retraite et Société*, 38, pp. 16-47.

Dallinger, U. (1997). *Ökonomie der Moral: Konflikt zwischen familiärer Pflege und*

Beruf aus handlungstheoretischer Perspektiv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Dallinger, U. (1998). Der Konflikt zwischen familiärer Pflege und Beruf als

handlungstheoretisches 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27, pp. 94-112.

Dallinger, U. (2002). *Elderly Care in the family in Germany*. Retrieved June 5, 2009,

from www.socsci.aau.dk/cost/gender/Workingpapers/UrsulaDallinger.pdf

Ermisch, J. F. (2004). *Parent and Adult-child Interac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ritain*. Essex: Institute for Social & Economic Research.

Gierveld, J. d., Dykstra, P. A., & Schenk, N. (2009). Living Arrangement and Differences in Family Suppor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eminar on Family Support Networks and Population Ageing*. Doha.

Iacovou, M. (2000).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Elderly Europeans*. Essex: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MCDS]. (2004). *State of Families in Singapore: Wellbeing of Elderly in Singapore*. Retrieved June 12, 2009, from <http://fcd.ecitizen.gov.sg/NR/rdonlyres/89400A6C-8621-4882-A238-01D9067C86DB/0/Chpt7.pdf>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MCDS]. (2005).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enior Citizens in Singapore 2005*. Retrieved June 7, 2009, from <http://www.mcys.gov.sg/MCDSFiles/Resource/Materials/NSSC%202005.pdf>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00). *Social Indicators in Korea*. Seoul: National Statistical.

Noveria, M. (2006, June 7-9).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Indonesia*.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1, from Impact of Aging: A Common Challenge for Europe and Asia: <http://www.univie.ac.at/impactofageing/pdf/noveria.pdf>

- Pakula, M. (2005).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Adult Children to Care for Indigent Parents*. Retrieved August 31, 2010, from 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http://www.ncpa.org/pub/ba521>
- Phillipson, C. (1997). Family Care in Great Brita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Ageing International*, 24(Summer), pp. 63-80.
- Ruggles, S. (2007, December). The Decline of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72), pp. 964-989.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05).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Ageing Issues, 2006*. Retrieved May 5, 2009, from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http://app1.mcys.gov.sg/Portals/0/Summary/research/Chapter%201%20-%20Demographic%20Realities.pdf>
- Teng, M.Y. (2007).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Indonesia*.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1, from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http://www.unescap.org/ESID/psis/meetings/Ageing_Change_Family/Living%20arrangements%20among%20the%20elderly%20in%20South-East%20Asia%20by%20Ms%20Yap%20Mui%20Teng.pdf
-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Long Term Care. (1999). *Community Care and Informal Care: Policy options for informal carers of elderly people*. Retrieved June 14, 2009, from With Respect to Old Age: Long Term Car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http://www.archive.official-documents.co.uk/document/cm41/4192/4192-2v3.htm>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DESA PD]. (2007).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0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情報部. (2001). *國民生活狀態調查*. 東京: 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

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情報部. (2001). *國民生活基礎調查*. 東京: 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

王偉. (2001). 日本家庭養老模式的轉變. *日本學刊*(1), 頁 126-139.

田蘭香、嚴基郁. (2009). 日韓長期護理保護發展情況及經驗借鑒. *東北亞論壇*, 18(2).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2007). *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 北京: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呂清. (2009). *新加坡努力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務*. 6月15日, 2009 擷取, 摘自國際線上: <http://gb.cri.cn/19224/2009/02/06/3245s2418172.htm>

李虹、徐新為. (2008). 關注空巢家庭，完善養老、托老體系. *前進論壇*(2), 64.

金泓振. (2008, 11月28日). 世間萬象——天下父母的悲哀. *朝鮮日報*.

韋紅. (2000). *新加坡精神*. 武漢: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徐寶康. (2003, 4月9日). 韓國的忠孝觀——長子瞻養父母不孝者不能為官. *環球時報*.

張豔萍. (2007). 日本社會的老齡化及老年福利政策. *新西部*, 18(09), 頁

121-122.

陳潔君. (2006). 國內外養老模式的比較與借鑒. *經濟與社會發展*, pp. 68-70.

劉乃睿、於新循. (2008). 論我國孝道傳統下老年人長期照護制度的構建. *西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34(5), 106-110.

潘屹. (2008). 從北歐、英國的社會照顧看中國社區照顧服務業的發展. 7 月 15 日, 2009 擷取, 摘自中國民政部:

<http://www.mca.gov.cn/article/mxht/llyj/200803/20080300012829.shtml>

穆光宗. (2002). *家庭養老制度的傳統與變革——基於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一項比較研究*. 北京: 華齡出版社.

附註

-
- ¹ Ruggles , 2007
 - ² Dallinger , 1997
 - ³ Dallinger , 1998
 - ⁴ 日本厚生労働省統計情報部 , 2001a
 - ⁵ 日本厚生労働省統計情報部 , 2001b
 - ⁶ Chung et al , 1998
 - ⁷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 2000
 - ⁸ MCDS , 2005
 - ⁹ MCDS , 2005

附件四.香港贍養父母典型個案

目錄

1. 個案簡述	2
1.1. 個案一	2
1.2. 個案二	3
1.3. 個案三	3
1.4. 個案四	4
1.5. 個案五	5
1.6. 個案六	6
1.7. 個案七	6
1.8. 個案八	7
1.9. 個案九	8
1.10. 個案十	9
1.11. 個案十一	10
1.12. 個案十二	11
2. 模擬參考個案	12
2.1. 模擬個案分析	12
2.2. 調解實踐個案	13
2.2.1. 個案一	13
2.2.2. 個案二	14
附註	17

1. 個案簡述¹

1.1. 個案一

1986 年。求助人：林麗貞（78 歲）。

林麗貞居住在灣仔明豐街某舊樓的天台屋，與年逾 70 歲某甲為鄰，同時收到業主收樓的最後通知，某甲因貧病交逼兼面臨遷居困境，一時看不開而自縊身亡。林秀麗目睹情景後，慌張驚惶地打電話向當區區議員哭訴，她沒有講清楚相關資料就把電話掛斷了，區議員聯同各老人中心社工、義工，跑遍了附近一帶的舊樓天台都沒有找到目標，最後報警求助才聯絡到她。社署安排她入住九龍某老人宿舍，但並沒有因此安心地定居下來，她幾乎天天都跑到舊住所樓下呆坐，似乎在等待或尋找些甚麼。查問原因之後，她道出一段辛酸史：她育有兩子一女，是香港某望族的家庭女傭，40 多歲守寡，獨力把子女培育成才。大女兒商科畢業後，在出口公司擔任會計；大兒子大學畢業，任職船務公司；二兒子高中畢業擔任汽車銷售員。她 50 歲那年結識同鄉男友，不幸被他騙走金錢和房產，被逼搬往天台居住，此事得不到子女的同情和原諒，子女成家後，相繼捨棄她而去。那時她已年過 60，沒有工作，積蓄花完後靠拾荒為生。事隔 10 多年，兒女從未回家探望她，初期大女兒偶而打電話問些事，每當她要求見面時，對方馬上掛上電話，不願留下通訊位址或電話。她回到原址的目的是希望子女回心轉意返到舊地與她會面。她期望子女帶她回家，粗茶淡飯過日子，不想終死在老人院。附近街坊熱心地協助她找尋子女下落，可惜，無情的時光夾著無情的子女溜得無影無蹤，沒有讓她實現願望。

1.2. 個案二

1996 年。求助人：邱平（68 歲）。

68 歲的邱平與妻子和兩個女兒同住。邱夫婦年輕時同在一家夜總會工作，不到 50 歲兩人就退休。由於父親邱老先生擁有兩個產業，一個住宅單位自住，一個商業單位出租，生活費用無憂。邱老先生死後，其妻子前夫之子甲君透過律師與邱平爭產，結果邱輸了官司，甲君贏取了商業單位。由於沒有租金收入邱夫婦要求兩女兒每人每月交 4000 元作為生活費用。兩女兒申述理由如下：我們是祖父母養大的，爸媽從來沒有理會我們。當我們看到他們時，他們大半在睡覺。我們開學，領成績表都是由祖父母或小叔陪同；無論是吃的，用的，穿的，在國外讀大學的學費，都是由祖父母供給，如果沒有祖父母，真不敢相象我們過的是什麼生活；我們住的是祖父的產業，我們只同意負責交管理費及水電煤氣費，其他各自負責，將來我們也不打算繼承遺產，如果爸媽要把產業賣掉，我們分文不要而即時搬走。

1.3. 個案三

1999 年。求助人：溫彬義（72 歲）。

72 歲的溫彬義，溫太已故，與 90 多歲的岳母同住。溫有兩個兒子，大兒阿寬為從幼收養，二兒阿興是親生的。他退休前為制衣廠領班。10 年前，阿興死於交通意外，留下一孫子阿旺。5 年前兒媳改嫁，溫太思子心切，為要留孫子

在身邊，不惜將僅有的一住宅抵押給銀行貸款 100 萬給兒媳為交換孫子阿旺條件。大兒阿寬婚後無子女，溫太要求阿寬夫婦視阿旺為親生兒子。不幸，金融風暴襲來使樓價出現負資產，阿寬還不起樓宇貸款，宣佈破產，生活陷入困境，溫太傷心過度而病逝。不久，阿寬把阿旺送交其親生母親，攜同妻子離家而去，留下父親與外婆。溫彬義一向重視孝道，認為阿寬所舉是不孝的行為，把他痛斥一頓，並請出工會理事長出面評理，要求阿寬留下來一同生活，供養長輩，並要留住孫子阿旺。阿寬作如下回應：我自幼在家受到不公平對待，因為我不是你親生的，弟弟可以念到大學畢業，我小學畢業就到汽車修理廠當學徒，無論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弟弟為先；我每賺一分錢都要交你，用錢向你們要有時還不給，弟弟則自由花費；弟弟結婚大排筵席，我結婚在工會食堂搞個茶會。要不是媽媽硬要留阿旺，滿足其母親提出 100 萬的要求，我不會同意將房子抵押給銀行，現在不會連房子也沒得住，也不會破產。為了阿旺的將來設想，我決定讓他與親娘團聚。現在我阿寬身無分文，夫妻兩從頭開始。我們大家思想不一樣，很難生活在一起。對不起，現時我沒有能力照顧你和外婆，如果我的生活好轉，我一定回來找你，我畢竟是你養大的。

1.4. 個案四

2001 年。求助人：顧勇成（75 歲）。

顧勇成，獨居，年 75 歲，住在灣仔某樓板間房，早年與劉姓女子同居，生下一個女兒珍妮。珍妮 13 歲那年，劉女士在一宗工業意外中身亡，珍妮尚未

成年，劉女士也沒有近親，所有保險公司的賠款和所屬公司的撫恤金約 120 多萬，全部由顧領取。15 年過去了，顧揮霍無度把所有的金錢花光，靠領取綜援過日子，但他覺得領取福利津貼限制多錢少，打算要求女兒每月給他繳租金，再加零用錢 5,000 元。珍妮作以下申訴：我的母親生我的時候，他已有妻子，所以母親一直沒有得到正式的名份。母親死後，他領了百多萬的賠款，錢花到哪裡去我也不知道，我初中畢業，就不讓我唸書，要我在家侍候他，還對我毛手毛腳。我 18 歲進某酒樓做幫廚，後來升為傳菜領班，與該酒樓主廚結婚，婚後得到飲食業集團李總經理器重，夫妻兩人跟着李總創業開餐廳，現有三家分店。我們是白手興家，知道窮人的苦處，因而對慈善事業也略盡棉力。按理幾千元錢是拿得起，但他不值得我養。我娘一生無名無份跟着他，他和我沒有正式的父女關係，我寧可做善事，也不會養他。

1.5. 個案五

2007。求助人：甘志強（58 歲）。

甘志強，中年喪妻，經營裝修公司，生意不錯。栽培獨生子添生到意大利留學，並資助他開設理髮店，成為一名頗有名氣的髮型設計師，收入豐厚。2006 年，甘志強因工程失利，債台高築，宣告破產後不堪刺激中風，並四肢癱瘓，經濟陷入困境，生活也不能自理，唯一的希望是依靠兒子照顧他，沒想到添生沒接他回家，也沒有安排他日後生活，添生認為父親尚年輕，長病難顧，自己既是納稅人，父親的日後生活應由政府負責，自己最多是抽空買點補品去探望

他。

1.6. 個案六

2008 年。求助人：李伯雄（75 歲）。

李伯雄獨居深水埗某座樓宇，靠積蓄維生，他有一名女兒甲君居住灣仔。他因心臟病入院接受手術，其中有一項是用者自付的醫療費用約萬多元，李先生因手頭緊絀，向住院社工求助並申請豁免，但李先生填報的資料是女兒供養，因而不獲接受，除非他的女兒甲君簽署檔聲明不供養父母（俗稱衰仔紙）。李先生找到女兒甲君商量，但甲君不願繳付費用也不簽署聲明，理由是她已繳稅，因而家人有權享有公立醫院一切醫療設施。李先生的病情被拖延多日，心情煩躁之下嚴詞痛斥甲君，以脫離父女關係相逼，結果甲君簽了「衰女紙」。社工迅速為他辦理相關手續後，李伯突然改變主意而不接受援助，理由有二：一是她的女兒甲君享有供養父親的免稅額達 10 多年，但甲君並沒有供養他分毫，一旦領取綜援，擔心女兒會惹上瞞稅之嫌；二是女兒曾受高等教育，獨身，月薪過四萬元，絕對有能力供養父親，決意跟她理論，希望她良心發現。

1.7. 個案七

2008 年。求助人：林洛（73 歲）。

林洛與妻子租住簕簕灣某單位，他有一子一女。兒子為一家投資公司經理，

女兒是酒店公關主任，兄妹兩人每月按時各給 5000 元予母親做家用，租金另計。林 73 歲那年，妻子去世，兄妹兩給他安排入住一套房，每月給 4000 元生活費。林洛不滿，經常到子女家吵罵，甚至打電話給女兒的上司，投訴子女不供養他。最後還到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投訴。林氏兄妹作如下的陳述：我爸是個地盤工人，喜歡喝酒賭博，每次酗酒就對我媽拳打腳踢，我媽做鐘點工養大我們倆，他還經常搶我媽的錢。賭錢輸了就拿我們倆出氣，又打又罵。我母親為了保護我們，寧可自己受皮肉之痛。小時候我們經常看到母親臉上身上青一塊紫一塊，都是父親給打的。我們兩從小下定決心，努力讀書，找份好工作賺錢供養母親。今天我們兄妹倆可以念完大學，又有好的工作單位，第一感謝偉大的母親，第二感謝香港政府和納稅人的助學金。我們秉承母親遺囑照顧他生活，租地方讓他住，每月給 4000 元是仁至義盡啦！

1.8. 個案八

2009 年。求助人：蕭和年（65 歲）。

蕭和年與妻子以及 83 歲的岳母同住一唐樓單位。蕭為一餅店師傅，蕭太自幼患小兒麻痺症，行動不便，沒有工作。他有一子阿潮，大專畢業後任職航空公司，後與劉姓同事結婚，因家裡沒地方住，婚後與女方父母同住，後又添一對子女，也交女方母親照顧。蕭與兒子彼此感情疏落，很少來往，各顧各的生活。蕭已退休多年，靠積蓄供養年邁的岳母和妻子。原本有 150 萬的銀行定期存款，後在銀行職員遊說下，買了雷曼兄弟金融產品，金融危機下使他陷入

困境，又逢岳母中風住護理安老院，每月生活發生問題。他不願意領取綜援，於是向阿潮求助。沒想到阿潮的答覆是這樣：我早已入贅劉家，我該養的是劉家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你年紀輕輕就退休享受人生，我和妻子，岳父岳母日忙夜忙，也就是為一家溫飽。外婆應該由你來養，你養不起，應該找社會福利署，而不是我。

1.9. 個案九

2009 年。求助人：陳伍四妹（88 歲）。

陳伍四妹，88 歲，育有兩子一女。大兒子陳友利是位印刷商人，二兒子陳友友是位工業原料推銷員，本與二兒子同住，因中風下半身癱瘓，並患老人痴呆症，得不到子女照顧，由外甥女曾萍萍代向鄰近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及區議員求助。社工和議員設法與其子女聯絡瞭解情況，可惜只有二兒子陳友友兩夫妻願意會見。

陳太太：我家婆今年 88 歲，17 年前老爺去世，就搬來與我同住，她很固執、囉嗦、暴躁。我們都很遷就她，但是她現在中了風，下半身癱瘓，又患了老人痴呆症。

陳先生：我和我哥哥商量過，輪流照顧媽媽，一家三個月或半年，他說大嫂不同意。兄弟為此爭論傷感情。

陳太太：我們本想請一個菲律賓女傭照顧她，算算工資、尿布、醫藥費，不算吃和住，一月至少要多花 6,000 元。住安老院最少也得花 8,000 元，她的大兒子是個印刷廠老板，員工過百名，經濟環境比我們好得多。大姑奶的丈夫是運輸公司老板，環境很不錯。我從來沒有做過工。98 年金融風暴，先生被裁員後一直找不到工作，還患上腎病，不可以操勞，醫藥費也不少，我的子女賺錢只能養自己。如果家婆像以前那樣健健康康和我們生活，吃住花不了多少錢，現在不一樣，她是不能自理，要花錢請人照顧，我們一家是無法負擔得起。

1.10. 個案十

2010 年。求助人：鄺美蓮（77 歲）。

77 歲的鄺蓮，年輕時就守寡，是個賣雞小販，育有一子一女。女兒嫁往加拿大，兒子阿勝是位室內設計師，畢業於日本，約五年前，阿勝與妻子離婚，搬回與鄺同住。她陳述：「阿勝結識一位來自台灣女子阿芳，一起做生意，向我借一百多萬，他提出把住屋出售，套取兩百多萬，聯名購一間近銅鑼灣的大單位，可以保值，住得更舒適，後來，入住新屋半年，他告訴我接到一宗大生意，需要錢週轉，要求我簽名向財務公司做第二按揭借錢，他叫女友勸我，請我飲茶，買東西送給我，叫我放心，我心軟，就簽字同意。不久，他告訴我已經很久沒月供樓財務公司已托收數公司追債，一共欠下三百多萬債項，再不解決就被封樓，會損失一大筆律師費和手續費，只要我簽個字，錢就可以到手還債。後大耳窿追債上門，在門口潑油。我不得不簽字賣樓。後來發覺阿芳是個好吃懶做

豪賭的女人，我跟她大吵一頓，不許她再接近阿勝。後經社工協助，阿勝成功重組財務，決心戒賭，與阿芳分手，在一間裝修公司做設計師，收入近 2 萬元，我們母子倆租住一單位，生活過得不錯。可惜好景不常，他偷偷與阿芳復合，半年前，搬出去住，也不給錢，現在業主已申請收樓，我急得到處找阿勝，他不願意見我，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我他將要結婚，不能再理我，叫我找區議員或社工幫忙。我本想找加拿大的女兒，要求她供養我，她不會原諒我。我沒有讓她升中學，留她在雞檔幫手，才 18 歲就把她嫁給一個比她大 15 歲的加拿大華人，婚後曾向我借 2 萬元加幣，幫她丈夫開小賣店，我不肯借，她不理我是有道理的，阿勝敗了我的財產，掏空了我的棺材本，為了娶一個我不喜歡的女人而離棄我，如此不逆子，我要告他。」

1.11. 個案十一

2010 年。求助人：李小媚（83 歲）。

李小媚現年 83 歲，已患老年癡呆症。由她的乾兒子阿強代為申述。李女士有一子一女，本有一個近 700 呎的自住單位，與丈夫、兒子阿紳、乾兒子阿強同住，生活融洽。丈夫死後，因自己體弱多病，把產權轉給兒子。不久，李女士失憶，阿紳把物業出售套現 300 萬，歸為己有，並要求阿強帶母親搬出，每個月給母親 2000 元，自己則另覓住處。從此，阿強負起照顧乾娘的責任。2010 年聖誕夜，李女士到友人家聚餐後，回家路上被人撞跌倒地，盆骨爆裂，左腳骨折住院。出院後，生活不能自理，醫生建議住護理安老院，每月約 8000 元費用。阿強本是酒樓侍應生，因要照顧李女士，只能做散工，收入不穩定，又沒

有積蓄，遂找阿紳討論安排李女士日後生活問題。阿紳作如下回應：母親一向視你為己出，她從來不信任我，早年她把食堂生意交給你，而不給我，她養你幾十年，現在你應該養她。今後，我還是每月給 2000 元，你再問我姐姐拿 2000 元，其他應由你包底，你是正式上契的兒子，年紀比我大，你是大佬，再不夠找社會福利署。

1.12. 個案十二

2010 年。求助人：梁潘帶銀（71 歲）。

梁老太年過 70，與兒子甲君、媳婦乙君、孫子女同住灣仔駱克道某單位，一家五口，家務由她一手包辦，例如買餸、煮飯、洗衫、清潔等，兒子和媳婦受過中等教育，分別是巴士司機和洗衣店簿記員，他們給的家用並不多，20 多年來老太把私人積蓄補貼家庭開銷，年輕時還到鄰居做鐘點女工幫補家計。梁老太雖然勤奮持家，卻沒有得到家人的欣賞和尊重，孫女對她諸多挑剔，如衣服燙得不好，飯菜單調乏味等，討厭她經常抹驅風油而嫌她身臭，經常對她呼喝並無理取鬧。有一天，梁老太在家跌倒，由救護車送急診室，經醫生診斷為中風而跌導致骨盆爆裂。經治療後，她須坐輪椅渡餘生。後經社工協助，領取政府傷殘津貼，並被安排入住私人安老院，但每月尚欠 2000 多元住宿費。而她的兒媳不願供給。梁老太認為她為兒子一家付出那麼多，現在應該得到贍養，況且他們是有能力負擔。

2. 模擬參考個案

2.1. 模擬個案分析

原告人：黃先生，被告人：劉先生

黃先生居住灣仔道某大廈，是一名的士司機，妻子陳氏，婚後並沒有生育兒女，但視妻子前夫所生的女兒甲君如己出，對她愛護備至並送她遠赴美國留學。甲君畢業後與來自台灣同學劉君結婚。2001 年，劉君以生意週轉為理由提出向岳父借產融資，據黃先生說，他是同意以信託形式把房產借給劉氏。劉氏找了律師辦妥手續後就回到美國去。不久，黃先生從政府寄來的公函中發覺自己不再是業主，遂找女婿問個因由，但劉君迴避並失去聯絡。黃先生就此事透過民事訴訟程序控告劉君騙產，劉氏在答辯書中稱，黃先生在拉斯維加斯賭輸了，由他代支賭本，故用房產償還。2007 年，劉氏夫婦突然回港，適逢陳氏正因患癌症而接受切除乳房手術，劉氏夫婦以關懷陳氏病情為由而入住上址。有一天，趁黃先生夫婦外出，劉君更換大門鎖把兩老拒於門外，黃先生召警求助，但劉君出示文件證明自己是業主而表示有權不讓任何人入屋，警方把案件轉介社會福利署。後黃先生被安排在聖雅各福群會屬下臨時宿舍，陳女士則暫住朋友家中。該案件已糾纏了 7 年，至今仍來回在高院及地院間處理中，地院的法官曾建議雙方透過調解解決。究竟是劉君騙產？還是黃先生輸了錢以樓贖還呢？且看清官如何斷家事。

分析：

- (1) 有調解的空間，當事人雙方對調解制度的認知不足；
- (2) 司法部門可引用民事官司調解為先的宗旨，建議雙方律師或當事人，尋求專業調解員負責調解。

以新加坡《贍養父母法案》為例，原告人黃先生夫婦可向法院申請贍養令，原告人的權益得到法律維護；當被告認識到不供養父母違法的行為，對處理「爭產」的態度和手法可能有所不同，有助於化解雙方的僵局，促使雙方自願選擇透過調解解決糾紛。

2.2. 調解實踐個案

2.2.1. 個案一

阿賢 30 歲，已婚，與父親擁有一共同物業，阿賢因需要用錢，提出將物業賣出，因而導致嚴重衝突，甚至有暴力的威脅，經調解員個別及共同面談雙方，大家終於達成共識，將物業售出及所得到的利益分配，不但使雙方得到所需保障，達到老有所養的目的，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也遏止關係惡化，更及早避免家庭暴力，促進社會和諧的意義。

分析：

- (1) 需要交由專業調解員負責。

中國人一向都有「厭訟」的觀念，為顧及面子問題，認為「家醜不外揚」，與子女對簿公堂不但傷感情，而要花錢花時間，財政和心裡壓力都是一般長者

所不能接受，寧可忍氣吞聲。調解的特質是保密、自願參與、較為省時省金錢，在調解員協助透過協商尋求共識，最終由自己作出任何決定。本案例透過雙方簽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和解協議書，無須入官府也可以得到有法律保障的文件，對雙方都有好處。在專業調解員協助下，促成雙方溝通、聆聽、表達觀感；終於達成共識，雙方得到各自所需，防止父子關係惡化，避免產生家庭暴力。

2.2.2. 個案二

陳幼美（下簡稱甲），嫁給比她年長 17 年的關先生做繼室，並沒有生育子女，但關先生的前妻育有三男一女。65 歲那年，關先生逝世，留下一間個人名下的自住單位並立下遺囑，遺囑主要內容有三點：（1）繼室陳幼美，身份証號碼：Axxx012（x）享有居住權，一直到她百年歸老或自動放棄，改嫁作自動放棄論，否則任何人不得干涉；（2）陳幼美死後或自動放棄，房產則歸其女兒關敏清，身份証號碼：Kxxx471（x）所有；（3）陳幼美若因環境變故而出售物業，必須得到關敏清同意。關敏清（下簡稱乙）在她父親死後不久即搬入該單位與繼母同住，她求財心切，千方百計想把繼母逼走，乙在家中養大狼狗，播放新潮音樂及成人電影，故意做出許多令甲難堪的事。有一天，甲精神恍惚地走在街上被的士撞倒送往醫院，康復後，她害怕乙會繼續對她不利而不願意出院，向社工和區議員求助，幫忙勸乙搬走，並把所有的首飾贈送乙以示友善。社工和區議員多次聯絡乙，希望從中介入調和，但乙不合作也不給予正面答覆。有一天晚上，趁社工不在場，乙單獨到醫院與甲會面，友善地表示接納各方的意見而決定搬出，但要求甲必須簽署一份文件以便辦理她父親名下的銀行賬戶手續。甲不以為然，簽署了一份英文文件，翌日，社工陪同甲出院回到家中，乙

擋住大門不讓她入屋，並出示甲無條件自動放棄並願意搬出該單位的文件，經核對後，的確是甲的親筆簽名，日子則是在甲入院前，甲簽名下方還有一個見證人及簽名，但甲並不相識此人。

負責的社工，啟動緊急援助機制，把甲安頓在臨時宿舍後，馬上向部門主管匯報實情。商討如何協助甲討回公道，調解包括報警求助或聘請律師循民事途徑打官司。經徵詢甲個人意願後，她有以下幾項見解：家醜不外揚，不想把事情鬧大；手頭沒有充裕的現金支付律師費；很想早日能安頓下來，找個住所存放先夫遺物；精神難以支撐；如果報警，一旦真相大白，擔心乙會有牢獄之災，對不起死去的丈夫；財產帶不進棺材，死後也是歸乙，倒不如趁早分給她。經多方考慮後，建議交由專業調解員協助。

社工與乙取得聯絡後，觀察所得，文件上的見證人是她由內地到港公幹的同居男友所簽署。乙有 6 個月身孕，將不能從事按摩師工作，急需有一筆錢維持生活；乙明白誘使繼母簽署文件，用不正當的方法騙取利益是刑事罪行；難以應付正義的社工和區議員；乙瞭解調解的好處，包括自願性參加、保密、花費不多、時間快捷、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協議、經雙方簽署的協議書具有法律效力。最後她同意用調解方式解決問題，在社工協助下，甲乙雙方簽署《和解服務同意書》。形式及內容請參閱文末範本。

在調解員協助下，經過 3 小時的會議雙方達成共識，簽署下列具法律效力的《和解協議書》。

和解協議書

本協議訂立於 2008 年 12 月 12 日。訂約一方為陳幼美，身份證號碼：AXXX012 (X)，地址是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以下稱甲方），另一方為關敏清，身份證號碼：KXXX471 (X)，地址是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以下稱乙方）。

茲鑒於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物業分配權事宜，經公正調解中心調解員曾善基_____協助調解後，同意遵守及執行下列各項條款：

- (1) 甲自願放棄居住灣仔道 232 號 18 樓 C 座，即日起搬離該單位。乙可繼續住在該單位，一直到樓宇出售交吉；
- (2) 甲乙雙方同意委托 ABC 律師行辦理上述物業的遺產繼承手續，律師費由雙方平均分擔；
- (3) 甲乙雙方同意把物業在市場公開出售，由乙君負責議價；
- (4) 所有賣樓手續交由 ABC 律師行辦理，涉及賣樓的款項交由 ABC 律師行代管，待全部手續辦妥後扣除相關費用，ABC 律師行分別開出兩張支票予甲乙雙方，分配比例：甲取三分之一，乙取三分之二；
- (5) 雙方不得干預對方如何使用賣樓所得的款項；
- (6) 任何一方不得再就遺囑內容提出異議；
- (7) 當雙方履行所有協議後，乙負責安排與所有家庭成員一起聚餐，費用由乙支付；
- (8) 乙產下孩子後，甲以祖母身份擺四席滿月酒宴請親戚朋友；
- (9) 在甲乙雙方完全履行此和解協議後，雙方須放棄一切控訴對方的權利；
- (10) 本協議以香港法律詮釋及執行；

陳幼美（簽署）

關敏清（簽署）

甲方姓名

乙方姓名

附註

¹ 7 註：個案中所有稱謂均為化名